成敗之鑑

陳立夫





成敗之鑑

陳立夫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六日

成敗之鑑——陳立夫回憶錄

著　　者：陳立夫
發 行 人：武奎煜
出版發行：正中書局
地　　址：台北市衡陽路20號
電　　話：（02）3822815·3821496
郵政劃撥：0009914－5
FAX NO：（02）382－2805
台中門市：台北市雙十路二段62號
台中電話：(04)2381945 • 2381946
FAX NO：(04)238-1943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六月臺初版
　　　　　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六月第二次印行

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
局版臺業字第〇一九九號（9321）
分類號碼：782.00.007（3,000）（9.60）（版）新
　　　　　（10.60）（版）新
ISBN 957-09-0904-8（精）
ISBN 957-09-0905-6（平）
定　價：（精）五三〇元
　　　　（平）四八〇元

海外分局
香港：集成圖書公司
地址：香港九龍油蔴地北海街七號
電話：3－886172－4・FAX NO:3－886174
日本：海風書店
地址：東京都千代田區神田神保町一丁目五六番地
電話：（03）32914344 FAX NO:（03）291－4345
泰國：集成圖書公司
地址：曼谷耀華力路233號
電話：2226573 FAX NO:2235483
美國：華強圖書公司
地址：41－35,Kissena Boulevard,Flushing,
N.Y.11355 U.S.A.
電話：（718）7628889 FAX NO:（718）762－8889
歐洲：英華圖書公司
地址：14, Gerrard Street, London, WI England
電話：（071）439-8825 FAX NO:（071）4391183



● 民國3年祖父冥誕，與祖母、父親、二叔(嬸)、三叔(嬸)
及兄弟姊妹們合影(文見P.4)



● 父親陳其業，字勤士（文見P.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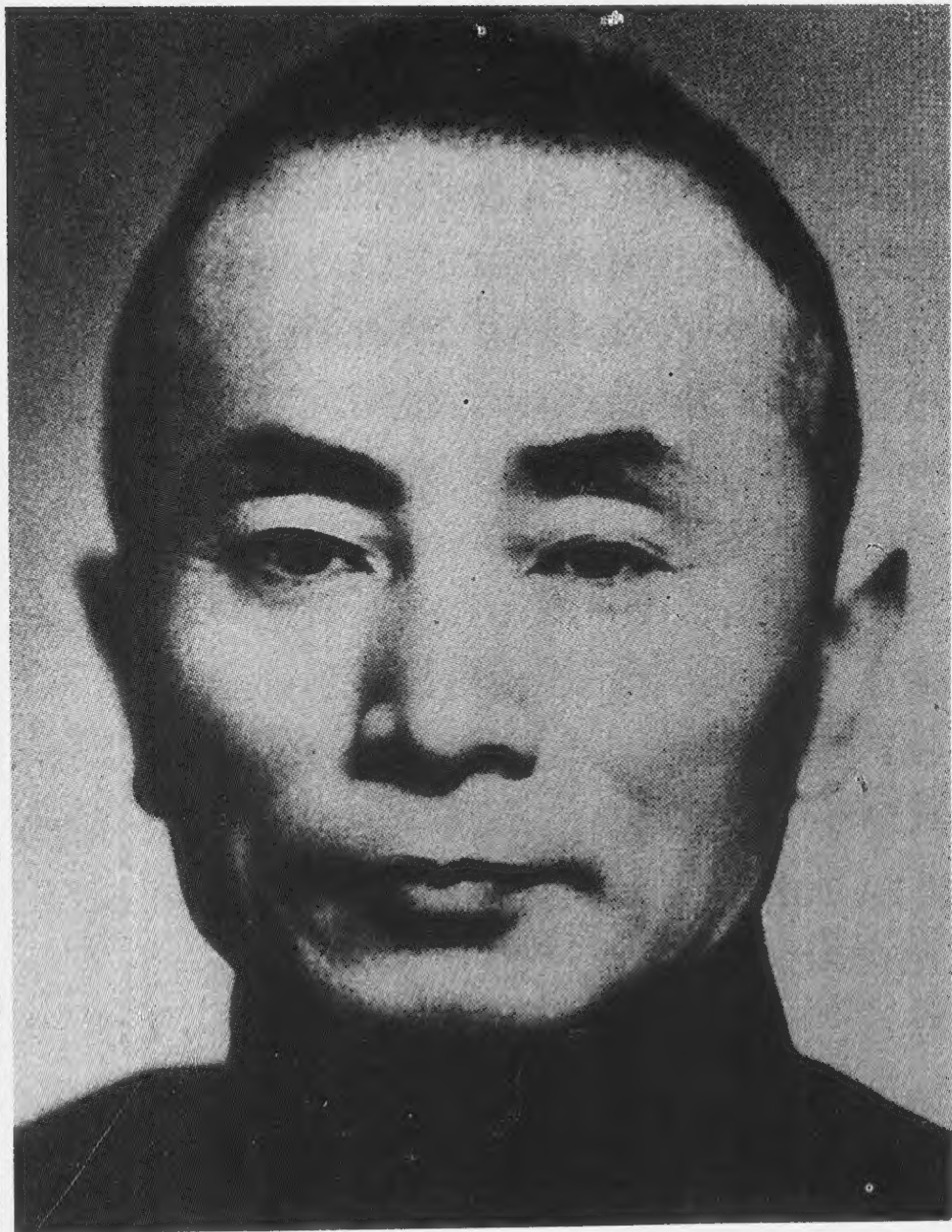
● 母親何氏，名文娥（文見P.5）



●二叔陳其美，字英士（文見P.4）



●三叔陳其采，字藹士（文見P.5）



● 大哥陳祖壽，字果夫（文見P.8）



● 在史克蘭敦白煤礦區工作時所攝（文見P.37）



● 民國13年於匹茲堡大學畢業得碩士學位時留影（文見P.33）



●民國15年任蔣校長機要祕書時攝（文見P.46）



● 與邵力子攝於重慶（文見P.47）



●北伐軍總司令蔣公贈予留念



●民國17年北京西山碧雲寺爲國父陵寢厝置之處，
亦即西山會議派之名稱之所出，同攝爲機要科同仁（文見P.131）



● 李宗仁先生贈(民國2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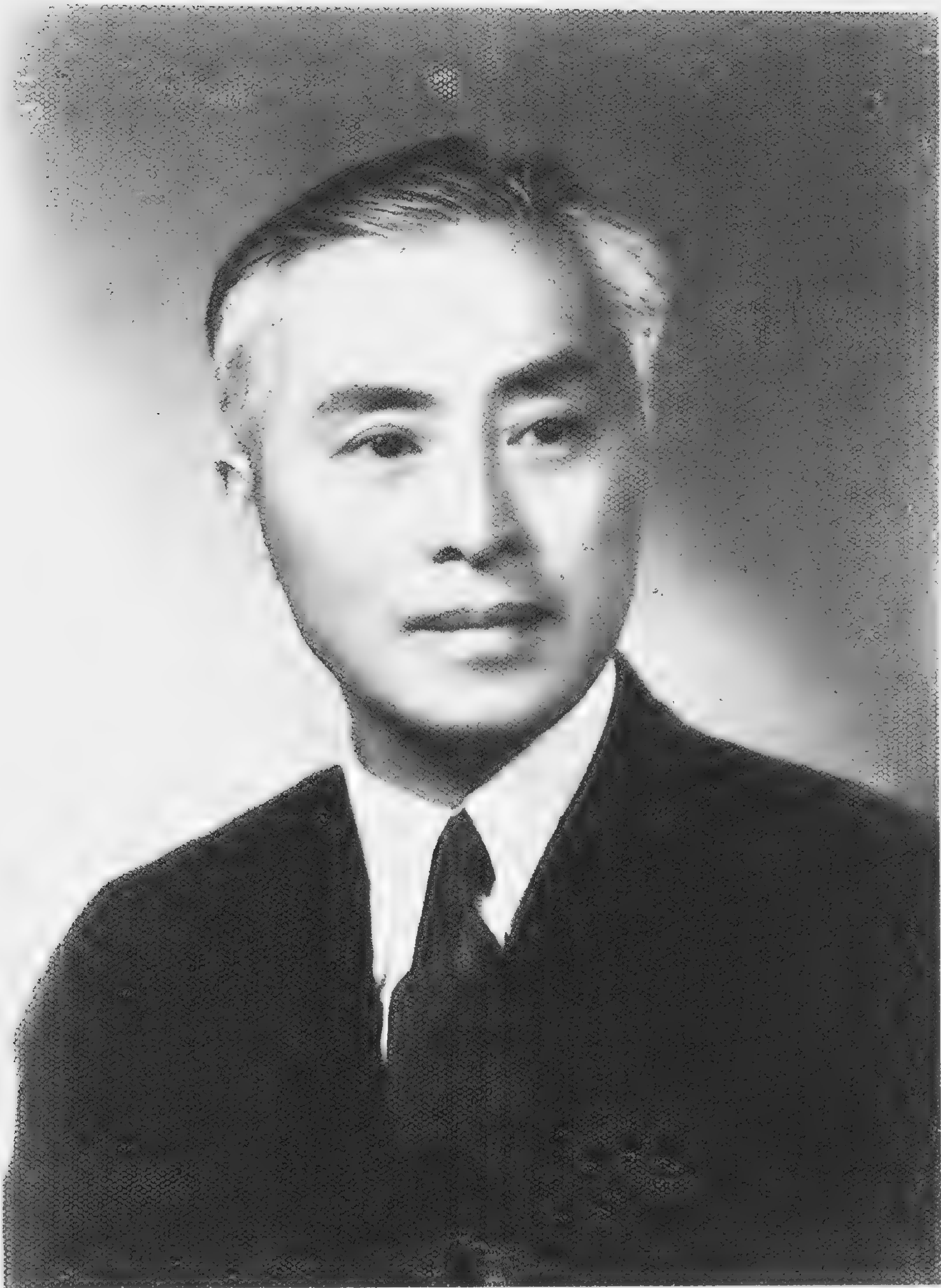
● 戴季陶先生贈(民國17年8月攝)



● 民國20年植樹節與稚暉先生、民誼先生、居正先生合攝（由右至左）



● 抗戰初奉命接洽俄援，在新疆與盛督辦世才及俄駐華大使等合攝於迪化（文見P.209）



●民國21年出任中央組織部部長時所攝（文見P.182）

果夫
立夫兩先生：

分手十年，國難日亟。報載兩先生有聯俄之舉，雖屬道路傳聞，然已可窺見兩先生最近趨向。黃君從金陵來，知養甫先生所策劃者，正為賢者所主持，呼高應遠，想見襟懷。今日之事，[illegible]國之[illegible]已非昔比。敝黨數年呼籲，得兩先生為之振導，使兩黨重趨合作，國難轉機，定在此一舉。

近者寇入益深，偽軍侵綏，已成事實，日本航空總站，且更設於寧夏，西北危亡，迫在旦夕，乃西南出兵，抗日討[illegible]，此不僅為貴黨諸公之所快，抑且更貽國人以口實矣。敝方自一方面軍到西北後，已數作停戰要求，今二四兩方面軍亦已北入陝甘，其目的全在會合抗日，直接西北，即所以保中國。敝方[illegible]遣[illegible]貴黨中央，以求兩方一般方針及建立兩黨合作之[illegible]協定，以[illegible]已[illegible]，得兩黨談話。兩先生如有意於此，請與蔣先生直接切商，而陳[illegible]更進一言，立停軍事行動，實行聯俄聯共，一致抗日，則民族壁壘一新，日寇雖狡，謀將挫矣。[illegible]必為之一戰[illegible]所由破，此乃敵計之成。

敝方為貫澈此主張，早已準備隨時與貴方負責代表作具體談判。現[illegible]由先生函邀面敘，[illegible]所欣迎。但望兩先生能直接與會。為果夫先生公忙不克分身，請以立夫先生主持方作以便雙方迅作負責之商談。想兩先生亦同此心，必不以鄙言為河漢。

臨穎神馳，請待明教。專此並頌
時祉

周恩來
九月一日

●周恩來來信（文見P.193）



● 民國20年召開國民會議，主席團合影。
由右至左／林植夫、陳立夫、戴季陶、吳鐵城、劉純一、
張學良、張繼、于右任、周作民、葉楚傖。
（文見P.176）

自序

陳立夫

當我小的時候，在私塾裏唸四書五經時，常常聽到一句勉勵人的話：「有志者事竟成。」我因此在民國元年到上海青年會所舉辦的夏令營中參觀了若干工廠後，就立志以「工業建國」爲己任，而考入了南洋路礦學校。有一天，大哥果夫帶我到二叔英士的秘密集會處所去看他。恰巧三叔、蔣介石、居正、于右任、戴季陶諸叔都在座，似乎在商議重大軍機起義反袁稱帝之事，他們見了我，就問我喜歡學什麼？我就以工礦爲答，並說明我相信工業建國，須從煤鐵入手，大家聽了，非常稱讚。

從此我就向此方向進行，南洋路礦學校畢業後，再設法考進國立北洋大學採礦工程科，其時家中因革命被袁氏抄家，窮困之極，幸賴三叔藹士及大哥之助，及本人之成績優良，若干費用可免，加以暑期中爲人測量田地，以所得勉強讀完大學。

「天助自助者」一語，竟應驗到了我能於一九二三年秋赴美深造，一家富有的楊氏親

戚，其兒子不肯唸書，要我帶他去美國，換換環境，或許有助。他們願爲我分擔旅費及部份學費，我允之。一面到匹茲堡大學深造採礦工程，週末到飯館工作以自給，一面帶了十八歲青年唸英文，沒想到一個習慣壞了的青年，好事不要學，壞事一學就會，我想盡方法教他學好，毫無效果，結果我一年以後得到了碩士學位，就要到煤礦中去做工了，無暇管他，祇能遣他回國，後來他把家產賣光，做乞丐死於橋下，此乃母教太壞，無志於學的結果。可悲也。

楊君離去，如釋重負。與友人徐恩曾開車暢遊美東諸州名勝地，並參加中國留學生年會共兩個多月，看到及學到美國情形不少。隨即到不同的煤礦中實習了一年多，並參加美國煤礦工會爲會員。在此期間，礦內一切工作都實習到了，碰到危險次數亦不少，滿懷希望將來回國可任工程師，不料一九二五年發生了美國煤礦大罷工，一時沒有工作可做，大哥來電促歸，謂介石叔要我去廣州幫忙。在我回到上海之日，山東中興煤礦公司董事長錢新之先生，即將聘書送到，聘我任工程師。我倒很願意接受，但大哥堅決要我先去廣州見了介叔，當面陳述理由，再去不遲。不料一到廣州見了蔣校長，他不讓我陳述，立即發表我爲校長辦公廳機要秘書，在其公館與邵力子先生共同辦公，不久邵先生被派赴馮玉祥處擔任工作，我獨任其職。一位習工程的人，擔任機要文書，簡直摸不著頭腦，祇能邊做邊學，幸無隕越。

從此開始，我的一生志願全部落空了！我是來幫助一位偉大人物完成他救國之大志——

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使中國得到自由平等——犧牲個人之小志，完成國家之大志，我又何怨何尤！

當我在寫碩士論文的時候，仔細看了總理的實業計劃暨建國方略，欽佩無已。這正合乎我的志願了，我就在舊金山本黨總支部加入列爲黨員，今既來幫助蔣公，以實踐總理的計畫，豈不是間接達到我的志願嗎！我想通了，我應該努力工作！但是我在文件中所看到的，使我大失所望。政治原來是這樣污穢的，因爲蔣公此時已統一了廣東，而在總理逝世後，汪精衛掌握了黨政的所有大權，和共黨及蘇聯顧問勾結，將黨內重要職位都送給了共黨，而且用盡方法先逼走胡漢民先生，再迫使蔣公離粵去俄，表面上是考察，實際上是充軍，在「以黨治政，以政治軍」的口號下，蔣公是受支配的。在一九二六年三月中旬時，蔣公和我二人，持了去蘇俄護照，準備行裝，由東山公館去珠江碼頭，準備搭船赴香港，轉蘇聯。在汽車中經我力勸，在途中徘徊數次，卒決定不走，遂發生三月二十日之事變，目的在殺蔣或綁蔣出國，幸蔣公先獲情報，先下手爲強，共黨之陰謀未逞，而汪精衛畏罪潛逃，黨政復歸本黨同志所掌握，北伐之計劃始能實現，此一歷史性之轉捩點，實爲黨國存亡之所關，我幸而親與其事，而有所貢獻。

在事變敉平之次二日，蔣公在虎門要塞司令部陳肇英同志處休息，對我口授北伐計劃而由我筆錄之，蓋以往蔣公呈軍委員會各項重要軍事計劃，全被俄顧問季山嘉將軍及汪精衛所

擱置不批，北伐乃總理未竟之志，非蔣公之軍事天才，無法以達成之也。今者，蔣公可自由以行其計劃矣。黨務方面，有大哥代理蔣公之組織部長職務，開始從共黨手中收回黨權，組訓幹部，以代替及充實各省市被共黨控制之黨部。鮑羅廷雖狡猾，經受制於張靜江與陳果夫二人，而無從施其詭計。政治方面有譚延闓先生主其事，軍事方面有李濟琛將軍主其事，後方安定，蔣公始安心可於同年八月誓師北伐矣。

蔣公對於三月二十日事變，不予深究者，其原因有二：㈠北伐未奏功以前，內部必須團結，容共政策，仍須繼續；㈡蘇聯軍援，尚未到達，惟此番之北伐，雖尚未準備成熟，亦不得不出之於冒險，蓋時機已成熟矣。八月誓師之日起以及攻下武漢，爲時僅兩個月，吳佩孚爲軍閥中之最強者，主力爲我軍擊潰於兩湖之間，無力反攻，我乃東向以攻孫傳芳軍於南昌城外而擊潰之。與福建北進之吾軍會師於上海與南京，是爲次年四月之事，長江以南全入吾軍掌握。爲時總共僅八個月，在中國歷史上所僅見之速也。其所以致此者：㈠蔣總司令經常在最前線督戰；㈡將士朝氣蓬勃；㈢人民到處協助歡迎；㈣機要科人員日夜工作，使前方請示之電文立即得復。

長江以南諸省甫底定，理應乘勝北進，而共黨之陰謀日顯，造成寧漢分裂之局，不得已，蔣公乘此時機，得本黨監察委員諸老同志之助，舉行清黨，幸各省黨部已經本黨同志所掌握，上海方面有青幫之全力支助本黨，軍隊方面政訓工作雖多數爲共黨份子，而部隊長官

則都爲本黨同志，故一舉而清黨成功，而反共之本黨西山會議派同志，全部歸隊，愈見本黨的團結。

繼續北伐，始於一九二八年四月七日，張宗昌軍隊無多大抵抗力量，紛紛敗北。不久我軍已佔濟南，日軍出而阻擾，造成五月三日濟南慘案。蔣公一面應付日人，一面令我軍繼續渡河北進。是時日人又炸死張作霖於回東北途中，其時閻馮兩方已早有人聯繫，共同來歸，十七年六月八日北京遂入我軍之手，北伐工作，遂告一段落，爲時僅兩個月。及張學良東北易幟，而全國始告統一，是爲十七年十二月十九日之事也（計時亦僅八個月）。從廣州誓師出發至佔領北京，作戰時間總共僅十個月而已，創中國歷史中之先例。

統一以後，蔣公爲實行總理之遺囑，召開國民會議，制定訓政時期之約法而頒布之。並開始從事各項建設。惜乎所有畏威而歸順之軍閥，均因要求未遂，又怕被蔣公消滅，先後叛變。例如十八年十二月二日之石友三，十八年十二月五日之唐生智，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之桂系，二十年三月一日之廣東，十九年四月一日之閻馮，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之陳銘樞，二十五年六月四日之陳濟棠與李宗仁。其中亦有汪精衛參與者，所幸叛逆者之軍事計劃來往密電，機要科均能破譯出來，呈送蔣公恭閱，知己知彼，一一爲之擊潰，同時共黨在各地之秘密活動，亦經調統機構先後爲之破滅，連其特工頭子顧順章，亦投順我方，故無大患，所可惜者，該數年戰爭不止，元氣大傷，若干爲民造福之建設，無財力以舉辦，至爲可惜。

安內始能攘外，對我最大之擾攘，乃爲日本帝國主義者，始則二十年九一八之東北被佔，二十一年三月九日成立僞滿州國，繼而於二十二年五月三十一日擴及華北，最後有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之蘆溝橋事變，造成了八年之中日戰爭，蔣公一面剿共，一面備戰，艱苦備嘗而仍不見諒於國人，遂有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三日西安事變之發生，幸事前我奉命與中共商妥共同抗日之條件及宣言，同時與蘇聯訂立互不侵犯條約，蘇聯認識蔣公之安危，有關蘇聯之存亡，致使中共未投井下石，加以蔣公日記之所記及中央決策之正確，並經多方面之營救，得以轉危爲安，而抗戰始有人領導矣。

苦戰八年，全國上下一致，我則擔任教育行政，安置數十萬由淪陷區逃出之青年，予以求學機會，並去除殖民地教育制而成爲中國式學制，此二者均對台灣復興基地有大大助益。日寇瘋狂侵美，而受原子彈之報復，日軍遂無條件投降，勝利後，各帝國主義者，乃紛紛對我放棄不平等條約，就是總理遺囑中所特別指出者，蔣公竟又爲之一一實現。後來美國羅斯福總統提議組織聯合國，中國被列爲五強之一，從此次殖名地之中國一躍而爲世界五強之一，中國人民莫不感謝美國之助也。

勝利之後，蔣公思路忽變，聽信政客之言，政治、財政、外交、軍事所採之方針，均大失民心，而有利於中共，加以國大選舉方針之錯失，致李宗仁當選副總統，從此軍事失利，退守台灣，以待反攻復國，前途如何，有待加緊努力矣。

總而言之，蔣公一生之成就，可謂仰不愧於總理與黨國，俯不怍於國人及後代子孫。但在國際方面，則毀譽參半。此無他，蔣公成爲所有失去既得權利之帝國主義者之共同敵人，共黨對我不利或不實之宣傳，遂成爲供應帝國主義者攻擊我人之資料，積非成是，解釋無從，祇求問心無愧，毀譽聽之於人而已。

我既有志未伸，除了幫助蔣公外，究竟成就了什麼？其答案是：

• 我以採礦的精神和方法，開採了中國文化的礦藏；

• 我二十八年八月建議了以孔子誕辰爲全國教師節，使孔子與教育界復歸于聯繫；

• 我把以往士人所必讀的四書，加以有系統之整理，名之曰「四書道貫」；

• 我把孔子之教，歸納成爲「公以顯道，誠以律己，仁以待人，中以處事，行以成物」五句，而使易以了解；

• 我闡明了中國人所講的「人道」是秉乎「天道」，源於易經，至善至美，故能成爲「道統」，傳承數千年而不斷，並形成了「大剛中正」之民族特性，四維八德，都由此出，己身雖乏宗教，而民德歸厚；

• 我歸納中國文化爲「重人兼重德」的王道文化，異於資本主義文化之「重財而輕德」，以及共產主義文化之「重物而輕人」，斯二者，各趨極端，其爲毀滅人倫則一，難於久存，共產主義不及一年已爲東歐諸國所擯棄，蘇聯亦隨而棄之，可以見言之有先見也。惟

中國文化，重家族，尚倫理，崇互助，乃爲人類所崇尚的文化，而能使人類共享和平之幸福；

．「孝」爲人類繼往開來之所繫，爲儒、道、法等家所共同倡導者，孝悌爲仁之本，不可忽也，失之者，自趨毀滅之道也；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易經》），本立則道生，道也者，人類共生共存共進化之大路，德也者，行此大路之方法也，仁義道德，國父稱之爲「互助」之用，爲人類不可須臾離也，知此，則國父繼承中國道統之意義明矣；

．「互助」爲人類進化時期之原則。具體而言，「倫理」是也，倫理喪亡，人與禽獸無異矣，故文化之高下，應視其倫理之謹守程度爲斷也。民主乃增強人類集體生存之方式，科學爲增進人類生活之豐富，均不若倫理爲人類共生共存之保障爲更重要也；

．強人同我，爲自私；忍小異而持大同，爲至公。故能「愛其所同，敬其所異」，則和平在其中矣。人與人，家與家，國與國，如能忍小異而持大同，則世界和平，人類福祉，乃能達致，我國祖先眼光之遠大，可以見矣。

我之貢獻，如此而已矣，敬請指教！

此書之成，有賴夏蓮英、胡有瑞、張修蓉三女士先後錄音記錄，後蒙賴世士兄之悉心整理，董鼎山先生之譯成英文，最後承張緒心、馬若孟兩教授之合理安排及修正，並承太平洋基金會之資助，更感美國「胡佛研究所」爲之出版英文本，謹此一併致由衷之謝忱。

陳立夫

怎樣看成敗？

您所不知道的
中國現代史料

陳立夫先生

以珍貴的圖文史料

爲現代中國歷史做見證

- ⊙非常精明的譚延闓
  爲什麼願屈居蔣先生之下
- ⊙[illegible]？
- ⊙日本人警告張作霖
  不許他加入國民黨
- ⊙假如……，閻錫山、馮玉祥
  也不會叛變
- ⊙民國18年
  陳立夫[illegible]
- ⊙戴季陶爲什麼是共黨最大敵人？
- ⊙周恩來
  不與[illegible]他們，[illegible]
- ⊙中國國民黨爲什[illegible]
- ⊙汪精衛爲什麼[illegible]
  [illegible]記者
- ⊙中山艦事件
  對中國近代史的影響
- ⊙蔣公隱退，李宗仁代理，
  政局不穩
- ⊙大陸失敗的主因是
- ⊙CC名稱從何而來
- ⊙陳立夫爲什麼到美國養雞

陳立夫

民前十一年，
出生於浙江吳興
少時就讀於吳興縣私塾，
及長畢業天津國立北洋大學
並留學美國匹茲堡大學
採礦工程科。
民國十四年起，
返國後被蔣公任命為
黃埔軍校校長辦公廳機要秘書，
抗日軍興，
由中央組織部長調任教育部長
擬訂定戰時教育綱領，
提高行政效率，
使教育工作雖在戰時
仍能不斷革新進步，
為國家未來培育所需建國人才。
政府遷台，
向蔣公建議改造國民黨，
自身則引咎辭退，
並離開政壇，前往美國，
[illegible]
民國五十八年奉召返國，
[illegible]山居，不與政務
仍以總統府資政身分
協助文化復興運動，
九十歲，以數年來鬻字所得，
成立財團法人
立夫醫藥研究文教基金會，
用以鼓勵國內外學者從事
中醫藥學術高深之研究

封面設計●林[illegible]
[illegible]
責任編輯●[illegible]
內頁設計●[illegible]

成敗之鑑——陳立夫回憶錄

【目次】

1 早年

民前八年至民國十四年

2 北伐初期

民國十四年冬至十六年冬

3 完成北伐時期

民國十七年春至二十年冬

4 與共黨折衝時期

民國二十一年春至二十六年夏

5 全力推展戰時教育時期

民國二十六年秋至三十四年夏

6 戡亂逆挫大陸淪陷時期

民國三十四年秋至三十八年冬

7 建議改造本黨時期

民國三十九年秋至五十八年冬

8 全力貫注復興中華文化時期

民國五十九年春至七十年

1

民前八年至民國十四年

早年

我從小就在一個充滿了愛和歡樂的家庭中長大，
民國元年，由於二叔的邀請，
我們全家來到了上海，
這是我一生中的轉捩點。



概述

過去有很多人勸我寫回憶錄，我一直都未下決心提筆，因爲我經常在靜靜的想，總覺得以往數十年的生活和工作，都不是依照我自己原先個人的意向和計劃去做的。我是學工礦的，我的興趣在科學和工程，在我出國讀書的時候，中國正是一個積弱的國家，它必須要科學化和現代化，才能振興和強盛，我學成回國，的確是懷著欲以「科學工業拯救中國」的抱負，想獻身於科學工業建設工作，但沒想到我回國之初，卻轉而從事了政治工作，這是我從來所沒有預料得到的，我個人自小所培養起來的興趣與抱負，就從這一刻開始轉變了，說來這該是一件多麼痛苦的事，可是一想到這種轉變，是爲了追隨一位偉人，致力於革命事業和國家前途的時候，我也就感到了有一些安慰和自得。

我確實曾經追隨一位偉人，從事國民革命的大業，打倒軍閥，統一中國，擊敗日寇的侵略，贏得抗戰最後的勝利，廢除不平等條約，將次殖民的中國變成了世界五強之一，並奠定憲政基礎，防止共產主義侵佔中國，蔓延亞洲，在整個國民革命的過程中，我只是接受這位偉人的領導，我的貢獻極爲微薄，雖然我跟隨在他的身邊，參與了很多的機要，整整地有二

十五年之久，即或我的貢獻應作記載，也該附錄於我所輔佐的這位偉人的回憶錄中，而非由我單獨執筆來做記述。正因爲這些緣故，所以我原先未有寫回憶錄的打算。

我所追隨的那位偉人，在他獲致了豐功偉業，開創了一個成功的境地之後，又不幸的瀕臨於失敗的局面。我在這時也感覺到了自己爲國民革命大業所奉獻的一生的精力與時間，也都恰如春水東流，消逝得無影無蹤了，也許我該可以重拾早年的抱負，再努力於科學工業建設工作，但畢竟我已不再年輕，不再有當年的活力，而且政治與經濟的關係，又是如此的複雜和微妙，無論從別人或自己的觀點來看，都有太多的因素必須考慮，一個人屆其退休之年，實有太多往事不堪回首的感慨。

現在，我的年歲越來越大，我決定接受朋友們的勸告，把我過去幾十年來的工作，做一個忠實的記述，希望能爲國民革命史實，提供若干補充說明，也爲中華民國史，提供若干眞實史料，爲歷史做見證，這是我執筆寫回憶錄的唯一心願。

在我對往事的追述中，我的心情是沈重的，我必須再重複一次，過去數十年來的政治生涯，我是缺乏興趣的，我始終念念不忘於要成爲一個工程師，或許這就是一項錯誤，但我也必須強調一點，在過去數十年中，做爲一位偉人的追隨者，我是如何懇摯而忠誠的執行著我的工作，在我這部回憶錄裏，我都會有清晰而詳細的記述。

家　世

我是浙江省湖州府（現稱吳興縣）人氏，原先的祖籍是河南鄭州，後來向東南遷至安徽，到了十七世紀，明朝中葉年間，祖先的一支就到了吳興定居下來，成爲那裏有名望的家族之一。

清朝末年，太平天國作亂，由於戰事的影響，我家的經濟環境一落千丈，幸好經商的祖父延祜公，事業相當成功，他改善了全家的生活，他是一位非常温文儒雅的長者，並且熱心公益，經常扶弱濟貧，深得鄰里們的敬重，祖父的原配夫人吳氏早逝，復與繼室楊氏結褵，婚姻美滿，祖父他老人家的元配育有三男一女，繼室僅育有一女。

我父親陳其業字勤士，排行老大，是前清廩貢生，他做過私塾教師，勤儉治家，熱心助人，也是一位成功的商人，他曾被選任本縣商會會長，後來擔任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

我的二叔陳其美字英士，雖曾在本縣充任典當學徒，然志氣豪爽，英勇過人，曾於辛亥年在上海起義，協助國父孫中山先生締造中華民國，我將在後文中詳予介紹，在此先提及一點，那就是當袁世凱稱帝之時，二叔是東南討袁軍總司令，在上海發動討袁，肇和起義，就

是他所領導的。但不幸於民國五年爲袁黨份子所狙殺身亡。

我的三叔陳其采字藹士，生性和藹，平易近人，日本士官學校畢業，曾創辦湖南武備學堂，國民政府成立，先後擔任主計長及總統府國策顧問等職務。他們三兄弟均爲我祖母吳太夫人所生，而祖父爲他們三位所取的名字，恰正說中了他們每人的個性。

我父親勤士公，那時是在離老家吳興縣約十二里處主持一家當鋪，因爲交通不便，往返困難，加上工作忙碌，所以他很少回家，只有在新年和節日的時候，才特地趕回家來團聚，平常日子，家中的大小事務都由我母親何氏夫人掌理，她非常能幹，也非常嚴厲，我們這些做子女的，對她都非常敬畏。

我們兄弟姊妹衆多，原本共有十人，大哥名祖燾字果夫，長我八歲，於民國四十年（一九五一年）在台北去世，享年六十歲；二哥是很早就過世的，大姊名祖孝字順夫，長我四歲；二姊名祖恭字敬夫，長我兩歲，我是排行第五，名祖燕字立夫；在我之後還有五位弟妹，但都在幼時感染疾病，不到兩、三歲就夭折了或竟小產而亡，這是我們一家人引爲最傷痛的一件事。後來母親逝世，父親繼娶黃氏，又生了兩男一女，分別名叫民夫（祖燕）、贊夫（祖思、女）及衍夫（即全國知名之籃球健將陳祖烈）。

這時（五位弟妹不幸逝世後的一段時期），我成爲家中的么兒，事實上也可說是家中唯一的男性，因爲祖父在一八九二年過世之後，父親爲了全家的生活，常年在外工作，而大哥

則到外地去讀書，我在家裏成天和女性們相處，受著繼祖母、母親、嬸母、姑母和姊姊等的照顧與愛護。因爲父親和英士、藹士兩位叔叔十分友善，所以二嬸母一向和我母親住在一處，從未分家。

母親何夫人出自吳興名門，她老人家有兄弟各一位，大舅在上海絲廠任經理，當我到了上海之後，曾一度參觀他的工廠，開始引起我對機器發生了興趣，尤其是對那些活動的機器設備，覺得非常好奇。二舅是經營鹽業的；另外我還有一位姨母，因爲早年守寡，故愛我們如同己出。

母親在我們陳家，實際上是一家之主，照料我們這群小孩之外，大小家務事都由她管，包括家中的經濟大權在內。我二叔陳其美先生，是一位個性很強的人，很少有人可說服他做任何事情，但他卻很聽家母的話，那是因爲家母胸襟豁達，而且很有見解，所以每次二叔談及當前政治問題之時，只有家母可與之深談。

母親一生，眞可說是辛勞備至，她對子女的管教相當嚴格，一定要我們注意養成良好的習慣，例如有一次有件東西掉在地上，我們走過時沒有馬上撿拾起來，母親就會責備我們說：「你們的眼睛在那裏，怎麼見到不應該在地上的東西不把它拾起來。」她認爲我們應隨時留意。對任何事物不該任意放過。她對子女雖然很嚴，但我們卻很敬愛她，每天晚飯之後，母親常會和我們圍坐在一起，講述歷史上偉人的故事給我們聽，她對古書的造詣很深，

常以孔孟仁恕之道來教導我們。

勤勞節儉的婦德，母親有很具體的表現，她從不貪求物質的享受，她以過樸實的生活爲樂，她特別愛對我那兩位姊姊講述爲人婦的道理，至於對我這個么兒，則非常的疼愛，我永遠不會忘記她老人家在產後臨終前所說的一番話：

「我恐怕活不下去了，我最耽心的就是我這兩個女兒，我死後就沒有人能照顧她們了，她倆須得自愛自立；對於立夫，倒沒什麼可掛念的，因爲他對人對事都將會應付和處理得很好，我很放心，相信他不會出差錯的。」

我出生於一九〇〇年八月二十一日（即夏曆七月二十七日），母親是於一九一〇年二月十七日過世，那時我才十二歲，就在母親過世的那天早晨，大哥果夫忽然匆匆地自杭州趕返家門，平常大哥回家，必先寫信告知家人，但這次却是突然在前一天夜間驚夢，見到了母親，所以他急急趕回，正好趕上和母親見上最後一面，不久母親便與世長辭了，後來家兄每提及此事，就說這是母子連心的心電感應。

父親是個工作很忙的人，他每天起早睡晚，當他起身之前，就已經有很多人在我們廳堂上等著要見他了，這些人都是來要求家父爲他們解決疑難紛爭。

家父他老人家爲人熱心，活力充沛，每天都有用不完的勁，他的身體一直很好，始終都是精神飽滿，當我在三十八歲那年擔任教育部長時，仍未見過他生病及躺在床上過。他經常幫助人們商籌婚喪事宜，並鼓勵大家儲蓄。他尤其喜歡杭州、吳興兩頭跑，譬如說：假如有兩個婚禮，早上在杭州舉行，下午在吳興舉行，家父必定都會乘車事先趕到現場主持，家父就是這麼一位勤勞熱心而又樂善好施的人，這是他的美德。

我的大哥果夫，在後文中我會詳細介紹，這裏先述說一件有關他的事，雖然他未受過太多的教育，但他有一個特點，使我非常的敬佩，那就是他除了買書之外，從不歡喜買別的東西，即使他身上只有一塊錢，也一定是用來買書的。他從不逛百貨公司，只逛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或舊書攤，無論早晚晨昏，他都勤於讀書，此外他也沒有抽煙、喝酒的習慣，甚至連看電影都沒什麼興趣。我也很喜歡讀書，不過，不像他那樣的勤奮專一，我對電影和運動也很愛好，我的興趣可說是多方面的。

小時候，我和大哥就很少爭吵，兄弟之間，相處得非常和睦，這也可能是因爲我們兩人相差了八歲，所以大哥總以大人的態度在愛護著我。到了長大成人之後，我們一起在黨部服務，經常互相討論有關黨務的事宜，他對中央執行委員會有什麼建議，必先徵詢我的意見，共產黨誣稱中央有小組織，稱爲中央俱樂部（Central Club），簡稱CC，後來共黨將此一名稱代表了我們兩兄弟。因爲Chen + Chen 亦可簡稱CC，也可以說我們兄弟二人是一體了。儘管

彼此有時意見並不一致，但都能相互尊重，這實在是受了父親和叔叔們的影響，他們相處得融洽和藹，從未發生口角，這種優良的家風，一直延續下來，現在我的孩子們也是一樣，年幼的總會接納兄長的建議，的確是兄友弟恭，而「悌」道長存於我們兄弟姊妹手足之間，也是很有意義的。

在個性上，家兄比我重感情，我是較重理智，但對很多問題，甚至對人生的看法，我們仍是一致的。大哥不僅勤學，在工作上也極爲勤勞，因爲他的身體羸弱，不時生病，但他的工作和演講，卻從未間斷，總是抱病從公，繼續奮鬥著，直到他臥病在床，不能起來走動之時，在病榻中，仍是手不釋卷。他常說：一個人雖纏病在身，但要和病魔戰鬥，最重要的是忘記本身有病。他不時的幫助別人上學，尤其是勸人讀書，他常自懊悔未受過足夠高等教育爲生平一大憾事，所以總是盡一己之力，來助人入學讀書或出國留學。

我的大姊順夫，比較像家母，非常能幹，有自己的見解主張，家母常責怪她太愛講話。二姊敬夫和大姊正好是不同的典型，人很好靜，因爲幼時生過病，身體羸弱，小時候我們一起上學，大姊在校中是位好學生，經常名列前茅，二姊就不像她那麼精明了，這就是因爲健康的關係。大姊後來嫁給了學水利工程的沈百先兄，二姊則嫁給了曾在中央銀行服務的喻公魯兄。

我家的宗教背景，在我母親那一輩份，都是信奉佛教，繼祖母楊太夫人尤其非常虔誠信

佛，自母親去世後，她老人家就一直在照顧著我們。母親生前很少帶我們到廟裏燒香，但繼祖母卻常會帶我去，我實在不太喜歡去，不過我的記憶力很好，可以背誦不少佛經，我並未眞的信奉佛教，父親、叔叔和大哥，也都未信奉佛教。

繼祖母楊太夫人是位非常和善的好人，由於篤信佛教，所以一個月中總有好幾天吃齋，同時，她老人家也是一位難得的好婆婆，當母親在世當家的時候，她從不干預家務事，總是讓母親去做主，自己做老太太，但在母親去世之後，她老人家接管家務，把整個家治理得井井有條，對我的管教也寬嚴有方，我們都很尊敬她，也有幾分畏怕她。

記得早年，繼祖母有位小女兒在大家忙著過年的時候死於肺病，她老人家悲痛異常，可是，在中國古老的迷信裏，總以爲過年時哭哭啼啼，是不吉祥的，於是繼祖母忍住喪女之痛，而且強顏爲歡，說來她老人家確是位堅強的女性，同時她對待父親和叔叔，也眞是視如己出，後來，父親就常和我們談到繼祖母那明朗而堅毅的性格，和她那股子慈愛的精神。

我從小就是在這樣一個充滿了愛和歡樂的家庭中長大的。

湖州私塾時期

在我進私塾唸書之前，母親就已開始教我認字，從她那兒我大約學了好幾百個字。七歲

時，家裏把我送到沈若臣先生的私塾讀書，我啟蒙的第一本書是《小學》，內容是有關禮儀和行爲的規範，四字一句並有押韻，讀來非常有趣，因而我的記憶也特別深刻。接下去我們就開始讀《幼學》、《四書》和《五經》。

當時由於我年紀小，記憶力特別強，每回老師交代的作業，不需多時，我便能朗朗上口，背誦得絲毫不差，所以我不用特別努力讀書，總是把時間留出來和其他的孩子一起嬉鬧玩耍。老師每回見我背書，都是流暢無誤，還認我一定很用功哩！那知道我很少帶書包回家，只是在背書前，約略看了兩遍課文而已。這種強記的工夫，給了我後來在工作上很多的方便和幫助。

在民國三十七年，我參加國民大會選舉工作之後，選出的代表達兩千餘人之多，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二，我都能在見面時叫得出他們的名字，時至今日，我敢說我的記憶力還是不錯。

我選的這所私塾學堂，共有學生三、四十人，在那時的湖州已算是有規模的了。三叔藹上及大哥果夫都曾受教於此。塾中課室分內外兩間，沈先生教學認眞，相當嚴厲，任何學生，只要書沒背好，手掌心就會挨上戒尺幾板，他的講台教桌是擺在外室，因此講課時，他是瞧不見內室的情形的，所以也只有肯自己努力讀書的好學生，才有資格被安排坐在內室，而我就是坐在內室的學生之一。

那時候學堂裏有兩項規定：其一是最早到學的，可以最早放學，故到館第幾，在習字上亦須自己寫明；其二是誰的功課成績表現不太好，就必須留到天黑才准回家。每天到了下課，老師總是一個個地點名才准離去，而每一個學生也就在叫到名字之時，就在老師那兒拿回自己的作業和批改的習字，每個學生的作業及他所學習的，彼此都不相同，有人唸《論語》，有人讀《孟子》，多數學習的是中國的古書，但也間有唸一些諸如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新教科書。這種教育方式，看似混淆麻煩，但是因材施教，因程度不同而分別教學，彼此都不會阻礙到別人的發展，這實在是一種極爲理想的教育方式。

每天早上進學堂，我是時常到得最早的一個，在去學校的街上常常碰到一位和尚，背了一座韋陀菩薩像，每三步拜一拜，我好奇地問他：「師父！你爲什麼要拜？」他說：「我要募化造一座廟。」我眞想不通拜拜怎能造成廟，再問他，他說：「你太小，不會懂的。」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我大概有三百四十餘天是第一位到校的。到學堂之後，每個人就先得向孔子神位行禮，然後按著先來後到的次序簽名編號，由於我每天到得最早，所以可以最先離開學堂，放學後我時常到學堂斜對門開雜貨店的我的宗奶媽家裏談談，直到兩位姊妹放學出來找我才一同回家。

奶媽人很祥和，待我很好，我在家的時候，或是以後從上海、從天津回到湖州來，她一定會爲我留下幾枚母雞頭一窩生下來的蛋，她認爲這樣的雞蛋最營養，她對我有一份深摯的

感情，每次家裏有人到她店裏去，她都會再三的問起我，每年過年我如果回吳興，也都會去向她拜年，她的眼睛有些斜視，行動舉止毫不俗氣，是一位令我難以忘懷的好人。

我們學堂老師沈先生，終日態度嚴肅，學生莫不敬畏，在我的記憶中，有幾件事是很有趣的。那時的私塾並沒有固定的假日，如果遇上好天氣，加之老師的心情又特別好，那老師就會向同學宣佈放假一天。有時他也會帶學生去爬山郊遊，而留一部份學生在課堂裏讀書，到下課放學之時，要是他尚未回來，則由師母出來通知。沈先生有一善舉，就是好買活魚或螺螄放生，每回他都會站在水急如湍的南門外一絲橋上，注視著橋下的流水，然後就叫我們把魚兒放入水中，這一刹那，他才面露笑容。我們最高興做的事，亦就是幫他提著魚螺去放生了。

老師離開課堂外出時，學生總會鬧個沒完，那時我也是如此。有一次沈先生不在，我做完作業就放在他的講桌上，然後就和外面教室的同學玩猜拳遊戲，大家喧鬧成一片，正好這時先生突然回來了，大聲責問，同學面面相覷，噤不作聲，沒人敢出面承認，只有我勇敢地站出來認錯並承認是我發起的，老師見我誠實，就沒有處罰我，其他同學亦個個祇被打了五板手心（照例照打十板），從小母親就教導我要誠實，這是一次好經驗。

去上海的日子

西元一九一一年，由於二叔陳其美（字英士）之邀請，我們全家都到了上海。那時二叔正受任革命軍滬軍都督之職，這是我一生中的轉捩點，如果當時上海的革命起義沒有成功，我就不會有機會來到這個大都市，也更不會有機會接受新式的教育了。

當全家到上海之時，眞可說是喜氣洋洋，闔家團聚了。除了我母親逝世不久父親仍留在吳興之外，繼祖母、二嬸和大哥、姊姊們全都來了。三叔一家也特由北平來到上海，大家的心頭充滿了歡樂，也對這個大都市充滿了新奇。

在上海，我們住在英租界跑馬場附近的「馬霍路」，市區的道路、洋樓、汽車，都給了我新鮮的印象，而租界區常可見到英國人侮慢中國人的舉動，更留給了我極強烈和極惡劣的形象，尤其是印度巡捕，且有當街踢打我們同胞的，更可恨的是在公園入口處，高掛著「狗與華人不得入內」的標示，這些都深深地損傷到我們民族的尊嚴，給了國人無比的沈痛，這也是促使我日後加入了國民黨，獻身於國民革命工作的原因之一。

二叔每日的工作雖然異常繁忙，但還不時抽暇和我們聊天玩耍，並且常常講些有啟發性

的故事給我們聽，培養我們的愛國心，鼓勵我們自立自強的志氣，使我們習以爲常地每天總想能與他閒談及聽他講故事。他的兩個兒子（馱夫、惠夫兩弟）雖然在他殉國時年紀還小，但長成後都富有愛國心和豪俠氣概，與二叔很相像。

二叔很喜歡小孩，常會給我們錢去看平劇，他自己也愛看戲，只是工作太忙，少有時間陪我們同去。

在上海住了一陣之後，我就渴望繼續上學，但是由於我沒學過英文，所以在正式入學之前，我必須先行補習，當時上海有所湖州旅滬公學，是居住上海的湖州鄉長爲教育本縣子弟所設，於是我就進入該所夜校就讀，專門補習英文，當時的英文教師是沈階升先生，教學認眞，循循善誘，因而我們建立起了良好的師生關係，後來，沈先生曾擔任我的私人秘書，協助我工作達十餘年之久。

當時住在上海的湖州同鄉很多，約有十幾萬，多半聚集在租界地區，其中以經營絲綢業爲主，從事文化工作者居次。湖州是物產豐饒之地，以盛產生絲、絲織品、魚類、毛筆、羽毛扇、竹筍、竹子等出名，在地理位置上，又因爲靠近上海、蘇州、無錫，交通至爲方便，三家輪船公司每日都有船隻往返上海，湖州人便把產品銷到上海，並在上海經營絲廠，其子弟也多半在本地唸完小學之後，就來上海繼續學業，所以湖州人在上海設有自己的學校、戲團及慈善機構，且有湖社之組織。

我在夜校補習了幾個月後，就考進了南洋路礦學校，我還記得當時的校長林兆禧先生，他是一位基督徒，喜歡講英語，初進該校，由於我從未接受過新制度下的小學教育，而且又無文憑，因此我只好先就讀中學預備班，將以前沒有讀過的課程重行學起。第一學年，我的數學成績最好，但是英文卻不及格，那時自然科學的教本也有用英文本的，別的同學都已有好幾年的英文根基，讀來不覺吃力，但對我來說，卻是苦不堪言。

一九一三年，我正式開始了在南洋路礦學校的四年課程，在校期間，我的數學、化學、物理成績一直很優異，在校四年，我拿了七個學期的獎狀，要獲得這項獎狀，說來也很不容易，必須全學期的成績分數總平均在八十五分以上，而且全學期全勤，沒有一次缺課請假，才有資格，我的四年學業，平均都在九十五分以上，數學成績尤其優異，經常都是滿分。四年中唯一的一次缺課，是爲了參加家兄的婚禮，而請了二小時假，就由於這二小時假，使我失去了一次獲得獎狀的機會。

在我讀中學的這段時間裏，家中的經濟大不如前，二叔在一九一三年的起義失敗後，即轉入地下革命工作，三叔那時在銀行服務，不但要負擔自己的家計、子女學費，還需負擔二嬸、我和姊姊們的生活，那時我的學費是由大哥支付，但一般的交通車費則由三叔付給，我見家中的經濟短絀，就從不主動向三叔開口要錢，因此每天我總是很早起床，走好幾里路去上學，每次三叔見我走路上學，就立刻拿錢給我坐車，那時我很知道用功，在四年中，拿了

三年半七張獎狀，是很使我父親、三叔及大哥高興的。

談到我的婚姻，在十三歲那年的中秋，我就訂婚了。她是家父一位同行老友孫蓉江伯父的千金，名叫祿卿。也是我們陳家親戚的親戚，按照中國人的習俗，總喜歡門當戶對，重視家教，所以當父親把她的照片給我看的時候，我就同意了，雖然我們曾在親戚的家中見過幾次面，卻從未開口交談過，那時的觀念保守，男女交往說話是會惹人笑談的。直到一九二三年（民國十二年），在我啟程前往美國讀書之前幾天，雙方家長這才安排我做了一次正式的會面。

二叔陳其美

說起二叔，雖然在上海我們和他同住的時候，我的年紀尚小，與他接觸的時間究竟不算多，但是以前從母親和大哥果夫的口中，我逐漸知道很多有關他的事，深深感到二叔的偉大，他的作爲與人格，給了我極深刻的影響，在此，我願意追述幾則有關他的小故事。

二叔給人印象最深的，那就是他能不看鐘錶，就可以正確地說出時間，如果有人問他現在幾點鐘，他只要看看天空，即能回答現在是幾點幾分，最多只有五分鐘的差誤，他這項天賦本領，實在使人覺得驚奇，我們家裏小孩，最喜歡問他時間，一來是省了去看鐘，二來也

是爲了好奇。

二叔從小就很勇敢、機智而且鎮定有爲，據說他八歲那年，和一群小孩到我家對面名叫海島的廣場上玩耍遊戲，廣場上正堆放著野草在燒，這時一陣大風吹來，一個站在近處的小孩，他的衣服竟被火燒著了，他嚇得哭了，其他的小孩也驚跑了，只有二叔立刻跑上前去，撲在他的身上，兩人一同在地上翻滾著，這才把火壓熄了，救了那小孩一命。

二叔小時候是家中所受正統教育最少的一位，傳統的中國家庭，如果經濟情形不好，只有最聰明的孩子才送去上學，其餘的都被送去習商，跟著學做生意，雖然我一直深信二叔是他們三兄弟中智慧最高的一位，但是祖父還是把他送到當鋪去做學徒。二叔在當鋪中的表現很好，但是他不滿現狀，後來被介紹到上海一家絲店管賬，他對這些都沒有什麼興趣，但爲了生活，他仍然很努力工作，閒來的時候，就用功自修，他這時自己讀了很多書，信也寫得很流暢生動，這可從他給黃克強先生的信裏看出，同時上海的環境，也使他有機會接觸到了政治的事物。

二叔因爲未受過太多正規教育，所以對於一般教育非常關心。當三叔從日本學習軍事回國，在南京工作，爲了替二叔安排赴日讀書，特地儲存了三百美金，做爲他去日求學的費用，就在他正欲動身之時，得知了有一所學校，因無力償付租金，即將關閉的消息，他立刻就把這三百美金全數捐出，並且建議該校酌增富家子弟的學費，及暫時減縮人事費用，以度

難關。三叔對二叔這種慷慨的義舉，非常感動，只好又再設法爲他籌措了三百美金，二叔這才得成行。

到了日本，二叔就進入警監學校就讀，他明快和愛打抱不平的性格，是全校聞名的，他的俠義精神，注定了他救國救民的行動，在上海從事革命工作，他經常不顧危險，前往探望繫獄的同志，因此而獲得大衆的敬重。記得黃復生先生被捕入獄後，二叔爲了救他，四處奔走，不遺餘力，並且爲了活動，不惜傾囊以出，終於把他保釋出來。在日本的時候，二叔和黃復生並不和洽，但二叔仍以革命前途爲重，絕不因個人嫌隙，而影響革命的大業。

二叔做事非常負責，而且也很有擔當，他曾經和幾位朋友合辦一份中國公報，中間有一度債台高築，當債主登門索債之時，合夥人都一走了之，惟有二叔出面承當，獨力負責，設法解決了債務問題。

他的慷慨好義，饒有古俠士風，在朋友間也是有名的。譬如有一次，天津的李六更，母親臥病，二叔和他並不是很熟的朋友，但他既有困難，又找上門來，於是就以濟人之急的心情，毫不猶疑地送了他一百元。他的疏財仗義、好交朋友，使得在上海各個階層，都有很好的人望，其中包括紅幫和青幫裏的人，也都成了他的朋友。

最能表現二叔人格的一件事，就是武昌起義後，清軍南下，革命軍兵力單薄，漸感不支，上海江南製造局之役，實有關革命之成敗（見國父手稿評述），是役之初，革命軍屢攻

不下，二叔乃決定鋌而走險，隻身前往製造局大門，說服守軍輸誠，果然精誠感人，大門開啟，迎其入門，進至第二門，守軍亦被感召而門啟，但不幸到達第三道門時，卻爲守軍所捕，他獨身陷於敵營，危在旦夕，清吏擬於天明時殺之，此一消息傳出，使得製造局外面的革命軍，爲救主帥而齊心合力，加緊越牆攻入，終把江南製造局攻下，救出了二叔，一舉獲得了勝利，在這一役中，鈕永建先生及蔣公介石也負擔了重要任務，二人和二叔是極爲密切的革命同志。

這次二叔在上海所領導的革命行動，對整個革命工作來說，實在是意義重大，舉足輕重，因爲武昌起義成功之後，不久清軍南下，漢陽撤守，如果上海沒有繼起響應，跟著順利光復的話，長江以南各省就不會跟著光復，袁世凱那時候如果忠於清室，與革命軍爲敵，又以後如果國父不把大總統位置讓給他，就很難奠定革命成功的基礎。所以黨國元老邵元冲先生曾說：「英士先生對於革命的成功，民國的締造，眞是貢獻極大，功不可沒。」

對二叔而言，國家的命運即是他個人的命運，所以他才能擁有置個人生死於度外的偉大胸懷，他不但投身於中國的國民革命，同時也致力於協助其他國家的革命活動，譬如他對越南與韓國的革命工作就非常熱心，當時在中國的韓僑，幾乎都認得二叔，同時他又創立了新亞同濟社，以推動亞洲區域的聯合革命工作，無疑的，二叔是第一個中國人根據民族主義的精神參與協助其他國家的革命工作。其後，家兄接續了二叔的遺志，從事此類任務。在一九

二九年至一九三六年間，我亦多多少少參與其事，時常有很多韓國革命志士與我們倆接觸，我們也盡力的來協助他們的獨立運動。所以韓國政府成立以後，頒給我國以「韓國建國勳章」，我家竟得了三個之多。

袁世凱那時正是充滿了私慾和野心，他眼見二叔在革命陣營中影響力很大，而且又是一位卓越的人才，因此就想盡辦法來籠絡他，曾經以五十萬美金的鉅款來厚賂他，要二叔離開革命行列，到國外去，二叔自然不會爲袁世凱的甘言厚利所惑，袁世凱見此計不成，乃轉而以五十萬美元暗中懸賞刺殺二叔。

當時二叔眼見國民黨的經費困難，財務拮据，革命工作受到了影響，無法推展，實在覺得非常痛心，於是忽然想到了不如犧牲一己，以報黨國，乃立刻提出建議，要求同志把他出賣給袁世凱，以謀獲得重金，來做爲推展革命工作的費用，他的建議爲同志們所斷然拒絕，並且婉言勸慰，但二叔許身黨國，爲革命而犧牲的決心，確是感人至深。

二叔常說：人必須創造機會，而不是等待機會。即使在創造機會的過程中失敗了，但終究已爲後繼者開創了奮進的環境。我常想：二叔若不是被袁世凱所害，英年早卒，革命的大業一定會更早完成，他的逝世，無異是使孫中山先生失去了一隻最得力的臂膀。幸虧二叔很識人，將蔣介石先生介紹給孫先生，後來繼之而起襄助孫先生，也是受二叔精神感召的影響極大。二叔與黃郛先生及蔣先生三人曾有過「桃園三結義」之舉，當然相交至篤，相知也

深，他與蔣先生更是有很多共同的特點。

對於二叔，我親身與他相處接觸的機會不多，有關他的所言所行，有很多還是後來由別人的口中聽到的，但是對於蔣先生，我不但能有機會耳聞其言，更能目睹其行有二十五年之久。從他身上，我似乎又看到了二叔的精神與風範。

北洋大學時代

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我從南洋路礦學校畢業，四年的課程，的確讓我學到了不少新知識，只是當時家中的經濟情況愈見艱苦，沒有能力供我繼續升學，三叔自己有子女三人，另外又要負擔二嬸和吾家數人的生活，所以三叔很希望我能立刻就業，分擔家計，不久，他就好不容易替我在京滬鐵路局找到一個隨車查票的工作，但是我求學心切，根本不想就業，所以我反而到處打聽大學的情形，後來知道在天津的北洋大學，每學期只收學費十塊大洋，並且免費供給課本和實驗設備，讓學生有充分進修研究的機會，至於伙食費，因爲是以麵食爲主，所以在北方也比較便宜，這對我來說，確實是個好消息，於是我就設法向寄父借了兩元報名費，偷偷地報了名，並且參加了入學考試。

在上海報名的考生有好幾百人，但只錄取四十五人，看榜的時候，我抱著緊張而焦急的

心情，只敢從榜尾看起，好久還見不到我的名字，內心著急不安，直看到最後，才見到自己竟然考了第五名，我興奮地把消息告訴了寄父，他爲我高興，同時他給我一封從湖州寄來的信，是父親寫給我的，內容是嚴厲地責備我不應未經他的許可而向寄父借錢報名，我當時流淚了。後來我就寫信稟告父親我考取的消息而認罪借錢，三叔聽到了不作聲，因爲他知道我中學成績甚好而又無力負擔我的大學學費，給我找到工作已經盡了心了。家兄則爲我高興，因爲他自己沒有機會讀大學，總希望他的弟弟能進大學，但學費和去天津盤川的籌措，依然是一個大問題，就在不久我返回湖州，對於茫茫前途，正覺苦惱萬分的時候，父親卻把我喊去，交給我二十五塊大洋，並懇切地對我說：「這些錢是我多年的積蓄，也是我所盡可能給你的學費，從今以後，一切就要靠自己了。」接過了錢，我不禁泫然而泣，一方面是感激父親愛子之情，一方面又不禁憂慮著自己今後要如何克服困難。這二十五塊大洋，實在無法維持一年的生活費用，幸好我自己有既定的目標，也有百折不撓的毅力，我相信終可以一步一步地去克服困難的。果然就在我整裝準備經上海去天津入學之時，二嬸母、四姨母和其他的少數至親，都分別或多或少地給了我些錢，助我作入學費用，家兄也給了我十元，還鼓勵我好好讀書，專心求學，他會設法資助我，於是我除了歸還寄父借款兩元以及購買航海輪船票外，尚餘不到四十元，我滿懷感激與希望之心，坐上三等艙的甲板上，因爲統艙位置，爲最廉價。航向天津，不幸風浪甚大，浪水打上甲板，把行李都弄濕了，寒風刺骨，眞是難受，

但是不能挫我雄志，船到了天津，我就立刻報到入學，當時的大學制度，是要先讀兩年預科，然後才正式進入本系就讀，我也唸了預科之後，才讀礦冶系的。

北洋大學應該說是一座理想的大學，我初來之時，覺得一切都很新鮮，大部份的教師都是美國人，全用英語教學，只有極少數預科的課程才用中文，更奇怪的，是中國教授亦都講英文，那時我雖在中學學些英文，但並不太好，所以入學之後，使我又感到頭痛。

在北洋大學這段日子裏，過了半年以後，經濟感到相當窘困，幸好以後每個月家兄都用郵滙寄給我六元，其中四元是付伙食用，僅存二元用來做爲一切零用雜支，眞個捉襟見肘，非常困苦，有時家兄的錢遲幾天寄到，我就只有挨餓了，因爲伙食團是學生自己組織的，規定伙食費是不許拖久的，所以每當遇到這樣青黃不接的時候，我只好買幾個饅頭，自行充饑。

學校因爲有各省區來的學生，人數甚多，所以伙食分開處理，有以米食爲主的南方伙，和以麵食爲主的北方伙，後者因爲便宜兩元，我這個南方人不得不加入了這個北方伙食團，過了兩年，我被推舉爲該團管理委員會主任，負責督導膳食衛生及記帳，我很盡職地做好這件事，同時不必因繳不出錢而挨餓幾天了，但最感煩人的卻是蒼蠅太多的問題，只要有人發現菜中有蒼蠅，立刻那盤菜就得重新換過，而這找廚師換菜的責任，也由我這主任擔任，眞是不勝其煩，我要求學校將飯廳做好紗窗紗門，同時每菜的菜碗上面加了罩子，責成廚師及

工友勤打蒼蠅，但是有些調皮搗蛋的同學，常常故意在菜快吃完時，放隻死蒼蠅在菜碗裏，大喊大嚷，要求換菜，有一次就被我當場拆穿了他們的惡作劇，因爲這隻蒼蠅身上是乾的，明明是人放下去的。我當場責備同學不該愚弄和欺騙廚司，否則以後這一桌發現蒼蠅，不許換菜，廚司因此很感謝我公正，並和我合作良好，而我這個主任，也竟然一幹兩年多，是任期最長的了。

吳稚暉先生也曾在北洋大學任教，王寵惠、王寵佑兩先生及王正廷、徐謨、吳南如、秦慧伽、雷寶華諸先生都是北洋大學校友，曾養甫、葉秀峰都是我的同班同學。北洋大學的訓練嚴格，出了不少優秀人才，我在校的成績也相當不錯，那時學校規定，凡學業成績總平均在八十五分以上者，可以享受減免學費的優待，所以我有好幾學期都獲得了這項優待，也減輕了我經濟上的負擔。

在大學裏，我很喜歡運動，因此身體鍛鍊得相當結實，那時我最喜歡網球，此外，籃球、足球、跳高、溜冰、賽跑，還有國術，我都很有興趣，可惜我的體格不夠高大，所以只能參加班際比賽，無法被選爲校際賽代表。

初到天津的第一年，人生地不熟，眞有舉目無親之感，幸好在大二那年，遇見了沈若臣老師的次子沈魯夫，他調到天津交通銀行服務，他的太太也是我過去的私塾同學，他鄉遇故知，實在覺得格外親切，從此我常到他們家裏度週末，分享一些家庭的溫暖，他們也了解我

經濟的情形，在我有困難的時候，從不等我開口，就會主動地借錢給我。

但是不幸的命運，竟然降臨到沈家，那一年，沈老師特地來天津探親，可是他來了不久，沈魯夫兄便患上了嚴重的傷寒症，沈老師平日除了教書，他有時也替人看看小毛病，但不是掛牌的中醫師，於是就替自己的兒子開方治病，不料病沒有好，而且日漸加重，終至於不治逝世，沈老師一家人悲痛不已，尤其是他老人家不斷地責怪自己處方錯誤，最後黯然地離開了天津，我眼見這位老父，跋涉千里，竟是爲了替自己愛子送終，內心也爲之悽然落淚，遭逢巨變，沈太太幾次想要自盡，以殉夫情，有一次是吞了火柴頭中毒，我及時把她送到醫院，因而得救，那段日子，我每天下課就趕到她家幫忙，但更不幸的是，在一年後，她的獨生幼子，也染病而逝，沈太太悲愴莫名，後來終皈依了佛門，這整個事件眞讓我體會到生命的無常，人生的悲劇竟可忽然來臨，是何等慘痛！

此外，還有一次經驗，也使我難以忘懷，那年天津地區，正發生了直奉之戰，張作霖和曹錕的軍隊，打得相當激烈，夜間都實施戒嚴，北洋大學位於天津郊外，因此對外的交通也都中斷，那時我最友好的一位同學陳汝良（字範有）竟忽然在晚間上吐下瀉不止，得了霍亂，眼見他生命危在旦夕，又無法在宵禁中去天津請醫生來給他診治，情急之下，我想起了自己曾在天津馬路邊地攤上買過一本小冊子，名曰《萬事不求人》，於是立刻把它翻閱，居然找到霍亂急救一方，就照著書上所說，到廚房找到了食鹽（須炒乾）和明礬，用同等分

量，加以開水溶解，病人服用之後，果然有效，吐瀉立止，竟撿回了好友一命，這使我深深地感到，我們平常對於醫療及急救常識有學習的必要，而因爲我的好奇，好買異書看，也是有所助益。

在大學我最友好的同學，還有曾養甫，他和陳汝良待我如同兄弟一般，見我有錯，總是直言相勸，陳兄高我一班，他是安徽石棣縣人，學的是土木工程，後來他在安徽本縣建造了第一座水泥橋，工程設計期間，我也幫忙爲他製圖，陳兄的父親是中國第一家，也是最大的一家啟新洋灰公司總經理。我曾經替該公司水泥廠繪製了一張全圖，所以我對水泥機器及製造過程非常了解，我從他那裏，體驗到了友誼的重要和益處。

著名的五四運動，發生於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那時爲了宣傳，我在學校負責北洋大學日刊的出版與發行，罷課期間，天天忙著編報業務，有時還要赴天津擔任採訪重要新聞，所以少有機會參加校外開會等活動。五四期間，我曾參加過幾次示威和請願遊行，那時在天津的兩所著名大學——北洋和南開，是出了幾位有名人物，如北洋的孫越琦和諶小岑，南開則有周恩來等。此外還有女師專，其代表劉姓十分能幹，常任學生聯合會的發言人。

五四時期，我對新文化運動的作品非常有興趣，由於在校編報的關係，所以閱讀的書籍甚爲廣泛，如《新青年》、《新思潮》等刊物，以及有關俄國革命和共產主義的書籍等，無不愛看。當時一般青年的思想多少有些左傾，我亦不例外，蘇俄抵抗帝國主義經過的書籍，

文筆生動，使人羨慕，我相信很多青年人讀了，都會覺得我們爲什麼不可從蘇俄革命學習到一些反帝的新經驗。

我對陳獨秀的作品非常欣賞，再如羅家倫和胡適之先生的作品，我也很喜歡，但對李大釗的作品，卻毫無興趣，五四運動最響亮的口號是「打倒孔家店」，對於這種激進的反傳統方式，我甚不以爲然。因爲我熟讀過經書，覺得並不怎樣不好，在我的想法，腐敗的傳統，是必須要革除和創新，但認爲舊傳統一無是處，應該一起打倒，這畢竟是過份情緒化，而非出自理智的行動的。我深信完全否定自己傳統文化的價值，一味模倣西洋或俄國的作品，未必就能使我們國家強盛，所以我一直認爲「打倒孔家店」，如果只是一句宣傳口號，旨在喚起民族的覺醒，則尚無不可，如果是用以全盤否定傳統的文化，則是矯枉過正，流於偏失了。

當時，我覺得最重要的事，就是打倒帝國主義，而五四運動的發生，也就是爲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才會有全國人民共同的憤憤不平。中國既爲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參戰盟國，何以還要受到割讓山東半島的不平等待遇，就在群情激憤、愛國情緒高漲之中，國民都期盼著參加巴黎和會的代表，能有所表現，據理而力爭；但列強諸國，卻棄正義眞理於不顧，彼此相互勾結，狼狽爲奸，紛紛幫助日本說話，這時我才瞭解到蘇俄反帝國主義革命的意義。

和會期間，國人的情緒鼎沸，一面支持著我們參加和會的代表，爲爭取國家的利益而努

力；一面則在國內對日本實施經濟制裁，由童子軍到處出動，勸導民衆不要購買日貨，各地商店也都只賣國貨，這使得日本租界的營業，大爲蕭條，在列強環伺欺凌中國之時，中國人民受了國父數年革命救國的宣傳，自動自發地開始了前所未有的團結，五四運動無疑是促進中國爭取獨立平等的導火線，其後不平等條約的廢除，都是這次運動開始的。同時全國國民也開始積極關心及參與國事，雖然巴黎和會是有關國際問題的會議，對國家來說還是對外的一種交涉，但全民卻以無比堅定的信心，集結起來，支持出席和會的吾國代表採取堅強的立場，也是爲弱國政府作後盾。

在這個時期，我對於孫中山先生的主義與思想，並沒有很深刻的認識，到是有感於當時的國情和列強的侵害，我倒很嚮往於共產主義所說的一套，共產主義一向很容易煽惑青年人，所以同學之間，經常在傳閱著馬克思主義的書籍。有些同學還贊成了共產主義，也有一些同學是信奉著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我自己卻覺得年紀尚輕，同時對政治興趣不高，所以就沒有參加任何政黨組織。

這時，我雖沒有參加政黨組織，但卻參加了練習英語演講的社團。北洋大學對學生的要求甚嚴，只要有一門功課不及格就得退學，例如我們那一屆班次，原本有四十五名新生，到畢業時只剩下土木十六人，礦冶十五人，一共三十一人，中途不是因病輟學，就是成績不夠標準而退學，幾乎佔了三分之一的人不終學，因此我總是小心謹慎，努力奮發地來補足我最

弱的一門課程——英文，當時教我們英文的教授名叫但維・拉提摩，是歐文・拉提摩教授（Owen Latimore）的父親，歐文那時還是一個小孩，經常和我們一同玩足球。

大學的前兩個暑假，因爲回家旅費太貴，我留在學校宿舍自修，後來，由於家兄的經濟環境改善，寄給我的費用較爲寬裕，暑假我也能夠返鄉探親了。回鄉之後，湖州的沈田莘先生是父親的學生，他們家有一個義莊，擁有沈氏田產甚多，而無一張地圖，因此要找人做土地測量工作，他們知道我是學工程的，就要我冒著炎暑的天氣，爲他們測量三千多畝田地，我約了葉秀峰同學，共同化了一個半暑假做測量，半個暑假畫圖，因此獲得了一筆豐厚的酬勞，使我經濟困難較蘇，這是我在大學期間所做的一件有意義的工讀工作。

我和葉秀峰兄做測量工作是在湖州南門外，我倆就看中了北門外的弁山爲我們的論文對象。因爲這座山又高又大，礦產蘊藏豐富，可以作我倆畢業論文的資料，次年年假，我們就去實地調查地質及礦產，大有收穫，論文內容至爲豐富，有一次到了高峯之上，突遇濃霧，彼此都找不著對方，隨而雷雨交作，情急之下，相互叫喊，這才又重行聚首，同時忽然出現了一位和尚，他問過我們後，知道我們是來此研究地質礦產的學生，就好心地帶我們到廟內休息，那座寺廟規模不大，還只有大殿骨架及屋頂，牆壁尚未砌完，殿內僅有的一座佛像也未鍍金，我們脫去濕衣，換上僧袍，坐定取暖之後，在講故事中我才發現他就是從前我每晨在湖州上學時在途中所遇見的那位拜韋陀的和尚，那時他背負著一座韋陀像，三步一拜，狀

極虔誠，原來就是爲了化緣建廟，他說他拜了十多年的韋陀，才得到善男信女的資助，造成了半座廟，未完成的工作，還須繼續進行，此生能否如願完成，則不得而知了，他意志之堅，信念之篤，實在使我們感動，「有志竟成」這句話，今天見到了實證。這一教訓，現在終於有了實現的願望，日後使我在很多事情上，增強了不少奮鬥的勇氣。國父的行易知難、總統蔣公的力行哲學，與這位老和尚的道理，有何不同？

匹茲堡大學研究所

一九二三年（民國十二年）夏，我從北洋大學畢業之後，就渴望著能赴美求學，當時，清華大學選派了一批學生出國進修，同時也提供校外學生兩名獎學金，南方北方各取一名，爲了爭取這個機會，我也在北方報名參加了考試，結果不幸落選，因爲我們學校裏有一位同年級學土木的李書田同學也參加投考，他在校中爲最用功的學生，成績特別優異，總平均分數在九十五以上，他一參加，我就沒有機會了，後來他進了康乃爾大學，得到了工程學博士學位，這是極不易得到的學位，他在該校有「百科全書」之綽號。他的哥哥李書華，也是有名的物理學家。

由於獎學金沒有考上，我只有另尋他途，正好繼祖母楊氏家中，有位獨生子，小名叫寶

寶，一向甚得父母的寵愛，父親曾做過外交官，母親是側室，家境富有，教育無方，因此寶寶在國內唸書唸不好，這時正準備換換環境送他出國讀書而無人陪往，他們獲悉了我的出國計劃有困難，就希望我照顧寶寶，一同出國，並願資助我的路費，那時我也聽說到了美國，即可半工半讀，所以就答應了楊家。

那年夏天，我們和清華學生一行百餘人，搭乘傑克遜總統號輪船啟程赴美，同船者有李書田、顧毓琇、霍寶樹、和我的姊夫沈百先，他是自費去愛荷華大學就讀水利工程學，我原本是打算入麻省理工學院或科羅拉多礦業學院，後來又聽說匹茲堡大學的煤礦工程學系極爲有名，因爲匹茲堡是煤和鋼鐵工業的中心，因此我決定帶了寶寶前往匹大，那時我的英語已經很流暢，毫無困難的了。

在匹茲堡我遇到了很多中國同學，如徐恩曾、吳保豐等人，他們都在西屋公司實習，一再勸說我留下來進匹大就讀，於是我便在匹大正式註冊上課了。並且替寶寶找到了一位女老師，爲他補習英文。

匹大採礦工程學系主任勃萊克教授（Prof. Black），學識淵博，經驗豐富，匹茲堡附近煤礦場極多，勃萊克教授幾乎每週都帶我們到一個煤礦場參觀勘察正在施教的功課，譬如當我們讀到礦內排水系統一章時，他就會領著同學到排水工程最好的礦場去實地勘測，回來必須立刻要我們作成報告，所以在研究所的一年時間，我眞是學到了不少東西，也發現到美國教

育之注重實用，這和我國的教育方法很不相同，這種對實用科學的重視，是一定會帶動著工業迅速發展的。

週末我找到了中國餐館的洗碗工作，賺些錢以供零用，半工半讀，不感辛苦，而寶寶家裏有錢寄來供其揮霍，依然不肯唸書，壞事一學就會，我的用功，並不能影響他絲毫，最後他瞞著我出去玩，亂化錢，不得已，我祇能在一年以後設法託人帶他回國，以免在外國替中國現醜。

一九二四年夏天，我和曾養甫兄同時獲得了碩士學位，我的論文題目是〈中國煤礦業的機械化與電氣化〉。畢業之後，我參加了礦業局（Bureau of Mines）的訓練，受訓期間，還必須學習礦坑爆炸的應變措施，同時接受考試，及格之後，才正式具有煤礦工作的資格。

學業完成了，內心有著喜悅，也覺得輕鬆，正好徐恩曾兄這時買了一部新的福特蓬頂汽車，就在暑假中邀了我和一位在科羅拉多礦業學院就學的陸子冬兄，一齊從匹茲堡出發旅行，我們三人興奮的準備好了一切，就由徐兄駕車出發，不料在到費城的途中，由於路標稀少，經驗缺乏，車行過速，一個陡坡下去九十度急轉彎，車子竟然翻倒路旁，四輪向天，如再翻九十度，那就墜落千尺懸岩之下，不堪設想了。彼時三人都倒著闔蓋在座位中，不得動彈，好在大家都未受傷，只有我的手指受了小小擦傷，這時蓬車之頂壓扁，擋風玻璃全碎，一個車輪折損，方向盤也斷了，我們只有猛按橡皮喇叭，希望有人來救，後來隔了二十分

鐘，才有一輛過路的卡車，載有十來個工人來到，他們合力把車抬起，才把我們救出，並且熱心地爲我們聯絡福特的服務站，來把車拖去修理。我們拿十元美金酬謝他們，他們堅辭不受。是夜，我們住在一家小旅館內，給我醫治擦傷的醫生，和藹可親，不斷地安慰我，並且不肯收費。到了第二天下午，車就完全修好了，效率甚高，這種出售汽車之後的服務精神，確是令人稱讚。但由於旅程的第一天就出事，所以使得同行的三房僅有一男的陸子冬兄心有餘悸，決定放棄繼續旅行，因此就只剩我和徐兄驅車前去費城。

我們二人且行且談，一路遊覽風光，順便參觀工廠，第一站抵達費城，參加了中國同學會年會，好不熱鬧，接著就前往芝加哥，轉回西北來到了波士頓，再南行至大西洋城、紐約、華盛頓等處。在大西洋城我們停留了好幾天，正好遇上了選美會，那時的選美會雖不及今日的華麗壯觀，但爭妍鬥艷的花車遊行及泳裝競賽，卻也使人目不暇接。華盛頓玩了之後，我們就去尼加拉瀑布，並且到了加拿大邊界，接著南行到了底特律，參觀了著名的福特汽車廠，該廠分工之細，生產之速，效率之高，給了我很深的印象，又二次到芝加哥，我們又看了一間規模極大的屠宰場，只見活生生的豬牛，從這邊送進去，不一會兒，就已經宰割洗滌乾淨，由另一邊送了出來，一部份是準備冷藏的肉，另一部份是裝好了的罐頭食品，令人嘆爲觀止。我們日行夜宿，大部時日在野地露營，自炊自食，難得住旅館，眞是個悠哉樂哉，在這兩個多月的夏季之旅，確是使我增加了不少見聞和閱歷。

加入美國舊金山國民黨

留美期間，在中國同學會裏，我們經常討論中國的政治發展問題。當年的學生對政治問題，是要比現在的學生熱衷得多了。那時很多學生都擁護國民黨，但也有少數同學不贊成國民黨聯俄容共的政策，而我對這項政策並不反對，我以爲從俄國革命歷史中，我們可以學習到一些經驗，由於我的論文有關實業建設，所以當時我對孫中山先生的主義學說及建國方略曾一度詳加研讀，極爲拜服，中山先生認爲政黨的三要素是主義、領袖、組織，所以在民國十二年和第三國際代表越飛發表共同宣言，認定中國的革命主義就是三民主義，孫中山先生就是中國革命領袖，至於組織，由於國民黨當時的力量還比較薄弱，所以就接納共產黨員以個人身分加入，以團結革命的力量，共同奮鬥。由於三民主義的精闢完善，能夠爲全國國民所接受，因此容易奠定良好的國民信仰基礎。

我那時是中國同學會匹茲堡分會的會員，會長是徐恩曾兄，這段時間我經常閱讀舊金山出版的《少年中國晨報》，所以常能讀到國內革命消息及中山先生的言論，到了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我才在舊金山正式加入了中國國民黨。

說起我對孫文學說的認識，早在我就讀上海南洋路礦學校的時候，就由家兄帶我去聽過

孫中山先生演講，他的廣東官話口若懸河，見解卓越，講來生動而感人，給我印象很深。在我赴美深造之前，也曾託家兄購買了一批有關孫文學說的書帶美，但在船上有感暈船，未能閱讀，後來忙了上課，亦無機會，及寫論文時，始將中山先生的實業計劃詳爲研讀，深佩其見解獨到精闢，諸如公路、鐵路之修築，三大港口之興建，其他各類工業之發展，這些都是建國之根本。

到了美國，眼見異邦的發展與建設，益感返國獻身革命和參與國家建設的重要，我和幾位好友如曾養甫、吳南軒、艾偉、徐恩曾、吳保豐、葉秀峰等人，經常在一起計劃著學成返國的事，我們都充滿了熱忱和抱負。我始終認爲中山先生的革命工作，實是建國的首要步驟，國內的軍閥一天不打倒，國家的統一與建設就一天無法開始，所以我們這一群當時的留學生，覺得只有返國獻身革命，在中國統一了之後，才能實現工業建設的理想，因此我首先申請入黨，我的這群朋友也都相繼地加入了國民黨。

我們都很熱烈地討論過孫文學說、建國大綱、建國方略，對於中山先生鼓勵外人在中國投資，以促進中國建設發展的論點，我個人尤爲贊同。譬如美國的鋼鐵工業，最初也是由英、德投資發展，這才逐漸形成爲美國本土工業。所以我一直認爲中山先生的見解正確，這是當時有部份人士，以爲外資所佔比例太大，將來恐有壟斷經濟之憂，所以有人主張外資比例不得超過一半，其實這些看法都嫌顧慮太多，當時的中國並沒有足夠的能力與資本，來推

動各項建設，若能規定一個期限，充分地借助外資與技術來促進發展，一旦國人有機會見到及使用機器，定能有所創造及自製的能力，那對我們一定是有莫大的幫助，何況不平等條約及治外法權一旦廢除，必使中國解除長久以來的禁錮，同時，我還認爲任何人都有鄉土思國之情，又有那些外國人願意終老在異國的土地上呢？外國人終必無法在中國生根，我們又何必懼怕暫時借用他們的資本和技術呢！總之，我非常佩服中山先生的很多先知灼見，再如他所提到的社會福利措施等等，都可見出他對國計民生和建設國家的遠大抱負，這就鼓舞著促使我加入了國民黨。

史克蘭敦的礦工生活

我在匹茲堡大學研究所畢業之後，就和徐恩曾兄作爲期兩個月的旅遊，獲益不少，隨後立刻開始找工作，最初是在一家磚廠任職，我從混土、切割、加熱等工作都做過，一個多月後，我正式進入了匹茲堡煤礦公司，開始了礦坑的本行工作。最初是在一個僅僅兩呎半厚的煤礦礦場工作，人站不直，要爬進去做，用機器把煤拖出來。後來又調到另一個礦約有七呎厚的煤層，其工作的方法全不同了。後來我又申請到一個礦去工作，其煤層約五六呎厚，那是最理想的了。在短短的五、六個月內，我總共在不同型的三種煙煤礦坑中，學到了很多寶

貴的工作經驗。

後來，我轉到史克蘭敦白煤礦區的麥文礦業公司服務，該公司有工人四千多人，井深有三千多呎，規模相當大，我在該處工作了八個月，前後發生了一些事，說來驚險有趣，而且使人難以忘懷。有一天，我正在坑道內幫一位老礦工修理鐵道，忽然我直覺到頭頂上有微音發出，急忙用力拉開了老礦工一把，眞個是說時遲，那時快，一塊巨石自頂墜落，幸好我們都及時躲開，免遭落磐劫難。又有一次，我和同事在坡下修門，我靈敏地聽到了似乎有一輛車在滑下來的聲音，我立刻把那同事推開，也就在這一刹那間，滑下來的車已把坑門衝得粉碎，終算沒有打著我們。在坑道內工作，一定要隨時提高警覺，以策安全。經過這兩次逃避了死亡，兩同事感我救命之恩，對我十分友好，教我不少經驗。

又有一次，我負責檢查坑道的通風設備，負責通風的人，在每次清晨坑道工作開始之前，必須首先入內察看，如果發覺有瓦斯氣味，或安全燈有瓦斯顯示，就要在坑道的每個入口處標示「危險」的標誌，以示警告小心，禁止入內。那一次我依例入內檢查，發現坑道有一處地方安全燈在顯示著有瓦斯，於是我忙做好了「危險」的標示，就在走出坑道之時，遇見了一位匈牙利籍的礦工正欲入內，我立加警告不可入內，但他不但不聽而且還吸著煙走入，我攔阻不及，不到三分鐘，只聽到坑內已是一聲爆炸，我撲倒在地上，慘劇發生了，這位匈牙利礦工混身燒焦了，事後公司派員調查，證明我並未失職，但我竟爲這件事難過了很

久。

我還記得有一次在礦內幫助一位電氣匠名叫約翰的修電線，他要我替他找個錘子來，我找來找去，祇找到一個有些破的錘子，我交給他時，他說：「這錘子像你們中國人」，我聽了怒火上昇，就拿錘子打了他一下，他就和我打起架來，一下子其他的工人集起來觀戰，工頭也來了。工頭問原因，我說：「他侮辱我的國家，所以我不能原諒他。」我將經過告訴了工頭，工頭說：「陳是對的。」並責備約翰及告訴其他工人以後不准侮辱人家的國家，於是以後無人敢再欺侮我──中國人。同時亦啟發了一個教訓──對外國人不能示弱。

在礦坑工作的這段日子裏，我曾經爲了別人擔心，連帶受過輕傷，住過醫院，但康復之後，我又走入礦坑，我絕不放棄學習的機會，在所有來美學礦的同學中，我是在坑道內工作最久的一人，坑道裏的撐木、通風、排水、裝運、鑽探、炸煤、裝電線、修鐵路，甚至駕駛地下電車等，我都親身學過和做過。

記得有一次收工的時候，我是最後一個離開坑道，還沒走到坑口，我就覺得好像有什麼東西忘了拿，於是又轉身走了回去，走了不久，就聽到砰然一聲，知道頂架倒塌了，如果我剛才一直走向前去，正好被活埋在頂石下面，當時在坑外的同事，都以爲我必定已被壓死在坑道中，沒想到我一向注意坑道的太平門出口處，所以不一會兒，我竟然在漆黑的坑道中，摸索到了一個小洞門鑽了出來，大家都驚訝不已，直到今日，我還是保有這種警覺性的習

慣，例如在旅館、戲院，我總會先查看安全的出口，這都是由礦坑工作中得來的經驗，實在說來，礦坑的工作實在是一項具有高度危險性的工作，那時安全設備又不夠，所以常造成很多人的傷亡。如果沒有礦工工會的隨時抗議，資本家那裏會顧全礦工的安全，肯化錢在安全設備方面呢！

大多數礦工所受教育有限，可是他們都相當自負，瞧不起大學畢業生。記得有一次，礦內的抽水馬達壞了，一位退伍軍人的礦工弄了半天沒修好，領班就要我去修理，我心裏明白，全礦場的人都會等著看我這大學生的笑話，所以我一定得把機器修好，果然皇天不負苦心人，在我用心之下，馬達修復了，大家也都對我刮目相看，自此之後，大家相處得更爲融洽友善。這件事也給了我莫大的體認，一個人在必要時一定要把握機會，表現自己的能力給人看，才能贏得別人的尊敬與友誼。

我在史克蘭敦的八個月裏，當地的友人待我極好，最令我懷念的麥肯・凱夫婦，他們有一個兒子在匹茲堡卡內基工藝學院就讀，在他介紹我寄住他們父母家的日子內，他們待我如同家人，而且不肯接受我在金錢上的回報，後來我雖然因爲交通不便，搬到基督教青年會的宿舍，但每逢週末或假期我總是到他們家去，凱老太太教我彈琴，作水彩畫，到了安息日，我也陪他們一同到教堂聽牧師講道，好像是一座美以美教會的教堂。說到我對基督教的接觸，那還是在兒童時代，吳興老家對門有一大塊土地，名叫海島，是外國人聚居之所，其中

就有座教堂每逢星期日，教堂就會發給各式各樣的卡片，有關基督的故事，精美悅目，很能吸引孩子，我有時也和其他孩子去要卡片，但是我對基督教並無多大認識，雖然我後來經過幾個月的聽講，但仍沒有接受，也並沒有表示拒絕。因爲我覺得四書五經中，有同樣的道理講過，並無差異。

在史克蘭敦地區，共有好幾個礦區，共有礦工一萬二千餘人，我是唯一的中國人。有一次，我陪同凱老夫婦參加教堂所舉行的晚會，有若干個節目，其中一個是大家輪流在匣內抽到一個紙條，上面有一問題，然後由抽得者回答。當時我抽到的問題是：「一九二四年所發生的最大事是什麼？」我立刻毫不思慮地加以回答：「一九二四年發生的事件中，最大和最重要的就是美國立法禁止中國工人入境，這種排華舉動完全違反了基督徒博愛平等的精神，也與美國的民主立國精神背道而馳，這項法案的決定，無異是美國的恥辱。」我慷慨直言，結果竟然贏得了滿堂的掌聲，大家都走過來和我握手交談。

從那時起，史克蘭敦的教堂中，有若干次都曾邀我去講演，我每次所講的都是有關中國傳統文化，以及孔孟學說的眞理，因爲我覺得身爲中國人，在國外只要有機會，是有責任來宣揚中華文化的。通常我應邀去講演之時，都會備了一部放映機，帶一些故都北平和其他地方的風景照去放映，用以介紹我們中國民情風俗，因此我白天在礦區工作，晚上依然忙碌不堪，礦區離市中心很遠，來往奔波極爲辛苦，但那段日子，卻過得非常有趣，非常充實。

有天晚上，我工作回來，身心極爲疲累，便躺下休息，後來竟在睡夢中夢見繼祖母楊太夫人去世，我一驚而醒，連忙寫信回家問候，誰知次日就接到了大哥一封電報，果然是告知繼祖母過世的事，而她老人家去世的時間，正好是我在做那個噩夢的時候，這眞是一種無法解釋的第六感，繼祖母生前非常疼我，她臨終時，一定想念我，於是她的靈波隔洋地送到了我腦海中，她的噩耗，使我悲痛莫名。

繼祖母的過世，使我興起了思鄉和懷親之念，正好這時礦區在鬧罷工，我是煤礦工會會員，曾經聽過工會領袖約翰路易斯（John Lowis）演講，這次也參加了罷工，我雖然可領工會救濟金，但是我決意離開，如果再有兩年的實際工作經驗，我便可以領到一張正式的礦工執照。過去的八個月工作，實在已使我學習到很多的知識，我很想再更換一個環境，到一所煤氣公司去實習，但是大哥果夫這時函電交催，要我即刻返國，他說我在美國已工作多時，現在也該回國服務，獻身於建設工作了，於是我便經温哥華乘船返國。

從留學到工作，我對美國印象最爲深刻的是管理制度，他們講求實際和效率，對任何事都詳加研究，我在礦場工作時，對有關公司的制度，以及採礦技術的改進等，就常見礦工們提出很多建議，只要提議經過研究，確屬有利於未來的發展，公司就會採納施行，而那位提出建議的礦工，就會獲得公司鉅額的賞金。這是一種很好的制度，鼓勵大家提出建言，使主管當局能夠發掘問題，也使員工對公司產生了向心力。後來我自己也採用這種方法，在黨部

工作和在教育部長任內，我都鼓勵幕僚提出意見，並盡量採納他們的意見。

再就是分層負責的制度，美國人也實行得徹底而有效，他們分工細密，一層對一層負責，每個人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講求實效，這種實際效果，在我們中國還很難做得徹底，本來一天可做完的事，總要拖上兩、三天，表示他是在忙碌做事，做個沒完沒了，這樣浪費時間，不重實效，是現時各機關的通病，不僅基層的人員如此，就是上級主管所發出的指令也多不切實際，近乎流於空談，因此無法獲得部屬的敬重，在執行上會造成很多的波折和困難。舉一個從家兄所告知的例子來說：在抗戰開始時期間，日軍直向長江西進，上級要他在幾天以內在鎭江採行沈船入江阻塞航道的計劃，以阻止日本海軍溯江而上的攻勢，但要在短短的幾天之內，把大量的巨石搬運到江中上百艘的民船上，並使船沈入江底，這就不是幾天的時間所能完成的，因而在執行上，就會造成了很大的困擾，難以完成使命的。我還發現其他諸如此類的例子很多。我發現在美國，至少在我工作過的地方，各級主管都會正確地計劃每個人一天能做多少工作，從不浪費人力或發出指定時間中做不到的命令，這就是美國人注重實效之處，也容易讓部屬對上司信服。做爲一名工程師，實在更需要注重實效，我之所以在礦區勤奮工作，就是內心裏有一股力量在鼓舞著，要我努力成爲一名優秀的工程師，在我返國之前，我也決定盡我一己之力，來促進中國工業的發展。

2

民國十四年冬至十六年冬

北伐初期

民國十四年秋返抵國門
隨即獻身國民革命，
十五年又隨著蔣先生參加北伐；
十六年秋蔣先生退隱赴日；
我隨同離開南京回到上海。



擔任蔣校長機要祕書

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九月，我返抵國門，到了上海，我本來準備接受中興煤礦公司總經理錢新之先生邀請，去擔任該公司的工程師；就在這時，家兄轉給了我兩份蔣介石三叔的電報，他希望我能夠到廣州去協助他，家兄也再三地說明，認爲這是我獻身國民革命的機會。只是我對政治並沒有像對工程師那樣有興趣，但經不起家兄的勸說，也有感於蔣先生的誠意，於是在十二月間，我就搭輪船前往廣州。

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元月九日，介石叔接見我時，不讓我陳述對採礦工作的興趣和志願，就任命我爲黃埔陸軍官校校長辦公廳機要祕書。在任命狀中，蔣先生稱我的號爲陳立夫，其實在這之前，我在國內外學校中都是用陳祖燕的本名，但從此之後，我就以陳立夫之名行世，而離開了工業一行了。正如同家兄祖燾，蔣先生稱他爲果夫，自此世人即以果夫和立夫，稱呼我們兄弟。

蔣先生當時是黃埔軍校校長、軍事委員會委員、廣州衛戍司令，也是東征軍總指揮，我在名義上雖是黃埔軍校的祕書，但實際上是在他官邸辦理他私人的重要機密文件，以密電的翻譯爲最多，我就居住在他廣州東山區的官邸，和他同用三餐，共同生活。

和我一起工作的是邵力子先生，我們在一間小辦公室工作，開始時邵先生是負責起草文稿，我則幫助翻譯電報和謄繕書信，同時我們也處理由黃埔軍校及東征軍總部送來的機密及重要公文；對公文的處理，的確是一門學問，邵先生給了我很多的指導，後來他奉派去馮玉祥處接洽要事，遂離開了廣州，我就獨自負起了這份機要文書處理責任。

我們每天所處理的公文，眞是包羅萬象，那時正值二全大會之後，共產黨徒正採取擁護汪精衛的策略，藉以把持整個局勢，因爲汪那時候是黨的中央常委、政治委員會主席、國民政府主席、軍事委員會主席，掌握著黨政軍三方面的大權，在「以黨治政，以政治軍」的口號下，蔣先生雖然握有軍事實權，還是處在被支配的地位，所以，蔣先生的處境極爲艱難，加以汪聽命於中央政治委員會顧問鮑羅廷及中央軍事委員會顧問季山嘉，使蔣先生的環境日趨險惡。各方送來的公文有政治的、有黨務的、有軍事的、有經濟的，以及私人方面的，五花八門，目不暇接；最困難的是翻錄電報，在開始之時，往往要花很多時間去查譯一個字，通常我都要工作到午夜才能就寢。而蔣先生則是凌晨即起，我在他起來之後，也不好再睡，只有立刻起來，那時我才二十七歲，體力充沛，雖然睡得時間甚少，但精神很好，工作很勤奮，蔣先生所交待的事，都能如期完成。

蔣先生的生活極有規律，他早睡早起，每天清早在床上就做健身運動，然後起身靜坐默想半小時，以清醒的頭腦，寫下當天要做的事情，再草擬要著手進行的重要文件。大部份重

要的文稿，都是由蔣先生親自擬就的；有時他會提示邵先生重點，而由邵先生起草，再送呈蔣先生自己修改，訂正最後的語句。一切的準備工作，通常都在早餐之前做好，然後蔣先生、邵力子先生和我再同進早餐。

我注意到蔣先生有時脾氣很壞，特別是對軍人，他對文人則較爲禮貌。有一天在晚餐後，我對蔣先生說：「如果有人對我發脾氣，我會立刻辭職。」不過，蔣先生很重視我這句話，知道我是一個自愛的人，這是我非常感佩他的。我很了解當時爲什麼蔣先生會脾氣不好，因爲那時在政治上，已經逐漸形成一個危機，有很多老同志認爲蔣先生是親共左傾；而共產黨則認爲他是右傾，設法要趕他走。因此，蔣先生提出北伐的計劃，却不能被提至軍委會討論而遭擱置。他居軍事要位，擔當重要責任，却橫遭阻折，心情自然就顯得鬱悶。

我是一個工程師，一開始就遇到這樣一個複雜的政治環境，對政治自然不感興趣，所以有一天曾對蔣先生提過兩件事：第一，如有機會，我仍希望能回到我本行去工作；第二，如果我留下爲他效力，我一定竭盡智能，接受指導，希望他一定要尊重我的人格，不受怒罵。蔣先生對這兩件事都答應了，但是第一件，他却從未做到，因此我學未致用，遺憾終身。至於第二件事眞的是完全做到，其實我算是後輩，但蔣先生在二十五年中，從未對我發過脾氣，甚至連拉嗓門大聲喊都未有過，如今想來，是很值得我慶幸欣慰的。

我習慣稱蔣先生爲「蔣三叔」，因爲黃郛先生、我二叔陳其美，和蔣先生是三人結拜爲

兄弟的，蔣先生年紀最輕，排行第三，所以我才稱他爲「三叔」。不過在工作之時，我仍稱他爲校長；後來北伐時期，則稱他爲總司令，公私分清。

那時共產黨徒和俄國顧問控制著中央黨部，連汪精衛（兆銘）也和他們一鼻孔出氣，蔣先生爲了工作，不得不和他們常有聯絡往來，但我却和他們沒有接觸，因爲我整日伏案工作，甚少外出，也少有社交生活。同時，工作的性質，也不允許我和外界多接觸，雖然我曾看過很多機密文件，但從不參與機密會談；見過很多來拜訪蔣先生的人物，但我也不參與他們的交談。我是一個機要秘書，專對校長辦公室事務負責，因此，我可以說是非常孤立的。

向蔣先生提興登堡將軍從不發脾氣故事

我跟著蔣先生二十五年以來，在他擔任黃埔軍校校長期間脾氣很壞，常常罵人。有一次，我對他說：「校長，你的脾氣很大，他們被罵的人受得了，我是受不了，如果你拿對他們的態度對我的話，那我明天就把舖蓋搬走。」所以我跟他二十多年，他沒有對我發過脾氣。「一個人要尊重自己的人格，這樣別人才會尊重你，知道你不是一個隨便招之即來呼之即去的人。我是來幫助他完成愛國家救國家的任務，並非來求個官做的。」

那個時候，蔣先生心情很不愉快，因爲他已把廣東統一了，共產黨徒處心積慮要把他趕

走，他心中很煩惱。他在政府裏的地位，儘管軍事權完全在他手裏，但那時候的口號是：「以黨治政，以政治軍」，就是黨管政治，政治管軍隊，他是站在第三級的地位，所以軍事權力雖在手裏，可是所處的地位很爲難，他們只要一個決議就可以把他換了。他見情形不好，就提出辭呈表示自己不願再做下去，但軍事委員會主席是汪精衛擔任，顧問是俄國人季山嘉將軍，他的權很大，他一方面想趕走蔣，一方面不敢批准，因爲他怕軍隊控制不住。蔣先生很煩惱，如果他走，丟下這個責任可不得了；不走，他們又壓迫他，所以壓力很大。當心裏煩惱，對部下有所不滿意時，往往容易發脾氣。因此我講了個故事給他聽，我說：「興登堡將軍說過一句名言：『發脾氣是自己處罰自己。』興登堡這個人是從不發脾氣的，他是一個天才軍事家，他有一段時間處境也很困難。威廉一世做皇帝時，興登堡做參謀總長，當時和威廉一世的太子威廉二世出操演習，兩人比賽時，他把威廉二世的軍隊全部包圍了，但外面傳播的消息是兩人打成平手，因爲如果說威廉二世全軍覆沒，則皇太子將臉色無光。興登堡因恐這個秘密外洩，不僅皇太子丟臉，他也站不住腳，所以他就提出辭呈，威廉一世也應付得好，准他辭職，派他到德國的東部東普魯士去研究地形。因爲威廉一世預料，萬一有一天俄國要打他們，一定從東普魯士那邊來，所以興登堡到那邊之後，把那地方的一草一木都弄清楚了。後來第一次歐戰發生，俄國攻打德國，威廉二世派興登堡擔任東部的總司令，由於興登堡對當地地形早已弄熟了，所以一舉擊潰俄軍，把蘇俄二十四萬大軍全部俘虜，這樣一

來蘇俄就不敢再打德國。後來威廉一世又把他調回西方打法國，戰爭結束時，他的軍隊從法國退回德國，本來打敗仗的軍隊紀律很難維持，但興登堡的軍隊紀律之好，全世界知道後都稱讚不絕。這次敗仗，不是他打敗的，而是他去接事的上一任總司令打敗的。興登堡去接替那人工作時，戰爭便告一段落，大軍在撤退時表現的秩序非常好，因此德國人很崇敬他，威廉二世下台後，人民便選舉興登堡爲第一任總統。」

由於我把興登堡的故事講給他聽，他對我的「你如果對我也這樣發脾氣，那我明天就把舖蓋搬走了」這句話，留有深刻印象，所以我幫他做過二十多年事，他從沒對我發過脾氣。這段故事，給他的印象很深，而我自己也很負責，他每次交給我的事情，我立刻處理，他自然不罵我了。

北伐前歷史性的建言

蔣先生因爲當時情勢複雜，汪精衛正主持一切政務，並兼任軍事委員會主席，完全聽從俄國顧問季山嘉的控制。國民政府雖有意免除蔣先生職務而又不敢，因此，蔣先生先試提辭呈，但汪精衛（主席）對蔣先生的辭職，既不敢批准，又不加慰留，蔣先生進退兩難，內心甚感痛苦。他們曾暗示蔣先生離開廣東，到俄國去，名爲考察，實則把他扣留在俄國，待有

人掌握了廣東軍事全權，才放他回來。蔣先生被迫決定離去，要我隨他同行，我們準備由香港搭船去海參崴，行程消息沒讓任何人知道，兩人的一切護照、船票、行裝都完全準備好了，事先還兌換了一些港幣，以備途中應用。出發那天，我們二人驅車前往長堤碼頭，在到達碼頭之前數分鐘，我就問蔣先生：「校長，爲什麼我們一定得走？軍事權在校長掌握之中，爲什麼我們不幹一下？」那時我年輕氣盛，並不清楚局勢的複雜，所以就信口問他，蔣先生也未責怪，他聽後就吩咐司機開回寓所，但在未到寓所以前，他又吩咐司機再把車開往碼頭，這時，我又問蔣先生：「我們如果走了，總理所交給校長的任務將由誰來擔負呢？」蔣先生聽了想了又想，最後毅然決然對司機說：「開回東山公舘。」司機座位和後面隔了一塊玻璃，聽不到我們所講的話，受命開東開西，莫名其妙。

蔣先生決定留下來幹了，這一明智的決定，對以後中國的歷史發生了極大的影響。這件事除了蔣先生和我二人知道以外，無第三人知道，所以我有責任在八十歲時接受本黨頒贈中山獎章典禮時向中央諸同志宣布出來，這是國民革命轉捩點之一，十分重要。至於蔣先生過去已去過蘇聯，這次再去，是沒有必要的，除非爲了政治因素。這個轉變，絕不全是因爲我的話而決定的，在一個人猶豫不決之時，任何一方面，增多一分，是會發生影響的。但是我何以有此勇氣問他，這除了總理在天之靈可以解釋之外，別無原因，歷史的因素是十分複雜的。我們回到東山公舘後，蔣先生就忙碌不堪，時時在緊張中，像有所準備似的。

到了這個時候，我才開始了解，蔣先生何以一定要我留下來，因爲邵力子先生是思想傾共，留在身邊，有所不便，有了我，才可派他出去聯絡馮玉祥；否則，對以下所發生的事件，會有影響。

中山艦事件

三月二十日所發生的「中山艦事件」，是一項陰謀，完全是針對蔣先生而來的。

中山艦原本泊在廣州，但那天沒有獲得蔣先生的命令，這艘砲艇竟然駛入黃埔，且砲身未著砲衣，一副枕戈待旦、隨時準備發射的樣子。蔣先生於二十日上午剛抵達黃埔，一見這種情況，就知道情形有異，立刻登上小汽艇返回廣州，跑到一座水泥工廠暫行棲身，在那裏指揮軍隊，部署一切，以應事變，通常，蔣先生到那兒，我都是跟著他去的，但這一次他却要我留在東山公舘。

其實，蔣先生在事前已接獲很多情報，我記得在十八日深夜十二時半，有人到官邸來敲門求見，他說：「我姓胡，有十分緊急事情要當面報告校長。」我說：「他已睡了三個多小時了。」他繼續要求面見，我不得已，才去通報，因爲幾天以前，蔣校長曾有吩咐，如有十分緊急情事，可以准我叫醒他。他聽說是姓胡的，立刻答允起來接見他，他們倆密談了半小

時多，胡才離去。我後來才知道他是胡公冕，是一名重要高級共產黨幹部，和蔣校長是浙江同鄉，而且是老朋友，他所以那麼晚來見，一定是爲避人耳目，而且有極緊急情報，非面陳不可。那晚，蔣校長和胡某低聲密談，我照例不參加的，但知道一定是很重要的事，不過後來我想談話的內容，一定和三月二十日的事有關。

蔣先生在水泥工廠住了半天和一夜，在這段時間裏，無人知道他的行蹤，汪精衛的太太陳璧君曾三次打電話到公舘，詢問蔣先生的行蹤，我告訴她我不知道，只知他上黃埔去了，她不相信，一定要我把蔣先生的去處告知她，我只有委婉地應付她，到第三次她發怒了，罵了我，把電話用力一摔，那時只我一人留在公舘，另外還有很多人打電話來問，我都婉轉地回答。至於，蔣先生的眞實去處，我即使知道也必須要保密的。

三月二十一日蔣先生在黃埔做了一次演講，隨即和我到了虎門，稍事休息，並草擬了北伐計劃，由他口授，要我做了筆錄。當時陳肇英同志是虎門要塞司令，他和海軍學校副校長歐陽格及徐桴三人於二十日晚間攫取了中山艦，平息了這次叛亂。後來我曾爲蔣校長送了一封信給歐陽格，要他來蔣先生公舘，在他來到之後，就被逮捕了。歐陽格曾在蔣先生底下做事，極能貫徹命令，但却被蔣先生下令逮捕，爲了這事，我想了幾天想不出理由，後來據我的猜測，蔣先生可能是不願把中山艦事件擴大，因而找一個人來承擔責任，因爲，蔣先生認爲北伐或還需共產黨的合作，所以奪回中山艦有大功的歐陽格就成了替罪羔羊，不過，蔣先

生這樣做，的確是有助於穩定當時的情勢。

後來歐陽格怎樣了呢？他是在北伐時期中被釋放的，但何時被放及以何理由被放，我已記不得了，但我知道他是一個很有雄心的人，他認爲他之所以沒能在海軍裏出頭，是受了福建幫的排擠，因爲他是江西人。不過，後來，蔣先生還是指派他出任鎭江中央魚雷學校校長職務，至於他的結局，確是出人意外，據說他犯了貪污罪，又有人說，軍法處要敲他竹槓不成而被軍法處死。他的毛病，是恃才傲物則有之，貪污似乎不像，我還曾設法救他，但已於事無補。歐陽格曾深切痛悔過，可惜爲時已遲。

在中山艦事件中，廣州警察局長吳鐵城也同樣被捕，他也是被帶到東山，再送往虎門，也許是蔣先生獲得情報，知道吳曾同謀之故，那眞是一個複雜而微妙的環境。我不太清楚究竟吳和汪精衛有什麼關係，不過，吳當時確是信仰尚未十分堅定、多方面應付圓到之人，後來我是在中央黨部時，才了解他的底細。但自始至終，除了蔣先生，實在再沒有人知道爲什麼吳會被捕，而蔣先生也從未跟我提起過這件事。

那時，廣州地區最可靠的軍隊是由劉峙、蔣鼎文兩位將軍所指揮，北伐時他們是第一軍的第一第二兩師師長，當鎭壓叛變時，他們曾經負責繳了共黨所指揮的工人糾察隊的槍械四千支，包圍了俄國顧問居住的地區及維持廣州市秩序的。他倆是忠貞不二的革命軍人。

我曾奉命抄謄蔣先生給汪精衛的信函，且在三月二十三日晚間親自把信送到汪家，信裏

的內容，是列舉事實，責備他不應聽信共黨，排斥忠貞。汪精衛隨即連夜離開了廣州去香港，行前他拒絕見蔣先生一面。至於這次反對蔣先生的整個陰謀，我很難了解全部內幕，但從各方面來看，尤其致汪函中，汪精衛必定參與其事，否則他何以不出面幫助蔣先生，又何以在事後倉促地逃往香港。這時，蔣先生也要求俄國顧問離開廣州，於是我又送了一封信給俄國顧問季山嘉。

事變過後，蔣先生與很多廣州的首要展開會談，這些人當中包括譚延闓、宋子文、李濟琛等，蔣先生想聽聽他們的意見，和了解他們的態度，以便對未來另做一番策劃。他們都坦承地對時局表示了自己的看法，給了蔣先生很大的幫助。

這就是我所知道的三月二十日中山艦事件。蔣先生統一了廣東，而受共黨之排擠，可說是做了最大的忍耐，他們認為威脅不成，就繼之以兵變，使蔣先生心生畏懼知難而退，沒想到蔣先生益發堅強，先發制人，鎮定地處理一切，終把事件平息了下來；同時為息事寧人，不願把事件擴大，免得和俄國關係發生決裂。那時俄國顧問在政府中的勢力很大，因為汪精衛祇要有領袖做，什麼都可奉命唯謹，所以他們的態度可以使蔣先生在廣州的處境日益困難，但是，蔣先生終於不受他們的威脅，同時極力設法緩和緊張的情勢，逮捕歐陽格就是一個例子。另外還有鄧演達，那時擔任黃埔軍校教育長，他雖也參與是日之陰謀，蔣先生都不予追究，並在這年的七月，反讓他擔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主任的要職。

鄧演達在中山艦事件的前一日（三月十九日），即顯得非常緊張。那天他來見蔣先生，適值蔣先生有事外出，未曾見到，就非常地不自在，並沒有追問蔣先生到那兒去，或是表現出關心的態度，好像他已事先獲知內情。其實這天，蔣先生並不是故意不見他，後來，蔣先生便知道他也牽涉在這次陰謀之內，仍然若無其事，蔣先生所以不予深究，是認爲當務之急，乃在集中全力完成北伐大業。我個人認爲鄧演達此人，是一個很能幹、有野心，而且有充分活力的人物，他口才很好而且工作勤奮，蔣先生是愛才的人，當然希望他回頭過來。

那時俄國方面也不願和蔣先生的關係惡化，後來在北平蘇俄大使館的文件中，發現當時俄顧問受莫斯科的責備，稱他們輕舉妄動。因爲他們知道中國北伐成功對俄國只有好處，雖然我們革命是以三民主義爲基礎，但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都是社會主義，相當接近，對反對帝國主義是站在同一戰線上的，當然可相互獲益。他們明白如果國民黨一旦在廣東失敗，那共產黨也將無法生存，因爲共產黨是需要在國民黨的卵翼下慢慢滋養才能壯大的，就是這種微妙的關係，所以，蔣先生和俄國方面，都盡量不使情勢尖銳化。

這次事件的結果，造成了提早北伐的決定，因爲從此時起，蔣先生已掌握了黨和政府的實權，可逕行決定何時北伐，而不必再聽那些處處扯後腿的俄國顧問和汪精衛的支配了。

中山艦事件所形成的影響，可歸納成下列六點：

・它使海內外民衆，都了解蔣先生所代表的是三民主義的一方，而非受制於共黨。

・忠貞的國民黨同志受到鼓舞，他們知道仍須繼續共同努力奮鬥，以完成國民革命的使命。

・共產黨明白蔣先生是不會受威脅的，擁汪排蔣的政策是失敗了，俄國更清楚共產黨蠢動的時機尚未成熟。

・粉碎了汪精衛和共產黨相互利用的詭計。

・蔣先生獲得了揮師北伐的實權。

・中國國民黨黨權重歸忠貞的國民黨員手中，不再受汪精衛與共黨的擺佈。

改組國民黨黨部

「中山艦事件」對國民黨發生很大的震盪，使得國民黨和共產黨的爭執，趨於公開化。早在黃埔軍校內，師生就暗中分成兩派，一派是信奉三民主義的人士，稱爲孫文主義學會；另一派則贊同共產主義，稱爲青年軍人聯合會。而雙方最高決策當局彼此也存歧見，那時國民黨人士多認爲和共產黨合作是必要的，雖然明知他們只是以合作爲幌子，私底下仍是爲共黨做事，但因爲他們不敢明目張膽地分開，所以國民黨也就在顧全大局的前提下，多方忍

讓，加以容納，他們都是化整爲零，個別地加入國民黨。說來這眞是一個混淆的局面，所幸的是那短暫的國共合作，確也奠定了北伐成功的始基，不幸的是共黨的野心和陰謀，卻是造成日後國共分裂，無法合作的局面。

在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一月，蔣先生在黃埔軍校所做的一次演講中，曾提到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有某些相同的目標。那時，蔣先生仍試圖從中斡旋本黨與共黨之間的爭執，香港和上海的報紙，因而指蔣先生左傾，並稱廣州爲「粉紅色廣州」。中山艦事件之後，大家都知道了蔣先生是三民主義的忠實信徒，他已有權可決定所有主要的政策，無論黨、政、軍各方面，蔣先生已不必再遷就或顧慮什麼了，他可以明快地處理黨和政府的事務，結果博得了後來英美對國民政府的相繼承認，列強終於了解蔣先生不是親共的人。

孫中山先生當初允許共產黨員個別加入國民黨，原是希望他們能爲三民主義革命貢獻一些力量，但最後與願相違，沒想到他們只爲自己打算，竟以國民黨爲掩護，在暗中發展共黨的勢力。而在國民黨內部，汪精衛之流人物都喜歡巴結共黨，事實上那時權力是在汪的手上，因此，蔣先生就成了共黨份子的眼中釘。而且軍中的黨代表都直接受中央黨部指揮，制度仿照蘇維埃「黨權至上」的原則，軍隊只成了一種工具，蔣先生當時處境之困難，可以想見。

就在汪精衛和共黨勾結、控制著黨的大權之時，蔣先生不得不採取對共黨應付的態度，

這就是他之所以會被外界認爲左傾的原因，如果那時不對共黨敷衍，蔣先生很可能早就被逐出廣州了。因此我認爲中山艦事件，對我國近代史的影響很大，有人認爲這是一次偶發事件，也有人認爲這是起因於誤會，但不管如何，我總覺得，蔣先生對這次事件的處理是正確而睿智的。

後來我在國民黨祕書長任內（民國十八年——二十年），在一次中央黨部清黨週年紀念會中，對當初中山艦事件做了很詳盡的報導。至於在民國十三年那些反對容共的資深國民黨員如謝持、張繼、鄒魯等同志，均離開廣州到北平西山去了，在那兒他們開闢了第二戰場，極力在北方宣揚三民主義，但他們却被共黨指責爲造成了黨的分裂，和削弱了黨的影響力。不過我却不以爲然，因爲那些當初贊成容共的國民黨員，他們雖留在廣州，但後來却轉而打擊共產黨，反對容共的一批人士，則在北方軍閥勢力之下宣揚主義，這對北伐應該是有間接幫助的。待全國統一之後，這兩批人士仍可自然地携手合作，共同爲建國大業而努力。

中山艦事件過後不久，胡漢民先生剛從俄國回來，他是一位資深國民黨員，在黨內頗具聲望。但那時一切職務均已安排妥當，胡先生只好出任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他對這類職位當不會感到滿意，況且當時，蔣先生已總攬黨、政、軍的要務，胡先生於此時歸國，在時機上確不甚適當，因此他自己決定暫時離開廣州爲妥，所以他在十五年（一九二六）離穗，其實他在廣州出現，對自己的處境也不好，他會成爲共黨的目標。我認爲他的離去，會

使黨內關係單純化，而且這也是明智之舉，如果他要留下來不走，鮑羅廷或許要設法趕走他，反使蔣先生會很傷腦筋，我不認爲胡先生的離開和鮑羅廷有什麼直接關係，不過，我懷疑蔣先生是不是聽了鮑羅廷什麼話。

那時在鮑羅廷手下的共黨份子，急欲排除國民黨內右派的勢力，他們認爲：「汪精衛是左派，胡漢民爲右派，蔣先生爲中立派。」蔣先生可謂處境矛盾，他既不能偏左或偏右，以免引致不良的情勢。一般都認爲在中山艦事件之後，蔣先生有偏右傾向，使得共產黨很緊張，事實上，蔣先生是非常中正的，雖然和共產黨合作的政策是左傾路線，但那是爲了北伐的大局著想，所以這也引起了右派人士的不滿，造成了胡漢民、伍朝樞等離開廣州。蔣先生爲了彌補這一裂痕，也特別選聘張靜江先生、譚延闓先生和家兄果夫等右派人士爲其幕僚，參與機要，張先生於三月二十二日離滬抵粵，家兄也於五月一日到達廣州。

爲了使北伐能順利成功，蔣先生必須和俄國重新謀求更良好的關係，但又不能做得過份。在俄國方面，當然希望蔣先生能採左傾路線，但因爲蔣先生意志堅定，因此共黨份子只好到處散播謠言，以間接而迂迴的方式，企圖來影響蔣先生的決定。

我沒有參加過蔣先生的一些祕密會談，通常我都備有他每天的工作時間表，正式會議均會有記載，但有時也例外。一九二六年四月，鮑羅廷自華北回來後，即和蔣先生有過一次祕密會談，我不知道那次會談是在那裏舉行，內容當然更無法知道。很可能他們是在電話中安

排的，而且會談之時，一定有人擔任記錄，不過我已記不得是誰了，或許這記錄會存放在辦公室裏，但我知道存在那裏的一些文件，均是對蔣先生有意義的，我也從未打開看過。

我記得胡漢民先生是在廖仲愷先生被刺（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後不久離穗的。廖先生曾被很多人誤認爲左傾，但我認爲他是一位非常忠於國民黨的同志，我注意過他的演講中，很少用「主義」這兩個字，有一天他却再三地公開強調「主義」，並且還特別說明是「三民主義」，以避免和「共產主義」相混淆；他不只是一名忠貞的國民黨員，而且還熱情洋溢，隨時準備爲黨犧牲，爲了對付劉震寰、楊希閔之流的軍閥，他曾勉強坐進鴉片榻，和他們混在一起，以博取他們的信任，打探他們的機密。他對黨是有相當貢獻的，後來出任財政部長，使黨與軍校度過了財政上的難關，這都是功不可沒的。我想很多人懷疑他，可能是因爲他有個左傾的太太何香凝和兒子廖承志的關係。

那時的傳言，都說是右派份子暗殺了他，還牽涉到了胡漢民先生的堂弟胡毅生。共產黨就利用這謠言，把事件歸罪給右派人士，到底眞象如何，我也不甚清楚，因爲那時我還沒有到廣州，不過無論怎樣，廖仲愷確是一位忠貞之士，右派份子是沒有理由要殺他，廖先生的過世，對黨來說確是一大損失，還記得那時他家就在蔣先生官邸的右邊，我還常去見他的夫人。

現在我明白中山艦事件確是對蔣先生的一項陰謀，不過那時我太年輕，並不很明瞭政治

的情勢，如今回想起來，可以覺察出一些當時不甚清楚的事，譬如說中山艦艦長李之龍就是一名道地的共產黨徒，他根本就不該沒接到蔣先生的指示，就擅自把中山艦開往黃埔。我還記得李之龍在黃埔受訓之時，在班上一直是第一名，蔣先生很喜歡他，所以才派他擔任中山艦艦長。

在這次事件之前，蔣先生並沒有組織自己的勢力，來抗拒那些反蔣份子，當然詳細情形我也不清楚。不過，那時，蔣先生在黨內的影響力還很薄弱，黨的政策仍操之於那一撮親共份子的手中，誰也不敢反對他們，對任何事情，他們做了決定，其他的人就只有唯命是從。汪精衛的辯才極佳，最主張國共合作，假如有人反對共產黨，汪精衛就會指責他違背了孫中山先生容共的遺言。當時，如果蔣先生組織了小勢力來對抗共產黨的話，他們必定會公開把矛頭對向蔣先生，因此我認爲，蔣先生是不會這樣做的，他很警覺地盡一切方法和他們一夥週旋相處。

蔣先生在當時要取得黨的控制權，是很困難的，他唯一能做的是先穩定在軍中及黃埔的勢力，雖然他在左右兩派的爭執中，是保持著中立的角色，但他仍然希望右派有較大勢力能與共黨份子相抗衡，他雖沒明白這樣表示過，但如果他那時知道共黨有如此狠毒的陰謀，自然就會有此反應。至於，蔣先生在軍隊和黃埔師生中的實力，和是否完全獲得他們的擁護，我並不很清楚內情，只知道蔣先生在這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和很完善的部署，蔣先生在打

倒軍閥之後，頗得威望，受到很多人的敬仰，這也有助於他勢力的建立。

我的看法是「中山艦事件」可說是反蔣陰謀的一項失敗，卻反而幸運地造成了蔣先生日後的成功。因爲，蔣先生把握了這次的機會，獲得了黨政實權，用來改變當時的環境，重要的是黨的控制權，也逐漸地轉移到他的手中，汪精衛也因此而失去了他雄厚的實力，黨又重新改組了，在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五月十七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就有很多平常擁汪的同僚，轉向支持蔣先生，而那些猶豫不定意志不堅的人，處境就顯得極爲尷尬，親共份子也警覺到蔣先生實力日增，於是轉而希望和蔣先生結盟。

在中執會第二次會議時，很多人提出了建議，決定對黨務重新做一次安排調整，並限制具有國民黨籍的共產黨徒的活動，同時還規定國民黨中央黨部各部門主管，必須由純粹的國民黨員來擔任，使得共產黨徒在中央黨部只有三分之一的執行委員。在這次會議的決議中，也要求共產黨將其加入國民黨的人員名單，開列出來交給中執會，這是黨改組的先聲。

決議案中，唯一付諸實現的是中央各部門都由純粹的國民黨員來司管，至於要求共產黨提出名單的事，他們完全拒絕，家兄果夫那時當選了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並出任代理蔣先生的組織部長工作，面臨最困難的問題，就是清查出誰是眞正的共產黨徒，就以組織部本身而言，從一開始就被著名的共產黨徒譚平山在控制著。

民國十三年元月，在第一次中央執行委員會議的時候，孫中山先生就已非常小心地注意

了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委員們底形勢的消長，那時最重要的組織部之所以交由共產黨來負責，我看是下列兩個原因：

第一，孫中山先生希望共產黨不要懷疑國民黨，他要共黨知道國民黨對他們是很具誠意和信心的，但他們却在汪精衛的卵翼下，整個地控制了組織部。

第二，也許孫中山先生認爲國民黨本身的組織，不夠嚴密牢固，須借助共產黨的那一套技術，來鞏固組織。

家兄由蕭錚、鄭異、余俊賢等同志之助，執掌組織部之後，即決定爲國民黨締造新生命。於是遴聘了曾養甫和賴璉兩位同志，他們協助家兄，組成了一個政治訓練機構，專門調訓各級幹部，那時家兄有鑒於各地方黨部，多爲共產黨所把持，而國民黨同志又多欠缺積極精神，因此如欲和共黨抗衡，則必須訓練一批新的幹部，重新振奮同志的革命精神，這才能奠定國民黨成功的基石。

我記得蔣先生曾要家兄去見丁惟汾先生和顧孟餘先生，他們介紹了段錫朋和王魯平二人來幫助家兄工作，丁先生是一位山東革命元老，對黨務工作有豐富經驗，他雖沒有擔任過實際的重要職位，但一直致力於黨務工作的推行，在北方同志間頗有影響力；顧先生和汪精衛的關係極爲密切，對汪這一派系的人，很有影響作用。他們所介紹的段錫朋，是江西人，五四運動時的學生首領，很有組織能力，在江西省本黨內部自成一派，號稱「AB派」，他協

助家兄從事訓練工作；王魯平來自北方，和汪精衛很接近，對黨務也很有經驗。

家兄就以這些人爲主要助力，展開黨的幹部訓練及黨務的改革，而這些人對黨務都有良好的經驗，且與黨內各派系也都有良好的關係。再就是他們多是來自華北及長江流域的人，在北伐期間，國民黨是很重視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的人心歸向的，家兄就在他們的協助下，展開了黨改組後的新工作。

張靜江、蔣先生、汪精衛、共產黨與蘇俄

在蔣先生公館工作的那段時間，我鎭日守在辦公室中，很少外出。直到張靜江先生來到廣州後，他的住處離我們很近，晚間九時後，一有空，我就常常去看他。靜江先生比較年長，我們尊他爲長者，在上海時我們就很熟，他很喜歡我，一再囑咐，沒事常去他那裏聊聊。

我們每次見面，都談得很愉快，靜江先生喜歡和我談建設或工程計畫等話題，我們談得最多的就是建造鐵路、辦工業，我把自己在美國所看到的鐵路網系統及工業等情形告訴他，一談就很久，他總是聽得津津有味。

那時，靜江先生正致力中國字用筆劃來分類的研究，從他那裏，我也學到不少準則。後

來，我自己也發明了一套，比他的簡單得多，我只用五種基本的筆劃，就出了一本書：《五筆檢字法之原理與應用》，請他題字，他就題了「吾道行矣」四字而非常高興（這本書是民國十七年在上海中華書局出版）。

後來在北伐期間，我們在總司令部機要科每天平均要處理一百五十件函電，既多又繁，忙都忙不過來，於是我就用我發明的五筆檢字法來作文卷的歸檔，電報本亦以此分類，檢查便捷，增進工作效率不少，間接有助於軍事之調度敏捷，蔣先生知道了，特予嘉許。

說起來，從中山艦事件之後到揮師北伐（民國十五年七月九日），在這幾個月中，工作實在是太繁重了，夜以繼日地忙碌中，我的身體健康受到很大的影響。

就在北伐將開始之前，我時常咳嗽，醫生對我說，X光片顯示我的右肺不大好，囑咐我要多休息，我無法遵辦，聽了也就算了。等到一出發，我們的心力全都貫注在北伐工作上，成天騎著馬行軍前進，停下來就譯電報，在緊張和忙碌中，右肺的毛病竟然因沿途空氣好，繁忙的工作似乎沒有影響到我。

說到北伐，我常想到一個問題：爲什麼中山先生要指派蔣先生擔任黃埔軍校的校長（民國十三年五月）。

根據我的瞭解，孫中山先生最初的北伐計劃，由於廣東軍方人士的反對而流產，因爲廣東軍方人士根本不瞭解孫先生的革命目標和救國大志，他們的想法是：只要統一了廣東，就

可以自求發展便好了。因此，他們對孫先生北伐計劃就橫加阻撓，百般反對，陳炯明的叛變即是一個例子。

孫先生瞭解這一情況，因此，他決定找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長江或黃河流域的人來領導北伐，那麼這位人士一定不會永遠安居在廣東，必定會北向求取全國統一，而且是一定會打回自己家鄉去的。

我想就是這個原因，孫先生選定了蔣先生。

蔣先生來自長江流域，早年又追隨過二叔陳其美參加過革命，孫先生想到，假如指派蔣先生爲黃埔軍校的校長，那麼他的長江流域同志就會跟著來到廣州，統一了廣東後，一定可以造成一股北向的力量完成北伐，而這些人是絕不會願意長期滯留在廣東的。

孫先生同時一定會想到，假若由蔣先生來領導北伐，必定會得到很多省份的同志來支持和擁護。

對孫先生的這一決定，最最不高興的就是汪精衛了。因爲汪精衛亦是廣東人，共黨也就要利用他這一地方觀念來捧他，他也會利用共產黨來發展自己的勢力，自然而然，對非廣東人士也不擇手段地打擊和阻撓。

在汪精衛的心中，他也知道蔣先生是不會長留在廣州，不過，他也明白蔣先生不是一位輕易可以被支配的人，如今廣東已經統一，蔣先生已掌握了軍事全權，而他自己不過是個軍

事委員會的主席，他缺少的就是像黃埔和東征軍這樣的武力。因此，他一心就想利用俄國人將蔣先生趕走，換一個他可以支配的軍人，那麼他就可以完全掌握全局了。

而俄國和中共也在發愁，因爲蔣先生不是他們能支配的人，同時在「黨權至上」的口號下，共產黨極反對任何人的勢力超出黨之上，他們的想法是，用黃埔軍校教務長鄧演達來取代蔣先生的校長位置，同時希望找一位將領來出任東征軍的總指揮一職。

當時北伐軍的部份成員，大多數都不是廣東人，第一軍軍長何應欽，來自貴州，曾參與上海江南製造局起義之役（一九一一年），第二軍軍長譚延闓是湖南人，第三軍軍長朱培德是雲南人，而大多數的黃埔學生也都是在上海由先兄果夫招來的青年，其中各省人都有，而以湖南人居多。

我深深覺得，孫中山先生選派浙江籍的蔣先生擔任黃埔軍校校長，是極有遠見的。

孫先生之所以這樣器重和賞識蔣先生，主要是在永豐艦事件時，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陳炯明叛變，在艦上蒙難的五十六天中，很多人怕危險，都紛紛離開了孫先生的身邊，唯有蔣先生却從上海趕到廣州去，始終隨侍在側，在危急艱困中，分憂解勞，我想，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轉捩點，使蔣先生獲得了孫先生的信賴。

記得蔣先生在第二次國民黨大會中被選爲中央執行委員，但在第一次國民黨大會中，他却沒被選上，在第四次國民黨大會（一九三一年）中，蔣先生曾分析那次沒被選上的原因，

藉以安慰其他沒被選上的代表們。他說：孫先生告訴他，不選他出任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主要是希望他默默做重要的工作而不要太引人注意。他告訴黨員們：「有時候潛在的領袖是會出頭的，不過總要隱藏一段日子。」

追隨蔣先生近二十五年的歲月，我常常這樣想：假如由我來寫中國近代史，我一定要這樣說：對於中國的統一及廢除不平等條約等等艱鉅事蹟，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蔣先生個人的功勞。

仁慈、體諒他人，這是蔣先生最令部屬敬佩和感念的。他很像二叔英士，是每個人的好朋友，對同志常常予以幫助，使得人人都願爲他效忠。作爲一個好的領導人，理智和感情必須交互運用得宜，而在這點上，蔣先生可說是一位天才。

那時，我很感激蔣先生給我機會使我結識了許多位重要人物，像胡漢民、汪精衛、張人傑、戴季陶、譚延闓等，雖然我對政治缺乏興趣，但從他們那裏，也確實學了不少。在黨裏他們都算是老一輩的人，我發現他們每人都有優點和缺點。蔣先生也不例外，不過其缺點都被他的豐功偉績所掩蓋了。他對許多主要問題的看法都很正確，除了歐陽格那件事外，他從沒有對有功的人，因軍法方面的不公，錯怪過一個人而置諸死地。

總司令部機要科

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七月二十二日，我隨著蔣先生參加北伐而離開了廣州。

我的職務是：在總司令行轅祕書處司管機要電報及文件。當時祕書處長是李仲公（貴州省老同志），白崇禧任職參謀總長，參謀處長是葛敬恩，李濟琛留在廣州坐鎮，而廣州的祕書處長由馬文車負責。

機要科處理的全是機密文件，其中大部份是機密電報，這些都是由我來處理。

在機要科工作的共有八個人，我們每天馬不停蹄地行軍，直到湖南耒陽，到了晚上停下來再繼續文書工作。

累固然是累，但是我們情緒很高昂，效率也高，反觀我們的敵人——軍閥，一貫的官僚作風，士氣懶散低落，我們一天的工作要等於敵人三天的工作，軍事貴神速，前方所請求者，立即得到回復，自有助於軍事效率的；由此可知，我們過的革命生活，是苦而有意義，沒有人感到厭煩，在戰場上，自然也是所向無敵了。再說，我們每天工作十四至十六小時，所有工作同志都知道我們的辛苦，大家更是精誠團結在一起，使我深深體會到，一個人只要

身挑重任，而把好處及成績留給他人，所謂「善與人同」，一定會無往不利的。

那時我們每天平均要處理一百五十件左右的公文，時間實在是不夠用，同時，蔣先生性子急，當他要調閱某件文卷時，我們一定要馬上找出來呈上去，因此，我就想到利用中國字的分類來處理檔案。

有一次，蔣先生要找數星期前何應欽將軍來的一封電報，有關東路軍某某事，我不到一分鐘就呈上去，蔣先生覺得很奇怪，就問我怎麼一下子就會找到，我就乘機報告我的「五筆檢字法」的用法，蔣先生聽了非常高興，說了一聲「你應用你的科技於你的文書工作了！」

不過，我自己發明的那一套制度有兩個目的：第一，必須能很快地找出所要的東西；第二，任何人都容易學會而快速運用。

要知道科學方法，就是每個人祇要稍稍練習都能使用的一種方法，沒有什麼祕密，像中國老式的歸檔方法就非常專門和巧妙，非得有相當時間，才能學會。我並不清楚那些老方法，不過許多政府機構都把那套老式的歸檔法列入移交，代代相傳。

我用我那套筆劃文卷分類制度，發現非常便利，使得機要科的工作在北伐大業中，貢獻了極大的力量。

湖南武漢戰役經過

民國十五年八月三十日汀泗橋之役，是一個決定性的戰役，使革命軍佔領了湖南，直進到湖北的武漢。

這一戰，雙方死傷極爲慘重，使這一位雄跨湖北、河南及河北的吳佩孚的主力被我們擊潰，元氣大傷，雖死守武昌於一時，但再也無法恢復他的反攻力量了。

雖然已經是超過半個世紀以前的舊事，但是，我始終難忘，在那次戰役中的一些經驗。

蔣先生要我送一封信到前敵總指揮李宗仁那裏，我騎著馬奔馳而去，沿途死屍遍地，臭氣薰天，遠遠望去，每一屍體的臉面全是黑的。可是，當我的馬經過時，馬尾一拂，一張張黑臉上滿佈的蒼蠅就全嗡嗡地飛了起來，臉又變白了，霎時心中的感覺是難以形容的。忽想起「一將功成萬骨枯」這句詩，我勒緊馬韁，呆了好久，才繞著屍體作波浪狀行走，以免馬蹄踏到死屍上面。

在路上，我經過幾個小村，當農民們看見我穿的國民革命軍制服時，都起而歡迎，而且熱情地將我團團圍住，有的人爲我牽馬，有的人爲我拿茶，更有人拿了一壺酒一隻鷄來慰勞

我。看看一張張眞摯的而感激的臉龐，使人眞感動，那一刻我也才眞正了悟四書中的「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的歷史重演。所謂「得民心斯得民矣」。

同年九月七日，國民革命軍攻克漢口的那天晚上，蔣先生使我留下了一個很深的印象。

在炮火密集的轟炸中，蔣先生從火車上的行轅出發到最前線指揮攻擊，任憑武昌城上炮聲隆隆地對我們射擊，他鎭定而無懼地指揮，對沒有任何戰爭經驗的我來說，面對眼前的情景，頓時覺得信心和勇氣大增；記得那晚回到火車上我還喝了一點酒，於是，我爬到火車頂上觀看夜戰，祇見炮火就在近處天空中穿梭地來往，颼颼地掠過，漆黑的夜空成了放煙火似的一道道的光芒。

蔣先生曾告訴過我，如果前線有極重要的戰訊電報，即刻待復時，無論是深夜任何時間，我都可敲他的門，喚醒他批復電報。我雖然獲得特准，不過除非特別緊急的事，我都盡量避免吵醒他，讓他休息，請參謀總長代爲處理。

隨著戰爭的進行，我們機要科的工作更形忙碌，不只是前後方來的報告，還有從後方轉來自上海等其他地區的函件也都需要迅速處理。

那時，蘇、贛、浙、皖、閩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是一位關係重大的人物。

我們方擊敗了吳佩孚，就要轉而打擊孫傳芳，我們有限的軍力，雖然士氣旺盛，情勢並不很樂觀。因爲敵衆我寡，所以採雙管齊下的戰略，一面應戰，一面蔣先生電請三叔陳其采

前往遊說孫傳芳，希望他與國民革命軍結盟，但是，最後遭到孫傳芳的拒絕。

俄國軍事顧問加倫將軍與蔣先生頗爲說得來，蔣先生很喜歡他，而加倫給予我們的印象也很好。

加倫所擔任的是純軍事技術性工作，對黨務及其他並無絲毫興趣，他對軍事上的建議，蔣先生常會採納。

在行軍中，每晚停下夜宿時，一定要留兩間房，一間是留給蔣先生的，另一間就是爲加倫預備的。有時，蔣先生邀我共進晚餐時，常常發現加倫也在座，他們談話的內容，幾乎都是有關軍事策略的研討。

蔣先生和白崇禧將軍之間，常常在觀點上有所不同，每遇這一情況，我都盡力去協調。每當接到一份有關戰局的重要電報時，尤其是李宗仁來的電報，我一定抄寫兩份，一人一份，如果他們意見不合時，我總會去和白將軍細說，通常他到了最後仍是會聽從蔣先生的。

白將軍對他們廣西同鄉，第七軍總指揮李宗仁特別偏私，舉例來說，他曾以參謀總長代總司令下令給軍需署，多發李宗仁的第七軍軍需補給。遇到這種時候，我總會告訴白將軍，必須將命令的副本抄送給蔣先生，讓他知道，但白將軍有時却改爲不以令文的形式發出命令，免得讓蔣先生知道。

第八軍總指揮唐生智將軍，是一個很有野心而投機的人，不值得信賴，我認爲國民革命

軍容他參加，實在是一樁冒險的事，但在左翼用他來阻止川滇黔的軍閥的異動，是不無有助。

第八軍的政治部主任劉文島，是國民黨的代表，專責第八軍和國民政府聯絡事宜，他來自湖北，是一名資深黨員，頗得唐生智的信任，通常他都代表唐生智和蔣先生諮商事務，不過，我認爲他對唐與中央做了不少聯繫工作。

劉文島的嗓門特大，面對一萬多群衆，他可以大聲演講而不要用麥克風。他的太太也在第八軍政治部工作，經常穿著軍服、馬靴，是非常出名的女性。

當時中國共產黨的基礎仍很薄弱，鮑羅廷和共產黨決定採取分化國民黨領導階層的政策，陰謀摧毀國民黨的後方力量。

我們留在廣州的有張靜江、譚延闓、宋子文、李濟琛和家兄果夫等，他們都非常合作，對我們前方進軍極有幫助，尤其是譚延闓先生，自中山艦事件後就擔任國民政府委員會主席，更是鼎力相助，深得蔣先生敬重。

因爲我成天待在機要室，對家兄來自廣州的情況報導知道得很清楚，他說：共產黨知道「中山艦事件」後在中央黨部的影響力已日漸衰弱，便圖謀分化我們的勢力。第一個就是放出空氣說：汪精衛應該出任中執會常務委員會主席，目的在挑撥張靜江先生和譚延闓先生之間的不和，鮑羅廷深知張靜江先生和家兄果夫是最不喜歡共產黨的陰謀作法，所以就攻擊

張先生的反共並非反革命的言論，而家兄果夫也支持張先生的立場，所以後來共產黨首先就用「打倒昏庸老朽的張靜江」的標語來攻擊他。

北伐行軍先後肺病好轉與患痢疾赴漢治療

在我任黃埔軍校機要祕書時，先是邵力子和我共同辦事，處理機要公事，後來邵力子派到馮玉祥那邊去聯絡事情，我便一個人擔任兩個人的工作，所以我很辛苦，每天工作到晚上十二點多，但蔣校長每天清晨六點鐘就起床，若有事情，他一定找我，所以我早晨六點鐘非起來不可。我的睡眠時間不超過六小時，由於生活的辛苦，每天伏在桌子上起稿、寫信、譯電報等，忙個不停，所以後來時常咳嗽，照過X光後，才知道右肺尖患了肺病。在這個時候，要北伐了，北伐是要行軍的，醫生勸我不要去，我則不能不去。於是我跟著行軍，一路走一路咳嗽，後來到了湖南來陽，由於走路對身體是很好的運動，而且鄉間空氣好，我的肺病居然逐漸好轉。在武昌戰火正熾時，由於我工作的繁忙，睡眠少，又時時吃些蒼蠅滿佈的米飯，我患痢疾，倒在前線火車中，一天天地瘦弱，加以前線醫藥又缺乏，因此，蔣總司令要我離開前線到漢口去找醫生，俾能休養一段時間，因爲我軍已先佔領了長江北岸的漢口，而南岸武昌尚未攻下。

當我乘轎前往漢口時，必須通過武昌城外一段路，城上的哨兵就向轎子射擊，幸未受傷；在渡江的時候，又遭到機關鎗猛烈射擊，也幸托天庇佑，終於在艱難危急之中，到達了漢口。不過，當我住進日租界的日本醫院時，我眞的已快要累死了，好在我在戰爭中已把生死看得很平淡。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國民革命軍佔領了武昌時，我仍然躺在醫院中。

在滬舉行婚禮

後來我身體康復，那時，蔣總司令已到了江西，我正打算回到他那邊工作時，他要我再好好休息一陣子，所以我就去上海，與我未婚妻孫祿卿女士完成婚禮。

由於前線通信困難，我生病，一直沒有告訴家人和未婚妻，家人原來決定要我們在上海舉行婚禮，日子定在七月五日。

當一切準備妥當，但七月五日正是北伐快要出師的時候，婚禮只得延期。其實，我最好等到北伐完成再結婚比較適當，但對這一要求，父親及對方家長均不同意，他們盼望我們能早日完婚，更不希望拖到無法預計的北伐完成時期。

最後婚期定在十二月九日，三天前，家人和新娘以及她的父母親就來到了上海，而我，

一直等到八日的晚上才乘船趕到。

爲了及時趕到上海，同時避人耳目，我化裝成商人模樣，還戴上了眼鏡，行期也不敢告訴任何人，家人都非常焦急，眼看婚期已到，而我還沒有消息，大家又在研究要不要延期，當我一到上海，給家嫂打電話時，大家才放下了心，不料果哥已從廣州趕來參加婚禮了。

婚禮是在英租界盆湯弄平安旅舘舉行，用簡單的新式結婚儀式。選在租界的原因，是那裏比較安全，雖然我們在上海有很多親戚，由於外面風聲很緊，也只邀請少數至親好友參加觀禮。

婚後，我和內人那兒也沒去，只是相偕看過幾次梅蘭芳平劇。

在我們婚禮完畢後，果哥就由上海前往南昌；就在這時，他介紹陳布雷兄加入國民黨。我記得陳布雷兄的入黨介紹人是蔣先生和家兄。

婚禮後的第八天，我接到白崇禧的電報，要我立刻趕回南昌總司令部，因爲他發現代理我的陳祕書廷綱不能勝任，所以催我馬上回去，於是，我立即於次日回漢口經湖南轉到南昌，這一路上所經過的地方，以往全是孫傳芳的勢力範圍，現在被我們所佔領。我還記得，回去見到蔣先生時，我替他帶了一枚「蔣中正」三字的石刻印章，若是在船上被人查到，還會發生危險的。

南昌總司令部

我是在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元月初到達南昌的，那時，蔣先生正在南昌戰場上親自督戰。

北伐軍是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七日攻下南昌，不過在進攻南昌之開始時期，却遭遇到堅強的敵軍，戰況慘烈，最令人擔心的是王柏齡司令的軍隊受挫，可以說，那一戰，是北伐諸役中最艱苦的一仗，敵我雙方均損失慘重，國民革命軍在湖南、湖北所嚐到的勝利果實，在這一戰中幾乎被抵消了一半。所幸第三軍團朱培德軍隊駐守南昌，經蔣先生親自督戰後，敵軍大敗，我軍由東門口追捕潰敗的敵軍，虜獲不少武器、人員，其中還包括孫傳芳部隊中的師長及團、營長數人。

當我抵達南昌不久，白崇禧將軍就離開了總司令部，就任東路軍的前敵總指揮。

事實上，白將軍在我離開總司令部期間，他感到很多的紛擾，使他有些不快活。

第一個令他厭煩的人，就是機要科代理我任科長的秘書陳廷綱，他來自貴州，是李仲公祕書處長的同鄉。陳祕書爲了討好白將軍，常常在他的面前說長道短，搬弄是非，有意無意中挑撥蔣先生和白將軍；對陳某的這一作法，白將軍非常反感。此外，文書科的潘宜之也是個令白將軍頭痛的人。潘某也是個喜歡製造事端的份子，不明大體。

在我離開的那段時間中，蔣先生指派蔣先雲到機要科擔任祕書的工作，他是黃埔一期畢業生，成績優良，但是他是一名共產黨員，也就由於他的進入機要科，使得情形更爲混淆；當蔣先生派李仲公處長到雲南、貴州去工作時，我成了代理祕書處長，兼理機要科工作，我發現有兩個人最令人頭痛：一個是替共產黨工作的蔣先雲，另一個就是專門製造事端的陳廷綱。

那陣子，我同蔣先雲共睡一間房，每到晚上臨睡前，他就對我說共產主義比三民主義如何如何好，試圖拉我進入共產黨，而我却力辯三民主義的精深和偉大，常常兩人爭得不歡而睡不好。

由於我們那時仍舊容共，不能公開批評共產主義的不對，而蔣先雲也沒有公開地承認他就是共產黨，不過，由他的言行中就可以清楚地知道他的黨派關係不同，從此我對他特別留心，拒絕讓他接觸由各處來告發有關共產黨的文件。而他知道自己無法看到很多重要文件後，有一天竟然進來偷窺機密文件，被我撞個正著，於是我不得不將此情形向蔣先生報告，蔣先生吩咐我今後特別注意他。

武漢南昌對立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當鮑羅廷一夥到武漢後，共產黨和主張聯共的國民黨黨員，堅持任何事都必須由武漢當局做決策，因此就引起了武漢、南昌間的爭鬥。

鮑羅廷在武漢儼然是大老板般地在發號施令，而共產黨也開始對唐生智、張發奎等軍事將領頻送秋波，百般討好，這就是爲什麼唐生智後來一抓著機會就想反抗蔣先生（一九二七年末、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張發奎也變得異常驕橫，而唐生智特別喜歡以武漢做爲首都，就是要討好共產黨，爲自己謀個高官厚祿。

南昌和武漢方面都急欲控制國民黨地方黨部，那時國民黨省市黨部共成立了三部分：廣州市黨部、廣東省黨部，以及江西省黨部。

共產黨第一個試圖接管的是廣州市黨部，作爲中共的根據地。但當家兄果夫離開廣州時，他將市黨部交給國民黨組織部代理部務的吳倚滄同志兼管。

我和吳先生有過交往，他爲人正直。結果，在一九二六年五月的第二次中央執行委員會議中，吳倚滄就不顧任何壓力，毅然決議限制共產黨委員只准佔三分之一的名額，完全破壞

了共產黨想控制廣州市黨部的企圖。

在江西省黨部中也有很多共產黨員，但三分之一的限額的決議通過後，我方得了三分之二的多數席位，於是共產黨就到處造謠。譬如：段錫朋同志在江西省黨部以高票當選（一九二七年二月），只有三個人沒有投他的票，但武漢方面却說他得票過少不足以當選，共產黨竟杯葛江西省黨部要求重選（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六日），也教唆逮捕羅時實、程天放等人（一九二七年四月二日）。那時，我並未參與江西省黨部的席位爭取，黨務方面的事都是由家兄果夫來管理。

那時的情況確實很危急，反蔣的陰謀逐漸開始明朗化，雖然以當時的環境來講，南昌具備有做臨時中央政府所在地的條件，但共產黨却堅持要在武漢，對共產黨的這一堅持，蔣先生爲避免與之作正面衝突起見，暫時容忍。

我想共產黨以及親共的一夥之所以堅持要選擇武漢，是因爲在武漢，他們可以不受北伐軍總司令部的軍事束縛。同時，國民黨中大多數人也屬意武漢，連譚延闓先生也贊成。基於這一情勢，蔣先生以南昌做爲臨時中央政府所在地的主張就無法實行，因爲那時的黨及國民政府的決策仍是具相當影響力的。因此，譚延闓先生不得不離開南昌前去武漢。

一九二七年元日十一日，蔣先生前往武漢，當時我沒有隨行。

事後，我從隨行人員那裏知道一些情形，他們告訴我，那次，蔣先生實在很危險，有一

天演講完後，差一點就被扣留住，離不開武漢。

就在蔣先生到武漢去的時候，我們終於發現蔣先雲爲共產黨搜集情報做工作的證據。蔣先雲有一份打給鮑羅廷電報的副本，被我們拿到，電報上全是機密性的情報。元月十八日，當蔣先生回來時，我就向他報告，我說：我已經無法爲機要科負責保持機密，因爲我總不能成天監視蔣先雲，況且他常常趁我入睡後偷取文件。最後，蔣先生只有免掉他在機要科的工作，派他前往武漢共產黨的中央去做工作。

不久，共產黨就喊出了「打倒昏庸老朽」的口號來攻擊張靜江先生。有一次張先生跛著腳笑著對我說：「共產黨說我老朽還可以，但我絕不昏庸。」

一九二七年元月初，陳布雷先生是否曾建議蔣先生不妨利用上海的青幫來對付共產黨呢？

陳布雷先生是位報人，所以對上海的情形比較熟悉，蔣先生可能常常徵詢陳先生的意見，不過陳先生從來沒有告訴過我他對蔣先生建議過什麼事，而且對上海的事，蔣先生自己一向很了解，似乎不必由布雷先生建議。至於蔣先生對陳先生的建議重視到什麼程度呢？我只知道自從他追隨蔣先生以來就成爲極重要的角色，由於蔣先生有許多講演稿要寫，公文要看，因此極需要一位具有政治頭腦而又常常接觸社會實際狀況的人來輔佐，而陳先生就是一位最適當人選。蔣先生經常和布雷先生討論事情，亦是可能的。

元月初，蔣先生決定以南京和上海爲次一步發動攻勢的目標，但是也有人主張先沿著平漢路對北平展開攻勢，因爲這些人認爲，當年太平天國之亂，打到南京時，由於內部意見紛歧而告失敗，但主張先攻取上海、南京的人士則認爲東南的財經利益較豐，控制了長江流域的下游，便可解決我們不少財政的困難。蔣先生主張以南京和上海爲目標發動攻勢，原因有二：

一是，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廣州的國民黨政治會議便決定移都武漢，這一決定，很可能因而失去在武漢的武力，而且黨內的紛爭也可能使得革命行動在軍閥還沒有打倒之前就瓦解了。因此急需另找一安全的處所。

二是，孫傳芳的部隊是一支極強大的武力，如果直攻北平，戰線太長，孫傳芳可襲擊我後方，我們將並不只是面對一道戰線而已，張宗昌的部隊亦很可能從山東來攻擊我們，因此蔣先生希望在沒有解決張宗昌、張作霖之前，先好好對付孫傳芳。

其實，無論以經濟、政治、軍事的觀點來看，蔣先生揮師指向東南的政策是正確的。

第六軍團是由程潛負責，而該團的政治部主任林祖涵是共產黨，因此，我們對第六軍團的情況都很關切。

在當時，軍中的政治部及黨代表是很有權力的，他們可以連署指揮官的手令，而且，在當時人們從來沒有聽說過「黨」在軍隊中是什麼作用，所以共產黨就利用政治部幹些情報工

作，擾亂民衆視聽。

蔣先生與日本、英國、上海銀行家、張作霖及北京政府

一九二七年二月，當北伐軍打到長江下游時，蔣先生就請戴季陶先生到日本去。

蔣先生這樣做是有原因的，因爲，北伐軍往後挺進的地區，都將遭逢到外國的勢力範圍，所以必須先作一番準備工作，而那時已決定的北伐進行計劃就要經過山東，一定會遭逢到日本人，而日本人曉得北伐進展得很順利，一定會從中阻撓，因此，蔣先生要戴先生去日本舖路先打聲招呼。

戴先生在日本會晤了很多黨政領袖，幾乎全是日本舉足輕重的人物。他們都很關心中國未來的動態，對戴先生的談話尤其注意。因爲那時大家都知道蔣先生和戴先生在廣州時意見不和，現在，戴先生却成爲蔣先生的私人代表，對日本人來說，則意味著某種情勢的改變，也許就此看出中國很可能統一。

而戴先生的出現日本，是最適合的證明蔣先生非外人所描述那樣激進的一位代表人選。

在日本期間，戴先生並沒有和日本人達成任何協議，但却獲得了日本人的瞭解，尤其他做了一次演講，更是轟動。戴先生在演講中告訴日本人，中山先生的「大亞細亞主義」說明

中日兩國應相互合作，中國的革命絕不會傷害到日本，中日兩國應保持友好，而三民主義的目的是促進亞洲永久和平的安定維繫力量。許多日本人聽完後，都感動得流下眼淚來。

戴先生在日本時，黑龍會領袖頭山滿一直陪著，頭山滿先生非常同情中國革命，當中山先生和戴先生流亡日本時，曾獲得他的保護。因此，他是中山先生和戴先生最好的朋友；他也認識蔣先生，只是彼此的交往不像孫先生和戴先生那樣深而已。

戴先生從日本一回國，立即在上海晉見蔣先生。

與日本人也有很深關係的黃郛先生，他所扮演的角色和戴先生有點不同。

黃郛立場中立，他實際供職於北京政府，個性持重溫和，處事冷靜，具敏銳的判斷力及雄辯口才，如果他爲國民政府跟日本人說項時，效果是和戴先生不同，他有辦法說服日本朋友在某些方面來幫助蔣先生。譬如，他曾私下向日本友人保證，蔣先生絕不是共產黨，只是環境逼使蔣先生不得不跟共產黨打交道，日本人對他的這一說法都很信服。

當時，蔣先生有沒有派黃郛去跟日本人打交道呢？當我們快到南京時，蔣先生做了很多準備工作，他發了很多電報給那些可以跟日本人打交道的人，我想黃郛是要去跟日本人解釋我們革命的目標及未來中日的關係。但我不認爲那個時候需要去告訴日本我們對共產黨的態度，因爲清黨馬上就要開始，我們自己都不敢聲張。

不過，我們需要有人去告訴日本人，我們一定會和他們保持友好，因爲，「反帝國主

義」的呼聲正在國內各地響起，因此，必須先消除日本人的誤會，也須免除他們的恐懼。

蔣先生、黃郛先生和二叔其美，他們三位是拜把兄弟，前已說過，三人雖然在政治立場上不盡相同，但個人之間的關係都很親近。

在當時的情況下，我們認爲事前的準備工作一定要做好，否則日本人馬上就會來干擾北伐工作。

至於蔣先生對英國有沒有採取相同的行動呢？我就不記得有誰事先去和英國人周旋，但我知道一點，就是當我們攻抵長江下游時，英國的態度已經轉變，他們知道我們不是共產黨，急欲與我們接近。

當北伐隊伍到上海和南京之前，我們和共產黨之間的爭鬥已日趨嚴重。英國很關心當時情勢，很快就轉變了他們的態度。其實，現在想想，一九二七年時的中英關係就跟美國和卡斯楚的古巴關係很像，美國承認卡斯楚是因爲卡斯楚曾聲明他不和共黨國家打交道，不過，蔣先生在一九二七年四月中以前，並沒有公開發表過不與共產黨打交道的聲明，但是日後共產黨攻擊蔣先生時的反應，好像認爲蔣先生曾做過這項聲明一樣。

當我們進逼上海時，上海的銀行界確實給予國民革命軍不少協助，這是很自然的，因爲他們要自保。我的藹士三叔在中國銀行擔任工作時，就結識了不少上海金融界的人，這時候他曾爲蔣先生做了不少的事，所以後來曾先後擔任全國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及國民政府主計

長等職。

蔣先生和張作霖之間那時也曾進行協商，因爲這是一種戰術，由於當時正在和孫傳芳作戰，就必須先和張作霖、張宗昌打交道才行，即使雙方談不成，至少也可以暫時緩和軍閥聯合抵抗的壓力。

時間常是戰爭中最重要的因素，蔣先生在這方面的確早有計劃，他善於利用時機，支配時間。

那時，國民革命軍的武力比任何一個軍閥單獨的兵力都相差很遠，我們只有用「各個擊破」的戰略，所以必須先和張作霖打交道才行。黃郛被派擔當這一重任，那時的情況很危急，國民革命軍和武漢的關係日趨惡化，而北京政府方面是不是曾派人和我們進行過接觸呢？對這點我不太肯定，不過，記憶中王寵惠先生曾被派來上海進行磋商。

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時間中，國民革命軍眞是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因此，很多人紛紛要和國民革命軍蔣先生談和，軍閥們要求我們能停止攻擊，北京政府希望我們能像袁世凱時候一樣。因爲，在一九一一年，我們就是因爲沒有力量繼續北進，才使整個北方落入袁世凱的手中。

最後，雙方的談判不成，因爲蔣先生所提出的一些條件，無法爲北京政府所接受。

我想蔣先生這樣做，爲的是要避免重蹈覆轍，因爲歷史上的兩個教訓令他深記難忘：一

是太平天國打到南京後就因內部不和而告崩潰；二是一九一一年時的南北分裂局面，使得蔣先生不願長留南京，所謂磋商談判只是等待時機而已。

安慶事件

當國民革命軍進逼南京前，我們的總司令部也開始播遷前往。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五日，我們從南昌搭火車到九江，再換乘楚同軍艦，蔣先生帶了很少人隨行，其中包括葛敬恩、楊虎、溫建剛和我及侍從副官等人。

三月十九日，艦艇泊在安慶，那時共產黨在安慶處處欺壓我們的同志，因此不少人跑到艦上來見楊虎，因爲楊虎是安徽省的老黨員，曾是參加肇和兵艦起義的重要人物。

這些同志紛紛向楊虎訴苦，他們要求馬上對共產黨採取行動，但楊同志猶豫不決，那時年輕氣盛的我，便慫恿楊虎即刻允許他們採取行動，如果有任何差錯，一切由我協同負責。於是他同意令他們採取行動了；由於機要科的一切祕密電報都經過我的手，所以深知共黨陰謀日漸明顯，我對共產黨的態度也日趨惡化，共產黨急欲吞噬我們，所以那時候的革命，也可說是兩面作戰，對付軍閥之外，還得要同時對付共產黨。

三月二十三日，當蔣先生在歡迎他的一次大會上做完演講後，我們同志就對共產黨發動

攻擊，這是我們第一次對共產黨發生正面衝突。當時我並沒有在場加入戰鬥，但是這事却是我一手促成的，也是我第一個揭開共產黨的眞面目。

後來，武漢方面曾問起蔣先生發生了什麼事，楊虎和我就向蔣先生說明一切，蔣先生聽完後沒說什麼，只叮嚀我起個電稿給武漢方面，說明一切已恢復正常。

其實，事情鬧得很嚴重，而蔣先生必定遭到武漢方面的斥責。

三月二十四日，我們抵達了南京，那天正是國民革命軍攻佔南京後的第二天。

走進南京城，遍地滿佈著孫傳芳部隊拋棄的步鎗、刀劍和手榴彈。

那些遺棄的鎗枝和武器，成堆地沿著下關各地的河邊擺著，當蔣先生要我送一封信給第二軍團副司令魯滌平時，途經這些滿地武器的地區，就像賀勝橋之役，我穿越滿地屍體的戰場一般，令我膽顫心驚。

那時，蔣先生和所有將領都在艦上會談，而白崇禧將軍早已在三月二十一日打到上海了。孫傳芳在上海失陷後也就很難保有南京。孫傳芳的軍隊雖仍佔據長江的北岸，可是他們並沒有向蔣先生的座艦開火。

接著，「南京事件」發生。

所謂「南京事件」，就是當國民革命軍攻佔南京後，有許多外國人被殺，這實在是件遺憾的事，不過，這可能是共產黨在背後鼓動造成的，使蔣先生和外國人結怨。

說起來，當兩軍交戰時，外國人受到了傷害，是不易避免的，但他們也很難分辨誰應對這一事負責，尤其在中國的外國人，平日自負慣了，總認爲沒有人敢傷害他們，所以都疏於防範。事實發生了，說實在的，在混亂中，誰也不能確定這事發生的眞正原因何在。

雖然，當時的武漢政府還沒有獲得國際間的承認，但確爲合法的政府，因此，有關外交上的交涉，都應該由武漢政府的外交部長來處理。所以，南京事件發生，蔣先生就請了各列強到漢口去磋商。不過，英、日、美等國，都將「南京事件」歸咎於蔣先生和武漢政府的外交部長陳友仁兩人的身上。

至於英國，他們知道蔣先生和共產黨之間將會有事發生，但在國民革命軍到達上海之前，最好有人向英國表示疏通才是，而上海金融界人士就是蔣先生和英國人之間最好的橋樑。

上海的人士，後來親蔣先生的要比親孫傳芳的多，因爲他們已經清楚地看出，蔣先生將會勝利，孫傳芳已居劣勢了。而上海金融界人士對蔣先生友好，他們的態度必將影響英國人的態度，英國人是個很現實的民族，雖然他們在南京有些損失，但他們必定會保護在上海的權益的。

上海情勢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六日，我們駛抵了上海。

蔣先生要我送一封信給白崇禧將軍，見到白將軍，兩人都很高興，我們已經很久沒有見面了。

我告訴白將軍有關共產黨的一些事，他是堅決反共的，他聽後就表示：我們必須謀求一條新途徑，後來，他對清黨貢獻良多。

我們的總司令部設在郭泰祺的交涉署辦公室中，那時上海大部份地區都被共產黨控制，當我們在總部辦公時，共產黨常向我們示威叫囂。

在上海主持共黨事務的，就是周恩來，當時他的作爲，就好像上海大部份都是屬於他的一樣，而他們利用閘北的湖州同鄉會館做爲根據地，由此可知周恩來與湖州人有著特殊的關係。

我與周恩來僅在五四運動的時期見過面，以後雖同在黃埔軍校服務，可是沒有機會相見，此次他來向我要宵禁口令，這是不能讓外人輕易得到的，他們如果得到了口令，晚間可

以通行無阻，用工人來擾亂或暴動，就難以阻止了，因此我拒絕了他。

我問他是誰需要口令，如果讓我知道是誰，也許可以考慮放行，但他一口回絕了我的要求，却堅持要口 的代號。

當時周恩來在閘北指揮工人，他就用他是全上海工人代表的身份來威脅我，但我告訴他，我們的工作是保護上海數百萬民衆的安全，假如他祇代表全體工人，他得聽我們的命令，他悻悻而去。

事實上，關於宵禁口令這件事，應該由參謀長辦公室負責的，他一定在那邊拿不到，認爲我是外行，會給他的，但是我對他們已有戒備，不會上當，這是我第一次拒絕周恩來的要求。

沒有得到口令，周恩來極爲氣憤，他對著我說：「你眞夠厲害。」

經過第一次的交手，就可以知道他這個人非常難纏，我後來告訴他，有什麼特別重要的事，可以事先打電話來，以便緊急處理，也許他知道此路不通，以後就很少來找麻煩了。

在往後的相處中，使我深深知道，周恩來在共黨中確實是一個很能幹的人物。

那時我們在上海的軍隊並不強大，不過大部份民衆都已組織了起來，記得周恩來告訴我：「上海大部份地區可以有六十萬人組織起來。」

蔣先生當時在上海的部隊，主要是由第一軍團負責，由於地區幅員廣大，實力就稍嫌薄

弱，幸而白崇禧將軍極端反共。

第一軍團的第一師師長是薛岳，他是一名好軍人，在陳炯明叛變時他曾經護送總理上永豐艦的，那時我並不太認識他，直到他擔任湖南省主席（一九三八——一九四五）時我才漸漸了解他。在我印象中，在上海的那段期間，他年紀還輕，思想不免略有偏激，從機要科獲得的情報中，我們確實有點擔心他。但不久就轉好了，否則，蔣先生也不會把他的軍隊調到上海來。

至於其他幾個主要兵團司令的態度如何呢？第二軍團副司令魯滌平，是很忠心的，他一切都聽命譚延闓；駐紮在南昌的第三軍團司令朱培德是沒有問題的一位；第四軍團司令李濟琛駐守廣州，他是主張反共的；第五軍團司令李福林也是沒有問題的；第六軍團司令程潛，易受政治部主任林祖涵（共黨）影響，有些不可靠，但是一般說來，他還是沒有多大問題的；第七軍團司令李宗仁，由於白崇禧的關係，也是擁護蔣先生的。而白崇禧將軍堅決反共的態度，受到蔣先生異常的信任，所以派他擔任參謀長；而第一軍團司令何應欽將軍更是絕對沒有問題的。總之，除了共產黨當時急欲拉攏的唐生智和張發奎外，其餘的軍事將領，都是擁護蔣先生的。

清黨

為了解決中國國民黨內的共黨份子，我們開始了清黨的準備。家兄果夫建議蔣公召開一次中央監察委員會議，以謀解決共產黨問題，於是，通電上海及各地中央監察委員，集會上海。

中央監察委員的年紀多半相當大，因此，共產黨並不在乎這個中監會，也不重視這些監委，但是，他們却沒有料到對清黨工作最有貢獻的都是這幾位年老監委。

當這些位老先生紛紛來到上海時，共產黨徒才開始覺察到面臨的險境，他們極怕中央監察委員會會採取行動，因此他們就散佈標語：「打倒糊塗的、平庸的、老而腐敗的份子」，目的在製造年輕黨員和這些老先生之間的對立。

民國十六年四月二日，吳稚暉上一封清黨建議函給中央監察委員會，結果獲得中監會一致贊同，通過了這項建議。

同時，汪精衛在四月一日回到國內，隨後幾天，他與幾位黨的領導人開了幾次會，大家決定在南京召開第四次中央執行委員會，來處理共產黨問題。

但是，到了四月五日，汪精衛却突然與中國共產黨領袖陳獨秀共同發表聯合宣言，重申國民黨與共產黨間的合作。

接著，汪精衛離開上海，潛往武漢，與共產黨携手對抗清黨工作。

在短短幾天中，汪精衛的態度却突然轉變，由此可見他的態度是何等的變幻莫測。

我們決定清黨，將國民黨中的共黨份子清除。

這時，我們發現所有的東西，包括官方印信在內，全都放在武漢。爲了清黨必須公佈一則公告，但却沒有印信。

國民黨組織部祕書吳倚滄，爲了這個問題來找我。

大家集會研究，最後我想出了一個辦法，我們既然必須限時發佈手邊的公告，祇有找出舊的公文上面有中央的印信，照樣刻了一方新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印信來使用；這是大家在無法可想之下的唯一辦法，因爲印信在武漢他們手中，使我們別無選擇，現在回想起這件事，依然覺得當時的做法實在是革命性的膽大妄爲了。

吳倚滄、我哥哥和我最關心的是如何找出誰是共產黨，因爲，中國共產黨從來沒有將他們黨員名單交給我們過，因此，我們根本沒有辦法分辨誰是共產黨，誰是「純粹」的國民黨員。同時，共產黨已經下了一道祕密命令，要所有共產黨員盡量地匿藏身份，以便繼續混藏在國民黨中從事他們的工作。

我告訴吳倚滄，唯一可做的就是打鬥，因爲一打了起來，國民黨和共產黨兩邊的人自然就會分出鴻溝來，這個辦法我們在安慶已經試用過。

隨即我們就打電報給各地足以信賴的同志，要他們想盡辦法擺脫共產黨，至於身份不明的人，只要從打鬥中就可以知道他們的身份和態度，然後就盡可能清除他們。

果然，國共的公開衝突接二連三地在浙江、江西、安徽爆發，而我們發的祕密命令果然是很成功的一招。

這時，各地發生的情況都不同，家兄、吳倚滄和我就不得不想出辦法來應付各個地區不同的難題，而蔣先生主要是負責處理軍事上的問題，自無暇兼顧。

各地國民黨負責清黨的領導人如下：

廣東是曾養甫、賴璉；浙江是蕭錚、鄭異、許紹棣、胡健中；上海是楊虎、吳開先、王延松；江西是程天放、羅時實、段錫朋；安徽是邵華、方治；江蘇是葉秀峯。

共產黨的勞工組織是「總工會」，爲了區別起見，我們另外組織一個「工人總會」；同樣的，共產黨的學生組織叫學生會，我們也成立一個組織叫「學生總會」；他們的農人組織叫「農民協會」，我們的叫「農人總會」。如此一來，不但在黨部有兩個相對的國共派系，在各種不同的社會團體中也分爲兩個國共派系，以便分開鬥爭。

以上的做法，就是我們透過黨及社會來與共產黨鬥爭，簡單地說，我們所採用的政策慢

慢地分辨出誰是誰，主要的用意只是在利用行動來澄清當時的跨黨情況。

一個黨團是一個社會或民衆組織中的祕密核心，譬如一個工會的黨團，經常在工會會議之前先舉行會議來決定黨的政策，同時，我們也不方便讓工會知道黨在控制他們，所以黨團活動必須祕密進行，甚而爲了能掌握主動控制權，我們不得不借工會的名義將我們的主張立場傳播給民衆。再說，我們黨員身份都很明顯，幾乎沒有人不知道某某是國民黨員，因此黨也就很少有所作爲，這是我們所以要成立黨團的原因，此外，祕密黨團也可以逃過地方軍閥的耳目。

說起來，設立黨團是共產黨慣用的技倆，但現在我們也這樣做，目的和他們是不一樣的。因爲我們的目的是掩護黨團在群衆組織中的活動，我們的目的有建設性，我們要帶著群衆走上正確的方向，而共黨的目的却在控制他們，指揮他們反政府、反國民黨，當然，也許有人會說，難道帶引大家走上正途不是一個控制的方式嗎？是，當然是的，但是心理上還是有所不同，共黨把不是共黨的人當敵人看待，我們只是把不是本黨的同志引導向善。

當共產黨控制中央黨部時，我們的黨團並沒有發揮多少作用，那時中央組織部派出一些老而無活動力的純國民黨黨員在群衆組織中工作，這些老黨員當然沒有辦法與年輕而活躍的共產黨員對抗。

家兄果夫接掌組織部後，我們才著手驅逐共黨黨團，而代之以我們自己的黨團，也就是

用共黨的手段來打擊共產黨。這樣一來，我們的黨團開始在社會團體中發生作用，能夠區分共產黨與國民黨，在清黨時，我們的黨團公開攻擊共黨黨團，在打倒他們之後，我們的黨團也就愈趨公開了。

清黨期間，我們的黨團在農人協會中極有效果，實際上農民對政治沒有興趣，但只需要少數的活躍份子按照黨的指示就可以辦好他們的工作，比起工會中的情形，可就簡單得多。而這些活躍份子對於當地情形、人際關係以及共產黨的身份都很清楚，所以很快就能分辨出來誰是共產黨員，然後予以打擊，農民協會就這樣成爲國民黨與共產黨的主要戰場。

清黨時，國民黨和青幫之間，雖然沒有正式的合作計劃，但是彼此是友非敵，尤其是黨員在上海進行祕密工作時，就得到青幫大力協助，因爲他們和外國租界及警察有交往。

我們與上海青幫之間，似乎有一種互不侵犯的協定，在二次革命時，英士二叔就曾和青幫携手合作過，但是他並沒有加入青幫。至於黨員有沒有加入青幫的呢？有，因爲國民黨不禁止黨員加入青幫，同時青幫也不禁止他們的會員加入國民黨。

上海的清黨

民國十六年四月，我們在上海展開清黨，一位親身參與清黨工作的同志，事後曾對我詳

說當時的一切。

說起來，在民國十六年以前，共產黨除了控制上海總工會及學生會外，還組織了其他民衆團體，這些團體都受制於共產頭子惲代英。

共產黨利用商人組織來顚覆大商人們所操縱的上海商會，另一方面，他們也利用馬路聯合會的力量來影響商人組織，又以此來防止小商人抱持中立態度，這樣他們才能掌握主控權。於是，工人、商人以及學生的組織成爲上海最有權力的組織，而惲代英就成爲上海人民團體中的領導人物。國民黨上海市黨部也受到共產黨員的暗中控制。

四月十二日以後，東路軍總指揮部政治部命令陳群、潘宜之、冷欣等關閉上海市黨部，同時，南京市的中央黨部指派陳德徵、潘公展、周致遠等同志成立一個上海市黨部執行委員會來指揮黨務，而這個委員又轉派代表在上海組織其他各級黨的組織以及民衆團體。

上海總工會，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的總黨部，擁有大量的武器及工人糾察員，這些裝備多數來自畢庶澄的軍隊，有一些來自南京和閘北的警察局，還有上海保衛團。忠心的國民黨同志，也有從上海保衛團拿了些武器來對付共產黨的工人糾察員。

爲了要消滅共黨的主要武力，四月十二日，東路軍總部不得不採取行動來抑制工人糾察員的活動，於是械鬥就開始了。幸好東路軍能以全力來執行任務，雖然有不少衝突，但卻沒有太多的死傷。

東路軍總指揮部政治部指派陳群、潘宜之、賈公俠等組織委員會負責統一上海各工會，並與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合作重新組織市內的所有工會，同時也成立了上海清黨委員會，所有國民黨內的共黨份子全部都給勾消。

上海清黨委員會的秘書長是林其漢，上海民衆組織中對清黨最有貢獻的首推共進會，這會的領導人是青幫的杜月笙、黃金榮、張嘯林、楊虎等人。

四月十一日的夜間，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和楊虎，請上海總工會委員長汪壽華到華國南路的杜月笙寓邸。原來共產黨已經和上海的幫會聯絡好了，而汪壽華已經加入了青幫，而且認張鏡湖爲他的頭子。汪得知全上海人士都一致反對共產黨，大家又勸他趕緊離開共產黨，支持國民黨，並解散糾察隊，但汪不聽，後來在一場格鬥受了致命傷。

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等重整工人之中的幫員，讓他們幫忙掃蕩南市和閘北的糾察隊，工會中的共產黨份子都被逮捕後送到警察局或陸軍中受處分，因爲很多共進會的會員在工廠中做工，因此對工會的內幕很清楚，也就很快地消除工會中的共黨份子。

當時上海總工會有八十多萬的會員，這樣大的組織，所發出的行動立刻就會影響全上海市的市民，因此共產黨就利用罷工作武器，讓所有的工會都罷工來引起民衆的恐懼，試想八十萬人罷工，社會秩序就難以維持，對全上海市民的生活都會引起不便和影響。

幸好，各區可靠的同志和各工廠的共進會會員都聯袂參加軍隊和警察部隊，幫忙逮捕工

會中的共黨份子，並突擊共黨的秘密指揮機構。於是，工會中的共黨份子潛逃藏匿起來，共黨頭子也躲進租界區，不敢公然露面，各校的學生聯會也由國民黨總部代表重新組織過，共黨學生紛紛逃離學校躲藏了起來。

可以說，上海市我們的同志都忠心耿耿，熱心黨務，他們不顧個人的安危，與共產黨展開了生死鬥，大家所表現的忠心和勇氣都是值得讚許的。

當時在上海各地的領導同志如下：在南市是楊守中、吳博光、童欣拜、林玫焉等；在法租界是牛昌主、張君儀、范正博、吳政、張效東、趙書等；在公共租界是唐德明、水祥雲、紀家模等；在閘北是江懷叟、江紀祖、趙國清、蔡國華等；在浦東的有陳君儀、張蔡保、顧由芳、陳培德、錢爲廷等；在江灣負責的是隴體要、汪竹一等；在吳淞的有黃生模、唐雲龍等。

我們的同志，在南市和閘北的解散武裝工人打鬥中，或是在爭取工會領導權的爭鬥中，都有許多死傷，直到四月十二日以後，各區的共黨陸續被逮捕，也將各工會和各學校中的共黨份子徹底清除。

其時吳開先同志在上海市黨部任組織部秘書，負責辦理黨員登記。凡跨黨份子自願申明脫離共黨者，由市黨部發給證書，並由其本人塡具脫離共黨誓願書存案。其經查明係共黨黨員而未申明脫離共黨者，一律予以除名，並通知清黨委員會。

清黨委員會係由陳群與楊虎二人負責，市黨部無權過問，陳群且將市黨部忠貞同志張君毅（交大學生任工農部秘書）捕去殺害，市黨部雖一再向警備司令部交涉，請其釋放，但楊虎不予理會，市黨部無法可施，乃電請果夫先兄報告蔣先生，蔣先生即電楊虎速予釋放，而楊虎電復則謂蔣先生電到之前已予槍決。市黨部大為憤慨，為張君毅同志開會追悼，並電請蔣先生予楊虎以處分，數月後，楊虎、陳群均奉令免職。（以上係吳開先同志所親歷上海清黨時之紛亂情形，並謂無辜人民之遭害者更不計其數，言之至為痛心，對本黨之失去學界同情及一般人民之失望，均屬無可補償之損失也。）

調查科之創始及其發展經過

凡是一個國家，受了外力的侵凌，為求自保，必須有一健全組織的調統機構，你如果唸過《管子》一書，可以知道齊國的調統組織的健全，老百姓的一切一切，政府都調查得清清楚楚，對外更不要說了，故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我們的革命是從軍政時期開始，經過訓政時期而進入憲政時期，亦可以說由霸道進入王道，霸道是手段，王道才是目的，但是我們的處境，非常艱困，外有帝國主義者環伺，內有勾結外力之軍閥和政客，如果沒有健全的調統組織，其危險太大了。

蔣公曾去蘇聯，知道該國政治之運用甚詳，而其調統組織之嚴密，實爲安定內部之主要因素，因此十六年清黨之後，蔣公就要我在他所任部長的組織部之下，組織成立調查科，其上要任務爲對付共產黨的活動而制裁之。

我奉到這個命令，感到我的個性對此頗不適宜，並且對這項工作絲毫沒有知識和經驗，因爲我是學採礦工程的，對物而不對人。因此我去請教戴季陶先生，戴先生聽完了我的陳述，他說：「你是一位和善而有智慧的人，做調查工作的人，固然三教九流的人都需要，但是要去管這些人的人，需要一位慈祥而公正的人，才能管得住他們而不出亂子，你看寺廟中兩邊站的十八尊羅漢，個個都是濃眉怒目三頭六臂的，但是中間坐的那位如來佛，卻是何等的慈祥雍穆，唯其如此，才能管得住，做得好，所以蔣先生要你去做，就是這個道理，我看你還是從命罷！」我聽了，才決定去做的。組織部調查科就這樣開始的！

我所知道的人，多半是美國留學生，學工程與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的，所以調查科開始組織，就是請這些人幫忙參加，他們中沒有一個懂得美國FBI或蘇俄的格別烏類似我們調統工作的。我們的科分調查與統計兩組，一面做，一面學，究竟這些人都是受過高等教育而有科學訓練的，而這美國科技對付蘇俄科技的初步決鬥，比較起來，還是我們比較高了一手。我們的工作進行得非常順利，不久就破獲了若干共黨秘密機關，而青年共黨之來歸者每月逾百人（共計爲一萬六千餘人），聲勢大振，但不到一年半我就由科長被升爲中央黨部秘

書長，科長一職經張秘書道藩等先後兼代，最後由徐恩曾（學電氣工程的）接充。

由於此一工作是新創的，我雖然離開了科長職位而去擔任中央秘書長，許多事情還是要來請教我的，所以不能完全不管。至於軍統之開始，是「有實無名」的一個組織，由戴笠（字雨農）在蔣公侍從室工作的時候，受命擔任調查特種事件所開始的，當調查科發現戴笠在做類似工作的時候，科中同仁憤憤不平，謂蔣公是否對我們不信任而另派戴笠去做？我就對科中同仁解釋一番如下：「我們的工作，可稱之曰黨的耳目，你們看人身上耳與目都是成雙的。所以黨的耳目，亦不妨有兩個，互相查對，是有益無損的。」衆皆悅服。所以，戴笠的工作開始時，是有實而無名的。

當時我考慮應否以此事問問蔣公，否則蔣公會輕視我們，怎麼戴笠在做調查工作，你們一點都不知道。於是我決定向蔣公查問說：「有一位名叫戴笠者，在外聲稱是蔣公要他做調查工作，有無此事？」蔣公有點不好意思說：「有的，我有時候要他去查一兩件案子，並無特別組織。」後來，戴笠的工作範圍與日俱增，還是有實無名而已。不過，蔣公不願戴笠永久這樣下去。

後來約在民國二十四年，蔣公要我主持一個「調統會報」，屬於軍事方面的，由陳空如先生協助我。遂正式派徐恩曾爲該會報之第一組主任（注重共黨在社會之活動），戴笠爲第二組主任（注重共黨在軍事方面之活動），並派丁默邨爲第三組主任（掌理會報方面之總務

事宜）。這一個組織，一直到蔣公要我擔任教育部長那天（民國二十七年正月），我才辭去會報工作，其理由是教育部的工作與調統工作是兩件絕對相反的工作，不能由一個人來兼做，遂以此理由脫離了調統工作，去擔任教育部的工作，因此「調統會報」亦取消了。其第一組改稱中央黨部調查統計局，局長由朱家驊擔任，徐恩曾副之；第二組改稱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局長由賀耀組擔任，戴笠副之。第三組取消了，後來丁默邨就跟隨汪精衛去擔任僞政府的調統工作，對於一二兩處在淪陷區的工作，不無打擊。

總之，中國調統工作由我創建的，直接負責，爲時僅一年餘，與此工作完全脫離關係。在十年以後，其間兩局的工作成效、組織名稱變更多次，我因年已九十五，記憶不清了，需要尋找材料，以實此文可也。

總而言之，「中統」是中國國民黨調查統計局的簡稱，它的前身是中央組織部調查科，創建於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先改隸於內政部，後改隸於司法行政部，時在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

「軍統」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的簡稱。它的前身爲我所主持之「調統會報」第二組，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底，因我出任教育部長，與第一組分別成立「中統」與「軍統」，二者同時分別掌理對社會及軍事兩方面之情報及共黨活動之調查工作。在國民政府統治大陸的二十年歲月中，兩統並立，幾經分合改組，從事情報蒐集掌握與運用。

持平而論，它對內部整肅，外患排除，鞏固領導中心，維護政局安定，實有助益，而於安內攘外，抗戰建國國策的推行，亦有不可磨滅的貢獻。但不容諱言，引人批評訾議的地方，亦所難免，其詳情見結論章。

無線電通報機之創造及其效果

那時，調查科還有二件最得意的事，是首先創製了一對溝通上海和南京間的短波無線電台，這個無線電台對我們往後的工作大有助益。

李範一同志當時是剛從美國回來的電機工程師，學會了短波電學，所以建議製造兩座短波無線電機。在當時我們政府還只有長波無線電台，因此我就請他製造兩套：一套放在上海，一套放在南京。此後，我就開始用短波無線電來聯絡上海、南京間的電報消息。

記得當初我對別人提到李範一的構想時，沒有人對此發生興趣，也沒有人懂得這些新東西，所以也不相信可以用無線電送情報。但我們是受過科學訓練的人，知道這是可能的事；而且，事實上當時已有好些國家開始用無線電作爲通訊傳播的工具。

民國十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孫傳芳從江北南下攻南京，在龍潭渡江，截斷京滬鐵路交通，自然南京跟上海間的電線亦被剪斷了，當時白崇禧在上海，何應欽在南京，無法聯絡

上，我乘此機會請何將軍用我們的無線電台，以電文溝通軍事計劃。果然，這兩座無線電台在打敗孫傳芳的戰役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因爲兩地軍事信息的交通全靠著它。

龍潭戰役證實了無線電的效用。事後，何應欽將軍報告蔣總司令說，京滬軍隊的夾擊孫傳芳計劃，全靠我們的無線電台之聯繫。蔣先生除發給獎金嘉勉我們之外，並且撥款要我們進一步改善軍中無線電設備。我們就開始計劃在上海設立了一個簡陋的製造無線電電報機的工廠。

我們的通訊系統比起軍閥及共產黨的要好得多而且快得多，這對我們是很有幫助的。機密消息和文件可以很快地送到中央黨部，而且可以很快地據此以指示所屬的各機構如何對付共黨。

密碼製作及破譯密碼工作

我們從事的另一件重要工作，是如何加強我們的密碼之機密性，以及如何設法譯出其他軍方集團密碼的能力。

民國十六年年底，唐生智叛變，而我們就將他發給同謀者的電文，一一地破譯出來。

原來，唐生智的那些人不察，他們把若干攻擊蔣公的密電電文發表在報紙上，我們就把

這些資料連同電信局裡所獲得的密碼電文資料一齊詳細研究後，就明白他們的密碼組織了。

當北伐軍每佔領一個地方，第一件事，我們就計劃接管當地的電報局，就是會同總司令部的交通處派人接管，而被指派接收各地電報局的負責人，必須同意把電信局所有電文底稿複寫一份送給我們，這樣我們很快就獲得所有各地發出的電報底稿，拿到這些資料後，首先找出一些關鍵的字，慢慢地就不難譯出整個的密碼。

我們這個特別小組的工作人員，由毛慶祥負責指揮，後來，蔣先生召集我們機要科同仁講話，嘉獎我們的工作是「知彼」工作，他並說，知己知彼是軍事勝利之所繫，你們的功效勝過十師的軍隊，以一萬元作我們的獎金。這獎金經特別小組同仁同意，我以六千元分給各有關工作人員，餘四千元作後來辦正中書局的資金。

我們以同樣的方法翻譯出石友三和桂系造反的電文。由於太「知彼」了，因此蔣先生能夠很快速地處理他們的叛變，擊潰他們，而當時我們並沒有用多少部隊。所以，我們的電碼破譯工作非常重要，我們確實對於軍事貢獻不少。

我們對自己的密碼，也是費了一番工夫的；中國境內現有的電報明碼本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大約有一萬字，起初我們只改變密碼的數字，後來覺得這樣做，很容易被別人破譯出來，所以我們決心重新將商務印書館密碼系統，刪去絕少用到的字，而重行安排較重要的字，因之字的次序完全變了，而常用的字用粗黑體字印，因此較前醒目易尋的多，而且與商

務的電碼本斷絕關係，爲機要科自創的密本，他人絕難破譯的。

我創造的五筆檢字分類法也是很有用的，有助於我們密碼本的保密和尋找。我們把密碼本存在總司令部機要科，但是，只要我走到那裡，這些密碼本就跟隨著我，而別人卻弄不清楚某本密碼究竟放在那裡，同時，我也經常改變密碼。

舉例來說，我們可能把五本密碼本編成甲乙丙丁戊交給一個人，讓他和我們聯絡，彼此之間有默契，例如，星期一所用的「甲」密碼，星期二所用的「乙」密碼，每天換一本，使別人永遠破譯不了我們的電報文。

在我們辦公室裡有一個二十五個抽屜的櫃子，從AA到YY，每一個抽屜又包含二十五個索引檔案夾，按照姓氏編檔是主要使用的方法之一，但我的分類方式卻有更廣的應用價值，所以我們仍照地點及題材來編檔。

我們大約有七百到八百的保密密碼本，每當我們收到一通電報，我們首先要找出他所使用的是那一套密碼，利用我們的檔案櫃，我們很快就可以找出所要的密碼本。

我們的辦法最大的好處，就是管理檔案的人對我的方法一學就會，我隨時可以更換人。但是也因此有一個小缺點，就是用過後密碼本須立即歸原，否則下次不容易找到，而爲了保密起見，我於是將二十五隻抽屜的檔案櫃完全鎖起來。我發明一種鑰匙，可以把一個櫃子一鎖上後所有的抽屜同時鎖起來，只有兩個人有這種鑰匙，負責檔案的人和我，我對我自己想

出來的辦法很滿意，我覺得它大大地提高了譯者的效率。

但是，我的編檔方式除了中央黨部秘書處及組織部黨員卡片兩單位採用外，政府方面並沒有採用，因爲，假如我的辦法被採納，很多管檔案的人就會失業，而編檔案是任何機構中最保守的部門，負責編檔的人是不喜歡有任何改變。不過，民國十八年我受命爲中央黨部秘書長時，黨部就首先採用我的方法，後來有些省黨部也採用此法。

政治軍事的發展

南京政府的政策，是要把共產主義在中國連根鏟除；但汪精衛卻繼續和共產黨合作。

民國十六年的五月間，汪精衛和陳獨秀發表聯合宣言。武漢政權決定派兵反抗南京政府，在他們的眼中，南京政府是反革命組織。我相信他們是接受國際共產的指令來行事，共產黨的基本政策就是要分化國民黨；也就是和武漢的國民黨所稱左派者聯合，而來對抗南京的國民黨的所謂右派政府。

六月十九日到二十一日，蔣先生和馮玉祥舉行了徐州會議，會中達成三項協議。

(一)取消武漢僞政府。

(二)在尚未清黨的地區清黨。

㈡遣送武漢部隊回河南。北伐軍和馮玉祥部隊聯合，繼續北伐。

在會議之前，馮玉祥曾拒絕把他的部隊調回北方，這對穩固他的協議是很重要的，因爲馮玉祥的軍隊控制整個的河南省。

汪精衛知道蔣先生和馮玉祥合作，極爲不快，共產黨在失望之餘，也在七月十三日宣佈退出武漢政府；假如馮玉祥不是和蔣先生合作，而是和武漢政府聯合來對抗蔣先生，那麼形勢就會無法掌握。

七月十五日，武漢領導者亦決心清黨；事實上他們早已知道共產黨謀叛的企圖。清黨活動先從湖南、湖北和江西三省開始，鮑羅廷、嘉林，和其他蘇俄顧問，都被驅逐出境。這時，共產黨對蔣先生的攻擊，可以說是有增無減。他們公然攻擊他是獨裁者，是反革命。

共產黨知道黨的眞正力量是軍隊，所以他們一心一意要分化軍隊，破壞軍隊對蔣先生的信心，引起黨內糾紛。而分化國民黨的軍心，乃是共產黨的基本策略。

共產黨令周恩來和張國濤，隨著張發奎的軍隊到南昌和九江。

到了南昌和九江後，他們就嗾使張發奎的部下賀龍和葉挺，在八月一日叛變；朱德也加入了這一次的共產黨武裝叛變。

在這一次叛變中，參加的共有兩萬多人，他們仍然用國民黨旗徽，正式的指揮機構稱爲「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

但在南昌的共黨叛軍，第三天就被包圍了；兩天後，他們突圍，開始流竄到南方，他們過了福建，就往廣東的東江流域逃，想在汕頭一帶建立一個共產黨的要塞，後來事敗，葉挺就率領共產黨的殘兵逃到陸豐和彭湃匯合，而朱德和手下餘黨詐降，然後再叛變，逃到湖南南部。

民國十七年的春天，朱德和毛澤東在江西與湖南邊境的井岡山會合。可以說，八月一日的南昌叛變，引發了紅軍的產生以及陸豐的叛變，也才使得中共得以獲得喘息和坐大的機會。

武漢加入南京的清黨運動，特別成立一個委員會來處理兩邊合作的事務，九月十六日這一委員會成立，汪精衛和孫科啟程到南京，也就是說武漢政府要搬到南京。

但在特別委員會召開之前，有一個大問題需要解決，這個委員會是否要傾全力來建立一個強固的政府，同時是否繼續北伐？特別委員會的決定是：繼續北伐。

蔣先生退隱赴日，我隨同離南京回上海

八月十二日，蔣先生卻在這時提出了辭呈。因爲，武漢方面喊出的口號是：分共反蔣。蔣先生爲了顧全大局，提出辭呈，把軍事大權交給何應欽將軍。蔣先生這樣做的目的，是要

使武漢和國民政府聯合起來，共同對付共產黨。

蔣先生辭退時，特別期望同志三件事：

㈠南京和武漢雙方同志，應擯外間挑撥之詞，盡捐意氣猜忌之念。武漢同志剋期聯袂遷移來南京，共同集合商議黨國大政之進行。

㈡要求分駐湖南、湖北、江西各地的武裝同志，併力北進，會同津浦線作戰的軍隊，一致完成國民革命；關於這一點因馮玉祥已經同意，所以說是沒有問題。

㈢要求湖南、湖北、江西三省的武裝同志徹底清黨。

對蔣先生這一做法，完全爲公。因爲他的退出目的是使黨能夠團結，一致對抗共產黨。同時，基於三月二十日所發生的中山艦事件，蔣先生和汪精衛之間有些隔閡，因此，蔣先生退出南京政府，中央監察委員吳稚暉、張靜江、蔡元培和李石曾等幾位先生也退出了南京；接著胡漢民先生也離開南京。

這樣一來，造成了國民黨內向心力的動搖，各地民衆組織紛紛打電報要求蔣先復職。但是，蔣先生卻在民國十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前往日本。

蔣先生之所以前往日本，據我的瞭解，是他知道將來北伐軍前進時，我軍必與日本在山東的勢力相遇，所以藉這次日本之行，可以預先替我軍舖好路。

在訪日期間，蔣先生多半是住在頭山滿的家中，因爲好客的頭山滿，一方面可以保護蔣

先生的安全，另一方面也能使蔣先生見到他想見的人。因爲頭山滿的話，當地人是非常尊重的。

蔣先生本來邀我一起到日本，但我沒有答允，因爲我當時對日本沒有什麼興趣，同時我也不懂日本話。此外，也正如我對蔣先生說的：我非常疲倦，而我健康情況也不佳，亟需休息。

那時，我曾經這樣想過，假如蔣先生不回到南京來，我還是可以去做工程師的事，政治對我並沒有多大的吸引力。不過，現在想想，我很可惜失去了這一可以會見日本重要人物的機會。雖然我曾去美國留學及返國經過日本兩次，可是，我從來沒有在那裏住過。

蔣先生退隱之後，白崇禧將軍和何應欽將軍同任軍事委員會主席團，也掌握了軍事的大權；陳祕書曾在民國十五年時候代過我的職務，也就順理成章地接過了機要科的工作。

白將軍對我很好，他要派我擔任他的顧問，但是我婉謝了。其實，蔣先生隱退後，並沒有要我也隨著退，只是我覺得無留此必要而已。

移交時，除了一些蔣先生要我個人保存的最高機密文件外，我把其他的都移交；在密碼方面也是如此，凡是具有高度機密以外的密碼，我都留在機要科裏。

交接的工作非常順利，當同事們爲我餞別時，我將科中結餘的幾千元給他們，作爲萬一失業時的救急費用。大家對我的離去，都很依依。

後來機要科擴大編制，附屬在軍事委員會，那時的祕書是毛慶祥。離開南京，回到了上海。我把那些隨身帶的最高機密文件加以整理，編入索引，然後交給毛祕書。

那時，我把大部份的時間用來修改我的五筆檢字分類法，把研究的結果全收在我的書中：《五筆檢字法的原理及應用》一書，是民國十七年中華書局出版；同時出版的另一本書是《姓氏速檢法》，我用我的方法分類了五百多家姓氏，這一本書簡化了中國姓氏的識別。

3

民國十七年春至二十年冬

完成北伐時期

繼續參加國民革命，
並任中央各要職。



蔣先生復職，我再主持機要科

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日，蔣先生由日本回到上海，認爲那時局勢不穩，影響北伐進展，乃應全國各界民衆團體的呼籲、高級軍事將領的擁護，和中共會議通過復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案，於十七年一月四日回到南京復職，我跟隨他一齊到南京，而且再被指派主持總司令部的機要科。

建設委員會

民國十七年二月我任國民政府建設委員會常務委員，並於五月指派兼任該會祕書長。這一委員會的主席是張靜江先生，其他的委員有李石曾、吳稚暉和曾養甫。

我之所以被任命擔任這項職務，主要的是，在廣州北伐軍出發之前那些日子中，我每逢晚上有空，就去拜訪張靜江先生。有關中國重建的問題，張先生非常有興趣，他希望我出任祕書長，因我們兩人有相同的觀點。

對重建國家，需要大量資金，但是那時政府財政很艱難，那裏有巨額資金用之於建設

呢。所以我的構想有二：

第一，我們要先組織一個工程師顧問團，這個顧問團的作用就是給予企業家以技術和行政管理的協助。例如：如果一家工廠經營不善，我們就會設法去協助他們解決這家工廠的困難。

第二，等我們有了充份的資金，我們就要根據國父實業計劃來建設。如果這項企業進行順利而是屬於私人經營範圍的，就將它交付私人企業家接辦。因爲當第一個企業或工廠賣給民間私人後，我們就可以用這筆所得，開始其他的建設，同時我們也決定要轉請國外專家來幫助。

建設委員會是直接隸屬於國民政府的。在那時，政府組織並不完全，新的機關每每直接隸屬國民政府之下。理論上，委員會應該附屬在院或部的下面，像行政院成立商業部等。但是，張靜江先生那時正是國之元老，且在高度聲名中，我懷疑他是否甘心屬於他人之下，來做建設工作。

我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計劃江蘇省淮河疏導計劃，這是個在中國討論了好幾個世紀的問題了。我們請了中國第一名水利專家李儀祉先生草擬計畫，他又請了一位德國著名水利工程師做一番實地考察，其結論與國父實業計劃中導淮計劃綱要不謀而合，可見國父眼光之偉大。後來這一計劃，由導淮委員會委員長蔣公及副委員長我大哥果夫主持施行。

另一項成功的計劃，是恢復曾被洪水淹沒的煤礦。

這一煤礦是屬於浙江省長興縣的長興煤礦公司。被水淹沒了以後，礦主劉長清曾請一位英國專家去恢復他的礦，他算了一下，說要修理整個排水裝置和恢復煤礦的經費，至少需要一百二十萬銀元。因爲太貴，就擱置不修，礦工失業太久，都變成了土匪，劉長清來找我，我告訴他建設委員會會派人來勘察估計。我請我的朋友陸子冬來做這項工作，陸子冬就是在美國時與我和徐恩曾兄同駕汽車旅行而遇到車禍的那一位，他是科羅拉多礦業專科學校畢業的。長興煤礦公司所在地，正是徧地土匪；土匪出沒的地方，大家不敢前去，所以要到長興煤礦去勘察，是非常困難的事。

幸而陸子冬是位很有能力的人，他找到了當地的土匪頭子，並和他達成了種種諒解。他告訴土匪頭目的計劃，並且保證等煤礦重新開業後，每個人都會有大米飯吃，就這樣，土匪頭目就幫他忙了。

根據陸子冬的估計，除非有意外發生，否則，恢復工作只要銀元四十萬元就夠了。較諸英國工程師的估計，祇有三分之一。於是，我和礦主劉長清商定，他出來要我們幫他恢復，等到把煤礦產量足夠自給時，由建設委員會交還給他自己經營。我們的投資由劉礦主分年償還。

我們和劉先生簽定一個合約，其內容是確定委員會投資部份資金幫助煤礦恢復，等到煤

礦能夠日產兩百噸煤時，再把礦交給劉先生，而他還可以留用我們原先所雇用的技術人員繼續工作或擔任顧問。

結果，從開始到完成合約的內容，全部只花了礦主四十六萬銀元，而且在進行中間還經過一短時間的大水災。這件事，是我學習礦業以來，感到第一次用到所學最快樂的收穫。

建設委員會又幫助安徽烈山煤礦之恢復（亦被水淹），並完成了許多其他的計劃，像協助整理上海附近的戚樹堰發電廠、修築杭州與江山間及嘉興與蘇州間的鐵道。此外我們也建議改善農業金融制度及工業金融制度。但是主持金融的當局，並不了解，亦未被採行，非但不願協助建設委員會事業之擴展，金融當局並且另外設立了國家資源委員會，最後將建設委員會的工作取而代之，從此以服務爲目的的建設機構的性質，完全變成了以奪取爲目的的資源委員會，使老百姓側目而視，政府的信譽大受損害。不久我辭去祕書長，由曾養甫兄接充，後來張靜江先生亦不願再幹了，建設委員會被資源委員會併吞，殊爲可惜！

組織京報

民國十七年的四月，我在南京創辦了《京報》，其名稱指出是京都的日報，因爲南京確定爲首都了。

辦這一份報的目的，在於透過這份報紙來宣傳主義，領導民衆，鼓舞全國的士氣，以完成北伐，早日實現三民主義；報紙的政策是極力反對與蘇俄聯盟政策，也決不與共產份子妥協合作；同時我們支持並贊成與以平等待我們的友邦聯盟。

我擔任報社的理事會主席，蕭吉珊任副主席，總編輯是吳醒亞，助理編輯則是陳民耿；辦報的資金就是蔣先生頒發的獎金中我所得的一份以及上述幾個人和一些熱心人士所幫助的。

由於我當時還在機要科工作，因此通常要到夜晚九、十點鐘才能到報社工作，羅時實是機要科的祕書之一，他也參加了京報社擔任記者，我主要是看大樣、寫社論和專題文章，通常要到很晚才能完成工作。

第二年，我們《京報》的發行數量已經達到一萬三千五百多份，已經成爲南京的第一大報，《中央日報》反而居第二位。說起來由於我在機要科工作，可以接觸到許多第一手的消息，因此，《京報》也就時時有最快、最新的獨家報導，不過涉及國家機密尤其是軍事消息，我是絕不會洩露的。另一方面是：我在報社是半夜才開始工作，這時別的報紙早已打烊，因此我們的消息快速就可擊倒其他幾家了。

民國十七年五月一日，《京報》獨家報導了收復濟南的新聞，我們之所以搶先，是因爲我當時正在前線，一打勝了，我就打電話通知報社，當然其他報紙就落後了。

《京報》也有不少膾炙人口的好文章，譬如，每天都有一些關於婦女、教育等問題的文章；除了文章，我們還配合圖表說明。我們也是第一家採用卡通漫畫的報紙，每天請畫家梁鼎銘以含諷刺性的筆觸來揭發社會的黑暗面，尤其是對不肖之徒的無情打擊。

每逢星期天我們增加發行一張畫報，在當時僅有《上海時報》這樣做。不過《上海時報》的畫報都是刊登美女明星的照片，而《京報》則不同，在畫頁中，我們用照片和圖畫卡通來隱喻社會新聞、政治等問題。

逐漸地，《京報》有著可觀的影響力，譬如北京光復後，我們建議將北京改名北平，我在社論中指摘繼續使用北京的不當，因爲南京已成爲國都，再用北京很容易使人誤會以爲我們有兩個國都；同時，我們也建議將直隸省改名河北省，因爲直隸是指這省是國都所在地，如果這樣，江蘇省由於南京首都，也可稱爲直隸省了。其次建議江蘇大學應改稱中央大學，因爲它位在南京首都。這些建議都被政府一一地採納。

在言論方面，我們是支持政府所決定的政策的，我們撰寫外交政策的社論文章，以使誤會者可以瞭解；我們擁護社會改革，痛擊腐敗惡習。

《京報》的立場看起來好像中立，其實我們是擁護政府的。不過，在小地方我們也對政府作批評，如果我們認爲政府有處理不當的地方，便會受到我們的指摘，這也就是《京報》會受到社會歡迎的原因。讀者對我們副刊上的長篇小說連載也極喜歡，因此，《京報》不僅

在南京成爲地方主要報紙，京滬鐵路沿線地方如鎮江、蘇州、無錫、常州等等城鎮，過去都是《上海日報》銷售的天下，現在卻都成爲《京報》的銷售網了。

報社的編輯部也陸續進入了好些生力軍，如賴璉、程天放、楊公達等等，他們都是國民黨員，後來也都成爲著名的學者及政論家。

我們曾經和海軍副總司令陳紹寬有一段不愉快的經過。專欄作家湯博公，他在每天的歷史專欄文章中，一天寫到有關民國初年海軍腐化的文章，這位副總司令當時在漢口，他聽到《京報》攻擊海軍，立即命令海軍艦隊的士兵到南京來接管我們報社辦公處，一位編輯被捕，經過這件事後，《京報》也就困難重重了；因爲只要我們指摘到某一個人，他們就會到蔣先生面前去告狀。

《京報》還有一件得意事值得在此一提：英國路透社曾把我們有關國際問題的文章翻譯送到外國，使得《京報》也有國外的讀者。美國國務卿亨利．史蒂文森路過上海時，還特別和主筆陳民耿會晤，這眞是《京報》的一大光榮。

大約一年半以後，我就將《京報》移交給石信嘉同志去辦，報社名稱也改爲《新京日報》，不過，我們將《京報》賺來的數萬元又創辦了《時事月報》。

濟南慘案

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我隨著蔣先生離開南京到前線徐州，參加最後一階段的北伐。

五月一日，我們光復山東的濟南。

其實，蔣先生已經下令部隊繞道濟南，避免與駐紮在當地的日軍起衝突。但是北伐軍指揮官可能認爲應該一下子攻下黃河南岸的城鎮，以免張宗昌因依靠日本的勢力在黃河兩岸與北伐軍對抗。事實上，我們軍隊進入濟南城的並不多。

那天的深夜，蔣先生帶著我們進入濟南，忙著處理發生在當地的動亂。

蔣先生在張宗昌放棄的辦公室設立總部，我們機要科就在城牆外火車站的一節車廂中辦公。

五月三日，我們突然聽到日本軍所放的鎗聲。我們決定要將機要科的辦公室搬到城內總司令部去。

在搬運中，最要緊的工作是搬移無線電台，當時由我指揮祕書高淩百負責這項工作，因

此，我們才能繼續發出電報，蔣先生必須藉著電報命令軍隊前進，同時也需要向南京方面報告一切。

當時情況非常緊張，日軍已經包圍了濟南，而濟南城也只有一個城門是開著的。

濟南慘案的發生，早在蔣先生的預料及防備中，因此，他特地任命黃郛為外交部長，因為黃郛和日本人關係頗好。

當外交特派員蔡公時死在日軍手中之後，蔣先生令黃郛與日人談判，陪同前往的有羅家倫兄與曾養甫兩人，那時羅兄正替蔣先生負責寫文章的工作。

黃郛向東京抗議，但第二天早上，情勢更為緊張，黃郛勸蔣先生離開濟南，蔣先生斷然予以拒絕。

情況更加緊張，黃郛又對我說，要我力勸蔣先生從速離開濟南城。

我對蔣先生說：司令部其他部門的人都已經走了，但機要科的工作人員跟我會留到最後，等到把所有電報發完後才會撤走。

聽我這樣說，蔣先生才同意離開。

我發現，每逢生死關頭，蔣先生都很鎮定，也很明快地作成決定。

有一次，蔣先生告訴我，每當他面臨困境，他喜歡到山中走走，聽聽流水的清音，沐浴在清純的松濤山風中，這時他的思緒可以澄清，心思更加明澈。

幸而當時蔣先生答應離開，否則，那情勢是非常危險，會發生什麼事是很難想到的。那時一陣飛機的轟隆聲，由遠而近，蔣先生命我看看是否是南京來的飛機。我剛將頭伸出窗外，就有兩枚炸彈落在我們的院中，一枚落在窗外偏左側花園的一個水池中未曾爆炸，另一枚就落在蔣先生臥室前五十英呎左右的副官處所在的地方，炸死了兩個勤務兵。

那些飛機是屬於張宗昌部下的，都是白俄駕駛。

這是我生平第一次遭遇到飛機炸彈，而我很驕傲的是，機要科中沒有一人畏懼逃跑。我告訴他們還有飛機來炸，但是我們必須把該發的電報發出去，同時，我向他們保證，我會與他們一直一起工作到最後。

不久，蔣先生在五月六日離開了濟南；我與機要科同仁，就完全單獨留在總部工作了。不過，不知道爲什麼，曾養甫和羅家倫曾經同來，與我們同過了一夜。

蔣先生在濟南發出的所有電報中，最重要的一封，就是下令我軍渡過黃河，特別是白崇禧所帶領的軍隊。他也透過無線電與南京的黨部和政府聯絡，主張用外交而不是用武力來解決這一濟南事件。

當晚，我們把所有的電報發完，但是，當晚城內外在戒嚴中，非要等到第二天上午才能出發到黨家莊與蔣先生會合。

出發時，我們最頭痛的事是搬運那個笨重的無線電台設備，我請高凌百想辦法，他竟然找到了一群清道夫幫我們搬運電台設備，大家這才能離開濟南向黨家莊出發。

我當時沒法和機要科同仁一齊走，因爲機要科同仁中有一位名叫賴世土的染患傷寒，我必須將他送到醫院，並爲他留下一些錢，安頓好了以後，我才趕上去與他們會合。

在行走途中，我們曾遭到數度機關鎗的襲擊，我也看到一架飛機油箱中彈，在半空中燃燒、墜落；望著天空中燃燒的飛機，心中眞是無限感觸，這是我第一次看到飛機燃燒，那情景到今天依然記得。

我們安然到達黨家莊，蔣先生見到我們非常高興；後來有位副官告訴我，在我們還沒有到達之前，蔣先生替我們憂慮，一再地問我們的行蹤，耽心我們的安危。

據說，蔣先生稱讚我，說我認眞、負責、有膽量，處理事務頭腦冷靜。我想這是他首度體認我的品德和能力。不過，我也給我的同事很好的印象，因爲在生死緊要關頭時，我們仍舊要達成我們所負的職責，我也沒有丟棄我生病的同事。

全國統一

濟南慘案發生的時候，幸好馮玉祥率領的第二集團軍和閻錫山率領的第三集團軍，都已

經開始朝北平方向前進，而濟南慘案正進行和談的時候，我軍已過了黃河沿著津浦及平漢鐵路前進，這樣一來，就減少了和日本軍隊起衝突的可能性。

六月十二日，張作霖下令他的軍隊撤出北平，而他卻被日軍炸死在皇姑屯。

當時，馮玉祥和閻錫山不攻擊張作霖而讓他撤退，我想一定是彼此之間有某種諒解，所以能夠和平地就取得了北平和天津。

北平是六月八日給閻錫山軍隊佔領的，爲防萬一，蔣先生很愼重，因爲日本人既然在天津有租界，自然會隨時支持張作霖，所以，蔣先生的作法是盡量避免和張作霖起衝突。

十七年七月六日，蔣先生、馮玉祥、閻錫山和李宗仁聚集在北平西山碧雲寺孫先生的陵寢前。

站在陵寢前，我們隔著玻璃棺，可以看到孫先生的遺容，他安然地睡著，就像活著時一樣。

蔣先生獨自站在前排，李宗仁、閻錫山、馮玉祥，一字排開站在他的身後，我們又都跟隨在後面。

記得當時，蔣先生一見到總理遺體就泣不成聲，這是我第一次親眼看到他哭泣，他正如兒子悼念父親一樣地傷心，眞令人感動；此後，我再也沒有看到他哭了。

蔣先生對著孫先生的陵寢，喃喃地敘述著這些日子以來所遭遇到的一切困難和阻礙，他

也表示要決心裁減軍隊，重建國家。

整個典禮氣氛莊嚴而隆重。

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在當時，的確有與蔣先生團結一致、為國效命的決心，沒想到不久他們就叛變了。

其實，那時蔣先生為表示對馮、閻的信任，所以我們在北方的軍隊留得不多，假如當時我們多留些人馬在那裏，相信閻錫山和馮玉祥就不會叛變了。

聽說，日本人曾經警告過張學良，不許他加入國民黨，使得他左右為難；如果他決心立刻投奔國民黨，那他的處境非常危險。

蔣先生本來可以派兵進入東北，但他認為不應操之過急，他希望用和平的方法使東北加入我們的行列。在我們光復上海後，各方代表都來和我們聯繫，連張作霖也派了代表來。

民國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當張學良宣稱歸順中央時，蔣先生派吳鐵城到東北升起國民黨黨旗。蔣先生讚許張學良，不畏日本人的威脅，冒著生命危險而加入國民黨。

至於張學良之所以願意和中央政府合作，原因有二：

第一，在半獨立情況下，可能會更受日本人的威脅。現在既然已經全國趨向於統一了，當然能加入南京政府要好些。

第二，他要為自己父親的死復仇。

民國十八年一月二十五日，蔣先生在國軍編遣會議中提議裁軍。我認爲他這樣做對國家而言是絕對正確，雖然有很多軍事將領反對這一提議，不過，作爲一名軍事將領，是沒人願意裁減自己的軍額的。

南京領袖群的主要目標

民國十七年十月，在南京成立國民政府，蔣先生是主席，譚延闓是行政院院長，胡漢民是立法院院長。

當時，黨內主要外交問題，就是如何提高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第一件事就是廢除不平等條約。

西方國家眼見著我們進步，但他們都不願意放棄他們在中國的種種特權。因此，我們在外交上必須艱苦地奮鬥，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會議中，這個問題就一再地被提出。

在內政方面，國民政府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修改舊法律，制定新法。

那時的法律，是沿用北平政府所制定的。事實上，我們需要一套新法律來符合三民主義的需要。這工作就由胡漢民先生負責。這是件很重要的工作，因爲法律的制定乃是建立一個民主政體的重要因素。

地方自治的建立，也是當務之急的工作。這是遵循孫先生在國家重建的基礎訓示下而建立的。

國民政府的另一項重要目標，是加強部隊的素質，而不是數量。蔣先生著手作了許多改革，以提高軍事人員的水準。許多的軍官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他們甚至可以沒有高中畢業證書就進入軍官學校，蔣先生就提高軍官學校的水準。此外，又從軍閥部隊中挑選出好的軍官，予以接受訓練，成立戰爭學院，以加強參謀人員的訓練。

總而言之，那時我們的工作就是提高我國的軍事水準，並使之現代化。同樣重要的還有各項經濟建設的興建，如建築道路、水道維護計劃等。這些都是像中國這樣的農業國家所迫切需要而且是最基本的問題。

政治訓練處

民國十八年的年初，蔣先生寫了一個短箋，命令我接任政治訓練處處長。這個機構的任務，是管理軍隊的政治訓練，直屬於總司令部訓練總監部，處長是方覺慧先生，他是一位很好的老紳士，在處中，他雇用了許多職員，其中百分之九十都是不帶軍隊的黃埔軍校畢業生。

蔣先生在徵詢我接管這一機構召見我時，我就婉謝了。因爲我過去一直在機要科工作，我自覺缺乏這方面的才能和知識，無法擔任這項軍隊工作。但是，蔣先生堅持要我去，而且指示我，必須裁減百分之四十至五十的職員，因爲他認爲該處用人太多，只是浪費錢而已。

對於裁員，我是一點經驗也沒有。我決定先與全體職員作一次個別談話，用口試的方式來測驗他們的思想。

口試的題目，是要他們說說對於清黨的感想，以及他對政訓部門工作的展望和作法。我還組織了一個委員會來覆閱他們的談話紀錄。

結果，我的這一作法引起了強烈的反對，他們認爲我的辦法太主觀。對這些反對意見，起初我覺得是個單純的問題，後來我才發現，事情非常的複雜，因爲，對職員來說，這是飯碗問題，再說，他們之中不少人與方覺慧有私人關係，而方覺慧也不願意放棄他的職位。

我向蔣先生報告，我實在不能處理裁員的工作，我不具備這種政治工作的才華，可是蔣先生不同意我辭職。

不過，我在正式到任後的一個星期，就請病假離開了南京，並請求蔣先生派員接充。在離開前，我已經接見了全部職員，而裁員工作尚未開始。

我離開南京到上海，咳嗽甚劇，疲弱無力，像肺病復發，到上海主要是檢查身體，需要休息和治病。蔣先生知道我的確有病，就准我辭職了。

中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

中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是民國十八年三月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在南京舉行。那時，我正在上海，健康情形仍然很差。

後來，我才知道，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會議，比前兩次會議更重要，因為，國民革命軍已經控制了長江以南流域，同志們都很熱衷創設中央黨部。

胡漢民先生在中央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對整個會議，他和蔣先生掌有決定性的大權。蔣先生是組織部長，我哥哥果夫事實上是代理部務。

會議中，大部份的代表都是活躍人物，因為他們曾經領導對抗共產黨員，他們對汪精衛和他的同黨，也就是所謂「左派」，是不會有好感的。所謂「左派」份子，只是在與共黨鬥爭中曾露出了消極「灰色態度」的人。胡漢民先生從來沒有對汪精衛友善過，因此，在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中，跟隨汪精衛的改組派如甘乃光、陳公博等就遭到了排擠。

胡漢民和汪精衛兩人，在黨內都有很大的支配力量，他們均以元老身份自居，而年資又高過蔣先生，因此，他們認為自己的派系應佔多數，而蔣先生是少數。但是假使蔣先生的人數和他們相等時，他們就認為是壟斷。

我聽說，對中央執行委員人選，是由蔣先生和胡漢民先生來決定，而我的哥哥果夫只是

執行他們的決策而已。

中央執行委員名單公佈了，黨的元老同志都被選上了。幫我哥哥在組織部辦理黨務的人也有被選上的，如張道藩、余井塘等。當然，其中也有一些新血輪，如果沒有選拔一些有希望的青年，那是不公平的，不能老讓這些年輕黨員替他人抬轎子。

想不到我也被選上了中央執行委員，我是從報上公佈的名單上才知道自己被選上。後來，我哥哥也寫信來告訴我這件事。事實上，我是不夠資格當選的。那時我很年輕，我是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中最年輕的一名。

中國國民黨祕書長任內

民國十八年四月八日，三屆一中全會我被選任爲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任祕書長，是從組織部調查科主任，一躍而升任此職，所以這項任命，對我完全是項意外，那時我的身體還不太好，沒有去參加會議，後來我聽說，是蔣先生和胡漢民先生在雙雙諒解下一起提名的。

對胡漢民先生同意並推荐我，是感到意外，因爲我與胡先生並沒有任何接觸，雖然，民國十五年那段時間，他也正在廣州，可是我們卻從來沒有見過。來到南京，見是見過，但

是，我們之間從來沒有過個人間的交往。我想他之所以推荐我，也許因爲我是英士先叔的姪子，或許聽到我的工作成績。

那一年，我才三十歲，擔任這一重職，實在是太年輕，因此我決定向中央呈請辭職。

四月十一日第一次中常會，胡先生任主席，討論我的辭職案時，決議「電陳立夫同志促其即日就職，在陳同志未就職以前，由葉楚傖同志兼代」（其時葉同志任宣傳部長）。余接電後，再度復電懇辭。四月十五日二次常會，仍未照准，決議再電促早就職，並請家兄果夫去函催促。余三次懇辭，謂絕非自謙，乃自量無能任此重任，懇另選賢能，免誤公事。四月二十九日六次常會，仍未核准。主席胡先生謂待蔣先生返京再與商量辦法。待至五月二十日十三次常會，其時余病已有進步，回抵南京，楚傖先生不肯再代，主席譚組安先生主張速促余到職，胡先生附議。余不便再上呈堅辭，遂列席十四次常會，說明苦衷。胡先生仍主張俟總理奉安後再議。六月二十日第十七次常會，楚傖先生堅辭代理，胡主席力促余即日到職。六月二十四日第八次常會余始允暫遵命就職，其經過如此。

在那一陣子，胡先生對黨務負擔極大的責任。每次，當蔣先生要到前線去時，他總指示我們，凡事要向胡先生請教。當然，那時汪精衛先生已經離開了南京的政治圈，胡先生是黨員中最資深，學識好，對黨務工作又具有濃厚的興趣。

我接任之前，擔任祕書長職務的是王陸一先生，他原是于右任先生的私人祕書，而我那

時候是中華民國建設委員會祕書長，是我學以致用的工作，我非常喜歡做的，此刻亦不得不辭去，接我事的是曾養甫同志，他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亦是國立北洋大學採礦工程科的同班同學。我的調查科科長的工作，也得辭去，此職我交給了徐恩曾同志。

那時我年紀輕，交往的人並不多，所以有工作機會時我只好聘用一些所知道的好朋友。眞的，回顧起當年，那些日子中，每件事都顯得那樣有趣，我以年輕人的活力和衝勁做事，時間如流水，如今半個世紀都過去了。現在的我，做每件事都要考慮良久。

正由於認識的人不多，我接祕書長工作時，祇帶了一個人上任，他是擔任處理半公事性質的來往函件的祕書。其實，這樣對我的工作反而更有益，因爲，大家都希望我能有些作爲；變更一些人事，則反而使人心皇皇，不安於位。所以像我這樣，亦可表示我信任大家。

祕書處中，王子壯祕書在工作方面最爲熟悉，他是山東人，曾經擔任丁惟汾先生的祕書，工作甚久，起先我並不認識他，但我們相處得很愉快。

那時的祕書處要處理所有中央黨部的公文，而各部門的大小事情也都要透過祕書處；同時，不屬各部門管轄下的事，也歸祕書處來處理。而祕書處也是上層與下級公文轉承的中樞，當黨的代表大會閉會期間，全會以及常會在安排議程時，祕書處成爲一個重要的機構，它必須注意重要議案的議程安排，同時，祕書處還得妥善處理所有的決議案提交中央執行委員會和常務委員會的。

雖然，這個單位是中央執行委員會的祕書處，但當中央執行委員會不在開會期間，它也兼任常務委員會的祕書處；另外，還得處理與政府間有關係的文書及事務，總之一句話，祕書處是黨內本身聯繫及對黨外關係的中心。一個年輕而從來沒有辦過黨務的人如我者，的確是一個重擔子壓在肩上，時虞隕越的。

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選舉

民國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召開第一次大會，會中選出了九位常務委員：蔣先生、胡漢民、譚延闓、孫科、戴季陶、于右任、丁惟汾、葉楚傖和我的哥哥陳果夫。

每次召開會議時，由九位委員輪流主持；這不是有所規定，而是一項諒解。

通常，並不是所有委員都出席常務委員會議，例如蔣先生，可能正在前方指揮軍事而不能出席。會中不是每件事都經由投票來決定，除了最重要問題之外，每次在討論結束時，主席會徵詢委員們對提案是否有意見，如果委員會沒有異議，那麼這個提案就算通過了。

凡是關於政策方面重大改變的事項，主席多半會決定採行投票，凡是票過半數，就算通過。

會議紀錄需交由主席簽署，在主席簽署之後，照理應對委員宣讀，看看是否要有所修正，實際上因爲時間關係，這一點每不及做到，而祇能在下次會議開始時宣讀之，如無修正就算成立。

我感到要服侍九位中央常務委員並不是件容易事，因此曾於十八年十二月三十日六十一次常會中及十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八十一次常會中又兩度請辭，我寫信給蔣先生和胡先生，向他們報告，我覺得自己太年輕，無法勝任這一工作。結果，前者批示「慰留勉爲其難」，後者批示「慰留」。竟仍無法解脫。

但是，蔣胡兩先生均認爲我有能力負擔這個職務，反而說服我繼續做下去，他們只告訴我有問題找他們好了，而我的困難之一是：有些太瑣細而又不便向常會提出的問題應如何處理。例如：常務委員會指示執行的一般方針，而祕書處尋找前例，並以常務委員會名義起草方案，雖然祕書處長有這一職責，但是這一文件仍需以九個常務委員的名義來簽署。

看來，每一個案件都必須去拜訪或打電話給全部九位委員以獲得他們的贊同，這是一件很麻煩的事。因此我建議，每天輪流由兩位常務委員代表全體負責執行職權，而輪值的委員應在每天早上九時或十時到中央黨部批閱公文。這樣每件事都可以盡快做決定，將公文辦出。如果他們中有人不同意，則祇能將全案提交下次常務委員會來決定。委員雖有九人之多，等於無一委員可作主，祕書長之責任太大了。

我每天上午八時前上班，這一天的輪值委員通常在九點鐘來，我通常都化費一上午的時間，與常務委員在一起。對我來說這是一個與他們熟識的好機會，當他們審閱案件時，我總是站在旁邊等著，一方面看他們是否需要進一步的資料，一方面我也可以注意到他們的反應和態度，後來他們均認爲應改爲每天由一位常委來輪值，因爲他們都太忙了。

在這段相處工作的時間中，他們都感到滿意，稱讚我辦事有科學方法，我把這一星期中前幾位輪值委員所批閱的公文內容及批示摘要呈閱，使每一常委知道這一週的全般公文情況，我也可以由這些位資深委員處學到很多，而且能夠深深地瞭解每位的個性和特點。現在分述於後：

胡漢民先生

九位常務委員中，胡先生對於黨是愛護的，對於黨務是有經驗的，而且是非常認眞而負責的一位；他對自己應負的責任盡了心之外，也時時提供有力的意見。

在我的觀察中，胡先生是位忠誠的黨員，他已多年獻身於黨，而對黨的主義更作了深入的研究。他是個很嚴肅的人，任何人在他看起來都應該嚴正，他的缺點是言語刻薄，喜歡批評和責備人，因而一些朋友都對他很疏遠；同時，胡先生又喜歡自誇及居功，當他對某件事不贊同時，他會在中央黨部紀念週中公開指摘，因此容易得罪人。

其他常務委員漸漸忙於其他工作，而會忽略了常務委員輪值的責任，但是胡先生總是準時到公。每一個會議，那怕是比較不重要的小組委員會議，他不僅必到，而且永不遲到，這是很令人敬佩的一點。

胡先生在沒有公事批閱的時間，他常與我談天，講許多有關黨的過去掌故，以及當時所發生的事。

舉個例來說：當時外交部長王正廷先生，每逢有外賓來訪問時，他宴請他們，常常請胡先生作陪，胡先生說他沒有分寸，外國小傢伙也要我們院長們去作陪，這是什麼外交部，祇能叫作外「文」部，眞是忘八蛋。我就接了嘴說：「交」字少了個「八」字，不就成了「文」字嗎？忘「八」的外交部，自然成了外「文」部了。胡先生聽了非常高興。

可以說：我相當地尊敬胡先生。

譚延闓先生

譚先生的個性和胡先生完全相反。

他非常聰明，而且雍容大度，可以說是九位委員中最聰明一位。

當他批閱公文時，總是很快決定。古人所謂「一目十行」，我於譚先生始見之。有一次我想試試看他到底是不是眞那麼快就瞭解了公文的內容，我事先將這件公文仔細看了一遍，

當他很快看完一件相當複雜的公文而批示後，我舉出了幾個問題，他的答案充份證明他已完全瞭解了公文的內容，一目十行是一點也不假。

譚先生發現一件時事有重大關鍵時，他總寫信給蔣先生提供一些建議，至於採納與否，則完全由蔣先生來決定，他從不居功及自誇。

每封信他都是自已親筆寫，他的一手顏字寫得非常美好，看他的每封信都使人感到很愉快。蔣先生對譚先生的建議多半會採納，但譚先生從來不會對別人說起那些建議是他提供的。對這一點，我非常敬佩譚先生。

也許有人會說，既然譚先生是那麼聰明，他爲什麼願意屈居蔣先生之下？我認爲，主要是譚先生覺得蔣先生是唯一能夠領導與應付這種複雜而緊急情況的領袖。同時，他一直顧到大局而且反共，在這種情況下，他也同意蔣先生做領袖是最適合的。

後來我聽說，譚先生雖出身於宦儒世家，但幼時極刻苦，因其母生前未穿裘服，故其終身亦不穿裘，至爲孝順，昔人云「忠臣出於孝子之家」，信然也。

戴季陶先生

戴先生也是位非常聰明的人，他對儒家學說十分瞭解，對佛學亦同樣明白，他似乎有志未伸，才從事信佛。他的信佛，對於邊疆民族的工作做得十分成功。他常對我講些很有趣而

又充滿哲理的故事，證明三民主義的思想淵源。當他討論公事時，經常在提出意見前，先以十五分鐘到半小時來談論原則，而且他的意見很多，又有獨到之處，使人折服。我常想，通常像這樣愛說話的人，一定是個思想家，他的腦筋好像是一家工廠，製造了貨品後，必須不斷地銷售出去，不然貨倉中無處儲藏了。

戴先生對蔣先生的幫助很大，他是西山會議派中最年輕的一位，反共徹底。在思想方面爲共產黨最大的敵人，因爲他出版的幾本書，闡明三民主義與中國文化的關係，對反共發生極大的力量。但他對老一輩的人頗有影響力，他在緊要關頭，能信守原則，以歷史事實爲證，說服大衆，發揮他的浩然之氣，例如在西安事變發生後，他的見解爲大衆所敬佩。他是佛家的大乘思想者，我有困難時常常向他求教。

丁惟汾先生

丁先生是位很沈默寡言的人，他不大會說話，也不善雄辯，不過通常他短短的幾句話，必定是中肯而具分量的。

他對黨很忠心，與蔣先生也非常合作。

在中央黨部中，很少有北方來的同志；而北方人，尤其是山東人，他們來到南京，都會去看看丁先生。

我們對丁先生的意見很尊重，一般與北方有關的事情我們都向他請教，他熟悉北方的人物和背景，「大同盟」就是他在軍閥時期所祕密領導的政治組織。在山東、河北，及其他中國北部地區，大同盟是很有影響力的。而實際上，大同盟就是國民黨的別稱，其他如平津一帶興中會、實踐社等祕密小組織，亦經常求教於丁先生，那是在北伐之前，在軍閥統治下的北方，用國民黨名稱不方便活動，而改爲大同盟等名稱作黨的各種的活動。後來經先兄及余提議常會，取消黨的一切小組織案通過後，才一律要求他們自動宣告解散的。在對日抗戰開始時，丁先生的中央政治學校教育長職位，是由我奉命爲之代理的。

葉楚傖先生

葉先生脾氣溫和，是一位典型的文人，喜歡飲酒，在辦公桌旁邊，常常有酒瓶放著。從前他是西山會議派，可是他一點也不積極，他的字寫得很漂亮，也擅長作詩，他的文筆敏捷而流暢，曾在上海辦過黨報。可以說，他有譚延闓先生的風度，但缺少譚先生的積極精神。

他不是個主動的人，但是，當情況需要時，他會很努力工作，而且很負責、很徹底。葉先生是位忠貞的黨員，尤其在對黨義的宣傳上，更有特殊貢獻。在我向常會懇求辭職的兩個多月時間，幸虧有他爲我兼代，否則我非得扶病上任不可，我非常感謝他。

陳果夫先生

他是一位很認眞而且負責的忠黨愛國者。他從二十歲起就患肺病，經常帶病工作，從不爲自己著想，在黃埔軍校開始期間，他對蔣先生幫助最大，例如招生、招兵及一切後勤補給工作，都是在上海軍閥控制的地區下祕密達成的。

果夫大哥每參與一個難題，對我表示他的意見後，通常都要我去向胡漢民先生和譚延闓先生請示。雖然他也是常務委員之一，但他想避免給人一種錯覺，認爲我們兄弟倆能夠決定黨的每件事的印象，況且，蔣先生也曾要我們遇著重要問題時要向胡先生請示。

他對於黨國是十分忠貞的，可惜他沒有受自然科學教育，否則以他的好學深思，當有更大的貢獻。黨的組織規章大半出之於他手，他對於黨的財政策劃有大貢獻，對於中央政校出力尤多。

孫科先生

孫先生非常喜歡讀書。在所有資深黨員中，我想他是閱讀西方書籍最多一位。

他看的書，比較偏重政治、經濟和科學方面的，他常要人替他買美國和歐洲出版的新書；當他對開會厭煩時，就在會場中拿出書來看，關於喜歡讀書這點，他和他的父親中山先

生很像。

我不認爲孫先生的興趣很廣，不過，對他的研究精神我很敬佩。

他不太愛講話，也不輕易表示他的意見，除非問到他；他可以和你坐在一起十五分鐘不講話，不過，對一件事發生興趣時他會發言，而且會越說越有精神，但是他容易發脾氣，不耐煩。

曾經有過這樣一個笑話：

假如你去看胡漢民先生，他將會滔滔不絕，沒有你說話的機會；假如你去見蔣先生，他會聽你說話，而他自己說的比較少；假如你去看汪精衛先生，他將會和你兩人都說得很多，表示得很客氣；假如你去看孫科先生，那他和你都沒有什麼話可說。這是代表四種不同形態的人。

這一笑話中可以看出：胡漢民先生很健談，蔣先生較沉默，汪精衛很會討好人，孫科則不易接近人。而我則與四種不同形態的前輩，常在一起處理公文，不亦幸乎！

于右任先生

于先生是位樂觀、誠懇、豪放，而且處世泰然的人。他是代表北方之強，他喜歡研討事務，是一位極出色的書法家，他的字就代表他的個性。

他是北方一個很重要的革命領袖，特別是在西北地方。他是陝西三原人，對西北的事特別感興趣。在西北，大家都以他爲領袖，如果他支持蔣先生，西北地方的人也都會追隨他的支持。

于先生的家在上海，但每次當他輪值常務委員時，他一定到南京來，是位極有責任感的人。因此，在會議中，他的意見常被尊重。

他有著強建的體魄，聲音宏亮，措詞清楚，給予人深刻的印象。他每每被請在黨代表大會或全會結束時朗讀宣言，他是位既愛黨又愛國的人。

于先生也長時期擔任國民政府的監察院院長；主要是，他是黨國元老之一，再說，中央委員中極少數是來自西北的，所以于先生對西北問題極爲重視。

革命的起源是由南到北，自然革命黨員是南方人較多。人數最多的是廣東籍同志，其次是長江流域的同志，再次才是黃河流域的同志；事實上，黃河流域的人數較少，但對負責組織的人來說，必須注意地域性的全面顧及，以求公允。

他是位不服老的人，他寫字、作詩，最喜歡與年輕人相處，雖然他有將近兩尺長的鬍鬚，但他自己覺得很年輕。我曾問過他，睡覺時鬍鬚怎麼辦，是放在被子裏，還是被子外面？他說：「將鬍鬚打個結，放在被子外面。」

于先生對中國草書非常有興趣，他寫過一本書，名曰《標準草書》。這本書的構想上要

使每個中國人能很快地就學會寫同一草書字體，是本很有用的習字範本。

胡漢民、丁惟汾、葉楚傖和先兄果夫，在黨部的時間都比其他常務委員來得多，他們每一個人對我都很友善，由於我年輕，每當做錯事時，他們都比較容易原諒我的過失，此外，我也單純，在人際關係中，無所謂過去的背景。

擔任常務委員的人，如果沒有在政府機關中同時擔任其他職務時，他可以支領黨部薪水，但是薪水很少，一個月只有三百元。

同時擔任黨與政府要職的情形

那時，大部份黨的中央委員同時也在中央政府中兼任他職，像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只有丁惟汾先生是例外；事實上，我認爲中央黨部中也只有他和我兩人沒有兼任其他職務。

薪水問題，我相信是大家要兼其他職務的原因，中央執行委員與中央常務委員，只能從中央黨部支領三百元的月薪，政府部長則可以支領月薪六百元至八百元。

至於省黨部的主管是否也同時在政府中任有其他職務呢？在北伐時期，地方政府在「黨權高於一切」的口號下都尊重他們，所以他們假此可能也不願意加入地方政府爲官吏，而去

支政府方面的薪給。

民國十七年至二十年這四年間，省黨部的同志隨著清黨工作而非常忙碌，他們忙著設立地方黨部的各級基層組織。於是，地方政府和黨部有了初步的聯合，在這種情形下，有時負責省市政府的人會加入黨，反之亦然。例如潘公展，他就是上海市黨部常務委員，同時也是上海特別市政府的社會局長（民國十六年五月，黃郛受命爲上海市長，潘公展出任社會事務局局長）。

當時，也有些本黨同志堅持黨部人事不應與地方政府混合，因爲在訓政時期，黨應具有議會的功能，一旦黨員參與了地方政府，便不能再批評地方政府。

有一次我代表中央執行委員會，出席江蘇省黨員大會，會議邀請了江蘇省主席顧祝同同志出席報告，顧主席是黨員，同樣的又是代表，當然以從政黨員資格在大會作報告，如果省政府任何部門的機關首長是黨員的話，黨員大會都可能請他提出報告，例如當時的教育廳長亦被邀出席作了報告。換言之，江蘇省黨部具有省議會的功能。

另外也有些人認爲，既然很難找到那麼多適當的人員來分擔組織黨部與組織政府，則何以不讓省市黨部委員同時兼任省市政府官吏，而要向外去求才呢？因此以黨比喻議會，有時是講不通的。

在清黨之後，蔣先生打算把地方黨部的黨員派入地方政府任職，許多黨員都不願如此

做，但仍有些很勉強地加入地方政府。在那時，「那裏有權力，大家就去那裏」。

那時，地方政府事實上並不腐敗，政府只要做錯事，黨部就會揭發它，所以政府是黨在監督，同時在領導人民，沒有人敢貪污賄賂。

其實，那些主張把政府與黨分開的人亦不無理由的，如果我們所有黨員都加入政府，他們就不能再有批評地方政府的權利，因爲這等於批評他自己。這對黨員在地方政府擔任職務並不是好策略，而有壞的流弊。

在訓政時期，黨具有議會的功能，中央黨部與國民大會相當，地方黨部與地方議會相當。如果是這樣，黨肯花錢付給黨員，使他們收入與政府同級人員相等，這樣我們黨裏會有好的人員來管理政府；否則，黨不給予黨務工作人員必要的薪津，而要求黨務工作人員在自顧自給的原則下工作，這是不切實際的，因爲黨員多半是窮的，不易爲黨常盡義務。其結果，有能力的人員將轉入政府服務，那麼，另一種制度將會產生：黨將與政府相抗，而不是督導政府。我們的黨與政府的組織，學自蘇俄，但是我們審度國情，不能完全學他們。

國民黨中央祕書長的工作

身爲中央黨部祕書長，每天我必須花費相當多的時間去接見訪客，幾乎凡是各省市來過

中央黨部的黨員我都見過。這些人我以前並不認識，但是，利用這一機會，我可以對黨內每位活躍份子都認識，也聽取他們的見解。平均起來，我每天要接見二十多位訪客，其中不少是來歸的共黨青年。

各地方黨部的人來到了中央黨部，他們總有問題希望解決，並希望來見見祕書長；即使沒有問題的也會作禮貌上的拜訪，尤其是各黨部執監委員。這樣一來，就和各地方主持黨務的同志有了聯繫。

每次的見面，爲了要了解他們每一個人的個性和情況，我都用相當多的時間聽他們的談話。

我從不拒絕見任何人，而中國人是很奇怪的，如果他們來到黨部不能見到祕書長，他們會很不高興，而且，我還必須顯得很歡迎的樣子見他們，並盡力使每一個人感到滿意。

總之，我的工作儘可能地爲地方和海外的本黨黨員及人民服務；在他們佇留南京期間，我招待他們，或請他們晚餐，從接觸中認識他們、瞭解他們。

我十分努力地工作著，每天，我比其他職員還要早到辦公室，而晚上，總是過了七點才離開，我這樣勤奮地工作，使得跟隨我的部下可眞吃了不少苦。他們有四十到五十人，做的都是專責的工作或是文書方面事務，無人敢遲到早退，辦公紀律自然建立起來了。

對祕書處，我做了番改組，最重要的是文書室，這部門原負責複印、印刷和分類的工

作；我將一種新的印刷方法告訴他們，因此，印刷效率大增，以前只能印刷二百份的，現在增加到了一千份；同時，我也依照我的五筆檢字法改組了祕書處的檔案系統。

以前在調查科工作時，我已經認識了組織部的全體人員；接著，我試著增進各部門的合作來增進工作效率。譬如，當祕書處收到有關組織部的公文，我會將副本送組織部，如果文件牽涉到其他有關部門：如青年部、婦女部等，我就將資料副本送一份到青年部、婦女部並附上字條，說明組織部門將會直接與他們聯絡。這一方法最大的好處，在使各有關係的不同部門都會很快得到來文的消息。

對這一連串提高效率的措施，在黨部施展開來後，地方黨部就對中央黨部的工作效率非常讚賞，對這一點，我自己也非常滿意。

我和我哥哥討論著如何促成全國統一的方法，以及一些待解決的問題。

我們第一項工作，是公布我們的想法和中央政府有關的新聞，尤其是要使非中央控制地區的人民知道。就以四川來說，在名義上四川省是歸誠了中央，實際上並沒有眞正統一。基於此，我們決定：㈠在中央黨部建立一個廣播電台，等電台設立了，然後我們再試著以合理的價錢出售收音機，這樣可使收音機聽衆逐漸增多；㈡製作與國家政府有關的影片，並分散到偏遠地區。用這兩種方法，將可使各地人民能聽到、看到中央政府的種種設施，而破除封建障礙。

我們的廣播電台在亞洲是很具影響力的，其電力比日本和蘇聯的電台還要大。設立的經費主要是海外華僑的捐款。從海外華僑來的捐款是很踴躍的，他們捐款給中央黨部、中央政府、財政部，以及其他任何他們所想到的機關，這種捐款，由於錢十分地分散，有些甚至遺失，因此我哥哥就建議由中央黨部設置專門委員會來接管這些捐款。

管理海外華僑捐款委員會首先請林森先生擔任會長，因爲華僑多數認識他。委員會開始整理已收到的捐款，同時編列預算，予以運用。譬如南京城內最寬的中山路就是由這筆錢建造的；再如中山門外修建陣亡將士公墓，也是由這筆錢支付的；再如上海無線電收發機製造廠經費的一部份亦在內，廠長是由李範一擔任的。

我們計劃建立一個電影攝影棚，後來由於經費的缺乏而沒有實現，雖然拍攝電影是一件非常費時間和金錢的工作，不過我們還是引進了中國的奧斯卡獎勵制度。而且組成一個電影教育協會，提供年度獎金頒給每年在教育內容及意義上最傑出的三部片子，因爲，既然我們自己缺乏經費去製片，也只有鼓勵民營影片的製作了。

身爲中央黨部祕書長，每當我一看到與國民政府有關的事，我就將之送交並列入中央政治會議的議程中。

至於我是否有權把這些事送交到中央政治會議的議程中提出呢？有的，因爲只有最重要的案件才會交給定期開會的中央政治會議常會，案件並不多，一星期平均六、七件，至於其

餘的一些瑣碎案件，我就直接將它們由中央黨部回覆給國民政府。

黨內年長的政治家，大多數安置在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以表示對他們的尊敬。中央監察委員會的作用，在於監督中央執行委員會，因此，中央監察委員會享有較大的威勢，因爲他們有權列席參加常務委員會及執行委員會，而有懲戒黨員之權，所以他們不會有被冷落的感覺。

在南京的西山會議派

支持南京政府的西山會議派，指的是張繼、鄒魯、林森諸位老前輩。民國十四年十一月在西山開會時，他們曾另有組織；但是，一回到黨內，他們就沒有任何組織，因爲他們唯一的目的是反共。

西山會議派的成員，無可諱言地，他們都是好朋友，不過，他們絕沒有個人的野心，而當年在西山的集會，主要的目的是反對共產主義。當我們也反對共產黨時，他們就沒有理由再持續這一分立的組織了；同時，在清黨時期，西山派成員的反共，給予我們很大的幫助。

這幾位老先生，雖然手中沒有軍隊，沒有任何實力，但是，他們的聲望、社會地位，以及影響力是很大的。蔣先生對他們極爲尊敬，雖然他們可能反對過他，但是，蔣先生依然以

禮相待。

對蔣先生來說，很多過去的事是要忘記的，所謂「不念舊惡」，這點在中國社會中也是絕對必要的。蔣先生非常守禮，對他幫助很大。他很注意細節，每當宴客時，他一定事先視察座位的安排；如果座位排錯了，他會非常不高興。有一次宋子文因爲在某一集會中被排在一個比較低的位置，而憤然離座。所以，蔣先生雖然有很多重大工作待處理，但是他仍然很注意這些小事情。

說起來，西山會議派是缺乏現代組織技術訓練，但是他們擁有高度的精神，以及對黨和對國家的熱愛；對一個黨來說，僅有正式的組織是不夠的，精神更是重要，在這方面，他們對黨的幫助就很大了。

這幾位老先生和蔣先生都保持友好關係，他們中有人生病了，蔣先生就會去電報問候；假如有人有了困難，蔣先生立即會送錢去，而過年時，他一定一一去拜訪。

對一位領導者來說，要洞悉每一個人過去的種種關係是很重要的，當問題來臨時，可以運用某個人私人關係去辯白、去疏通，這是很重要的。

針對這點，蔣先生就常請張繼到北方去替他協調，因爲，張繼老同志是位很好的北方政治家，他爲人坦率，更堅決反共；這位好好先生曾在民國二十四年突然衝出抱持行刺汪精衛的兇手，其勇敢有如此者。我與張繼老同志很熟，他是位眞正的革命份子，也是個學者，我

很欽佩他。

每當北方人來到南京訪問時，他們一定會去拜會張先生，就如同山東人來了，一定會拜訪丁惟汾先生一樣；無論是張繼或是丁惟汾，他們都是黨國的元老，對黨、對國和對孫先生都深具信仰，對黨尤具忠誠。

擔任中央政治會議祕書長

民國十八年六月我接任中國國民黨祕書長不久，於十九年十二月中央常務委員會便任命我兼任中央政治會議祕書長，此後又於三十六年四月兼任此職。

中央政治會議是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委員會的簡稱，這是黨內設立以研究政策的單位。凡是有不直接與黨有關而是與政府有關的重要問題，都交由中央政治會議來處理。

一開始中央政治會議是比較單純，慢慢地又設立了內政、教育、財政、經濟、外交和其他必要的小組委員會以研討特殊問題；而中央政治會議的決策並不直接交給政府，仍須經由中央黨部常務委員會。這些決策或是包含在常務委員會報告事項之中，這類案子常委就不需要進一步的討論，唯有極少數列入會議的議程裏，經常委會討論後，再作最後決定，然後由常委轉交國民政府，常務委員通常是廣泛地計劃出政策範圍，而不是釐定政策執行的細節，

每當與外界交涉時，總是常委會以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名義來做最後決定。

蔣先生是中央政治會議的主席，他要出席每一個會議，如果他缺席，可以指定人代行主持；在聽完議程中的每一項討論案而有了決定之後，主席命祕書長立即宣讀決議。會後，主席自己也詳閱其中的每一部份，而予以簽字，十分愼重。

一般說來，蔣先生有權指定任何人來代替他做主席，有時他也讓出席政治會議的委員互相推定一位主席，如果胡漢民先生出席的話，委員們經常推他代主席；如果他也缺席的話，那就要推請其他委員代理；如果蔣先生在南京不能出席時，經常會指示誰是代他擔任主席；如果不在南京，他經常讓與會的委員們決定。後來政治會議委員漸漸採取輪流主持這一會議，而大家也都樂於擁有這同於主席般的特權。

當蔣先生不在南京時，中央政治會議的決議，如果是不很重要的，我通常是將它送給蔣先生和其他擔任主席的常務委員，但是遇到很重要的事，我就會發電報給蔣先生；如果蔣先生不同意這一決議，就會提出來再作討論，不過這種情形是很少發生的。

在我出任中央政治會議祕書長以前，身爲國民黨祕書長，我就經辦關於政府事件的文件，中央政治會議祕書長的工作比較簡單，主要的工作是會議的籌備工作，例行性公事並不多。狄膺、胡翰兩祕書幫我準備議程工作，我有時指導他們翻閱舊檔案並找尋先例，經由我們的有系統整理、分類排印，使得每一位委員都有一份特別案例的資料及所有先例的報告

書，如果遇到重要案件，我就必須在案件提出前，將議程送給蔣先生看，如有指示，就設法報告若干委員，使之照指示通過，當決議案整理就緒後，必須經過中央政治會議主席的核閱，並以得到他的簽字爲憑。

說起來，中央黨部祕書長的職位遠重於政治會議祕書長，因爲中央黨部祕書長有左右事情的影響力，不僅是在政治上，而且對整個黨部都有這種力量，同時我還要間接監督黨內的其他組織單位，而中央政治會議祕書長就沒有其他單位需要指揮的。

而中央政治會議的重要，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它所討論的都是重要的立法原則及政策問題；二是與會的人都是重要的人物。雖然中央政治會議的決定是不會公布，而是要呈給常務委員會，每當案件在送交國民政府做最後執行前，經常有被洩漏的危險，故保密是非常重要，因爲新聞界一知道了，一定會到中央黨部各單位設法去採訪，而不去找政府部門的人。實際上中央黨部雖然如此重要，但是卻不需要如此對外鋒芒畢露，我們的黨究竟是後台老闆，應該試著把重要性轉移到政府方面去公布才對。

中央政治會議通常在星期三召開，而常務委員會在星期四開會，行政院則在星期一召開院會。原則上，政府的決定應該在星期二日報上發布，可是消息經常在中央政治會議開完會後竟就會洩漏出去，這樣一來，政府的宣布反不如中央政治會議的決定受人重視。照理說，黨部應該在幕後，政府在幕前，但政府的宣布應該具有影響力，而人民卻不注意，因此，我

們決定要增加黨部決定的保密性。

黨、政、軍的權力

蔣先生擔任國民政府主席，胡漢民先生任立法院院長時，國民政府是十分重要的。在早期的南京政府，許多事情劃分並不清楚，當時正在試行新的五權制度，這也就是國民政府之所以重要的理由之一。

擔任國民政府委員的人選，通常都是由國民政府的主席推荐給中央政治會議，經通過後再轉送到中央常務委員會，我亦被選任國民政府委員之一。

那時當政府的兩部之間有爭論時，就委付行政院出面解決；而兩院之間的爭論就交給國民政府；國民政府委員每個星期開會一次，不論國民政府委員會能否解決兩院之間的紛爭，這一紛爭都會被送到中央黨部再轉交中央政治會議的。

國民政府委員會在重要的立法上也有發言權，他們討論那些將被實施的法律和條例，然後再送到中央政治會議上去研討並決定根本方案，再依程序送交中央常務委員會處理，中央常務委員會通過後，再經由國民政府轉交送還立法院。

民國十九年九月二十二日，行政院院長譚延闓逝世後，蔣先生在那年的十一月二十四日

接掌行政院。

蔣先生接掌行政院後，我開始擔心一種情況會發生，因爲如今沒有一位能在蔣先生和胡漢民先生之間居中協調的人了。而胡先生一向是敢於批評任何一位他認爲做錯事的人，如今當胡先生批評指責行政院時，他一定會直接責備蔣先生了。

不可否認，行政院在蔣先生任院長時地位非常重要，新聞記者都注意到了這點，當然這一情形，主要的是一個強有力的領導者，無論他走到那裏，權力就會跟到那裏，權力就掌握在最後的決定人手中。

說到黨與軍事有關發展的聯繫情形，主要是這樣，只有最重要的軍事情況才在每週的中央政治會議上由蔣先生以主席和陸、海、空三軍總司令的身份提出報告，大部份的軍事問題則由軍政部部長向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全體大會提出報告，主要的內容是有關過去的發展或是預測未來的動向，由於保密的關係，要報導軍事策略是很難的。

中央政治會議也有權決定一個軍事計劃的，譬如民國二十二年的十一月，當第十九路軍在福建叛變時，就將他們的指揮官革職，軍政部長也是由中央政治會議議決指派，中央政治會議也有權通過軍事條例，但軍事政策通常很少在事先討論，以保機密。

對蔣先生所報告的軍事行動，政治會議都會支持，如果有不贊同時，那麼情況就很嚴重，因爲如果反對軍事行動就意味著戰爭，從軍事觀點來看，軍事行動的意見紛歧和不合就

是內戰。

軍事在黨之下，這只是手續，嚴格地說，黨要控制軍事是很因難的。中央政治會議下是沒有機構掌理軍事事務，雖然有一個軍事委員會，但力量是有限的，因爲主管的人並沒有權力。

其實，這一切最重要的還是人事問題，如果黨、政、軍的領導者是同一個人，就不需要爲軍事問題向黨的政治部門作報告，這是自然的結果；同時中央政治會議的委員們也並不要去知道有關軍略的事。當然，如果一個並不是很重要的人管理軍事，情況就會有所不同。

關於經費問題，情況是：國民政府的每一機關部門，將預算送到國民政府的主計處，民國二十年以後，由我的三叔陳藹士主持。

主計處是一個專門的機構，它的決定必須送到國民政府委員會，預算草案必須送到中央政治會議，然後交財政委員會，一項一項討論後，再送回中央政治會議，中央政治會議通過後，再送到中央常務委員會，接著送回國民政府；這是一套繁複的過程，常常需要花費幾個月的時間才能通過所有必須的過程。

軍事預算是包括在全部政府預算中，某些情況下，軍事人員決定後，要減少一些是很困難的，同時也有筆特殊軍事專款，這是爲了軍事目的使用的儲備金，因爲有許多祕密軍事用途可以動用這一儲備金。

敉平十九年的叛亂

民國十九年的四月，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等，爲了裁軍問題聯合反叛南京政府，而以閻錫山爲總司令，爲了敉平這一叛亂，我們動員了在北方的黨員。

我們採行的方式是以破壞行動來抵制叛軍，大家建議以馬超俊爲北方地下人員的首領，當時汪精衛也到達北平與叛逆合作，而馬先生是最反對汪精衛的。

委員們要求常務委員會任命馬超俊爲一祕密的華北黨務特派員，他尋找了許多方法來對抗閻錫山和汪精衛所聯合組成的擴大會議；每當閻與馮的軍隊需要老百姓支持時，而黨的公告是要百姓不要幫助他們，同時黨員們也以很多的行動去阻礙敵人的軍事行動。譬如，使火車出軌以延誤軍事運輸和後勤支援，對馬超俊來說，這一工作做起來並不費力，因爲他一直與勞工階層接近，在勞工運動中是頗有名的。

這次，蔣先生能夠勝利，主要原因是他能在十九年的秋天擊敗敵軍的主力，同時能使張學良從背後襲擊叛軍也有功。不過，這也可以說是蔣先生的勝利，因爲是由於他的努力才爭取到張學良的協助。

時事月報及政治評論的創立

《時事月報》的性質，我們是以美國的"Time"月刊及法國的"Lo Mois"月刊爲典範，有系統分析國內外重要新聞和科學進步等問題。

我任發行人，陳民耿是編輯。編輯部的同仁全是著名的專家學者和社會名人，例如梁敬錞（和鈞）在編輯部工作，專寫財經方面的文章。

這本雜誌受到了歡迎，曾發行了一萬一千份，是國內第三大雜誌，僅次於商務印書館的《東方雜誌》和中華書局出版的《新中華》。

當我任中央祕書長時，曾和果夫大哥一起創辦《政治評論》，由鄭亦同同志負責經營，他是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資本是由我們三人提供。

在這本雜誌裏，我曾用「陳正」筆名（「正」字是「LF」二字所合成的「立夫」之英文縮寫）寫過一篇文章，內容是暗射到楊永泰，題目是〈政客官僚之復活與國民革命之危機〉。結果，楊永泰看了極不高興，到處打聽陳正是誰；後來他知道是我所寫，他也清楚文中所指的政客官僚就是暗指著他。

事實上，楊永泰所做的正和我所形容的官僚政客伎倆相符合，以盡逢迎之能事；所以，楊永泰知道我在抨擊他，其實，在他來之前，蔣先生用的都是年齡較輕的人，他來了之後就開始重用老年人，也開始用非國民黨籍的人。

《政治評論》的創辦，目的是促進一個理想，就是喊出：「一個主義」、「一個領袖」。我們使蔣先生會成爲黨的名實相符的領導者，因爲那時所有的麻煩就是由於這黨沒有眞正的重心，所以「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的狀況才會造成，這也是全國對內對外所最需要的一個條件。

成立正中書局

民國十九年，我與吳大鈞同志組織成立了正中書局。

剛剛開始，正中書局的規模很小，投資的資本也只有四千元，全由蔣先生爲破譯密本所獎賞而來的錢辦起來的，由我任發行人。

一個理想支配了我們的報紙、雜誌和出版事業，那就是文化宣傳對黨的工作是很重要的，最初正中書局只限於出版黨的書籍和資料。

民國二十年，我覺得一個人的力量有限，是不能同時做很多的事，所以，我把正中書局

交給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祕書處經營辦理。黨增了資，並且退還我們所投的資金額而保留了我們的股權，這樣一來，正中書局的資本就寬裕得多了。

民國二十四年，正中書局開始出版中學教科書，在上海設立分銷中心，再邀請著名的教育界人士在各地成爲我們的代理商；第二年，又在武昌和長沙成立兩個分銷中心，在上海建立了印刷廠。

不久，我們接到一張訂單，要出版蔣先生的日記、西安半月記，以及蔣夫人對西安事件的回憶錄；這三本書，每一種都銷售了五十萬本，眞是一筆驚人的大生意。

後來，中央黨部將轄下的三民出版社和正中書局聯合經營，三民的印刷在南京很有名，是「第一號印刷」；正中的印刷在上海也有名，就成爲「第二號印刷」了。

正中書局既奉獻與中央，成立董事會，但中央仍以董事長任命我，總經理仍爲吳大鈞。其營業範圍日漸擴展，抗戰軍興，西遷至重慶者，唯正中書局而已。大後方採抗戰建國並重之方針，故學校有增無減，教課用書之供應，全賴正中，正中對國家之貢獻亦以此一時期爲最大，此爲余化私爲公之效果也。

臨時約法之爭

民國十九年的十月，蔣先生呼籲制訂訓政時期臨時約法，這時，我看出來蔣先生與胡漢民先生之間有了爭執。

胡漢民當時身任立法院院長，他認爲任何有關法律的問題，他都有最高的權力，雖然他感到有很多立法的工作要做，但是臨時約法的頒布時機還沒有成熟。

而胡先生的勢力很大，只要黨能控制局面，他是黨的領袖，就能保有很大的勢力，假如黨的重要性減少了，政學系的成員也許能提高他們自己的地位，而這些正適合政學系的方法──他們只想用手段利用他人提高自己的地位，我曾經聽張羣先生說過這樣一句話：「黃埔集團有槍械做後盾，CC派有群衆做基礎，政學系只不過虛有其表，實際上什麼也沒有。」

臨時約法的施行將會提高人民的地位而降低了黨的地位，政學系自然贊成利用人民的地位去直接減低國民黨的權力，間接用以和胡漢民對抗。但是提高人民的地位也正就是國民黨的政策，經訓政時期朝向憲政時期邁進的程序，只是時機是否成熟而已。

對這長期的爭論，我的看法是：臨時約法的公布太早了些，嚴格來說，在訓政時期即使

要公布臨時約法，是應該以建國大綱中有關訓政時期應做的工作納入約法，使黨與民衆齊心協力以達成之，這才是明智的舉動。孫先生在建國大綱中說得十分清楚，在進入立憲階段前先由縣行使自治，當一省所有的縣到達這一階段後，各省才準備成立自治政府，而當過半數的省到達自治政府成立時，全國才能進入憲政時期，而孫先生當初的設想就是訓政是要由下層逐步向上發展到整個國家，至爲清楚的。

對這一問題，我始終有著懷疑心，因爲我們從來沒有照著孫中山先生的建國大綱去做，如果確實照著做了，也就不會失敗了。最基本的工作是訓練人民在縣內先行使政權；換言之，選舉他們自己的政府官吏，制訂他們自己的法律，但是這點也被忽略了，沒有一個人知道一個縣如果要實現孫先生所規定的地方自治需要多少時間。

我對黨決定在民國二十年召開國民會議的看法如何呢？國民黨在名義上統一全國，這次會議的目的在獲得人民的正式認可孫中山先生制訂的建國三程序——軍政、訓政、憲政之三個時期。換句話說，得到人民的肯定：「邁向訓政並計劃訓練人民行使自治的能力。」

在一次會談中，胡漢民先生提議我任代理國民會議祕書長，他一向對我很照顧，不過，那天我心中正有些火氣，我說：「我不想當代理祕書長。」說完，我轉身就走了。

胡先生對我的舉動非常驚訝，後來別人告訴我，他覺得非常疑惑；其實，我當時只是覺得茲事重大，無法勝任這一工作，不含任何政治意義，我是很少發脾氣的，但竟然和胡先生

發生這一小誤會，眞是遺憾。

粉定了汪精衛、閻錫山和馮玉祥的叛變後，蔣先生在軍事上是獲得了勝利，但是他也接受了他們的意見，決定制訂臨時約法，但是胡漢民先生卻認爲這時來討論臨時約法是太早了。

在蔣先生這一方面，要制訂臨時約法是政治性的決定，這一舉措的基本意義是以此來解除那些想鼓動黨外支持的人。就我的瞭解，黨內有野心的人都不願追隨孫先生的遺教，當這些人不能位居黨的高位時，他們就尋找黨外的力量來反抗黨；其實，他們不是反對黨，而是反對蔣先生，也可以說這就是蔣先生必須博取民衆的擁戴以解除其他人的政治威脅。

對此，胡漢民先生採取了更強硬的態度，由於多年來與汪精衛爲敵，無論汪的主意是什麼，胡先生就是反對，他堅持：蔣先生聲言要制訂臨時約法但卻沒有經過黨的通過，這是錯誤的。

從胡先生的觀點來看，蔣先生只是一名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委員，以黨的風紀角度來看，胡先生是沒有錯的，假如我是一個法官的話，就法律上來看，我要說胡先生是對的；就政治上來看，蔣先生是對的。

我看到這情形不好，我在胡先生批閱公文後，對他說：中國歷史上，最了不起的時代，爲伊尹相太甲，周公相成王，二者都以年長者輔助年幼者成大業，這充份表示公而忘私，故

孟子稱伊尹爲聖之任者也。我的意思是希望胡先生效法伊尹周公以輔佐蔣先生成大業，勿以元老自居，彼似領會，而不料仍受政客之撥弄而出此亂子。

監禁胡漢民

由於胡漢民的反對提早頒布臨時約法，使得蔣先生就用這一理由監禁了胡先生。我想這必然是一項有計劃的行動，只是蔣先生事前並沒有對我說過，也許他認爲我與胡先生太接近了。不過，我對胡先生一直是很尊敬的。

在當時，楊永泰是很接近蔣先生，以往在廣東採取七總裁制的時代，政學系一向很反對胡先生，他當然亦不例外，有機會就要與胡先生算舊賬，他認爲胡先生是國民黨的代表，對付胡先生就是對付國民黨。

要知道楊永泰是怎樣一個人，從政學系的領袖李根源對楊的批評可以見之。李在蘇州作寓公時對人家說：「楊永泰好比我們雲南的煙土，吸了它覺得很舒服，上了癮就不容易擺脫它了，吸久了就會中毒。」楊是一位道地的政客，他見蔣先生時，常對於重要問題，攜帶了正面和反面兩種方案，他先探探蔣先生的意思，如果蔣先生偏向正面的，他就呈上正面的方案；反之則呈上反面的方案，以迎合蔣先生之意旨。這種逢迎的政客伎倆，國民黨員都不會

的，而且不屑爲的。

事實上政學系是沒有正式的組織，但他們的組成份子都保持很密切的聯繫，他們不做低層工作。他們將力量集中在高層，盡力研究蔣先生、研究汪精衛，想盡辦法來逢迎領袖及他身邊重要的人，這一做法目的是贏取信任和好感，然後再運用這些權勢去實現他們的計劃和他們的目標——取得重要而正式的官位及發財。

當時楊永泰和政學系常常提醒——或可稱爲挑撥蔣先生，說他的缺點是缺乏完全的自由意志的發揮，因爲有很多像胡漢民一樣的黨國元老限制住了他，由於他們一再地火上加油，更誣指胡先生是策動軍隊的人；也許廣東的軍隊和劉峙是和胡先生關係相當好，但是我相信胡先生不若汪先生，是不至於直接去做反叛蔣先生的事的。

劉峙是河南省政府的主席，民國十九年到二十四年之間，河南省政府的秘書長張廷休是胡漢民的人，楊永泰就指說他是胡漢民派他到河南的組織聯繫和接觸者。事實上，劉峙是江西人，他認識同鄉張廷休也有一段長時間了，而張廷休的就任祕書長職務也不是胡漢民所推荐的。

至於所謂胡漢民和許崇智暗中串通一事，我的瞭解是，蔣先生曾經在許崇智下面工作過，所以當民國十九年九月十日，蔣先生解散他的軍隊後，他自然不滿意，廣東人是比較容易本土化的，不過對胡漢民和許崇智來說，都無力量來與政府作對的。

有一天晚上，蔣先生從他的臥房走到浴室，看到一個站在靠近他房間的守衛，神色慌張，行動鬼鬼祟祟很不正常的樣子，蔣先生立即懷疑這人想暗殺他，因此命令侍衛長將他逮捕，並交給戴笠偵訊。後來查出這人和溫建剛有關係，而溫是一個粗魯而沒有法律觀念的人，當時他擔任南京公安局的局長，而與胡頗相熟。

對蔣先生指控胡漢民破壞政府，我的看法是這樣的，就像我所說的，胡漢民在中央執行委員會是最值得信任的一個委員，但是他在紀念會上公然揭發政府行政的缺失，因爲他覺得他的立法院院長身份地位是和議會議長相等的，但是政府官員卻誤解了他的意思，大家都感到憤怒。

我想，要是譚延闓還沒有去世的話，胡漢民的被監禁就不會發生，因爲譚延闓就是調停各集團糾紛的人。

胡漢民的被監禁，我認爲：

㈠胡漢民公開譴責和批評政府，他批評他所認爲不對的人，而且中傷他們，這就是爲什麼當他受到監禁時沒有人爲他辯護的原因。

㈡楊永泰與胡先生的交惡，遠在中山先生在廣州時，曾一度行七總裁制時就開始，他認爲胡漢民聯繫軍人的行動是有陰謀的，而這事最能觸怒蔣先生，而爲挑撥的最好機會。這是胡先生喪權的主要原因。

㈢蔣先生認爲胡漢民的演說與行爲時常阻礙到他，當時，蔣先生認爲胡漢民的任何對政府的批評都使他感到不愉快，因爲，蔣先生負有很大的責任。再說，當大家偏向胡漢民時，也就表示大家遠離了他。說來這是一個權力鬥爭，而蔣先生是大權在握的人，自然不希望任何人限制到他。再說，當時國家未達成統一，胡先生的一些作爲也會導致麻煩的。

胡先生被監禁的那天晚上，只有我大膽地替他說話。

那天晚上，所有中央監察和執行委員，都被邀請到蔣先生的軍校官邸開會和晚餐。當時胡先生就被監禁在他的家中，沒有出席，其時參加的諸委員知道了這消息，沒有人敢說一句反對話。會一開完，我就拉著葉楚傖先生一起去看蔣先生，葉先生一句話也沒有說，我力勸蔣先生就此罷手，千萬不要走極端，何況胡先生已經引退，如果再予以監禁是不妥當的，蔣先生回答我說：「已經做了，就沒有辦法再掩飾了。」

我始終覺得奇怪，爲什麼沒有一個人替胡先生辯護。

黨國元老們一方面是怕，不敢說話；另一方面，胡先生由於喜歡譴責和批評，和這些元老們都疏遠了。再說，他與許多黨員的關係也都不好。

想想看：我竟然天眞地向蔣先生提出異議，因爲，我很重視及憂慮次日報章雜誌上對於監禁問題的解釋，我認爲如果這一事件給人有不良的感覺，對蔣先生亦有不利。

以後誰來代替胡先生成爲最負責任的中央常委呢？無疑地只有蔣先生了。

胡先生的被監禁，對國民黨有沒有影響呢？

雖然胡先生是一個對黨政非常負責任的人，但他並沒有企圖安置心腹在各地方黨部。他偶爾推荐個把人，但並不是很堅持，如果認爲他所推荐的人不當時，他也從不生氣。在這一方面，他與汪精衛作風不同，他是紳士作風，而汪精衛是有他的班底，有他自己的組織的——改組派。胡先生有追隨他的黨員，但並沒有組織，因此他被監禁，對黨內的低層幹部的影響並不大。雖然許多同志爲他的監禁抱屈，但這種情緒並沒有產生很大的衝突和困擾。

胡先生的被監禁會不會導致孫科、林森及其他領袖的脫離南京政府？

民國二十年五月，廣東方面先後有通電要蔣先生下野及成立「中央執監委員非常會議」與「軍政府」等異動，這多少與這件事有關。因爲廣東方面的反對者大都是廣東人，廣東的離異不是好現象，這正意味著黨部的分裂與遭遇挫折，不過從軍事觀點來看，並不是很嚴重的事，因爲，蔣先生剛剛平定閻錫山和馮玉祥的亂事。

不過在南京影響就比較大，元老黨員在言論上就更加謹愼，大家認爲胡先生的失敗，主要就是言詞太尖酸刻薄，元老政治家們都記取這一教訓，從此講話就更小心了。

國民會議

民國二十年五月五日至十七日，在南京召開國父遺囑中所要求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的國民會議，茲將會議中的重要事項及決議案概述如次：

國民會議出席代表四百五十餘人，提案三件：㈠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草案；㈡確定教育實施之趨向；㈢實業建設程序案。五日舉行開幕式，由蔣主席致開會詞。六日，出席代表及中央委員、國民政府委員等五百餘人，由蔣主席領導，在狂風暴雨中謁國父陵，隨即行宣誓禮。

七日舉行預備會，選出主席團九人，除由本黨推定一人爲于右任委員、國民政府推定一人爲張學良委員外，其餘七人在七日舉行之第二次預備會議時，臨時主席于右任報告票選結果爲：張繼、戴傳賢、吳鐵城、周作民、林植夫、劉純一和我；候補者爲彭濟羣、丁惟汾、胡庶華等三人，隨即由主席團報告推葉楚傖先生爲祕書長，他請我幫忙，於是我的工作就形同副祕書長了。

八日開第一次大會，討論約法；九日開第二次大會，決議「廢除不平等條約」案，並推

定陳布雷、邵力子及劉蘆隱等起草宣言。

在十二日舉行的第四次大會中，三讀通過了「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十三日第五次大會通過「接受國父全部遺教」及「確定教育設施之趨向」兩案。十四日第六次大會中通過「實業建設程序案」；並決定嚴重警告陳濟棠，促其悔悟，以確保全國和平統一。

在十五日的第七次大會中，通過七要案兩電稿，並決定中華民國二十年六月一日爲訓政時期約法公佈施行之期。在本次大會中同時通過昭告全國擁護和平之議案。

十六日會議中，通過臨時動議，用大會名義嘉慰蔣先生；在國歌未制定前，暫以黨歌代替國歌。在同日舉行的末次會議中，並通過大會宣言，其內容包括下列三要點：㈠接受國父全部遺教；㈡廢除不平等條約；㈢擁護和平統一。

國民會議於五月十七日閉幕。蔣主席在閉幕式致詞時，曾強調下列各點：㈠鞏固統一與遵守法治；㈡確認民生爲建國之首要；㈢培養民族之毅力；㈣推行教育設施；㈤安定地方秩序；㈥完成地方自治。

國民會議並發表撲滅赤匪宣言。

這次的國民會議有好些優點：它顯示出國民黨不再享有特權，這點使得非國民黨人士也容易參與政治；同時，國民會議的政治氣氛要比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中所寫的濃厚得多。

不過，從表面上看，國民會議雖似不錯，實際上，這個會議的舉行並沒有替一般百姓帶

來很多的益處。

國民會議通過了訓政時期臨時約法，因爲這一約法已經成爲蔣先生和胡先生之間的爭論中心，所以會議中，大家也就全力支持。

會議舉行期間，胡先生仍然被監禁在南京，許多代表打算去看他，不過都被勸阻了；想去看他的，都是一些年老的黨國元老，雖然他們去看胡先生，只是從人情方面帶去安慰，不過當局卻想到，這次會議主要是討論臨時約法，萬一在看望中，這些人被胡先生所勸動，可能會在會議中引起不安和騷動。

說起來臨時約法的好處，該是當人們眞正需要臨時約法之時，它將保障人民的權利。但假若與領導階層有了衝突，它也就成爲他們的利器，用以對抗那些違抗臨時約法的人。嚴格說起來，如果臨時約法早通過，那麼胡先生就可依法向蔣先生提出質詢，爲什麼拘束他的自由。

事實上，蔣先生並沒有公開地定下胡先生的罪名，他僅僅只是寫了一封信給胡先生而已。

我的中國字分類系統

我完成了中國字分類的系統。

將中國字找到分成幾個主要的式樣，即所有的字不管是直的或彎的，都是從一個點開始；連續的點連成一直線，連續的線或直線的運動通過空間成爲一個平面；平面通過空間的運動形成一個立體；凡一立體有三個坐標，而文字只需兩個坐標，橫的和垂直的。當一個點橫地向東移動形成一個筆劃，我把它稱爲「劃」；當一點垂直地向南移動，我稱它爲「直」；從一點向東北方向移動，這就叫「剔」；向東南移動就是「撇」了。由一線從中心向下移到左邊形成的，在第二象限中，如果一直到底又轉向西北方就叫做「鈎」；由一點向東南移動則叫做「捺」。

我的中國字的系統減少到五個基本的筆劃：點（包括捺）、橫、直、斜（包括剔與撇）、曲。凡有兩個方向的筆劃，都稱之曰「曲」。這比張靜江先生所用的十多個筆劃來分類要簡單得多了。

不久，我已用了五個筆劃系統（、一丨ノフ），使我對中國文字語言的奇妙構造得一有

系統的分析，以此方法來找字，是非常進步而容易的。我相信我們的文字在它發展的過程中，已經重新經過幾番整理工作，因爲我的檢字法，從有系統的字的分類上就可以看得清楚了。

中國文字，較任何其他文字的分類爲科學化，例如：凡有關金屬的字都有金字旁，同樣地，任何事物與木有關，也必包含了木字旁。兼採用形與聲，不是自然成長的安排，無疑地是由人力改良和重新組織而成的。

西元前二二一年到二〇九年，秦始皇曾有計劃地焚燬了書籍，使當時六國的文字復歸統一，雖然我不敢說那時文字已開始有系統的改進，但我確信在某個時期，我們的文字分類已經有了很大規模的整理。

有那一種文字能有我們的科學化特性呢？就以英文來說，金屬的物質有金(Gold)、銀(Silver)、銅(Copper)等等，這些字彼此都沒關係，雖然有很多字是源於拉丁文而來的，但是拉丁文是不是一個非常有系統的文字，我不清楚，可是我們的文字卻不同，銀、銅、鐵、錫等都是金屬的一種，一看字也就知道它是屬於金屬的了，因爲它的邊旁就有金字。所以，我們的文字是眞正地奇妙無比。又如「菜」這個字，有「艹」在上面，表示它屬於「艸」科，在下面有「采」字表示聲音，可以說，沒有其他的語言是如此地科學化的分類了。

應用我的系統排列法，我在五個基本筆劃下重疊一下，就產生了二十五個部類，例如，

在點之下，我們依據下列的次序排列：點點、點劃、點直、點斜、點曲。如果一個電報是何應欽發來的，它要歸入丿｜（斜直）類的檔案抽屜內，在丿類的第四個抽屜內去找、丿類（、是應字第一筆，丿是欽字第一筆）即得。

我寫了一篇中國字分類的文章，將中國字分成四組：天、地、人、物。在「天」組之下，有上、下、左、右、前、後、風、雨、光、聲、日、月等字，任何與風有關的字就有「風」當它的邊旁；在「地」組裏，我們有金、木、水、火、土等字樣；在「人」的分類下，裏面有「首」、「眉」、「目」、「舌」、「手」、「足」等；在「物」組裏有動物方面的魚、虎、馬、牛、羊等字；在植物方面我們也有草和竹等字；在礦物方面又有石、玉、土等。除了複體字之外，大多數的中文字都在這四類之中。

我寫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是由於很多人批評我們的文字難學，現在我要證明兩點：第一，證明中國文字是所有文字中最方便和容易學的，是符合科學的；第二，證明中國文字是文法最簡單而不難了解的。

在研究筆劃時，我發現中國文字有一個特點，在英譯時，一、兩頁的英文，可以用一頁餘的中文來充份表達；中文的文法也相當簡單，不像德文有陰、陽、中三性，時間上也沒有什麼困難。此外還有一個特性，就是能把字用在不同的地方，或當名詞，或當動詞，而無須加字碼以分別之。

這篇文章只是一個初步的草圖，可是，民國十八年時我卻在車內遺失了一隻手提皮包，當時把這篇全稿放在裏面，化了不少時間而前功盡棄，使我感到好失望，情緒也大爲低落，我意興闌珊地，不想再做這一工作了。

我是一個做事小心的人，很少遺失東西，這是我第二次丢掉東西，第一次是在民國十三年，在美國卡內基工學院宿舍存放行李而被竊了的。

遺失的雖只是一篇文章，可是，在當時對我來說，遺失的卻是興趣和那份熱心。

蔣先生辭政府本兼各職去甬轉杭休息，我仍留京供職未隨行

民國二十年五月，國民政府召開國民會議討論約法後，豫、鄂、皖、湘、贛、閩各省赤禍竄擾爲虐，中央正全力清剿；而粵方先後於五月二十五日由唐紹儀領銜通電要蔣先生下野，二十七日，唐紹儀、汪兆銘等十六人在廣州成立「中央執監委員非常會議」，二十八日，汪兆銘、李宗仁等背叛黨國在廣州成立「軍政府」等反對行動；不久又繼之日本關東軍在東北瀋陽發動「九一八」事變，侵佔我中華各重要城鎭，內憂外患，國難當頭。

蔣先生於同年十二月十五日向中央臨時會議中請准辭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長及陸海空軍總司令本兼各職，去甬轉杭休息，有望粵方捐誠團結，共赴國難。

我那時任中央組織部部長與中央各同志互謀國是，仍留京供職未隨行。

4

民國二十一年春至二十六年夏

與共黨折衝時期

同時積極策劃準備抗日措施



絶處逢生

我任政府公職後，航空事業已逐漸發達，因此有幾次搭機公幹，都遭逢空中危險，但所幸均能化險爲夷，平安的降落地面，此應是上天保佑，「絶處逢生」吧？

記得我最早的空中歷險是民國二十一年一月初，這時正是豫、鄂、皖、贛、閩各有赤禍猖獗，而日本關東軍自侵佔瀋陽後，又相繼進奪長春，逼攻熱河，內憂外患，國難日亟。此期適逢蔣先生下野，中樞頓失憑依；於是京粵雙方代表召開上海和平會議後，先後到杭會晤蔣先生共謀國是，同時，中央開會決議敦請蔣先生復出視事。

我受命搭機去杭，向蔣先生面陳中央決議案，促其速歸，共商大計。

那次我坐的是教練機，共容兩人，駕駛員在前座駕駛，我則坐於後座，由於是教練機，故機艙沒有頂蓋，因屬特急事件，乃臨時以教練機專程送我到杭州。那位駕駛員名喚石曼牛。

飛機航行尚未接近筧橋時，忽然陰霾四佈，雷電交加，頃刻之間下起大雨來。此時，雨點飛打在臉上好痛，天空又一片混沌，電光閃在眼前，下面灰茫茫什麼也看不見，我和石駕駛員都嚇呆了，因爲油料已快耗盡！在十萬火急中，後來總算露出一線視野，才冒險緊急降

落，著陸後我鬆了一口氣問他：「如再無法降落會怎麼樣？」他餘悸猶存的說：「祇要再盤旋五分鐘不著陸，油一耗盡，飛機就會栽下來，我們也就必死無疑了！」

堂弟旣夫不幸空難，死於非命

這回飛航歷險過了不久，我的堂弟即英士叔的長子陳旣夫（吾叔尚有一次子名惠夫，民國七十三年才過世），生性很衝動，愛國心也很強。他受了「九一八」事變的刺激，決心從軍投考空軍官校，大家勸他不要去，但其去志已堅，無人能動搖他，於是他便從上海到杭州，去投考空軍官校。

事有湊巧，在行程中的火車上，他便遇到那位駕駛教練機的石曼牛先生。由於兩人是隔桌對坐，便交談起來，在談話中石曼牛獲知他是我的堂弟，就提及爲我駕機去杭州的往事。無形中兩人的關係更拉近了。

石曼牛告訴我堂弟，他是空軍資深教練，願意帶他去報考官校。到了筧橋，依照規定，未經法定訓練的學生是不准參予飛行的，但石教練因和堂弟旣夫關係非同尋常，便在一次飛行教練中，擅自帶他升空飛行。

在那次飛行中，有兩架教練機同時起飛，石曼牛的飛機在前，另一架教練機在後，豈料

後機螺旋槳竟撞上前機尾部，飛機失去平衡便墜毀地面，我的堂弟和石教練，便不幸死於此次空難事件！

我家發生此次不幸悲劇後，令我直覺的感到那位石曼牛先生好像和我家有一種孽債，他是來向我們索債的，避不開！逃不掉！他載我飛杭州時，雖然在僥倖中我能逃過一劫，卻想不到事隔不久，我的堂弟執意投考空軍，卻又在火車上「冤家路窄」不期而遇，復因堂弟家世和我曾先後同搭石曼牛飛機的淵源，導致駃夫弟以英年之身，死於非命，誠令人慨嘆命運之捉弄人。

我一生很少有什麼忌諱的事。譬如有一次我自美國返國，適逢中國航空公司「處女航」第一次飛抵中國，我即順便搭此機返國。

臨行之前，大家都勸我不要搭「處女航」的飛機，那會有危險，我卻不爲所動，偕內子按既定計劃搭機起飛。中途經夏威夷加油，許多華僑親友都到機場歡迎我們，不料內子下機時一腳踏空，竟摔了一跤，扭傷腳踝，後來祇好換機飛回上海。一個人離開家門，常會碰上一些意想不到的事，幸與不幸，常在頃刻之間，有時候眞教人會聯想到那是在無識無知之中，冥冥中的一種命運的安排。

主持土地委員會

民國二十三年一月，四屆四中全會，我與先兄果夫、蕭錚等提本黨土地政策綱領案。經決議，併會中另提之實行土地政策與請迅速施行土地法，以及同年二月全國經濟委員會，在中央政治會議提爲擬具土地法施行步驟各案，先後由中央政治會議研究討論。當經決議：㈠由全國經濟委員會、內政部、財政部合組土地委員會，先將各省市土地實況於六個月內爲比較的有系統之調查，再行擬具辦法，請中央政治會議核定。㈡所有四中全會及全國經濟委員會，分提有關土地問題各案，彙交該委員會研究，並於同年八月中央政治會議第四百十九次會，推任我爲土地委員會主任委員，主持其事。

我奉命任土地委員會主任委員後，即組織成立土地委員會，由高信、張廷休分別擔任處長，唐有壬爲祕書，秦汾學長則代表經濟委員會盡力協助，乃動員全國各縣市本黨同志，完成全國土地調查工作，其經過情形，詳見我所著〈我的創造、倡建與服務——九十憶往——〉文中，茲將我對該工作之感想分述如下：

本黨自有組織以來，動員黨員爲政治宣傳及行動而盡力，乃屬常事，唯爲經濟政策，蒐

集實施材料以作立法之依據而動員黨員，則以此土地委員會之土地調查爲創始。其範圍包括二十二省八百十餘縣之廣，其時間連統計工作在內，佔一年又三個月，動員黨員親自下鄉工作者逾一千人，我當時年僅三十四，苟不兼任本黨組織部部長，絕不能擔負此一艱鉅任務，苟非全體同志之戮力從公，亦絕不能順利完成此一偉大計劃。

當時本會經費極少，無力購置計算機，乃利用各機關在不辦公之時間不需用之僅共有不到二十架之計算機借用十餘架，在晚間運來次晨運回盡「廢時利用」之情況下，如是者三個月，機器幸無損壞，四十餘種數字，全部精確統計出來，工作同志由上而下，莫不興趣高張，效率超越，可稱國民政府中前所未有之工作方法，若在今日，則可以電腦計算機代之，無庸如此苦幹與窮幹，唯精神勝物質之觀念，由此而更信其可能，則爲當時之所得實證。

本會當時大多數內勤外勤人員，均爲兼職，稍予津貼，加工無酬。唯均能不辭勞苦，日夜以赴者，蓋咸知此一工作，爲推行本黨之土地政策之基礎準備工作，爲人民幸福所寄，故欣然爲之。由此可知所謂「志之所向，其趣自至」之言，實有至理。黨員互稱同志，必先知其所同者爲何志，無志之人而妄稱同志，不亦名不符實乎？黨以大志領導黨員，而不以利，然後事無不成。蓋入黨者原以救國救民爲其理想，而願犧牲一切以求志之實現。

本黨革命之初，即採「平均地權」爲政綱，以資號召，經二十三年之期間，始有時間作基層之調査統計工作，以作土地法修訂之依據，已覺遲晚。復以日寇侵略之期迫近，日夜以

全力準備軍事抗拒，未遑奠經濟設施之基礎。及抗日戰爭開始，更無暇晷顧及土地問題，且土地淪陷幾及其半，雖有善法，亦無如之何矣。白色帝國主義之阻撓，實予赤色帝國主義者以機會，以「土地改革者」之名，掠奪人民所有之土地，使國父耕者有其田及平均地權之偉大理想，無從實現，實爲本黨之莫大恥辱。唯吾人深信耕者若不能有其田，雖以武力強迫，終難達成提高生產之目的，人民日日在飢餓死亡線上度生活，其能不鋌而走險推翻此一政權者，其可得乎？吾人今日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爲最大號召，仍需以「耕者有其田」，使農民起而擁有土地。

建議兼外交部長汪精衛對日方針

民國二十四年間，行政院院長汪精衛兼任外交部長，其時日本侵華之野心日益顯明，汪令其次長唐有壬及高宗武司長應付之。一日我進謁戴季陶先生請教我方對日應採之方針，戴先生認爲若不從大方針以轉變日本之侵華政策，零星應付，絶難生效，拖拖時間尚可。我問戴先生是否可去日本一趟，對日本元老重臣方面做些工作，俾知中日戰爭之後台爲蘇俄，將來萬一中日戰爭爆發，必致兩敗俱傷，得利者爲蘇俄。戴先生笑謂我曰：「這是一件極艱鉅的工作，主管外交者並沒有派要員前去日本，誰會請纓負重。」我聽了覺得戴先生並不是不

肯去，而是中央沒有意思請他去，我於是去晉見汪先生，面陳所見，以中日戰爭之促成者爲蘇俄，藉以拆散軸心國家之聯合，並以解除蘇俄被東西夾擊之危險。我國之對策，應使日本方面採北進戰略，毋使西進，並予以便利，使兩虎相爭，互耗國力，以解除中日戰爭之危機。汪聞後，認爲不易改變日本西進之政策，亦不圖作不可爲而爲之嘗試，我亦不便再推薦戴先生，失望而歸！我始知汪先生非一大政治家，旋轉乾坤，必須具有大理想與大魄力，方有成功希望，若汪者僅能用唐有壬之輩，走後門，施小惠，中日戰爭，不能避免矣。

刺汪案之迅速偵破

戰爭愈來逾近，內憂外患，紛至沓來，此時若干重要問題，必須召開全會商洽，依本黨慣例，每屆大會或全會開幕之前，必先謁總理之陵，然後回中央黨部開預備會議，會後攝影以留紀念。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本黨四屆六中全會照例攝影，正在攝影時，汪精衛突然被刺客狙擊，背脊中彈，幸無大礙，刺客爲一通訊社記者，當場被衛兵槍殺，搜其身上，祇獲出入證一枚，爲孫鳳鳴所有，經晨光通訊社所領取者，凶手已死，查究較難，而此次最大之特殊情況，爲蔣公未參加照相，於是謠言四起，有人疑係有政治背景，有人則認爲主戰份子不滿外交之懦弱而出此（時汪兼外長）。汪夫人陳璧君女士，則公開在中央黨部揚言

謂：「蔣介石每次參加照相，何以此次不去參加。」衆說紛紜，幾成政潮之起因。唯此次蔣公何以不參加攝影，因從陵園返黨部，感覺精神欠佳，故未予參加，不料竟出了大亂子，事雖巧合，但終感有理說不清。

是日傍晚，蔣公即召我前往，謂此案必須立即徹查，早日破案，澄清謠言，以防政局有變；並問我破案需要多少天？此時，我對本案雖已命徐恩曾、戴笠著手查究，唯刺客已死，通訊社久已屋空無人，絲毫無確實線索可循，竟大膽答允蔣公試以一星期爲期。辭出後，首由孫鳳鳴入黨表上介紹人方面著手推究，凡與其直接及間接有關者，一一傳問，卒於鎮江附近拘獲其同謀者賀步光、張明英等人，承認刺汪不諱，從黨員入黨介紹人找關係以破案，此爲第一次。

當時中央黨部對於此案組成專案小組委員會，陳璧君亦爲委員之一，乃將人犯交由該委員會審訊，始知謀刺汪者，爲汪之小組織中份子，因汪登台後，置彼等生活於不顧，忿而出此，該案眞相大白，一場風波平息。在全國一致對外之情勢下，內部倘因誤會而發生破裂最爲不利，幸我迅速設法偵破此案，前後僅五天時間，使蔣公洗刷誣名，因而，蔣公對我嘉勉有加。

準備抗戰招撫共黨——周恩來給我昆仲的一封信

抗戰尚未開始時，積極從事準備工作，中央政治學校全部師生決定從南京遷到江西廬山，再遷芷江，最後遷至重慶郊外小溫泉。當政校遷離南京，前往廬山時，教育長丁惟汾辭職，蔣委員長命我代理教育長。在代理期間，學校遷往廬山，那時我向學生們講演三民主義六小時，但是僅僅幾天，我就被蔣委員長派到新疆去了。因此我代理政校教育長的期間是很短暫的。

蔣委員長派我到新疆去是有原因的。早在抗戰以前，他就要我做兩件工作：

第一，要我和中共交涉，萬一中日戰爭爆發，中共應及時發表宣言，共同抗日。

第二，要我和蘇俄交涉，一旦中日戰爭掀起，中蘇兩國要站在同一戰線。

關於第一項和中共的交涉，是祕密進行的，因爲若被日本人知道，很可能會提前發生戰爭。民國二十四年九月，我們於剿匪期間，在陝北一帶圍剿中共的殘餘部隊，周恩來就開始煽動學生，促進中央政府抗日，張學良也受他們的影響跟著唱高調，責備中央政府爲何不抗日？其目的要把放棄東北的「不抵抗將軍」的頭銜轉移給蔣委員長，其實，蔣委員長早在積

極準備中，爭取時間，非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若非抗戰不可，亦決不能處於被動地位。由於，延安一帶隨時會有被消滅的危險，因此周恩來寫信給我大哥果夫和我，希望我們政府不要再圍剿他們，他們願意聽中央，和中央共同抗日。其信經香港黃華表與曾養甫兩同志轉來，其原文如下：

果夫
立夫 兩先生：

分手十年，國難日亟。報載兩先生有聯俄之舉，雖屬道路傳聞，然已可窺見兩先生最近趨向。黃君從金陵來，知養甫先生所策劃者，正爲賢者所主持，呼高應遠，想見京中今日之空氣，已非昔比。敝黨數年呼籲，得兩先生爲之振導，使兩黨重趨合作，國難轉機，定在此一舉。

近者寇入益深，僞軍侵綏已成事實，日本航空總站，且更設於定遠營，西北危亡迫在旦夕，乃國共兩軍猶在敵對，此不僅爲吾民族之仇者所快，抑且互消國力，自速其亡。敝方自一方面軍到西北後，已數作停戰要求，今二、四兩方面軍亦已北入陝甘，其目的全在會合抗日，蓋保西北即所以保中國。敝方現特致送貴黨中央公函，表示敝方一般方針及建立兩黨合作之希望與誠意，以冀救亡禦侮，得闢新徑，兩先生居貴黨中樞，與蔣先

生又親切無間，尚望更進一言，立停軍事行動，實行聯俄聯共，一致抗日，則民族壁壘一新，日寇雖狡，漢奸雖毒，終必爲統一戰線所擊破，此可敢斷言者。敝方爲貫徹此主張，早已準備隨時與貴方負責代表作具體談判。現養甫先生函邀面敘，極所歡迎，但甚望兩先生能直接與會。如果夫先生公不允分身，務望立夫先生，不辭勞悴，以便雙方迅作負責之商談，想兩先生樂觀事成，必不以鄙言爲河漢。臨穎神馳，佇待回教，專此並頌

時祉

周恩來　九月一號

（民國二十四年九月收到）

與中共交涉時，我方代表是我和張冲，中共派代表是周恩來，這項談判，必須有第三國際代表參加，那就是潘漢年。他們兩人必須先得到我方的安全保證，始肯來上海，我方並由張冲任聯絡員。那時候的情形，我們原則上好像是接受中共投降，在他們只要我方停止剿共，提任何條件他們都可以接受。日寇一日侵華，就是給他們復活的機會，條件隨時可以食言，到了那時候，我們自己抗戰不暇，他們不打日軍，我們也難對他們作有效的約束及處分。我們知道他們怎樣想法，他們也知道我們會怎樣做法，因爲他們一向不守信諾，能欺騙人家，就算是他們的能幹，但是爲對外必須表示全國一致抗日起見，我們要求他們在戰爭爆

發以後，即需發表共同抗日宣言，表示全民一致，其內容須包括下列四點原則：

㈠為徹底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

㈡取消一切反政府之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㈢取消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受軍事委員會的統轄，擔任抗日戰爭之任務。

㈣取消蘇維埃組織，改為行政區，以期全國政權之統一。

這四項原則，中共當然同意，後來周、潘二人由我們招待至南京居住，由我直接和他們談判，使他們更為放心。經多次磋商，宣言及條件的文字都已大體談妥，周恩來就想回延安覆命，我命張冲陪他去西安，順便往見張學良，由周口中說出，我們雙方對共同抗日，大致已有協議，以免張學良再唱抗日高調，藉以保存實力。潘則留京滬續洽，不料事隔幾天，西安事變忽起，當時張冲、周恩來都在西安，外人罕知其原因為何？其共同抗日宣言在七七事變後，於同年九月二十二日公布，此後他們就設法擴展軍力，不眞心抗日，此次國共交涉，開始時間是在民國二十五年。

赴蘇聯之行與蘇交涉始末

由於周恩來致果哥與我之信中，蔣公與我等立即看出中共係受蘇聯之指使而出此，蓋蘇

聯之國策爲㈠拆散軸心國家（德日義）之聯盟；㈡在東方促使中日兩國之戰爭，在西方促使德法之戰爭，俾蘇聯不致東西受敵而可保持中立；㈢命中共向蔣公投降，俾蔣公無內顧之憂，益增抗日之決心；因此，我受命與中共與蘇聯同時進行交涉。

民國二十四年聖誕節之前夕，蔣委員長就派我赴蘇俄進行祕密交涉，我向來沒辦理過外交工作，初次嘗試，深感惶恐。領袖授以機宜，並囑我此行必須絕對保密，故均用化名的護照，我化名李輔臣，張冲化名爲江融清，於聖誕節前夕乘德國郵船 Posdam 啟程，同船有赴德上任的程天放大使及隨員，二等艙中則有曾經聽過我在該校講演的電雷學校學生二十多人，準備赴德進修的，由上海至馬賽航程十幾天，保密工作幾乎不可能，但是畢竟在周詳的計劃下達成了。唯一知道我們在船上的是程天放大使，但在船上也不便和我們來往，船經香港、曼谷、比寧、新加坡、錫蘭、蘇彝士運河、埃及、義大利而到法國馬賽，中間要經過八個檢查站，每次旅客都要到甲板上排列點名，我則喬裝戴墨鏡，但我的白髮難以掩飾，此外，我則蟄居艙房，託詞有病而不出門，飲食用品，一律送到房中。

由於每到一碼頭，旅客必須到甲板上供人檢查，差不多要經過半小時的時間，極易暴露身份，在無計可施下，我想出了一個辦法，我教張冲先去站在頭排第一個，等到點過名後再拿我護照站到排尾最後一個，如此也就每次被混過了，原因是檢查人員臨到最後被檢查人時，往往心力俱疲也就馬虎了。

在旅程中，每到一處，等別的旅客都上了岸去遊覽了，我們倆才上去遊覽一下，匆匆遊完儘早趕回，如在新加坡、比寧、錫蘭雖上岸遊覽，在路上卻未碰見熟人，一直到了埃及，保密工作做的都很成功，在此期間，程天放先生都是利用船上電話和我聯絡，有一天，同船的中國人在船上開同樂會，大家說：「怎麼這兩位李先生和江先生總是不出來呢？」有的甚至想衝入我的房間看個究竟，我便請程大使設法阻止他們，這些人懷疑的說：「房中這兩個中國人行蹤詭密，是否「滿洲國」（日佔領下的東北）派到德國去的？程大使乃告訴他們說：「他們都有病，大家不要去騷擾他們！至於同樂會每人應分攤的錢他們照出，祇是不能參加晚會。」就這樣在船上一關一關的過去，總算未露出馬腳。

船到馬賽，上岸很麻煩，在檢查護照時，全都集合在一大廳中，我要張冲先生先去，到最後一名我才去，在大家疲困情況下，我也就安全過關。回到艙房，我們多給茶房一點小費，代爲我們找一旅行社，我們悄然乘夜火車去柏林，乃能始終未暴露身份。

經輾轉到了德國柏林，我和張冲在市中心一家出租的房間住下，離中國大使館較近。程天放先生則去大使館就職，此時希特勒當政，特工密布，安全可慮，蔣委員長來電要我們在柏林等候行止，電報都經由程大使轉來，何時進入俄國，要待情況演變決定，並曾電示我們：「爲時尚早，可先到法國、瑞士、義大利一行」，每到一地，都住最高貴的旅社，那是爲了要避人耳目，因爲這類豪華旅社，中國人是不會去住的，我們都是白天蟄伏，晚上出

來，去逛夜總會，或看電影，如此更不易見到熟人。

此後又轉到匈牙利、捷克，我們也住進當地一家最豪華的旅社，但此地（捷克）大使是梁龍先生，他發現這兩個中國人一姓李，一姓江，究竟是什麼人呢？何以不來使館報到呢？派員來查訪後，便知道我們兩個中國人，是經過此地，馬上要走的，恰巧這兒正舉辦一項展覽會，中國也派人來參加，於是便邀我們一同吃飯，爲了怕洩密，不去又盛情難卻，我祇好派張冲去，推說我有病不便參加，並代表向梁大使謝謝，由於他不認識張冲，故眞象未被揭露，我們乃迅速又遷往另一旅社，藉以掩飾行蹤。此時復接電示，仍要我們繼續等候，於是又去了馬賽，不料在此卻碰到一個中國人，此人是酆悌先生，他是黃埔一期學生，我私下叮囑他說：「我們出來很祕密，你不能告訴任何人，如有洩密情事你要負全責！」隨後我們到匈牙利和南斯拉夫，乃至奧國等歐洲小國都去了，最後仍回到匈牙利等候命令。

有一天，中國駐土耳其大使賀耀祖先生來匈牙利說：「現在情勢不佳，風聞日本已推測蔣委員長派陳立夫啣命到蘇俄去，蘇俄獲悉甚感不安，深恐引起軸心國家對蘇發動戰爭，故蔣委員長已令我轉告不必去蘇俄了。」於是赴俄之行便因此打消。

我出國期間，在國內中央各種會議，報端未見登載我出席的消息，已啟外間疑竇，幸好我先準備了親筆信十幾封，由內子從杭州郵寄南京親友，告訴他們我在杭州養病，每隔幾天，寄出一封信，所以還能保住祕密，但是在日本方面，還是放出試探的謠言，說我被派赴

蘇俄，蘇俄對此消息，極爲害怕，恐怕軸心國家因此而早日聯手制俄。蔣委員長乃不得不改變計劃，命我返國與蘇俄大使鮑可莫洛夫在南京交涉，我就和張冲同志分途返國，以避外人耳目。我經奧國維也納，南斯拉夫而達希臘，渡海至以色列的首都海法，再從「甘如」搭荷蘭KLM班機抵新加坡，再搭貨輪去上海，不料該輪到達香港後，奉命先經日本裝煤，抵埠，幸未被日本海關上船的檢查人員發現，否則我的使命，將被日本人暴露，那就不容易解釋了。

民國二十五年，我和蘇俄大使鮑可莫洛夫在南京交涉，我們希望和蘇俄訂立軍事同盟，使日本知難而退，唯鮑大使認爲萬一日本侵略我國，蘇俄受軍事同盟之約束，就得協助我國攻打日本，唯若蘇俄正在協助我抵禦日本時，日本可能和德國聯盟進攻蘇俄，則蘇俄勢必兩面受擊，因此鮑大使認爲軍事同盟對他們增加危險，於是談判未能達到預期目標，遂退一步商談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在交涉期間，我曾問鮑大使曰：「一個三民主義之中國與一個共產主義之中國何者對蘇俄比較有利？」鮑大使對此一問至爲驚奇，認爲當然後者爲有利，我告之曰：「你錯了，三民主義才是共產主義的最好朋友，你想一個五億人口的國家，一旦共產化了，還能聽兩億人口的國家指揮嗎？」鮑大使遽然醒悟，以我言電告其政府，此後乃談到軍援的實質問題了。其實我們要和蘇俄訂互不侵犯條約，旨在使蘇俄不要乘中日戰爭而幫助中共，當時中蘇交涉，是由我經辦的，但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卻是由外交部長王寵惠代表我

國簽字的。附互不侵犯條約原文。

中蘇互不侵犯條約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
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政府　爲欲對於一般和平之維持有所貢獻，並將兩國現有之友好關係鞏固於堅定而永久的基礎之上，又欲將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七日在巴黎簽訂之非戰公約中雙方擔任之責任重行切實證明起見，因是決定簽訂本條約，兩方各派全權代表如左：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特派外交部長王寵惠；

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特派駐中華民國大使鮑格莫洛夫；

兩全權代表業經相互校閱全權證書，認爲妥善，約定條款如左：

第一條

兩締約國重行鄭重聲明，兩方斥責以戰爭爲解決國際糾紛之方法，並否認在兩國相互關係間以戰爭爲施行國家政策之工具，並依照此項諾言兩方約定不得單獨或聯合其他一國或多數國對於彼此爲任何侵略。

第二條

倘兩締約國之一方受一個或數個第三國侵略時，彼締約國約定在衝突全部期間內，對於該第三國不得直接或間接予以任何協助，並不得爲任何行動或簽訂任何協定，致該侵略國得用以施行不利於受侵略之締約國。

第三條

本條約之條款，不得解釋爲對於在本條約生效以前兩締約國已經簽訂之任何雙面或多邊條約對於兩締約國所發生之權利與義務，有何影響或變更。

第四條

本條約用英文繕成兩份。本條約於上列全權代表簽字之日發生效力，其有效期間爲五年。兩締約國之一方在期滿前六個月，得向彼方通知廢止本條約之意思；倘兩方均未如期通知，本條約認爲在第一次期滿後自動延長二年；如於二年期間屆滿前六個月雙方並不向對方通知廢止本條約之意，本條約應再延長二年，以後按此進行。

兩全權代表將本條約簽字蓋印，以照信守。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一日訂於南京

王寵惠

鮑格莫洛夫

在進行中蘇交涉時，我們了解，蘇俄希望這場戰爭是我們和日本打，德國和法國打，而蘇俄不捲入戰爭，其目的是明顯的，因此我們向蘇俄提出軍援要求，不會被拒絕。並且希望在戰爭期間能由他們繼續支援我們各類武器，例如飛機、坦克、高射砲、大砲等，都在交涉時把武器的數量、運送的時間簽訂妥善。因爲一旦戰爭爆發，沿海各港口，均不能用，其唯一的路線就是新疆，後來我被派往新疆與盛世才督辦商洽，如何將汽油運至沿途各站，以供應此類重武器之需用，俾能及時補給我軍抗戰。此外，在這次交涉中，並要求蘇俄一旦中日戰爭爆發，不要以武器幫助中國共產黨，以免我們「腹背受敵」。我那一句警語，確使蘇俄在戰爭中，沒有幫助中共，後來蘇俄忽然又與日本訂了互不侵犯條約，而我方在戰爭後處理游擊隊之政策錯誤，爲淵驅魚，壯大了中共，蘇俄遂又食言以助之。

西安事變

我奉命與共黨周恩來及第三國際代表潘漢年商談共同抗日問題，即萬一日本侵略戰爭開始，中共應發表共同抗日宣言，商談內容有四點，大要前已言之如下：㈠服膺三民主義；㈡服從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之指揮；㈢取消紅軍，改編爲國民革命軍；㈣取消蘇維埃組織。

在西安事變前幾天，我奉命准周恩來經西安去延安覆命，由張冲同志陪其到西安，順便同往見張學良，藉以告張我人談判經過大要，俾知中央有抗日之決心及準備，以免張學良以

抗日為號召，藉以保存實力，故在西安事變前，周與張冲之所以均在西安者，其原因在此。

事變發生，中央連夜召開緊急會議，其結論如下：㈠對張楊採嚴厲態度，依據歷史教訓，凡元首被挾持，中央態度轉弱者，元首必被害，故中央決意討伐；㈡令何敬公主持討伐軍事，迅速入關；㈢其他有助於蔣公出險之一切措施，齊頭並進。我就根據第三項與曾養甫兄商定，立即請杜桐蓀同志趕赴上海約潘漢年來京，次日即令潘致第三國際一電，大意如下：「張楊之叛變劫持蔣委員長，全國軍民均不齒其所為，蔣如有不幸，中國失去抗日領袖，日軍可極容易佔領中國，此將於蘇聯為最不利，國民政府採嚴正之態度，以應此變。」

再次日又去一電如下：「昨電諒達，周恩來同志如尚在西安，擬請立即去電令毛澤東及周恩來兩同志影響張楊，協助蔣委員長出險，此則於中蘇兩國均有利也。」

兩電用密碼（潘之密碼在我處）發出，由南京與莫斯科直通之電台拍發，次日接第三國際復電大意如下：「潘漢年同志：兩電均悉，所見甚是，已電令毛澤東、周恩來兩同志遵照執行。」

我見此復電，心為之稍安，及蔣委員長返京，我自機場同至委座軍校官邸，蒙委座召見於床側，我急急問曰：「周恩來在西安態度如何？」答曰：「甚好。」我又建議說：「中央軍既已入關，似可乘機攻佔延安。」委座俯首不答，我見其甚倦，即告別而出，唯念潘漢年之兩電已發生效果，心中甚慰。

接見日本議員訪問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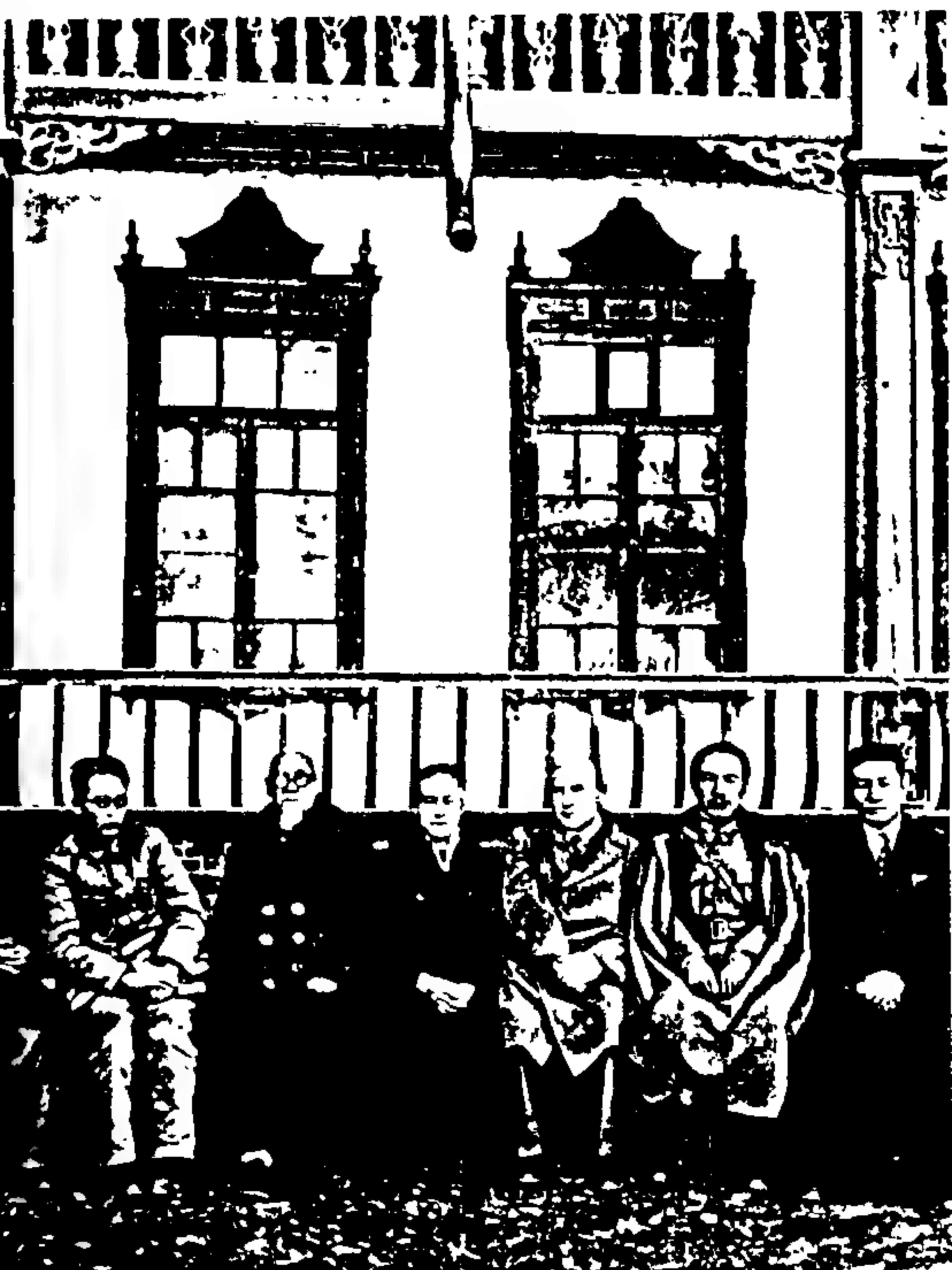
民國二十六年春季，日本議員訪問團一行十五人前來南京，堅欲訪我，我於常府街寓所以茶點款待之。寒暄畢，我問之曰：「諸君之欲訪我，是否因報章所載，我為主張抗日最烈之一人？」彼等俱大笑，我續告曰：「我為反共最烈之份子為大衆所熟知者，若今復為抗日最烈之份子，豈非妄自尊大到了極點乎？我今有機會正告諸君，反共是確認共產主義絕對不適宜於中國，從理智方面以反對之；反日是由於貴國不以兄弟之邦相待，而以強凌弱之態度對待我們，使我們為自衛計，不得不反抗，是從情感方面以反對之。情感隨時可以回復，互信互愛，而理智信念一成，難以更改，日本如不明白挑撥我們雙方者為蘇聯，而必須自投羅網，我可預言中日戰爭之結果如何以相告，請諸君記錄下來（若干議員出其手冊記之）。貴國將被資本主義者所控制，中國將被共產主義者所控制，兩敗俱傷，一無所得，故希望貴議員先生均能以全力制止貴國少壯軍人，毋被他國所利用，而自誤誤人，並請查閱孫中山先生『大亞細亞主義』之演講辭，以明中日兩國應循之途徑，則幸甚矣。」我明知當時日本少壯軍人之橫暴，非彼等少數議員所能為力，但亦應使知未來之結果。戰後日本破獲一大間諜案，為少壯軍人受蘇俄之煽惑，使之侵華，但大錯已鑄成矣。民國五十年我經日本，議長高橋宴我夫婦於其寓所，有蔡孟堅同志在座，我將戰前接見議員訪問團之經過告之，高橋嘆曰：「其命矣夫，以後不宜再錯才是。」

5

民國二十六年秋至三十四年夏

全力推展戰時教育時期

自民國二十七年初就任教育部長，
在此七年之中，
撫輯流亡學生，重振後方絃歌，
擴展各級教育，改革並建立制度，
發揚民族文化，
訓練並徵調學生直接參加抗戰工作，
全力推展戰時教育。



抗戰開始答新聞記者之問

七七事變之次日，政府已決定抗戰，是日我去組織部上班，中外新聞記者十餘人已在部長室等候，見我來到，美國記者驚奇之態度爭先問曰：「中日強弱懸殊，如何能抗日？」我曰：「你們美國人，應諳美國歷史，如果依照你們的看法，則美國今日猶爲英國的殖民地矣。華盛頓在Williemburg起義時，僅憑幾十枝亂槍，與英國駐軍之武器相比，有天壤之別，華盛頓所憑藉者爲民意，民意是看不見的偉大力量，遠勝於槍桿子，其所以最後勝利者，民意爲之也。今日本侵略中國，全國民意主張抵抗，蔣委員長順從民意以抵抗之，故今日之問題不是『能戰不能戰』而是『應戰不應戰』，應戰則雖打到一兵一卒仍須頑抗，美國之獨立戰爭，最後得法國之援助而成功，焉知我國之抗戰，亦將獲得他國之援助而戰勝敵人乎？所謂『得道者多助』是也。諸君之估計僅從物質一方面作比較，是錯誤的，須知精神道德之力量，實較物質的力量大得多多，北伐戰爭，以少勝多，此乃一可證之近例也。」我復將北伐經過史實爲之告，記者聞之，俱記錄而退。

抗戰初期任軍事工程團團長

抗戰時期除上要教育工作外，另值得記述的，是我應軍事方面的要求，組織「軍事工程團」，在劉河與嘉定之間築一條碉堡線，以阻日軍之西進，那時日本人已佔領上海，準備往西進攻南京，爲阻止其前進，必須有一線堅固之機槍陣地足以延緩之。因不久以前，我曾發起組織「國父實業計劃研究會」，集合京滬一帶工程師，根據國父計劃，估計每一項工程所需要的工程人員數量，因此，就順便動員他們組成軍事工程團，我被推爲團長，從事此項工程，於極短之時間內完成之，只是可惜我們辛苦冒險所造好的碉堡，他們軍事方面沒善加利用，就被日軍佔去了，實在是很可惜的事。後來，蔣委員長寫過一本書《中國之命運》，書中有些地方說到國父實業計劃，初步應該修築多少種工程，例如需建多少里鐵路？多少里公路？多少里電線？另外算算需要多少名工程師及多少人力等等來配合完成之。此種表格列入書中，這都是動員中國工程師學會全體人力，始能計算得之，此一研究會，至今猶健存，殊屬難能可貴，每年召開年會，我均被邀參加專題講演。

共黨之不守信

共黨和本黨談判合作，就我所知，多是不守信的，在民國二十五年周恩來及第三國際代表潘漢年和我們洽商和平事，協議發表共同抗日宣言，表示全民一致，其內容包括徹底實行三民主義等四原則。殊料抗日戰爭開始，爲時不及半年，共黨就秘密命令其所屬對外宣佈「共赴國難，一致抗日宣言」，所謂四原則是一項幌子，實際是壯大自己，其策略是：「聯絡上層，奪取下層，打擊中層」，舉例來說，在上層則和我們軍事長官聯絡，在下層則設法拖走我們的軍隊，背叛他們的直屬長官。

我獲悉這一陰謀後，便將此密件面報蔣委員長，他看了後認爲這情報是不可靠的，且以爲是離間國共合作關係的文件，並問告密的人是誰？我不得不將此人的姓名告知蔣委員長，蔣委員長竟懷疑此密件是僞造的，嗣後竟把告密者東北同志拘禁起來。

在此事件發生不久，我軍退至漢口，閻錫山先生自山西飛來漢口向蔣委員長報告軍情並順便拜訪我，我即告以共黨密謀「壯大自己」的上述陰謀，他聽了也不大相信，但豈料返回山西不久，他就發現有好幾團的軍隊被共黨「挖」走了，事後，閻向人談及此事件時，曾表示悔恨當時未接納陳立夫先生的忠告，致未事先防範，造成軍隊的損失，至此，他才認清了共黨的眞面目。那時共黨從陝西渡黄河到山西，由於地緣關係，軍隊常有往來，並因共軍也

高喊抗日，便不疑有其他，不料却因此喪失不少軍隊。

後來，蔣委員長識破共黨眞相後，經我建議，乃把當初提供上述密件的東北同志予以開釋，由此可知以蔣委員長之明智尚有判斷錯誤之時，可見共黨之虛僞狠毒實非一般人所能想像得到的。

赴新疆與盛世才交涉經過

蔣委員長爲什麼派我去新疆？其根本原因是：盛世才在北伐時從廣東出發和我一同行軍，他當時是參謀處的參謀，我是祕書處的科長，大家在一起行軍而認識，他見我白天行軍，到一地方停下來就馬上努力文電工作，往往工作到晚上十一點多，他看見一般人沒有我如此努力，所以對我的工作態度非常欽佩。不久，他到了新疆，把新疆的領袖金樹仁打垮，取代了金的地位，變成新疆的首領。金樹仁是個軍閥，盛世才是東北人，很有才氣。那時他打電報給蔣委員長，要中央派人去新疆，他指定要兩個人，一個是我，另一個是齊世英（立法委員）。我那時在中央組織部很忙，齊世英曾在過去和盛世才共同參加郭松齡反對張作霖的革命工作，也因事無法分身。蔣委員長因此沒派我去，也沒派齊世英去，就另外派了一個人去，此人是盛世才的老師黃慕松先生，這位先生不太懂得政治。因爲盛世才用自己的力量

佔據了新疆，是希望中央承認他，中央沒有派他希望的人去，反而派了他的老師去，這位老師又莫名其妙，在沒去之前，新聞記者訪問他，他便發表了一段談話，題目是〈治新方針〉。盛世才是個多疑的人，他以爲中央是派人去領導他的，他自己辛苦打下新疆，而中央却派個比他高的人去接收，自然不滿意了。我曾去找過這位盛世才的老師，告訴他盛某本想要中央承認他，這篇談話會使盛誤以爲中央要派你去控制他。黃慕松說他沒有要去治理新疆，而是記者胡說，但是已不及更正矣。果然他去到新疆，盛就把他軟禁起來，好不容易，才放了他回來。後來廣西的黃紹竑和白崇禧有野心，他們和汪精衛勾結起來，想密謀奪取新疆。那時黃紹竑曾打電報給盛世才屬下一個軍長名張里元者，想拉攏這位軍長推翻盛世才，但是這個電報被盛某拿到了，汪精衛和「桂系」一派的陰謀被發現後，張里元被捕而置死，盛世才對中央就很不滿意。那時我曉得這種情形，而蔣委員長適在江西剿匪，盛某和汪某的關係弄僵了，於是盛世才想獨立，我就到江西去見蔣委員長，告訴他新疆情況很壞，蔣委員長乃派一重要人物帶封親筆信到新疆去安撫他，才把新疆情勢穩定下來。蔣委員長知道我和盛世才的關係；第一次盛要我去新疆，他沒派我去；第二次我向他報告新疆情形，他派人帶信去，才把新疆安撫下來；第三次是在抗戰開始時，歐亞航空公司路線經新疆，飛機上有許多德國軍事顧問，因機械故障，迫降新疆，那時汪精衛是行政院長，拍兩通電報給盛世才要他放行飛機，盛世才不理睬，汪很難堪，因爲盛報復過去汪和黃紹竑想聯合搞倒他的宿怨，

而德國方面向汪發出「哀的美敦書」，限其在四十八小時內辦好，汪沒有辦法，很客氣的表示要來看我，我說不敢，乃到了他家，他請我幫忙，用我的名義，把事先擬好的電文要我過目簽字，請盛世才放飛機起程，電報發出後，第二天盛就放走了飛機。這三次關係，盛世才對我都很賣面子，所以，蔣委員長很了解我和盛某的關係。那時我和蘇俄大使鮑可莫洛夫談判之後，蘇俄希望我們和日本作持久戰，蘇俄可保持中立，而減少東面的威脅，以觀其變，我乘機要求蘇聯供我飛機、坦克、高射砲等武器援助我國，我要他寫明多少坦克，多少飛機，他起先不大願意寫，我怕他賴賬，一定要他親筆寫下來，他才寫了。我把他寫的字條藏起來，後來派張冲到蘇俄要武器，他們外交部還想賴，張冲就把鮑可莫洛夫大使的親筆字據拿給他們看了，才予承認。他們把武器分了數批運來中國，途中要經過新疆，因此，蔣委員長便派我去新疆交涉，要盛世才支援我們油料。我啣命去新疆時，同行的尚有蘇俄鮑可莫洛夫大使，他是經新疆回蘇俄去的。我們一行是乘中國航空公司包機去的，飛機抵達迪化，盛世才親來迎接我們，帶了一營馬隊，揚起漫天灰塵，威風凜凜。

當天，盛世才爲我開了一個很盛大的歡迎會，我和俄國大使一人坐盛的一邊，成了座上貴賓。當時俄國在新疆的領事館要比在我們南京的俄國大使館不知道要大多少倍，人員有幾百人，俄國人在新疆早有野心已是很明顯的事了。盛世才對我很好，招待我住在督辦公署的西花園內，裏面的佈置陳設極爲講究，那裏過去殺過許多人，在金樹仁時代，極爲嗜殺，請

客時吃完飯，就請大家看殺人，所以邊疆地區很野蠻。我住進西花園後，有人告訴我這裏鬧鬼的故事，但我一點也不怕。

盛世才對我極爲優遇，別人到了新疆不能自由行動，但我例外，我可以隨意到處參觀，到處演講。盛的太太辦了一所師範學校，也請我去講演，這是別人從來沒有的事。有一天，盛世才派人帶了四箱鈔票送給我使用，新疆的幣制和內地不同，內地一塊錢等於他們好幾千塊錢，但四箱鈔票的錢數目還是很大的。我當時若不收下，他一定認爲我不給他面子，若收下便等於接受賄賂，我想出來了一個兩全的辦法，那時新疆民族很複雜，我建議盛世才修建一座中山紀念堂，我於臨走時就備函把這筆錢捐作修建中山紀念堂的費用，這件事處理得極妥善，盛也贊成。

有一天，我正式跟盛世才交涉支援油料的事，盛答應了。當時一頭駱駝可載八桶油，這可說是用最古老的運輸方式來運最新式的運輸油料。他們按照我們的計劃把油料送達目的地，一桶一桶地安置好，這樣由蘇俄贈送我們的飛機、大砲等軍用品、便可在新疆加油，然後經甘肅到西安，再飛抵漢口。交涉辦好了，我就要走了。臨行的那一天，在歡送我時却出了亂子。盛世才把他所有的政府要員都請來了，有省政府主席、各廳廳長、軍事領袖，他是督辦，爲最高領袖。盛的疑心病很重，那天有維吾爾族的副主席和幾位廳長在，他即席起來講話，我也講了話。後來他要我先去休息，却命令一部份參加歡送會的要員不要走，當時把

副主席和幾位廳長逮捕，說他們勾結造反，要把他趕走。其實這些人也不一定眞是造反的，他的疑心病太重了，他藉著歡送我的機會，聚集政府要員，然後逮捕他們幾人，實在是很令我難過的事。

盛世才這個人，到後來除他太太之外，什麼人都不相信，所以最後既不相信俄國人，也反叛了中央，我曾勸過他誠心誠意信仰蔣委員長，因爲委員長很信任他，他應忠心耿耿信任中央，才能保護新疆，否則新疆很容易被俄國人攫去。他的「督辦」公署門口，晚上都架滿了機關槍，實在可怕。他的公文箱都上鎖，批公文時一定先自己用鑰匙打開，他什麼人都不信任，中央派人去協助他，他也不相信。此人能力頗強，但失敗在不信任任何人，最後連一個親信都沒有，因爲中央派去的人，他既不放心，身邊的老部下也不信任，充其量也只有相信他自己的太太一人而已。

新疆是個好地方，有十七個浙江省那麼大。新疆的水不必從地下挖井，它來自天山，白天太陽一曬，山上的雪水融化了就流下來，晚上天氣涼，水就停止了。人民種麥，土地肥沃，黑土有兩三尺深，他們說：「一年收穫吃三年」，只要把麥種灑在泥土上，就不用管了，因爲鳥類不多而「水從天上來」，灌溉無虞，眞是太富庶了。新疆既有十七個浙江省那麼大，浙江當時有二千七百萬人口，十七個浙江可以養四億人口，但新疆卻只有三百多萬人，所以新疆很富饒。新疆的石油和煤都多，煤是全世界最好的煤，我是學採煤礦的，所以

懂的。有些三尺長、一尺半方寬的大煤塊，一頭驢只能馱兩塊煤。燒過的煤剩下的成了極少白灰，幾乎一點渣子都沒有，所以是最好的煤。此外天山還產翠玉、黃金。金礦中產一種「狗頭金」，和狗頭一樣大，新疆富得不得了，所以蘇俄處心積慮地想得到新疆。在盛世才歡迎我那一天，我看到一個高大的俄國人，是蘇俄總領事館的三等秘書，對我很注意。後來鮑格莫洛夫沒有回來任大使，蔣委員長派我去飛機場接新任大使，我一見之下非常面熟，乃想起來他就是我在新疆見到的那個高大的秘書——蘇俄總領事館的三等秘書。新任大使爲什麼在新疆做那麼低微的職務？後來我派張冲到蘇俄去打聽，原來以前他在蘇俄做過國防部副部長，後來把他降下來做總領事館三等秘書。在共黨國家裏，升黜無定則，由此可見，其「視人如物」，毫無情感。那次蘇俄是派他到新疆去探測地形，所以俄國人從未放棄對新疆的侵略，因爲新疆對他們具有最強大的吸引力：版圖大、物產豐、人口又少，我在新疆期間，蘇俄的總領事對我也很友善，他陪我去打獵，那一天沒獵到什麼東西，他送了一把很好的獵槍給我，那時我們和蘇俄的關係是非常友好的。

在我前往新疆時，我和鮑格莫洛夫於安徽蕪湖上飛機，那時日本人正在轟炸南京，南京機場不能用了，我們的飛機剛起飛，飛機場就被炸了，日本人當時可能獲得情報，所以來炸蕪湖機場，亦未可知，幸而我們逃過大劫。我從新疆回來時，也乘專機，機上沒有別人，非常空，盛世才送了我許多哈密瓜，送行的場面又是幾百匹的馬隊，煞是壯觀！途經哈密，風

沙很大，視線不明，飛機迫降於哈密，停留一夜。在哈密吃到眞正的哈密瓜，是又甜又小的，盛世才送我的哈密瓜很大，這才知道有所不同。那晚在哈密，住在新疆籍的國大代表堯樂博士家，招待我很週到，晚上他們帶我去看新疆戲，他們本地戲演得很殘忍，爲畢生所僅見，那天演出「武松殺嫂」，他們眞的用豬心、豬腸做道具，血淋淋的從武松嫂子身上取出，看了以後覺得很殘忍、很野蠻。新疆的男女騎馬不用馬鞍，戀愛求婚時，男孩追女孩都是騎馬追，只要追上了就要吻到對方，女孩就得嫁給這男孩了。到新疆還獲得一些新見聞，那兒有戈壁沙漠，什麼叫戈壁呢？戈壁的地面是像由沙子、洋灰、石子混合成的一種東西，非常堅硬，地面平坦，是天然的飛機場，這種地形叫「戈壁」。那一天，我們飛機被風沙所阻，迫降哈密，就停在戈壁上，但第二天早晨，發現飛機失踪了，大家開著汽車四處去找尋，找了很久才找到，原來飛機被風吹到好幾里路以外的地方，他們把飛機拖回來檢查後，才又起飛，現在想起這事還覺得十分有趣。

回程中，我們飛機先到蘭州，再到西安，快到西安二十分鐘前，日本飛機到了西安上空，正好迎著我們飛機而來。我們飛機收到情報後，機師問我該怎麼辦？如果往前飛向西安，一定會被日機攻擊，若往後飛回蘭州，油料又不夠，眞是危急萬分。我想了一想，告知飛機師決定前飛，到了西安時，才知道有日機十二架經西安往南飛到漢中去投彈了，我們降落機場時，地面上一個人也看不見，大家去躲警報了。過一會兒才解除警報，我們又逃過一

劫，可算是幸運了！陝西省主席蔣鼎文兄來迎接我，到省政府吃頓午飯，再飛往漢口，一到漢口又有空襲警報，我們立刻把行李和哈密瓜搬下來，飛機乃飛往宜昌去。日機來炸漢口，機場亦被炸，蔣委員長侍從坐的一架飛機稍稍被炸壞了，而我又安全抵達，這眞是幸運的事。我在蕪湖上飛機後，機場就被炸了，臨到西安又遭遇敵機；到了漢口剛下飛機，機場又被炸，我不能不說這三次逃過大難是一種奇蹟！當初如果在西安上空遭遇敵機時，我若決定飛回蘭州那就糟了（油料不夠）。所以在千鈞一髮之際我決定事情，往往第一個想法比較正確，因爲第一個想法很純潔，沒有雜念，所以我採用第一個想法——往前飛，因此化險爲夷，逃過了浩劫。

到新疆安排油料的事幸而及時辦好，因爲後來日本人打南京，南京失守，緊接著日本人又攻打漢口，那時美國供應的飛機都被摧毀了，蘇俄的飛機、坦克車、高射砲都及時運來，日本人一點也不知道，當其再度轟炸漢口時，就被我們空軍一舉擊落十二架，赢得了空前勝利。日本人對這場慘敗，深感意外，因爲他們以爲我們沒有飛機了。這次空戰的光榮勝利，使我在抗戰勝利後，還獲得一枚空軍獎章，在文人中獲得軍事獎章，我是第一人，深感榮幸。

向陶德曼提出重要建議

日本人攻打我們，我們退出南京，到了漢口，那時日軍擊傷了黃埔江中的外國軍艦（我已記不得是那一國的軍艦），因此引起外籍人士抗議。德國乘機派陶德曼大使出面調解中日戰爭，勸說兩國不要再打下去。那時我已在漢口，陶德曼來找我，我雖然與中共交涉共同抗日，與鮑大使商定互不侵犯條約，我卻感覺到，中共與蘇俄二者終不可靠，如能有機會消滅之，則可爲國家及世界除一大患，於是向他建議說：「日本軍閥一直想打我們，你要他們停戰，最好想個方法能轉移他們的目標，他們自然不會打我們了，我以爲你們軸心國家應該聯合起來，要日本往北進，德國向東進，這才是軸心國組合的目標。」我勸陶德曼向希特勒建議，要做一件使全世界人類能對德國尊敬的大事，不要專門去侵略弱小的國家，應該以解放全世界殖民地爲號召，讓日本、德國、中國聯合起來，先把蘇俄打垮。當時蔣委員長並沒有要我說這些話，是我自己跟他講的，主要想說服他們轉移攻擊目標，如果當時他們能接受我的意見，那麼現在大陸一定還是我們的。我說三個國家要有一個秘密協定，以打倒共產主義爲第一目的，以解放全世界殖民地爲第二目的，這樣一來，國父的民族主義理想便實現了！

三個國家聯合打垮蘇俄，則蘇俄一定會被打垮，打垮蘇俄之後再轉頭協助弱小民族解放獨立，則英國不打而自垮了，赤白兩個帝國主義的頭兒打倒後，我們可宣布全世界所有各民族一律平等，等亞洲各殖民地如印度、安南等殖民地一律解放，我們中國不要得到什麼利益，我們的版圖大，人口多，物產富，日本人可到亞洲南洋一帶被解放的殖民地去做生意，謀利益，他們的困難也就解決了，他們可以假道我們領土去打蘇俄，一俟戰爭結束，德國必須保證日本退出中國，非洲各國殖民地的生意可讓德國去做，如此則軸心國家原來的目的可達，而美國亦不會不贊成我們的主張的，那麼德國也不必去打法國了，日本也不必侵略我們了。如果德國贊成這個建議，蘇俄被打垮以後，共產主義就被消滅，我們另外替他們立個反共的首領。蘇俄佔領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等國家，也讓他們獨立自主，如此則全世界人民皆大歡喜。我的構想請陶德曼向德國希特勒報告，後來不知怎麼搞的，陶尚未得到柏林答覆，日本軍隊已繼續向西進攻，陶德曼調解不成，只好回國，如果當時我的計劃成功，今天世界局勢將大大改觀。兩個大帝國主義者的領袖國被打垮了，全世界所有殖民地解放了，三民主義實行於全世界了，那是多麼偉大的事。德國外交部可能還存有我建議的檔案，英俄兩國如有人看到後一定對我很不諒解呢！我的辦法原本是根據國父遺囑中所昭示的「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的話去實行的，如果這個理想實現了，南洋各殖民地一律解放，日本人就有很多地方可做生意，可以移民，又何必來侵略我們中國呢？在民國二十四年

汪精衛兼外交部長，我曾對汪說，我們派大員到日本去，向他們提出一個大計劃，以轉移其目標（即以上向陶德曼建議的方案），使日本不要侵略我們，可惜汪精衛無此魄力，不敢去做，眞是莫大的遺憾。等到戰爭一開始，時機迫促，陶德曼又不及向德國討回音，而戰爭又開始了，時機一失，駟馬難追，不勝浩嘆。

辭去調統工作之指導擔任教育部長

一日，蔣委員長召見，要我擔任教育部長，這一突如其來的消息，使我難以允諾，其所以如此者，因第六部之職權範圍即包括教育在內，而其時淪陷區學生紛紛退至後方者，日甚一日，此一工作，王世杰部長難以勝任而請辭。我稟明蔣公曰：「教育部長與調統工作，爲一絕對不同性質之工作，不能由一人兼任之，如委員長必以教育部長相畀，請准辭去調統之指導工作。」蔣公允予考慮，次日復召見，允余辭去調統工作而任教育部長。由於我不再任調統工作指導，第一處徐恩曾正式改稱中央調查統計局，第二處戴笠正式改稱軍委會調查統計局，第三處丁默邨結束取消，我從此與調查工作脫離關係矣。我以往對蔣公之任使，從未有任何交換條件者，此次則爲例外，因身爲教育部長必須以德服人，而調統工作，在一般人看來，總覺以力服人爲可怕，不宜兼任也。後來以此報告戴季陶先生，他向我道賀，他

說：「你能夠擺脫調統工作，這是你聰明的地方，我當時勸你接受蔣公之任命，喻之以如來佛之管十八尊羅漢，今竟能安全解脫，眞是你的造化，恭喜恭喜。」凡事適可而止，即是中庸之道，這是我的想法。

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總裁

民國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九日，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昌揭幕，出席代表三百五十五位。在這之前，我們有個工作，就是要把蔣委員長選爲總裁，當時黨裏喊出口號是：「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一個組織」，「一個主義」當然沒有什麼問題，「一個領袖」却有些問題，因爲黨內汪精衛等好幾個人，他們資歷都比蔣委員長深，我們希望在打仗時候，所有黨政軍都應集中力量，故我與果哥商定辦了一種雜誌叫《政治評論》，由鄭亦同同志主持之，主要內容，是報導一個國家不能沒有領袖，目的在灌輸大家這種思想觀念，黨內也自然不能沒有領袖，因此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中我們提案選舉蔣委員長爲總裁。這時最大的困難是汪精衛，汪精衛資格要比蔣委員長深，如果汪精衛明智一點，他應該知道這場戰爭應由蔣委員長去指揮與擔任領袖，但汪精衛終不大心服，尤其他的太太陳璧君，個人領袖慾很強，所以這項選舉有了困難，那天的選舉，出席代表共有三百五十五人，若論多數票可當

選，那是沒有問題的，我們都計算過了，只希望不要有誤會，這個案子提出以後，汪精衛臉上表現很不愉快，我那時擔任組織部長，我看出這種情形不對，立刻到裏面去見蔣委員長，我說：「汪先生好像不大高興，如果我們能加一個副總裁名額，可能足以挽救此事。」蔣委員長同意了，這個案子通過以後，選出蔣委員長擔任總裁，汪先生原本一心想當總裁，當時臉色都變了，雖然後來又選他出任副總裁，可是他心裏一直不大滿意。因此汪精衛認爲蔣委員長可以做國民黨的領袖，他亦可做各黨各派的領袖，後來就提出了組織國民參政會一案。

國民參政會之成立

國民參政會裏包括共產黨、青年黨、民社黨以及其他無黨無派的各界領袖（稱之曰社會賢達），在這之前，我曾經聯繫過青年黨的領袖曾琦，民社黨的領袖張君勱，希望他們參加中央政治委員會，中央政治委員會裏面也有不是黨員的，這是我們黨內最高政治組織，其中非黨員的如閻錫山推薦的趙戴文，張學良也推薦過楊尚清，我想假如讓青年黨、民社黨的領袖參加我們的中央政治委員會，便可以集中力量，所以我當時就和曾琦、張君勱談過，他們也很高興參加進來，以便全國團結，一致對外；正在這時候，汪精衛用本黨的名義和青年黨、民社黨交換了一封信，承認他們這兩個黨，其實汪沒有這個權代表本黨去承認友黨而不

先經過本黨的決議，他認爲他們與我們之間沒有政治問題，汪精衛此時已想做各黨各派領袖的意圖，已極明顯，因此我的團結工作完全失敗了！我是想把各黨各派聯合起來，這聯合陣線是爲了對付共產黨的，可惜沒達成這項計劃。當時汪在正式提出國民參政會的提案前，大家在蔣先生官邸討論要不要成立國民參政會，我也參加了這項會議，我說：「將來如果國民參政會的決議和本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決議不同時，該怎麼辦？反之假如我們提出的案子，國民參政會不贊成，又該怎麼辦？」汪精衛見我反對這個案子，他說：「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可以等於美國的參議院，國民參政會可以等於美國的衆議院，參議院權力比較衆議院高一點，我們亦可仿歐美的制度。」這一說明確定了本黨的政治地位，蔣先生不反對，我又何必單獨做難人，也就不說話了，當時大家亦沒有什麼意見，就決定提中政會及中常會通過了這個案子，成立國民參政會。

幸好國民參政會在起草時，有一條條文是：國民參政會組成委員的遴選是由總裁決定，此一條文對蔣先生是比較有利的，會後，蔣先生把我留下來，並囑咐我說：「你去找我們黨裏年輕而口才很好，色彩又不很濃的同志數十人，把他們的名單都抄給我。」於是我在中央及各省黨部的同志中具有以上條件的名單報上去，並將汪精衛、青年黨、民社黨三方面重要份子也都列了名單，一併呈給蔣先生，他在本黨及各黨派名單上分別圈選，一俟委員確定後，連同國民參政會的組織條例提出中央通過。在這名單中，我有一個原則，即本黨忠實同

志，必須佔多數，其他如汪派及各黨派合起來僅佔百分之四十幾，萬一需要表決議案時，依照民主慣例，我方佔多數，是絕對必要的。國民參政會組織好了以後，蔣先生指定三個人擔任黨團指導員，我是其中之一，另外兩人是中央秘書長和陳公博。開會時重要的案子，他們如果要搗亂的話，以民主投票方式解決，我們人數多，他們也搞不出什麼名堂來。自從國民參政會成立後，汪精衛自認爲是領袖中的領袖，擔任各黨各派的主席，與蔣先生任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總裁不相上下，心裏才比較舒服了些。

復興社與青白團之組織與解散

抗戰還沒開始時，共產黨煽動一般青年人，說我們政府太軟弱不敢抗日。蘇俄希望我們和日本打仗，所以共產黨也就跟著蘇俄走，煽動我們學生主張抗日，那時一般青年常常責備政府爲什麼不抗日？這是很難對外講的事，我們不能告訴青年我們已經在做抗日準備了，此事很難公開說明的，以免被日本了解我們的弱點；如果公開說明，日本人知道了一定會提前來攻打我們，使我措手不及而陷於失敗之境地。民國二十四年青年學生已開始爲此事吵鬧，張學良也跟著他們唱高調，這時，蔣委員長就派我到蘇俄去，我臨走時寫了報告呈蔣委員長，我說這樣下去是不行的，應該要由委員長密令各校校長帶著學生自治會的負責人，一起

來南京開一秘密會議，請委員長親自告訴校長和學生領袖們，這場仗我們一定要打的，我們正在準備中，不能公開說明，使敵人知道我們的底細，你們不能隨便到處講，我們正在爭取時間準備，時間越久，準備越充分。所有全國各大學校長及學生領袖親自聽到蔣委員長親口的承諾，結果大家都很高興的回去了。以後學校學生不再責備政府，這件事，蔣委員長接受我的意見，處理得很成功。因為我曉得這裏面有花樣的，共產黨希望我們打，蘇俄也希望我們打，犧牲我們國家，他們亦無所謂，但是我們為什麼要處於被動呢？我們又能忍耐多久才能對外宣講呢？在這個時候，蔣委員長看到這批青年，怕被人家拉走，就叫我們去組織，叫黃埔系去組織「復興社」是秘密的，是蔣委員長核准的，他們又被稱為「藍衣社」；我們這邊也是蔣委員長要我們搞的，叫做「青白團」，雙方都不以黨的名義去拉青年，把他們吸收進來以免被中共拉走。「復興社」是軍方的，「青白團」是黨方的。照理說黨裏是不可以搞小組織的，所以人家說我們是什麼「CC派」，都毫無事實的，若然我們早被本黨所懲罰了，此番的兩小組織都是蔣委員長要我們搞的。大約是二十四年開始的，到了二十六年抗戰一開始，青年們心都歸向我們，我們的任務已經達成，因此，蔣委員長在漢口把這兩個小組織一起取消了，一取消之後就組織青年團，這批人都改歸到青年團了，這是一種政治運用。人家說我們搞小組織，其實是奉命行事的。所以在漢口我簽了一份報告呈蔣委員長，我說戰爭已打了半年，我們這個小組織——青白團已不必要了。他對我說復興社也可以不要了，兩

個都一起取消可也。我在復興社是指導員，在宣佈取消的會中，他講完了話之後，要我講話，我說打仗的時候一方面需要正規部隊和對方正規部隊打，另一方面也需要別動隊打游擊戰，我們這兩個組織等於兩個別働部隊，正規部隊打仗，我們別働隊招收愛國青年入隊，幫助正規部隊，現在正規部隊已揭開戰爭序幕了，我們別働隊可以不要了，所以要取消。我們一切都是聽命令的，我們沒有自己的企圖，組織或取消都完全按照總裁的命令，委員長對我這番話，全爲贊同。後來青年團組織起來，蔣委員長自任團長，以陳誠副之，兩個社的青年，一併加入了團，大家團結救國，這是抗戰時的一件重要事件，亦是我們對歷史的一個交代。

青年團成立始末

還有一件事也很值得一提，那就是青年團的成立。爲什麼要成立青年團呢？因爲黨裏要把預備黨員制度取消。預備黨員當時參加了各小組，在開會時學習學習，但小組裏沒有什麼全黨一致的訓練，所以新入黨的黨員亦就缺乏基本訓練了。所以當時成立青年團有一個重要目的，就是把新進來的年輕黨員加以集中訓諫，青年團就是本黨的訓練機構。這個組織條例本黨推我起草的，所有預備黨員就是進了青年團爲團員，等到二十五歲時就可自然變成黨

員。我當時想到青年團不可變成另一個組織，而是一個本黨訓練機構，這樣子就不會發生爭端，但是，蔣委員長派陳誠爲青年團書記長，康澤爲組織處處長，康這個人很有野心，他希望青年團是另外一個組織，和我的構想完全不同，他把青年團團員到了二十五歲留在團裏，不讓他們自然變成黨員。蔣委員長也是青年團團長，竟不顧組織條例准許康澤的簽呈，到了二十五歲的團員不讓他們變成黨員，可繼續留在青年團。這樣一來可麻煩了，形式上竟變成了兩個黨，摩擦就開始了，這正是共產黨所希望的，就是黨和團起了爭端。這一點，蔣委員長是弄錯了，我曾於起草組織條例時跟他說得很清楚，絕對不要變成兩個組織。就好像一個中學，一個大學，中學畢業後升入大學，但是現在却變成一個有大學的中學，一個無中學的大學；前者有新血輪，後者漸漸成爲老朽，新陳代謝的作用未得到，反而變成兩個互相衝突的組織。因爲康與陳誠均有野心，他要成爲青年團的領導人物，將來可取黨而代之。於是各地方、各省的黨部和團部變成對抗的形態，自己和自己找麻煩，結果，蔣總裁又下令將青年團歸併入黨。以他們的看法在黨裏是我在領導，在團裏是陳誠與康澤在領導，青年團的組織條例是我擬定的，我早就看出有形成兩個組織之危險，所以明白規定團是黨的訓練機構。但是我們的領袖是另外一種想法，在領導上沒有什麼關係，認爲黨會聽他的話，青年團也會聽他的話，但後來糾紛得太厲害了，民國三十六年九月中央六屆四中全會通過團歸併於黨，這中間浪費的時間和精神都太多了，實在不必要。這也是抗戰期間一件重要的事。是領袖的錯

誤！

屢遭大難化險爲夷

抗戰時期，有一件事值得一提，我們政府從南京、漢口撤退時，可以看出蔣委員長的偉大，他都是最後一個離開，他走之前總會打電話給身邊幫他忙的幾個人，在電話中說：「立夫啊！你現在可以走了！」我就問：「委員長還沒有走，我們怎麼可以先走？」他總是說：「你們先走吧！我也快走了！」一位領袖之所以成爲領袖，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他必須顧到所有幫他忙的人能安全離開，他最後才走，這樣才能算得上是一位領袖。後來我到了漢口，撤離時，委員長也要我們先走，那時有一段插曲很有意思，離開漢口，本有兩條路可走，一條路乘飛機，另一條路乘船過洞庭湖，經長沙到貴陽，再到重慶。當時朱家驊兄要我和他同搭飛機走，陳布雷兄要我和他坐船走。他們兩人都送票給我，我當時很難決定，究竟跟誰一同走，那天晚上我做了一個夢（我是很少做夢的人），夢見天上有一隻老虎跳下來要咬我，我驚醒過來想想該怎麼辦呢？天上有虎下來是不是象徵著禍（虎）從天上來，那我就往天上去，總不會錯的了！我遂決定乘飛機，乃寫信給陳布雷兄將船票璧還，告訴他很抱歉不能和他同行，我要跟朱家驊兄乘飛機去重慶了，是日我們平安地到達重慶，不料不久就接

到電報消息說洞庭湖上那艘船被日本飛機發現，他們認爲那船上一定有重要人物，因此便從空中衝下來以機槍掃射。我第一個感覺是：糟了！陳布雷兄遇險了！後來陳到了重慶，他對我說：「這次我差點做了一件大錯事，我住的船艙有兩張床，一張我睡，另一張本是準備給你睡而空在那裏的，那天日本飛機機關槍掃射下來，剛好有三顆子彈打中你的床，那三顆子彈一定把你打死了！眞是謝天謝地你沒有跟我來！」當時我就把自己的夢告訴他，「虎從天上來」，照一般人的想法，一定不要乘飛機，而我却有點迷信，凡第一個想法總是對的，我想「禍從天上來」，我就往天上去，這麼一想，我就決定坐飛機了；否則怕虎從天上來，我就乘船的話，遇上了日本飛機射擊，豈不應驗了禍從天上來嗎？這情形和自新疆回西安遭遇日機時，我決定不退回蘭州而往前飛的情形相似，所以一連串好多次危險，都依照第一個想法去做而能化險爲夷，現在想來，眞是幸運。

汪精衛做日本傀儡始末

汪精衛一方面認爲自己是領袖的領袖，一方面對抗戰又沒有信心，一直是個失敗主義者，汪精衛這個人很聰明，他最大的缺點就是想做領袖，幫他的人就是他的太太陳璧君。陳璧君這個人領袖慾比汪精衛還強，汪精衛如果做了「老大」的話，她就可做「第一夫人」，

所以她始終覺得不滿意現狀，汪精衛看到戰爭要失敗，他常對我們說：「唉！這個仗怎麼能打呢？」總是悲觀的論調。我們退到重慶後，汪精衛心裏就打算逃跑了，一個作戰主持人的決心很重要，主持人信心動搖，影響下面的人很大。所以我們的戰爭能打到最後，完全靠蔣委員長一個人的決心，這也不是容易的事，因爲那時我們的戰爭節節失敗，我們從南京、漢口退出來，直退到湖南，日本人當時如果不以零零碎碎的軍隊來打我們，而用百萬大軍來包圍我們，那我們就完了。他們以零零碎碎的軍隊來打我們，今天不夠了，明日再增加一些，所以，蔣委員長判斷日本人是「小鬼頭」，氣魄不大，一心只想佔便宜，希望用很少的本錢，可以得到很大的利益。所以，蔣委員長的戰略是「以空間爭取時間」，我們中國有這樣大的面積，你要每個地方都打可不容易，你要在這裏打，我們到另一個地方去準備反擊，敵人跑到我們國土上，假定我們每個人民都抗日的話，他們就受不了，所以我們的政略和戰略都很正確。我們南京剛失守退到漢口時，我那時很憂慮，我認爲日本大軍如果南邊走粵漢鐵路，北邊走平漢鐵路，從南北兩個方向把我們包圍在漢口，那該怎麼辦呢？我把這個問題向蔣委員長請教，他判斷說：「不會的，日本人絕對沒有這麼大的魄力，我們可以步步爲營，慢慢轉敗爲勝。」蔣公的判斷是高明的。

汪精衛那時我也看出他要跑走了，他沒有選上黨的總裁就很不高興，後來他當上了國民參政會的領袖，內心還是不高興，因爲萬一失敗了對他還是很糟糕，所以他就去勾結日本。

日本人也正想找一個中國人來做傀儡，汪精衛正是他們理想的人選，所以他們就互相勾結起來。汪精衛看見局勢危險時，他的副官和我的副官很要好，他的副官就告訴我的副官說汪精衛要預備離開了。我就把這消息打電報告訴蔣委員長，他那時在陝西漢中，我說根據確實消息，汪先生有離開的情況，我不便說明消息來源，等到蔣委員長要回來時，汪精衛就先跑掉了。汪精衛跑到海防，那時情形很不好，他認爲戰事沒有勝利的希望，蔣委員長要我飛到海防去請汪精衛回來。去海防的飛機票買好了，第二天早上我預備飛往海防，就在那天早晨看報時，知道汪精衛的秘書曾仲鳴在海防遇刺，他們說刺客弄錯了房間，原來汪精衛和他的秘書分住兩個房間，刺客走錯了，走到曾仲鳴的房間，否則汪精衛已被打死了。外面傳說是戴笠派人去暗殺的，但我不知其中眞象，我就請示蔣委員長，我說這種情況下去海防也沒什麼用了，他就叫我不要去了。這樣一來，汪精衛怕我們殺害他，就輾轉地逃往香港，再赴日本，和日本人勾結組織了一個僞政府。當初我擔任教育部長，辭去調查統計總部工作時，調查統計總部之下原分三個處，這時第一處處長爲徐恩曾，改稱中央調查統計局；第二處處長爲戴笠，改稱軍委會調查統計局；第三處則取消了。第三處的處長是丁默邨，丁默邨的工作暫時沒有著落，他就到香港去了，他和周佛海交情極好，因此就跑到汪精衛那裏去組織僞政府。後來汪精衛做頭兒時，周佛海任僞行政院院長，丁默邨任僞浙江省主席。在此之前，丁擔任過他們特務工作的頭兒，因爲丁以前在上海熟知第一、二兩處的人事，所以他到上海以

後，把上海調查統計局第一、第二處的人抓走了。他冒充說：「我是陳立夫派來請你們去的，他們不知道丁默邨已背叛了我們，還以爲眞是我請他們去，以致於有些人被丁默邨弄去了。所以第一、第二兩處在上海的地下工作人員便恨透了丁默邨。那時我打電報去告訴他們：丁默邨已跟著汪精衛走了，和我已沒有關係；可惜已太遲了，丁這個人很聰明而狡猾，他早把上海祕密通訊的地方都記下來，所以我們吃了他一次虧。

日本人投降之前，丁默邨任僞浙江省省主席，周佛海任僞行政院院長，李俊龍任僞上海市市長；丁在浙江，周在南京，李在上海，這三個地方很重要。我派了一個姓趙的人去找丁默邨（因爲丁默邨知道僞組織終會失敗，所以在電報裏偶爾還是和我們打交道和請罪），我告訴他說：「現在戰爭快要結束了，因爲原子彈已投中廣島，你們只要爲我方做三件事情，這三件事情你們做得到的話，你們雖然是漢奸，可是我可以保證你們不死。那三件事情呢？第一件是南京、上海、杭州這三個地方，你們要守住崗位，不能讓江北的新四軍先佔去；第二件是京滬、滬杭兩條鐵路上所有的僞軍部隊要能控制得住，因爲這很重要，我們的軍隊可立刻由鐵路運輸到上述三據點而無阻礙；第三件是，戰爭一結束，你們要以最快方法聯絡上第三戰區（靠近江蘇、浙江一帶）司令長官顧祝同，讓中央軍立刻開進以上三個地區，這三件事，你們必須做到，這是與你們幾個人的生命攸關。」我要他們給我回電，但是由於戴笠恨透了他，所以我特別要他和戴笠取得聯絡，電報由戴笠的電台轉給我，這樣戴笠他們也了

解這段事的接洽經過，否則戴笠不會放過他的。因爲上一次他害了戴笠不少的地下工作人員，他們會報復的。後來他在電文中告訴我，他負責做到這三件事，所以日本人投降後，他們馬上協助中央軍進佔上海、南京、杭州三據點及滬甯、滬杭兩鐵路一帶地區，如此才沒被新四軍先佔去，這樣一來，我就要實現保證他們不死的諾言。

然而，有些事是難以預料的。周佛海因爲和陳布雷過去交情很好，他就另外去活動，請陳布雷幫忙呈請蔣委員長赦免他，後來他獲得赦免，但爲時已晚，畢竟還是死在監獄中。丁默邨本來可以不死的，但有一天他生病，在獄中保出去看醫生，從南京拘留所裏出來，順便遊覽玄武湖，恰巧碰到中央日報的記者，這位記者發現了丁默邨，他回去後便在報上報導了一個消息：「丁默邨逍遙玄武湖」。這個消息，被蔣委員長看到以後，他來問我：「丁默邨爲什麼跑出監獄呢？」我察明事情眞象後向蔣公報告，說明丁默邨因爲患病，監獄才准他保出治病，不知道他爲何去遊覽玄武湖。蔣委員長很生氣的說：「生病怎能還遊玄武湖呢？應予槍斃！」如果他被監禁時，能安份守己不要亂動，就沒有事了。因爲蔣委員長對他的印象一向很壞，我因爲有保證諾言，後來向蔣委員長求情，希望永遠監禁不要槍斃他，但是蔣委員長沒有答應我的請求；不得已，我只好派員告訴丁默邨說：「我已沒有辦法救你了，我雖然向你擔保過，可是你自己不好，你爲什麼要逍遙玄武湖呢？」丁默邨處決前寫了一封信給我，信上說：「我很感激你，我也知道你很幫我的忙，我自己不當心，都怪我自己鑄成了大

錯」，所以中央日報記者害了他。李俊龍的下落不明，可能被共黨槍斃了，汪精衛最後也死在日本，汪精衛爲取出身上的子彈在日本開刀，竟因此而死在那裏。汪精衛這個人很聰明，他的講演很具煽動性，他能把一篇文言文立刻翻成白話文，翻譯得又快又好，一點也不用修改。他的講演雖具煽動力，但仔細辨其內容；沒什麼東西，好像做八股文一樣，有著一套的模式，聽完後回味起來，沒有什麼特別的內容，但當時可以把聽衆迷惑住，眞可謂是個「狐狸精」（吳稚老稱他的名詞）。這個人的確夠聰明，他最大的缺點，就是想做領袖，什麼人支持他，他都高興，共產黨捧他，他很高興；閻錫山、馮玉祥的叛變，捧他他也參與；日本捧他做傀儡漢奸，他也高興；只要能做領袖，出賣國家也在所不惜。他一生想做領袖，但却沒有實力，到最後終於遭致失敗的命運。此外，他一生怕妻子，他的妻子領袖慾特強，妻子要他怎麼做，他一定俯首去做，所以一般人說汪精衛的一生是被他的妻子陳璧君毀掉的，確實是有道理啊！

任國父實業計劃研究會會長

抗日戰爭期間，我在民國二十九年任中國工程師學會會長，鑒於國父實業計劃對抗戰後的建設問題至爲重要，我遂倡議組織國父實業計劃研究會，由成都年會決定成立，並推選我

任研究會會長，十幾個專門工程學會正副會長皆爲委員，另外還邀請一批專家分別組成十幾個專門小組。

三十年三月研究會開始進行工作，由各專門工程學會、工程專家、農林專家，以及職員等組成，分成許多項目進行研究。經一年半時間提出一份研究報告，這份計劃從十七個方面提出大量數據，開始提出十至二十年內應達到的目標，例如十年內應建鐵路兩萬公里、煉鐵九百萬噸、機床十五萬部、飛機一萬二千架、培養人才二百五十萬等等，這份報告在三十二年內部印發。

根據三十二年的研究會報告，一年間曾舉行全體大會四次，各種專題小組會十八次，並外出考察。已經完成各項工程實施初步細密計劃，並且進一步考慮各項計劃之間的互相配合問題，配合所根據的是各地人口、資源、地勢的數字，將各組計劃對比研究，互相協調。

三十二年四月，在重慶市中央圖書館還召開了「工業建設計劃會議」，到會有各方面專家百餘人，研究會的研究報告成爲這次會議的重要資料，並經受各方意見的討論，最後綜合成十六條提要性的綱領，稱爲「工業建設綱領」，後來由政府公布。

三十四年研究會感到十六條提要性的綱領還是偏於原則，考慮進行補充。於是召集五次會議，參加者有吳承洛、吳健、吳蘊初、沈怡、茅以昇、孫越琦、程孝剛等二十餘位專家，提出許多具體意見，最後由中國工程師學會總幹事顧毓瑔滙總，完成「工業建設綱領實施原

則」九十一條，例如針對綱領第一條，有實施原則十四條，其中對基本工作、目標、重點、條件、配合、補救、人力，組織、調查等都提出原則要求，此實施原則後來亦由政府公布。

三十四年，蔣公發表其所著《中國之命運》一書，其中的經濟建設一章，其所列之估計所需要各項工程人員數量表即引用此一研究報告中的材料。

抗戰期間之教育行政

我自民國二十七年一月七日在重慶就任教育部長，到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去職，主持戰時教育行政將近七年。在此七年之中，撫輯流亡學生，重振後方絃歌，擴展各級教育，改革並建立制度，發揚民族文化，訓練並徵調學生直接參加抗戰工作，實在做了不少的事。這些事績大部分已記述於當時教育部所出版的各種期刊，以及教育部對於歷屆參政會的報告之中。勝利後，教育部所出版的《第二次全國教育年鑑》中，亦有比較系統的記載。茲就我在教育部任內所做的印象最深的教育行政分述如下：

戰前我與教育文化界的關係

我以一個礦冶工程師而擔任了抗日時期教育部長的職務，我的學術訓練似乎和教育行政

沒有什麼直接關係。但事實並非如此。礦冶工程師是發掘及冶鍊地下物質資源的；教育行政人員是要發掘及冶鍊人力資源的。兩者的工作有可以類比的地方。並且教育工作在美國還有人稱爲Human engineering的，教育行政不過是另一種工程而已。這樣類比，好似附會，却也是有意義的。其實我在戰前和教育文化界確也有許多直接關係。

國民革命北伐告一段落以後，我首先是在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工作的。由於在黨內先後擔任過秘書長和組織部長，充分認識了宣揚主義深入人心的必要。我時常去各處講演，對象多爲中等以上學校的教師和在學的青年，人數當在十數萬以上。我對中央政治學校學生曾作有系統的講演，講演稿經整理出版，這便是我的第一部著作《唯生論》（上冊）。以針對共黨的「唯物論」而發的，這本書再版多次，很能引起青年們的注意，更堅定我到各處演講的信心和勇氣。九一八事變以後，華北局勢漸趨緊張，我幾度到平津一帶去視察和講演，和北方的青年及教育界人士曾有很多的接觸。

我不僅在中央政治學校曾作系統講演，我還從民國十八年起，擔任該校的校務委員。二十六年五月，我又曾短期代理該校教育長職務。此外我還自民國二十年三月起擔任過國立暨南大學的董事。對於當時的高等教育，並非陌生而有相當的認識。

我對於一般教育改革和社會教育運動，也曾參與。我曾在歷次黨的大會中提出或聯署教育改革方案，爲後來教育的準繩。我又曾聯合與教育界有關人士發起「中國本位文化建設運

動」，組成「中國教育電影協會」和「中國科學化運動協會」，和社會教育界與科學家多所接觸。我又發明了五筆檢字法，使中小學和一般人可用極簡便的方法去檢查生字，也可用來作檔卷分類，或爲書後索引。曾在中華書局出版一本《五筆檢字學生字典》。

我在戰前，雖然與教育文化界有多方面的接觸和參與，但是從沒有想到後來會擔任教育部長，負起全國教育行政的責任。在九一八事變後，我和居覺生先生北上途中，曾接到當時行政院長汪精衛邀我接掌教育部的電報，但是因爲黨內任務繁重，便立時復電婉謝了。

我終於受命接掌教育部，是在七七事變之後。其時政府決定抗戰，日軍佔據平津，進襲京滬，我政府初遷武漢，改組行政院，院長由孔庸之先生擔任。那時我正兼任「軍事委員會的第六部部長」，第六部的任務原是對於戰區青年的宣傳組織和救濟，和教育部的職責有相關之處。我受命於危難之際，義不容辭，便於二十七年三月七日接到任命，於三月七日，飛到重慶後方到教育部正式辦公。直到三十三年終行政院改組爲止，我的部長任務幾乎與抗戰相終始，現在算來，已經是時隔五十多年了。撫今思昔，眞是感慨萬端。

進教育部後的人事安排

我受命後的第一件事，便是部中人事的安排。原任的兩位次長和總務司高等司兩位司長以及主要秘書人員，都已隨前任王世杰部長去職，各另有任務。我的人事政策是留任的概不

更動，已去職的物色適當的人才補充。這第一著已經安定了部內人心。因爲命令發表以後，部內人員以爲我從事黨務多年，勢必多借重黨裏人才，而對部內人事必將大事更動。孰知我過去受命爲中央黨部秘書長時，我祇帶了一位秘書去的。我自己不分人我，人家的人自然可爲我所用了。我用人唯才，一秉大公，對於在職人員，一概留任。保證了事務行政的穩定性和繼續性，而不至減少工作效率。至於應補充的人員，則是當時教育界所十分矚目的，因爲這些主要職位，都是與將來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執行特別有關的。關於常務次長和簡任秘書這兩個職位，我發表了歷任浙江省教育廳長、交通部和內政部次長的張道藩同志爲常務次長，又發表了曾任河南省政府秘書長及中央黨部秘書的張廷休同志爲簡任秘書，這兩位都是與我共事較久的，我把部內日常事務交給他們。他們都曾擔任過大學教授，也是教育界知名的，部內外都認爲是適當人選。其餘政務次長和高等教育司長，與總務司長的人選，我決定從教育界物色。經過審愼的考慮，我發表了南北大學三位知名教授分擔這三個職位：清華大學工學院院長顧毓琇教授爲政務次長，復旦大學教育系主任章益教授爲總務司長，北京大學教育系主任吳俊升教授爲高等教育司長。這三位和我過去都沒有私人關係。顧次長是在中國工程師學會及科學化運動協會相識的。章司長是復旦大學的友人介紹相識的。吳司長過去只見過一面，甚至還沒有接談過。我選任他們，因爲他們過去對於教育的言論和成績，以及在教育界的聲望，可以幫助我執行國家的教育政策。同時又因爲當時國內教育以北方、南方和上海

爲重心，我選任這三位，還注意到區域分配。顧次長與北方教育界有淵源，章司長熟悉上海教育界情形，又代表私立大學；吳司長則因出身東南大學而執教北方，與南北兩方大學都有關係。所以他們具有南北公私立學校的代表性。這三位的職位發表以後，部內外都認爲人選適當。還有當時一部份人的一種疑慮，也一掃而空。原來我國自頒布三民主義的教育宗旨以後，已有人誤會爲「黨化教育」。以我曾經在黨部擔任要職的人主持全國教育，當然不免有人疑慮眞來實行「黨化教育」了。可是我到部以後，對於原來留職人員一概不加更動，而所補充的重要職位，都是遴選教育界知名人士來擔任，大家都可以釋疑了。不久蔣夢麟先生會見吳司長，曾經對他說：「自從教育部的新人事發表以後，我們知道陳部長係純粹從國家教育的立場來主持行政，大家都放心了。」即此一例，可見我進部後的人事安排，如何具有安定的作用。

這一班新人連同留任的國民教育司顧樹森司長、社會教育司陳禮江司長以及後來履任的余井塘次長、朱經農次長、賴璉次長、先任簡任秘書後主管社會教育司的劉季洪司長、總務司蔣志澄司長，和新舊的主管部門人員，都能深體抗戰時期教育責任的重大，各本所長，盡心竭力，和衷共濟，執行我的教育政策，使我在部七年獲得相當成就。我現在回憶起來，對於用人得當，固然覺得自慰，同時對於他們的貢獻，也是很時時感念的。

主持一部的行政，固然要注重主管部門的人選，而各主管部門的基幹人選，也應有適當

的安排。任用他們之權固然屬於部會長官，可是我的原則是由各主管自行保薦所屬由我核定任用，盡可能不由我直接委派。這一原則，可以避免部外的人情委託，也可以使主管為事擇人，易收指臂之效。我在部時間，各司處的人事協調，效率增高，一部份便由於這個由主管薦用幹部的辦法。以高等教育司而言，當時由司長薦用的專門委員及科長人選，如邵鶴亭、陳東原、黃龍先、任泰、韓慶濂、吳正華、馬繼援、柯樹屏、鍾健諸位同仁，皆是一時俊彥，該司陣容之盛，得未曾有。戰時高等教育建設較多，未嘗不是此等優秀幹部計劃與執行之功。其他各司處幹部任用情形，亦大致相仿。我此時追憶此一幹部任用政策的成功，也頗引以為慰。

執行部務的憑藉和助力

我在教育行政方面，有相當的成就，固然由於部內人事安排得當，部務進行順利，但這只是行政機構的運用順利，如無上峯和外界有力人士的指示和支持，以及教育界同仁的合作，還是不能有所成就的。我首先要感謝先總統蔣公即當時的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及行政院孔祥熙院長的信任及指示。先兄果夫當時供職黨部，對於教育有許多特到的見解，對我的行政也支持和建議。但是他對於教育部政策的決定和一切人事從不干與。關於教育方針的指示，我要特別感謝戴季陶先生。戴先生本是三民主義教育政策創議人之一。我實行這政策，對於

復興和發揚中國文化，常獲戴先生的指示和贊助，增加我的貫徹這政策的勇氣。在這一方面，我還得了吳稚暉先生的特別支持和鼓勵。吳先生本是教育學術界所推重的前進思想人物之一，他主張促進科學與工程教育，也曾有一時比較不重視中國文化，他在五四運動時曾主張黑漆一團的宇宙觀，並一度要把線裝書擲到毛廁裏去。可是在抗日時期，他對中國文化的觀點大有改變。他認爲在戰時發揚本國文化可以加強民族自覺，激勵愛國精神，對於團結禦侮，有莫大作用，所以改變了過去對於中國文化的態度，而大力支持教育部的政策。他什麼官也不做，但是他始終擔任教育部特約編審的職位，並正式受薪。他還接受部聘爲學術審議委員會委員，在這委員會，他每會必到，且對於教育部有關發揚民族文化的提案，無不贊助。以他過去在教育學術界和青年界領導的地位，一改過去主張，起而支持教育部的政策，這影響是很大的。

我在教育部七年的工作，要是沒有當時行政院長兼財政部長孔庸之先生的大力支持，是難有成就的。孔先生一生以「提倡教育，振興實業」八字爲志願的，時時以此抱負告人。戰時教育的種種措施，需要極多極多的經費。在抗戰時財政收入減少，而軍費浩繁，教育與文化在短見者看來，比較爲不急之務，國家不應爲此耗費鉅量金錢。可是當時的孔院長兼財政部長同意我的見解，認爲抗戰與建國應雙管齊下，教育青年乃是爲建國預儲人才，和抗戰同樣重要，也是實現他的抱負的機會。所以孔先生對於教育部的遷移學校、增設學校，以及對

於戰區青年的救濟，對於中等以上學校學生的貸金，一切所需費用，不顧當時行政院政務處長及財政部內部人員的反對而批准由國庫支給。這一筆龐大費用在國家財務支出上僅次於軍費。我在抗戰期內，在教育行政能有所施展，全靠孔先生對於教育費用的慷慨支給，這是十分值得感念的。

我還得感謝中央政治會議以後改稱國防最高委員會所屬教育專門委員召集人陳布雷先生，及財政專門委員會主任委員徐堪先生的大力支持。

戰時教育政策、方針與方案的訂定

我初接任部務時，面臨亟須解決的有兩大問題：第一是戰區逐漸擴大，學校員生不能在原地進行教學，紛紛內遷，流亡在途，除需緊急救濟外，此等學校，究應繼續辦理？抑緊縮歸併？此爲「量」的問題；第二是關於「質」的問題。在抗戰前夕，即有人高唱「實施國難教育」，完全改變了平時教育的性質，一切課程及訓練，均以適應軍事需要爲前提。因此亟須在平常教育與戰時教育兩者之間作一抉擇，這是「質」的問題。我當時根據抗戰與建國雙管齊下的國策，認爲建國需要人才，教育不可中斷。並且即在戰時，亦需要各種專技人才的訓練和供應，有賴學校的訓練。其時高等教育司吳俊升司長對此早有卓越的見解，他在來部之前，曾發表〈國難期內的教育〉一文，主張國難期內所需要的教育，不應只是在原有教育

外，另加一部分的特殊教育，而應該是全部貫徹救國目的的教育；也不應只是應付一時非常局面的教育，而應是應付來日大難的教育。我和吳司長意見相同，遂決定學校數量不僅不應減縮，並且依據需要，還須相當擴展。此爲對於量之問題之解答。其次關於質的問題，我認爲正常教育仍應維持，爲建國預儲人才，但爲適應軍事需要，應加特殊訓練以備隨時徵召。根據這種決定，遂於民國二十七年三月首先發表「告全國學生書」，說明教育政策，指示青年趨向。隨後因當時在訓政時期，國家一切重要政策，必須經過中國國民黨的決議，我便在二十七年四月召集的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討論抗戰建國綱領時，提出其中有關教育的綱領，經討論通過，原文爲：(1)改訂教育制度及教材，推行戰時教程；(2)訓練各種專門技術人員，以適當之分配，以應抗戰需要，(3)注重國民道德之修養，提高科學之研究與擴充其設備，(4)訓練青年，俾能服務於社會事業，以增加抗戰力量。

此外，復提出戰時各級教育實施方案綱要，亦經大會通過。此綱要規定九大教育方針及十七項實施要點。九大教育方針如下：

(1)三育並進。(2)文武合一。(3)農業需要與工業需要並重。(4)教育目的與政治目的一貫。(5)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密切聯繫。(6)對於吾國文化固有精萃所寄之文史哲藝，以科學方法加以整理發揚，以立民族之自信。(7)對於自然科學，依據需要，迎頭趕上，以應國防與生產之急需。(8)對於社會科學，取人之長，補己之短。對其原則加以整理，對於制度應謀創造，以

求一切適合於國情。⑼對於各級學校教育力求目標之明顯，並謀各地平均之發展。對於義務教育，依照原定期限，以達普及。對於社會教育與家庭教育，力求有計劃之實施。

至於十七項實施要點，係根據以上九大方針而規定的具體措施。關於學制、學校遷移與設置、師資訓練、課程教材、訓育、軍訓、體育教育經費、地方教育行政機構、教育經費、學校建築、留學政策、最高學術審議機構、邊疆與華僑教育、社會教育與家庭教育等項，均有具體規定。

以上經過黨部最高決策機構議決之教育綱領與戰時各級教育實施方案綱要，並通過國民參政會而由政府加以公布，遂成爲戰時教育實施之最高準繩。

統計數字所表現戰時教育的成就

抗戰期間教育部最顯然易見的成就，便是原有的各級教育，雖因國土淪陷、幅員縮小，以及人力物力的維艱，非但沒有萎縮，還有些學校在數量上大有增加。這對於學術文化的延續與發揚、建國人才的培育，以及對於當時抗戰所需專技人力的供應，都有貢獻。我不願意以枯燥的詳細統計數字來表示教育的量的發展，但將抗戰前和抗戰將勝利時有關各級教育的數字，列成比較表，以表示在艱辛抗戰中維持和發展教育的總成就。

項目	二十五學年度	三十三學年度	增減數
甲、專科以上學校			
校數	一〇八	一四五	(+)三七
教員數	七、五六〇	一一、二〇七	(+)三、六四七
學生數	四一、九二二	七八、九〇九	(+)三、六九八
畢業生數	九、一五四	一二、〇七八	(+)二、九二四
乙、大學研究所			
所數	二二	四九	(+)二七
學部數	三五	八七	(+)五二
研究生數	七五	四二二	(+)三四七
丙、中學			
校數	一、九五六	二、七五九	(+)八〇三
教職員數	四一、一八〇	六七、四七七	(+)二六、二九七
學生數	四八二、五二二	九二九、二九七	(+)四四六、七七五
畢業生數	七六、八六四	二一二、七八三	(+)一三五、九一九
丁、師範學校			
校數	八一四	五六二	(−)二五二
教職員數	一〇、二二二	一三、三四七	(+)三、一二五

學生數	八七、九〇二	一五七、八〇六	(+)六九、九〇四
畢業生數	二四、一六二	二六、八〇八	(+)二、六四六
戊、職業學校			
校數	四九四	四二四	(一)七〇
教職員數	八、六四五	九、八一一	(+)一、一六六
學生數	五六、八二二	七六、〇一〇	(+)一九、一八八
畢業生數	一〇、二九四	一四、〇三〇	(+)三、七三六
己、國民學校			
校數	三二〇、〇八〇	二五四、三七七	(一)六五、七〇三
教職員數	七四二、八七一	六五五、六一一	(一)八、七二六
學生數	一八、三六六、四九五	六一七、二二二、八一四	(一)一一四、三二四
畢業生數	二、一六六、三七七	三、八七一、六八八	(+)一七、〇五三

【資料來源】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

從以上數字的比較，可以看出專科以上學校無論校數、教員數、學生數，和畢業生數，在戰時均較戰前大量增加，這由於教育部鼓勵戰區專科以上學校內遷，並增設新校之故。中等學校除師範學校及職業學校校數減少外，教職員數、學生數、畢業生數，都較戰前增加。

中等教育之發展，由於政府控制地區中等學校之增加和國立中學三十一所、國立華僑中學三所、國立師範學校十三所、國立華僑師範學校二所、國立職業學校十三所之創設，國民教育完全由地方辦理，因爲淪陷地區國民學校未加入統計，所以戰時校數減少。但是教職員數、學生數相差無多，則因爲在後方十九省市推行國民教育，增加學齡兒童入學率之故。至於畢業生人數之增加，則由於最初推行國民教育，短期小學畢業生，亦計算在內。依三十三年度之調查，學齡兒童就學率已達百分之七十，比較戰前之百分之五十三，增加很多。

由上所述，可見各級教育在數量的發展上，並未因戰事受到影響，而爲了適應戰時的需要，更產生了許多新型的學校，這尤其是戰時教育的珍貴收穫，我想起教育界同仁在教育部政策指導之下，同心一德爲教育下一代國民的艱辛困苦情形，不禁神往。

專科以上學校的西遷與增設

教育部主管全國教育行政，其直接主管事業，係以國立專科以上學校爲主。所以在戰時的中央教育行政，其中心工作亦側重在大學、獨立學院及專科學校方面。戰事發生以後，華北及沿海、沿江一帶地區，相繼淪陷，而此等地區爲專科以上學校集中之地。當時教育部的當務之急，莫過於將此等學校的員生及圖書設備遷移後方，重振絃歌。後來戰事區域劇增，即在後方各校，復因敵機轟炸，亦須由城市遷設郊外。依教育部二十八年的統計，戰前專科

以上學校一〇八校，因戰事遷移後方者有五十二校，遷入上海租界或香港續辦的二十五校，停辦的十七校。其餘十四校，或是原設後方，或是原在上海租界，或是教會大學能在淪陷區繼續上課的。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所有遷在上海租界與香港以及原在上海租界辦理的各校，乃至原在淪陷區勉強維持的教會大學，都已停閉。其中一部分員生遷至後方，轉入他校，或遷地續辦。其原設在後方各省的專科以上學校，因受敵機轟炸，或因有受轟炸的可能，很多由城市遷移郊區的。實際當時全國專科以上學校照常開設未受戰事影響的，只有新疆文理學院一校而已。教育部對於這許多專科以上學校的遷移、接濟、決定遷設地點、籌措應變及經常費用、並將幾所私立或省立大學和學院改爲國立，以及對於後方受轟炸的學校之校舍和圖書設備的修整、補充，無時不在緊急應付情況之下，張羅補苴。並須適應需要設立新校，如師範學院及工、農、醫等學校，其工作之艱鉅，事後追憶，實非筆墨所可形容。

當時有許多學校一遷數遷，顛沛不堪，終能歸於安全地帶繼續開課者，如浙江大學，由杭州一遷至江西吉安，再遷廣西宜山，三遷至貴州遵義，並分設湄潭。如中山大學，由廣州一遷至廣西龍州，再遷至雲南澂江，復課未久，又遷至廣東坪石；遷校次數最多的是廣東文理學院，由廣州遷至廣西梧州，再遷藤縣，三遷融縣，四遷廣東乳源，五遷連縣，六遷曲江，七遷回至連縣，八遷羅定；遷移最遠的爲北平的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及天津的南開大學，初遷長沙，合設長沙臨時大學，再遷蒙自與昆明，改稱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一部分員生

由長沙遷雲南，係徒步前往的，歷盡險阻，終於全數安全抵達。遷校最迅速而完整的是國立中央大學，全部員生及圖書儀器，由南京溯江西上，直抵重慶沙坪壩建校。農學院農場的牛羊牲畜，舟運不便，則由陸路徒走驅策西行，亦安全抵達重慶。這些都是抗戰期間學校大遷移史中的珍聞。

這一番艱辛遷移工作，由於各校員生的勇敢與毅力而完成。但是中央及地方教育行政機關，決定遷移大計，適應軍事變化，隨時指示機宜，相擇地點，並撥給款項，亦煞費周章。這一切都是爲了保存國家元氣，是值得記述的。

在戰時不僅要儘可能維持原有的專科以上學校，還因應當時需要，新設若干學校。我鑒於師範教育爲教育的基礎，要求教育的改造與改進必從師範教育做起，所以除在幾所大學設立師範學院外，創立了男女師範學院各一所，其後並增設貴陽師範學院、南寧師範學院和湖北師範學院，又將西北聯大的師範學院，獨立設置，改稱西北師範學院。均按照戰時教育政策，進行中等學校的師資訓練。

注重實科教育，原爲戰前的政策。在戰時雖未強調此種政策，但爲適應戰時專技人才的需要，對於醫工學院以及各種技藝專工學校，也有所設。此等學校的增設，器材設備需要很可觀的經費，雖在戰費開支浩繁、日增困難情形之下，仍能請得鉅款，創設新校，在當時是很費一番努力的。

爲了訓練社會教育人才和音樂人才，又曾創設國立社會教育學院和國立音樂院。江西省內缺少大學，曾有國立中正大學的創設，而浙江省內，因爲浙大遷出，又添設了國立英士大學。這是應當地的需要而設置的。

因爲舊校的維持和新校的創設，所以在抗戰期內，大學教育非但沒有萎縮，還有大量的擴展。在當時有人不以此種政策爲然。可是以畢業生就業情形而論，在戰前有「畢業即失業」的譏評，而在戰時畢業的大學生，因爲軍事建設及後方工商業開發的需要，以及建教合作委員會的設立，畢業生更是有計劃的分發，自然有不少就業機會，尤其是工程及會計學科的畢業生，單是成都修建的鉅形飛機場就吸收了一大部份。其他的需要也是供不應求。至於勝利後的復員國家復興部門工作，更大量需要人力，幸有戰時的培植，也不至十分感覺匱乏。單就這一方面，即可表示戰時擴展大學教育的決策正確。

大學教育素質的改進

戰時大學教育不僅是量的擴展，在素質方面，也曾力求改進。在戰前國聯調查團對於我國大學已有批評，認爲地理分配不合理，課程不切中國需要，內容支離分裂，教授資格冗雜，教學方法偏於注入，建議改進。所有批評和建議，在當時未受充分注意而戰事已起。我受命主持教育部，認爲不僅應維持和擴展大學教育，還應該作合理的改進。關於地理分配不

合理一節，原來大學集中於少數地區，因爲戰時的遷移，此種不合理情形已自然解決一部分。我在決定各校遷移地點時，也曾注意合理分布的原則。但是因爲戰時種種限制，又因戰區時有變遷，所以沒有達到完全合理分配的理想。我當政府在武漢時，也曾有一通盤計畫，將大學的文理法三學院合成爲綜合大學，在後方分區設置；將農、工、醫、商、教育等專門學院由大學分開就各地區需要分別設置。當時並擬有各地分設綜合大學和專門學院的藍圖。此種革命性的措施，因爲上述原因，未能實行。

關於課程之不合中國需要，國聯調查團曾指出：「受外國教育之影響甚巨，對於重要學科之研究，大半皆藉一種外國語爲媒介，所用之材料及例證，亦多採自外國。」又說：「在華參觀之人，考查中國若干大學之歷史、政治科學或經濟之課程，若不能斷定此種計畫，究爲研究中國之西洋學生而設，抑爲研究西洋之中國學生而設，此等人實大有可原諒之處。而在自然科學方面，教學偏重外國之情形，尤爲顯著。」（見國聯教育調查團報告書）此種批評，婉而多諷。我自接任教育部長以後，對於大學課程的不當，亦有同感。我曾說：「文化侵略者對於所侵略的國家，首先要毀滅其歷史文化，我起先對於這些陰謀，還不大瞭解，民國二十七年到了教育部以後，才恍然大悟。那時沿江、沿海都被日軍佔據了，所有大學都往後撤，我一一爲之安頓下來。我發現這些大學都像外國租界。這個完全採德國學制，那個完全採法國學制，其他不是採美國制，即是英國制。但是採中國學制的又在那裏？課程五花八

門，毫無標準，有關中國歷史的部門爲最缺乏。學政治或經濟的不談中國政治或經濟制度史，談農的不談中國農業史，國文更是最不注重的一門功課了。我於是下了決心，請了專家訂定大學課程標準，分『必修』『選修』兩種，把中國人應知的中國各部門的歷史材料放入必修科，無教材的則獎勵寫作。使中國的大學像一座中國的大學，我排除了一切的障礙，收回了文化的租界。」（見自著《從根救起》，六五頁）我雖於五十多年前收回了文化租界，可是迄今五十多年來，各大學的課程仍有不適合中國的需要者，居然連中國通史也有人主張取消了，豈不又漸漸退回到租界的景象嗎？言之可慨！

吾國還是農業國家，水利應列第一要務，而抗戰開始後，全國唯一的南京河海工程學校，也停辦了。肥料沒有學校研究，可以出口換取外滙的農產品如豬鬃、桐油、茶葉等，竟沒有一個專科學校來研究改良的；瓷器、絲及絲織品爲重要出口物品，亦少爲此而有專科或職業學校之設立。如此建教分立，無怪乎國家經濟愈來愈差，這是我在部設立建教合作委員會之主因，後來在各大學分別設立上述各科系，以配合當地產物之需要，也是如此。

關於整理課程的步驟，先是在二十八年二月由部決定了整理大學課程的三個原則：㈠規定統一標準，不僅在提高程度，且與國家文化及建設的政策相吻合；㈡注重基本訓練，先從事學術廣博基礎的培養，由博反約，不因專門的研究而有偏頗之弊；㈢注重精要科目，所設科目，力求統整與集中，使學生對於一種學科的精要科目，有充分的修養而有融會貫通的精

神。至於課程內容科目，則規定有共同必修、分院必修及分系必修及選修各類。此三原則所以糾正當時大學課程不切國情及支離繁複的流弊，且與後來美國和英國倡行之通才教育精神相符合。

整理大學課程，除了規定科目表而外，進一步便是擬訂各科目教材內容，以備各校試用。因於二十九年征集各院校各科目之教材綱要，邀集各科教授數百人，開會審擬數百次，經二年的努力，於三十二年編定各科教材綱要草案共四十二種，頒發各校院參酌試行。

在規定必修科目表時，有若干關於中國歷史的科目，如中國法治史、中國政治史等，雖經規定，因爲過去的忽略，有若干院校苦於無適當教材。雖經試頒內容綱要，但仍不足解決教學之困難，因而教育部決定編輯大學用書，以供各校參考試用。民國二十九年成立大學用書編輯委員會，擬訂編輯計畫，分公開徵求、特約撰述，及採用成書三種辦法。至三十二年特約撰述者計五十八種，公開徵稿得八十八種，採用成書計十七種，合共一百六十三部。其中不少屬於自然科學者。此種措施，對於學術之中國化，也即是對於所謂收回文化租界，爲基本要圖。但是大學用書與教科書不同，只供大學教員學生之採用或參考，並未限制各校必須採用爲課本。當時也有一部分學者專家，以爲妨害講學與研究的自由，實屬誤會。

提高大學素質，除了整理課程而外，還著手審定師資，並對學富資深者特予以優禮與獎勵。原來大學教員，尤其教授一職，其資格漫無標準，涉近冗濫，國聯教育調查團，早有批

評，社會亦嘖有煩言。在我到部以前，教育部原已訂定大學教員資格規程，並擬從事審定，因事未果。我到部以後認爲提高大學素質，審定教員資格正名定分，並多以優禮獎勵，乃當務之急。因於二十九年頒布大學及獨立學院教員資格待遇暫行規程，與大學及獨立學院教員資格審查暫行規程。規程中分教員爲教授、副教授、講師、助教四級，其資格與待遇及審定辦法與升等年資均有適當規定。當辦法初頒布時，有極少數學校教授認爲由官廳審定資格，有礙他們清高的身分，不以爲然。後來知道審查教員資格，由教育部特設之學術審議委員會主持，而此會的人選，十二人由部直接聘任，十三人由國立大學校長選舉，再由部聘任，此外部次長與高等教育司長爲當然委員，學術專家居絕大多數。審查尊重專家意見，甚爲審愼而客觀，他們便漸得諒解。同時部中對於審查合格教員可准休假進修，亦可發研究費及獎助金。又對於合格資深望重之教授，經過同科目教授之選舉可以擔任部聘教授。此種種優禮辦法，使當初懷疑者感覺審定資格，正所以尊重教授地位，並爲優禮之準備，都個別或集體送審。審查工作便得順利進行。自二十九年至三十三年，全國大專學校教員送審者達七千人，已審查合格者五千八百餘人。依照規程審查的結果，使過去任助教、講師、積有年資，教學有特殊成績並有著作者可以升等。這便改革了過去任教授或副教授必以留學回國得有學位者爲限，而本國畢業雖任教多年有成績、有著作之教員，甚至所教學科與國外研究無關者，亦沈淪在助教與講師之地位而不得升等之不良措施。這樣對助教、講師有激勵作用，使他們更

努力教學與研究，同時也解決了戰時新增學校師資荒之困難。

統一招生制之創立及其他考試制度之改進

爲了齊一大學生入學水準以及解除高中畢業生各處奔波參加各大學入學考試的困難，我決定實行在後方十九省市分區舉行大學入學統一考試辦法。原來在國聯教育調查團的建議中，本有大學入學考試統一舉行一項，當時沒有實行。在戰時因爲交通困難，我感覺更有實行統一考試的必要，便於二十七年度起開始實行。教育部成立統一招生委員會，各考區分設招生委員會辦理報名考試閱卷事宜。考試科目及日期由教育部統一規定，試題統一由部頒發。錄取及分發學校由部中統一招生委員會主辦，由部公布。統一招生連續辦理三年，對於整齊入學水準免除學生奔波之苦，並保證錄取的公正無私，又可減少各院校個別辦理入學考試的浪費，實屬一舉數得。可是事後回溯辦理情形，頗覺茲事體大，教部負荷此責任，實需充分勇氣。其困難情形第一是在交通方面。各考區分散在後方，試題全靠派員乘飛機專送，萬一飛行阻礙，試題不能於統考之日抵達，即生困難。還有戰時敵機出襲頻繁，萬一考試之日，試場受襲，或因警報而散場，則統考即受破壞。再者試題的保密，因爲分區複印，也增加困難。幸而繼續辦理三年統考，由於準備的周密和辦理人員的勤謹負責，都得順利完成。後來因爲戰事擴大，交通更增困難，改爲分區聯合招生。有的院校最初感覺統一招生，不能

自行作主，此時改爲聯合招生反覺其不便了。可知一般人對於若干良法美意，難於圖始，而樂於觀成。

爲了提高學生程度，我還改進畢業考試辦法，除學期學年考試外，增加了畢業總考。現時歐美大學，對於處理學生畢業問題，有兩種極不相同的辦法。一種辦法是平時無成績考核，畢業考結總賬，如德國即採此辦法。一爲注重平時及學期考試，考試及格，給予學分。學生通過多次的考試，累積學分至一定數量，即准畢業，此爲美國通行之辦法。中國大學在戰前原採美國辦法，國聯教育調查團對此辦法認爲「至不妥當」，並建議學生須在最終試驗及格，方可畢業。我到部以後，對於畢業考試，採一折衷辦法，即略改原制而另加一畢業總考。依此辦法，學期學年有考試，亦是累積學分，但規定學生須修足四學年課程，方可應畢業考試，畢業考試非僅考最後學期之課程而是必須舉行畢業總考。此種辦法，因爲平時有學期學年考試，對於學生之學習進程，隨時有督促與考核，但不是只要求學生累積若干學分，即可畢業，而要在舉行總考時，使學生對以往四年所有主要學科有一通盤複習，使其對所獲知識作最後之整理而得系統的了解，不致東鱗西爪支離破碎，有學分制之流弊。此種折衷辦法，使學生之學習心理不致視學習與準備畢業考試爲一事，比德國及英法兩國類似的辦法，也尚勝一籌。

除了入學考試和畢業考試的重要改進而外，爲鼓勵在學學生平時勤勉求學，教育部還舉

行了幾次「學業競試」。由部內所設學業競試委員會，每年就各院系主要學科命題，送由各院校任學生自由參加競試。競試成績彙齊評定，對最優及次優者分別獎勵，並予以公布。此種競試頗能發生激勵作用，也眞能識別眞才。舉例而言，獲得諾具爾獎金的楊振寧便是在西南聯大參加全國物理科學業競試而獲得最優獎的。香港的西文記者張國興，也參加英文競試而獲得最優獎，他以獎金買了一雙新球鞋的得意情形，至今還向人樂道。

訓育制度之重視

要改進大學素質，健全大學行政組織，增加行政效率，也屬必需。過去大專學校，不僅教學與課程諸多歧異，學校行政組織亦多紛歧。教育部在二十八年訂頒大專學校行政組織要點十二項，規定各校均設教務、訓導、總務三處，各處首長都由教員兼任。其中訓導處的設置，乃由於種種需要。第一，由於推行導師制，須有統籌的機構；二因戰時學生貸金、救濟、疾病照顧及徵調種種有關學生事務增多，需有主管機構；三因戰時須集中意志爭取勝利，青年行動須有積極指導方可免入歧途，妨礙抗戰。因爲這三種需要，所以各校都設有訓導處。訓導處爲事實所必需，有一事實可以證明。原來在戰時即有少數人誤會訓導處的設立偏重於行政方面的對於學生消極管制，而主張不設訓導處，以訓育委員會來代替的。勝利復員以後，北京大學首先改制，即由教授組織的訓育委員會替代訓導處。孰知訓委會只是商量

訓育方針，無人負實際行政責任，而戰後學生事務有增無減。學生有所請求，均直接向校長請求，校長室門庭若市，校長的辦公時間多數消耗於應付學生事務。當時的胡校長適之，感覺到事實有此需要，又把訓導處恢復設置了。這一事實充分說明了，任何制度如根據需要而產生，此需要一日存在，便不能依任何成見而輕於廢止的。

擔任訓育工作的老師，除了指導學生如何做人而以身作則外，對於所訓的人，自應有一崇高的理想，因此我就寫了一篇〈訓育綱要〉呈奉蔣委員長核定後頒布施行。其要點僅十六個字：「自信信道，自治治事，自育育人，自衛衛國。」先此曾頒布全國各學校共通校訓：「禮義廉恥」四字，以此四維教導學生。

大專教育的改進，在戰時還有其他種種措施，不一一縷述。現在回憶經過，作一簡單檢討。可以說戰時大專教育的維持和擴展，確是符合抗戰建國的政策，適應學術文化與社會建設的需要。所造就的人才十多萬人，除不幸淪陷在大陸者外，現在台灣政、軍、社會、學術各界服務的五十歲上下的人士，大多數是在抗戰時間受過戰時大學教育的。由於他們對於國家社會的貢獻，蔚成今日富庶安定的台灣。還有現在美國的上萬中國學人多數獲得友邦人士的讚美，也多數是戰時受過專科以上教育的。從此種具體的事實，可見戰時大學教育，總算獲有成效，我回憶及此，亦引以自慰。

中等教育的新頁

教育部向來不直接主辦中等教育和國民教育。教育部只是決定政策和方針，制訂法規，監督地方教育行政機關辦理中等教育和國民教育。在戰時教育部對於中等和國民教育的措施，大都還是指導監督而非直接主辦。可是因爲戰時的特別需要，也有例外的措施。

由於戰區的擴大，沿海各省市泰半淪陷，戰區青年或由於我方招致，或由於隨家遷徙，紛紛流亡於後方各省市，人數衆多。後方已有中等學校，無法收錄，勢必另予求學機會。加以戰區中等學校教師也紛紛流亡後方，生活無著，亦須加以安置。最初將此等教師組織成若干教師服務團，一面爲戰事服務，一面由部給予薪金。但一時救急，終非長久之計。因此，教育部便決定直接負起中等教育的一部份職責，不讓後方各省增加負擔淪陷各省之中等教育經費，創辦了國立中學三十一所，國立華僑中學三所，國立師範學校十三所，華僑師範學校二所，國立職業學校十三所，共有六十二所之多。計收容學生約五萬餘人，安置戰區中等學校教師亦有數千。此等國立中等學校，不僅可以供給戰區教員及青年以就業就學的機會，還因爲各校教員大多來自沿海沿江比較成績優良的學校，由他們辦理中等學校，對於後方省市還有示範作用，對於改進一般中等學校素質，亦有貢獻。

抗戰期內，教育部對於各省市中等教育的指導，其重要措施之一，爲訂頒各類中等學校劃分學區辦法，通令各省依照省內人口、交通、經濟、文化發達情形，分別劃定三類中等學

校（中學、師範、職業）校區，分區設置各類學校，以免重複、集中與偏枯。此項辦法自二十七年頒佈後，各省均擬訂實施計劃，經部核准後分別施行。其中學區則注意小學升學兒童之比例。職業學校區則注意配合地方經濟特產。師範學校區則注意區內小學師資之需要。三十一年復頒訂中等學校設校增班注意事項，對於具體實施作進一步之指示。

因爲上述法令的頒佈，和各省市的遵照推行，使戰時中等教育在區域和比例方面有合理的分配，也爲戰後中等教育定下了發展的藍圖。

規定中等學校課程，也是戰時改進中等教育一種重要的措施。除了在中等教育添設戰時特種教材和實施後方服務訓練外，教育部還從事各校教學科目及時數表和課程標準的修訂。二十九年修正公佈了高初級中學教學科目及時數表。三十年跟著修訂完成了各科目的課程標準。

中小學所用的教科書，在戰爭後期，由教育部統編，交由各書局印銷，乃是戰時重要教育措施之一。在戰前，我國中小學教科書，採審定制，戰爭後期，改爲所謂「國定制」。當時以及在戰後，頗有人批評爲「統制思想」或「與民爭利」。這種批評，由於不了解當時的情形。教育部統編教科書交各書局印銷，乃是爲了適應當時情況被迫而出此的。抗戰時期，後方各中小學校，非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供應教科書的各大書局，除正中書局外，最初都沒有遷移後方。因而教科書供應數量大爲減少，供不應求，形成嚴重的書荒。教育部雖曾徵

用正中的教科書，但是因爲課本不全，仍未能全部解決問題，其他書局原在後方的分局，把民初的課本也掃數推出了，還是不敷分配。民國二十八年，教育部召開全國國民教育會議於重慶。各省市教育廳局長紛紛向教育部索書。教育部無法供應，只訂出中小學用書補充辦法，臨時應付。辦法之中規定無法購得教科書之科目，暫准油印講義分發應用。甚至規定小學寫字作業，以抄書代替，以供無書的學生使用。書荒的嚴重情形，可以想見。在三十年中小學課程標準頒佈以前，各書局的舊書，尚可適應一部分需要。新課程標準頒布以後，照例各書局都立即依照改編教科書送審備用，但是各書局因限於人力物力，祇能維持現狀，不能改編新書，而舊書的供應，由於限於物力，又都是版本縮小，紙張粗劣，印刷模糊，不合標準。教育部爲了維持中小學校教育水準及維護學童健康，勢不能不採取根本解決的辦法。這辦法便是中小學教科書，由部依新課程標準統編，交各志願書局分印供應。部編教科書係交由國立編譯館負責。編輯的程序，甚爲審慎。先由編譯館經過初編、審查、校訂、送部核定後交書局出版供應。此爲暫行本，作臨時應急之用。暫行本行用之後，由編譯館徵求各學校及各專家意見，加以修訂，由部核定後交書局印行，此爲修訂本。修訂本使用後，再根據各方意見，由編譯館作最後修訂，經審訂後發行，此爲標準本。標準本經過此周詳審慎的程序而最後作定本供應，雖不能說盡善盡美，總算已盡其可能以求其善美了。

從以上的敘述，教育部負責統編教科書，由於後方紙張缺乏、印刷困難、書局能力有限

種種情形之逼迫，乃出於不得已，毫無「統制思想」的用意，更談不到「與民爭利」，當時各書局都極諒解而願與教部合作的。教育部的主旨，只在於使中學學生有適當充足而合於新標準的教科書可讀。而在戰時物力人力維艱之時，却是集中各方面的智慧和毅力才能做到的。

國民教育的推進

國民教育向爲地方政府所主辦，在戰前各級教育之中，以國民教育爲最落後，小學並未普設，學齡兒童就學率很低。國民政府遵行黨綱中厲行普及教育之規定，曾經數次頒訂實施義務教育辦法，未見顯著成效。民國二十四年再訂實施義務教育暫行辦法大綱，令各省市自該年八月起施行，漸著成效。據統計，民國二十五年的學齡兒童入學的比例，已由二十三年百分之二九・八二增至五三。抗戰之後淪陷若干省市，國民教育所受打擊最大。我到部以後，一面令後方及敵後各省市繼續依實施義務教育暫行辦法大綱，推行義務教育；一面對國民教育作根本的改造和積極的推進，七年的努力，有顯著的成就。舉其犖犖大者：有建立國民教育制度；訂頒推行國民教育計劃；督促並輔導各省市實施國民教育計劃，計年責其成效；使國民及中心國民學校之數增加，學齡兒童入學比率逐年增大，文盲數逐年減少。現在就此數點，加以敘述。

國民教育制度係配合二十八年政府所頒佈的「縣各級組織綱要」，即所謂「新縣制」而建立的。這新縣制中關於教育方面的規定，有下列要點：

1.每鄉（鎮）設立中心學校，每保設立國民學校。

2.鄉（鎮）中心學校與保國民學校均包括兒童、婦女、成人三部分，使失學民衆補習教育與義務教育打成一片。

3.鄉（鎮）長、中心學校校長及壯丁隊長、保長、保國民學校校長及保丁隊長，均暫以一人兼任之。在教育經濟發達之區，鄉（鎮）中心學校校長、保國民學校校長以專任爲原則。

4.鄉（鎮）中心學校教員；兼任鄉（鎮）公所文化股主任及幹事，保國民學校教員兼任保辦公處文化幹事。

上列各要點，與原有教育法令出入頗多。教育部依照各要點將前此推行之義務教育與失學民衆補習教育，合併實施，統稱曰國民教育。部中主管單位亦改稱國民教育司。原屬社會教育司主管之民衆補習教育，亦改歸國民教育司。並於二十九年三月訂頒「國民教育實施綱領」，令各省市試行，國民教育新制度，遂隨著新縣制而訂立。此項綱領試行三年以後，根據試行結果，對於新縣制中之規定酌有改變，使合於教育實際需要。爲完成法律基礎起見，特草擬「國民教育法」以代替原有之「小學法」。「國民教育法」經立法院通過後，於三十

三年公佈，國民教育制度便成爲法律，爲其後實施國民教育之基本法。國民教育法，變更縣各級組織綱要中的規定的，有下列重要各點：

1. 確定中心學校名稱，改稱爲中心國民學校。
2. 保國民學校及鄉鎭中心國民學校，不限定設置一校。
3. 私人或團體，亦得設立專辦國民學校兒童部之小學。
4. 確定國民學校及中心國民學校均隸屬於縣政府及院轄市之主管教育行政機構。
5. 確定國民學校及中心國民學校教職員應協助鄉鎭公所及保辦公處，訓練民衆，推行地方自治。
6. 確定學齡兒童及失學民衆之強迫入學，另以法律定之。

以上各點規定，都較新縣制之規定，更合於教育需要。可是因爲改變新縣制的有關教育規定，遭遇不少阻礙，我爲了克服阻礙，在行政院陳述，在中央黨部提案，並請國民參政會通過議案，最後經過立法院的決議，不知經過了多少說服工作，最後始克完成法律而奠定了國民教育新制度。

制度建立，不能自行，我們還訂了實施計劃，督促各省市推行。在二十九年公布之「國民教育實施綱領」中，已訂有施行程序一章。在此一章中，規定國民教育之普及以五年爲期。自二十九年八月起至三十四年七月止，分三期進行。

第一期：自二十九年八月起至三十一年七月止爲第一期。在本期內各鎮（鄉）均應成立中心學校一所，至少每三保成立國民學校一所。在本期終了時，須使入學兒童達到學齡兒童總數百分之六十五以上；入學民衆總數達到失學民衆總數百分之三十以上。

第二期：自三十一年八月起至三十三年七月止爲第二期。在本期內保國民學校應逐漸增加，或就原有之國民學校增加班級。在本期終了時，須使入學兒童達到學齡兒童總數百分之八十以上；入學民衆達到失學民衆總數百分之五十以上。

第三期：自三十三年八月起至三十九年七月止爲第三期，保國民學校數應盡量增加，以期達到每保一校爲目的，或就原有之國民學校增加班級。在本期終了時，須使入學兒童達到學齡兒童總數百分之九十以上，入學民衆達到失學民衆總數百分之六十以上。

上項分期普及國民教育計劃，經教育部飭令各省市參酌當地實況，加以實施，爲了實施的順利進行，教育部並訂定訓練師資及籌集經費辦法令各省市照辦。中央與省並補充縣鄉實施普及國民教育的經費。中央財政已因應付軍用，十分困難，可是我向中央竭力陳述國民教育的重要，所以能做到在中央教育預算中，列入普及國民教育的補助費。

國民教育經過中央的訂定計劃，並補助經費和隨時派員視導，分期推行的結果，已能逐漸接近原訂分期應達到的標準。茲以三十三學年度（即是實施的第四年）爲例。此年度實施國民教育的有後方十九省市。其鄉鎮數共爲二六、四一四。其保數爲三〇三、七九二。已設

國民學校（包括中心國民學校）共計二十五萬四千三百七十七所。平均各省市已超過每三保有二校之規定，距第三期終了後每保應有一校之規定，已經不遠。

再以學齡兒童的入學率而論：三十三年度後方十九省市共有學齡兒童三千四百十一萬餘名，入學兒童數計共有一千七百二十二萬餘名，連同已受義務教育而不在校之學齡兒童，合計學齡兒童已入學者約共有二千五百餘萬名。入學兒童總數約佔學齡兒童總數百分之七十強。比較戰前之百分之五十三，大有增進。在戰時各方人力物力維艱之時，能對於國家基礎教育加以推進而有此成績，我教育界實可以自慰。

關於國民教育的其他重要措施，尚有有關籌劃國教經費、訓練師資，及優待國民學校教員等各項法令的公佈；有各省市教育行政機關在實施國民教育應行注意事項的訂頒。幼稚園規程，修正小學各科課程標準，小學訓育標準也先後訂頒。三十三年由國民政府公佈的國民學校法，將戰時對於國民教育的創制，作法律的制定，也奠立了國民教育久遠的基礎。

社會教育的創新

社會教育，關涉多方面，比較為不定型的教育，且當抗戰時期，人心士氣的振奮，敵愾同仇心理的激發，亦多賴社會教育助其宣傳與推動，所以戰時的社會教育很多創新的機會。此時回憶，有許多措施，值得記述的。

教育部原來直接主管的各社會教育機構，爲與民族文化學術有關之國立圖書館與博物院，如中央圖書館、中央博物館、北平圖書館、故宮博物院。此等院館的文物和人員均於戰爭初起時，即已向後方遷移。我到部以後，認爲這些都是國家民族學術文化命脈所寄，應妥爲安置。所以先後指定適當的地點，勘定館址，繼續開辦，其正在籌備中者，並助其剋期成立。此等院館雖然歷經遠遷，所有圖書文物均無散佚，且有增添。如河南古物原屬地方，撥歸中央院館保存開放觀覽。如上海藏書家珍本圖書，經撥鉅款派中央圖書館蔣復璁館長冒險間關前往搜購，加入收藏，以免敵僞攫取或毀壞，這於保存民族文化，都很有貢獻。此等圖書文物連同藏在海外珍本圖書，均克於大陸淪陷前完整遷移台灣，使故宮博物院與中央圖書館先後復館完整無缺，爲中國文化大放光明，戰時的保存和增加，種種努力，值得紀念。（有關社會教育設施之「中央圖書館設立及善本書籍搜購與保存經過」另於後述及。）

除了恢復並發展原有國立院館而外，在戰時還創設了好些中央社教機構，三十一年籌設中央民衆教育館於重慶；三十二年籌設國立西北圖書館於蘭州；（後改稱國立蘭州圖書館。）三十三年由中英庚款董事會收辦國立甘肅科學教育館；三十二年成立國立禮樂館於重慶，同時復籌設中央美術館於陪都；國立敦煌研究所於甘肅。凡此館所，與原有遷移各館不同，都係憑空締造。初創之時，未免簡陋，但逐漸經營，頗具規模。在懸格過高者看來，未免因陋就簡，但我的政策是「先求其有（眞），再求其好（善），更求其（美）」，由無而

有，由有而好，由好而美，乃是一切事業發展的三級過程。如懸格過高，先不能有，那可能好？更難得十全十美。尤其在戰時一切物力人力維艱，如只求好，則將一事不能興辦。我主持教育行政，不僅對於社教機構的創辦，取由有而求好的政策，對於其他教育事業，也莫不如此。戰時教育不僅未萎縮，且有蓬勃氣象，莫非由於採取這個政策的結果。

除上述各館外，教育部爲適應需要，還直接舉辦了其他多種社會教育工作。戰區社會教育人員流離失業，教育部舉辦登記，先後共達一千八百餘人，組成兩社教工作團，派赴後方各省市從事抗敵宣傳及社教工作。二十九年改爲正式任用，化救濟工作爲正式社教事業。三十一年將此等人員組成西南、西北、川康等三社教工作隊，深入公路沿線城鎮，以及窮鄉僻壤從事抗戰宣傳及社教工作，使民間明瞭抗戰意義，引起敵愾同仇心理，對於支持抗戰，深有影響。二十七年起教育部組織之巡迴戲劇教育隊共四隊及實驗戲劇教育隊一隊（後改稱實驗劇團），遍歷東南、西南、西北各省重要城市，巡迴上演，觀衆逾千萬人，對於宣傳抗戰及提倡四維八德，現身說法，收效不少。此外，還將原遷後方的國立戲劇學校，改爲國立戲劇專科學校，採五年制，收初中畢業生，加以深造。原設山東的省立實驗劇院，也改爲國立戲劇學校，訓練正規戲劇人才。

禮與樂爲德育之兩輪，故音樂可以調和人性，爲社教有力工具，所以我在戰時也竭力提倡。先在部內設音樂教育委員會，從事計畫與研究，繼在重慶青木關創設國立音樂院，在福

建創設國立福建音專，並恢復上海音專，多方訓練音樂專才。又接辦中華交響樂團，提倡社會音樂。曾先後舉辦陪都千人大合唱與白沙萬人大合唱，振大漢之天聲，對於激勵民心士氣，不無貢獻。關於音樂學術方面，曾由音樂教育委員會進行編訂音樂詞典，擬訂標準音律，並曾擬訂「中華新韵」，由部請政府公布。

美術教育，在戰時亦多興辦。除中央美術館與敦煌研究所外，並成立藝術文物考察團，先後在陝西、河南、甘肅、寧夏等省工作，並在陪都舉行敦煌藝術展覽會。

對一般社會推行科學教育，在戰前，山西、福建兩省原有科學館的設置；戰時除創設國立科學館外，並督促各省市設置科學館，除施行通俗科學教育外，並對戰時科學設備簡陋的中等學校學生，給予觀察和實驗的機會。各省市先後遵令設置科學館者有川、湘、鄂、贛、黔、桂、康、滇及重慶九省市。

電影與播音爲推行社會教育的最有效的工具。我在入教育部以前，已經對於教育電影，特別提倡。入部以後對於利用電影與播音施教的所謂電化教育，特別推進。先在社會教育司特增設一科，主管電化教育。並令各省設電化教育輔導處，先後成立者有十八省市。三十一年創設中華教育電影製片廠。又成立電化教育巡迴工作隊，分赴十九省市巡迴示範。截至三十三年十二月底止，共成立五十二隊之多。戰時電化教育器材甚爲缺乏，教育部勉籌外匯，逐年購發收音機交各省市應用，並在部內設立幻燈製造室，試製植物油幻燈機及電石幻燈

機，鏡頭即用國產玻璃，用水力及人工磨製，各完成三十架，可放映玻璃幻燈片。又試製透明幻燈片，印成歷史偉人事蹟一套，用捲筒放映，均已發放無電源的邊遠地區的學校和社會機關應用。這是抗戰期間與環境艱苦奮鬥的一個事例。關於增加電化器材的來源，擴大民衆教育，我曾想向美國請求幫忙，贈與小型電影機及幻燈放映機，把這個計劃告知當時設在重慶的美國新聞處的處長費正清君，託其回美國幫幫忙。不料這位思想左傾，後來處心積慮幫助共匪要摧毀我們政府的哈佛教授，非但不幫忙，竟在哈佛大學發起所謂倒陳運動，誣指我以統制思想之罪。我知道我這一個向農民施教的大規模文藝運動，是共匪所最害怕的，於是其同路人（至少如此看法）費正清就幫助他們來這一手。後來我離開了教育部，這個計劃也就吹了。這是推行電化教育過程中的一大損失。（另有關「推行社會教育誣爲思想統制」於後感想述及）

教育部除了直接施行各式各類的社會教育，如以上所述外，還制頒法規，令各學校兼施社教，並推動各省市推行社教。其中比較重要的如各學校實施社會教育辦法、民衆教育館規程、民衆教育館工作大綱與民衆教育館輔導各地社會教育大綱、省市立科學館規程、體育場規程等等，另外還有二項法律案的完成，一項便是補習學校法，是由教育部所擬經過立法院通過公布的。這補習學校法的要旨，便是各級補習學校列入學制系統之內，和正規的高中以下各級學校並行。另一法律案，便是國民體育法。

教育部爲擴大社教，還制定了各種節日，每年二月十五日爲戲劇節，三月二十九日爲青年節，三月二十五日爲美術節，三月二十六日爲廣播節，六月六日爲工程師節，四月五日爲音樂節，九月九日爲體育節，九月二十八日爲教師節。關於青年節和工程師節規定的經過，需要特別敘述的。原來在戰前，已經非正式的以五月四日爲青年節。我認爲黃花崗起義比五四運動更能表現青年愛國、犧牲和奮鬥的精神，所以便改以三月二十九日爲青年節。至於六月六日爲工程師節，是這樣的：我記得在教育部任內，被中國工程師學會推爲會長。我對於素所尊敬的顧頡剛先生，曾經作了一件極有意義的事，他是一位極有名的歷史學教授。忽然發了奇想，寫一篇文章說，大禹是個蟲，沒有那麼一個人。他的理由是很欠缺的，但是他的名氣很大，居然有人相信。我聽了非常嘔氣。我想難道離孔子一千幾百年的大禹，孔子對他尚且非常讚美的人，反不及四千年後的顧先生所得的文獻更爲可靠，何況孔子一向重視證據，無可靠的文獻，他不寫作。我於是伺機去找顧先生，請他考據禹的生日是何月何日，以備提出工程師年會拿這一個日子作爲工程師節。他考據了以後，寫了一封信給我，說某年六月六日是大禹的生日，我就根據他的信提出工程師聯合年會，經全體會員一致通過。我隨即宣佈，從是日起大禹不再是個蟲了，因爲蟲的生日是無法知道的，這是顧頡剛先生負責考據出來的，有信爲證。大家皆哄堂大笑，我就救了顧頡剛先生。現在每年六月六日所舉行的工程師節，是這樣來的。（原文並見自著《從根救起》第六六—六七頁）定孔子誕辰爲教師節也是有意

義的，因爲以至聖先師的誕辰爲教師的節日是恰當不過的。最近美國加州從而效法。墨西哥亦繼起採用。甚至美國衆議院已通過同一方案，以孔子誕辰九月最後之星期日爲獎勵優良教師之節日，一待參議院之通過即可成爲法案。我們創例於先，亦可以自豪矣。

最後我要講戰時關於掃除文盲的成就。我國過去社會教育的最大工作爲推行民衆補習教育，其實即是掃除文盲。掃除文盲工作在二十九年度以前，由社會教育司主管，自三十年度起實施國民教育，民衆補習教育改屬國民教育之成人教育部份，由國民教育司主管。據教育部三十三年度統計，後方十九省市共收教成人數爲八百六十七萬二千一百十五名。加以歷年掃除文盲數爲四千七百三十一萬六千五百四十一名，共掃除文盲五千五百九十八萬八千六百五十五名。此雖距清除文盲之目標尚遠，但已盡相當之努力，而獲有可觀之成效。

邊疆與華僑教育的展開

我國邊疆地區，民族特殊，文化落後，邊疆教育，在戰前已有特殊設施，對日戰事起後，邊疆各省成爲抗戰之重要根據地，教育文化，亟待推進。因而邊疆教育非但未被忽視，且有很大的發展。

邊疆教育方針的確定爲重要成就之一。二十八年全國教育會議通過教育部所提的「推進邊疆教育方案」，以及三十年行政院根據教育部草擬所頒佈的「邊地青年教育實施綱領」，

乃戰時實施邊疆教育的準繩。「綱領」中確定以「蒙藏及其他各地之人民，其語言文化具有特殊性質者」爲實施邊疆教育的範圍，邊疆教育之宗旨則規定爲遵照中華民國教育宗旨，切實推進邊地教育，徹底培養國族意識，以求全國文化之統一；並根據邊地人民各別之特殊環境，切實謀其知識之增高，生產技能之增進，生活之改善，體育衛生及國防教育之嚴格訓練。該項「綱領」復明白規定「中央對邊地青年教育，依一般教育行政系統，仍由教育部主管」。由於此項規定，向由中央政治學校、中央組織部及蒙藏委員會等機構所辦的邊疆學校，均改隸教育部主管。邊疆學校之隸屬，乃歸統一，而教育部亦由此增加了責任。

爲了推廣邊疆教育，教育部不僅接管和維持原有的邊疆學校，還增設了各級的邊疆學校。截至三十二學年度爲止，爲了直接教育邊地學齡兒童，並實驗示範起見，設有國立邊疆小學十七所。戰時不僅有國立中等學校，還有國立小學，這是爲適應需要特殊設施。爲培養邊地師資並貫徹邊教政策起見，我們接辦並創設了國立邊疆師範十二所，內有師範附小十四所，國立邊疆中學三所，國立邊疆職業學校九所。教育部直接主管的邊疆學校共計四十三校，學生達五千八百五十八人。（師範附小學生未計入）

爲求邊教推行順利，教育部復積極推進邊疆考察與研究工作。除零星派員赴察哈爾、綏遠、寧夏、青海、甘肅，及新疆等邊地考察外，並組織了教育部西南邊疆考察團，於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間在四川、雲南、貴州，及廣西四省邊區考察，對於西南苗夷教育，曾作有價

值之建議。民國二十八年後組成有西南、西北、川康、新疆四考察團。民國三十年復舉辦了大學生暑期邊疆服務團，由教育部選派八個大學之教員十人、學生四十七名，前赴四川西部黑水新谷河流域實地調查羌戎邊民，並作教育及醫療之服務。調查部門分邊疆文化、邊疆經濟、邊疆畜牧、邊疆地理、邊疆生理、邊疆生物及醫藥衛生等七類。其出版的報告書名《川西調查記》。

關於邊疆學術研究，則在中央、西北兩大學增設邊政學系，並補助其他大專學校設置邊疆建設科目及講座。三十三年並曾籌設邊政學院。我去職後，在三十四年改為國立邊疆文化教育館。

邊疆地方，無論學校教材、民衆讀物，均極缺乏，其原因在於邊地語文特殊，內地所印之教材讀物，不能適用，而邊疆學校又無力自行編印，遂形成書荒。教育部於民國三十二年置辦簡陋邊文印制機件，譯印初級小學國語常識課本蒙藏回文（與國文對照）各一套（回文本未出全），分發應用。邊地兒童始有適當教科書可讀。同時又將重要邊疆教育法給及三民主義分譯蒙文、藏文，印發邊民閱讀。又曾開始編印國家蒙藏辭典及其他補充讀物。

以上所述乃教育部直接主辦邊疆教育，多為示範及提綱挈領作用。其最後目的，乃在於邊疆教育由邊疆自辦。在這一方面教育部並未忽視，一面補助經費給邊疆各省學校，一面注重督導考核。民國三十二年教育部根據考核結果，曾頒訂「各邊省辦理邊疆教育三年計

劃」，令滇、寧、青、甘、康、川等七省依照規定項目及進度切實推進，曾收相當成效。

華僑爲革命之母，抗戰期間，華僑出錢出力，貢獻很多。海外僑民教育，因戰爭的逐漸擴大，受了很大影響，很多僑校，在當地失去存在，許多華僑青年流離失所。我們主持國內教育，對於僑校的設置與僑校員生的安頓，也負有責任，因此我在戰時對於僑民教育，也有很多的設施。

爲了使華僑教育獲得法令的依據，我在黨的七中全會提議而通過了「僑民教育推進方案」。依此方案，我擬訂了「僑民教育實施綱要」，提經行政院通過，於三十二年由院頒發施行。因爲這兩個文件的訂立，華僑教育的設施便有了根據。

太平洋戰事爆發後，香港及越緬僑校，紛紛內遷，計達二十餘所。教育部除撥發經費助其在閩、粵、桂、滇等省分別復課外，對於僑生回國升學的補助及國內僑生經濟中斷的救濟，都不遺餘力。對於僑生有各種救濟金，受助者有一萬四千二百八十六人之多。對於僑校教職員之流亡各地者，均資助旅費，協助返國，介紹至國立各僑校任教或介紹其他工作，無一人流離失所。戰時僑校員生的救濟工作，至爲徹底，對於增進海外華僑對於祖國的向心力，很有幫助。

除了對於回歸祖國的僑校師生的安置外，教育部還在海外增設僑民小學五所，對於海外已立案的僑校並予以經費補助。在國內又因僑生返國的格外增多，必須創設新校收容，自二

十九年起先後在雲南保山、四川江津、廣西樂昌分別設立國立華僑中學三所，又在閩粵設僑民師範學校兩所，培養海外僑教師資。又撥款交粵省內各中等學校，增開五十班，收容港澳等地返回祖國的僑生。此外又在復旦大學、中山大學、廣西大學、廣東省立文理學校，由部撥專款各增僑生先修班，收容中學畢業僑生。對於僑生返國考升大專學校者，則令各校從寬錄取；更於國立各大專學校，設置僑生保送名額。戰時對於僑校教師及華僑青年之安置，可稱無微不至，一方面固然盡了教育行政方面應有的責任，一方面也是酬報華僑的愛國熱忱，此項辦法，在戡亂期間，仍繼續辦理。

僑校教科書係由教育部編輯交書局印行，備各僑校採用。二十八年至三十年間，已將小學各科教科書及教授書全面編輯完成，印發各僑校採用。中學教本自三十年起編輯，至三十一年已編就初中公民、歷史、地理、算術、博物等科教科書供給使用。海外僑校採用部編教科書者達百分之八十以上。此等教科書注重民族精神及祖國實況，足以激發僑胞之愛國情緒。

由於對海外僑校鼓勵立案，在戰時立案僑校激增。對於立案僑校並予經費補助，隨時加以督導。自二十九年起，教育部即會同僑務委員會派專員駐港澳等地，視導僑校。三十年又增派專員至菲律賓、緬甸、印度等地視察當地僑校。

戰時僑教復兼顧僑教人才之培養及南洋情形之研究。三十年起，廈門大學及暨南大學設

置馬來語科目，中央大學設置印度語科目。並於三十一年在雲南設立東方語文訓練班及國立東方語文專科學校，藉以培養赴海外僑居之社會及商業人才。三十一年更設置南洋研究所，除研究南洋各地政治、經濟、教育、史地及僑情等問題，擬訂戰後處理方案外，更從事僑校各種教科書之編輯，並進行各項有關問題之研究，提供政府作擬訂僑民政策之參考。

學術研究與國際文化合作的促進

抗戰初起，大專學校遷徙，圖書儀器損失很多。政府外匯短絀，補充不易，加以滇緬路被封鎖，國外物資進口不易。在此情形之下，學術研究，幾於停頓。我到部以後，認為為國家長遠之計，學術研究不可一日中斷，便在無法中設法，使各大專院校加強學術研究。為建立學術標準，有學術審議委員會之設置。為培植研究人才，令各校增設研究所各研究學部。為獎勵學術研究，特設學術獎金。為獎勵自製儀器，補助北平研究院研究製造光學儀器，並創設科學儀器製造廠。為補充圖書儀器設備，特向國外徵求，並向政府請得大量外匯自行購置。這些都是戰時促進學術研究的措施，值得加以敘述的。

關於學術與文化政策的釐訂，學術標準的建立，單憑教育行政人員，是不能處理恰當，也不能樹立權威的。我為了尊重學術界的意見，擬建立超乎行政的客觀學術標準，乃設置了學術審議委員會。其組織係由各國立大學校長就學術界選舉十三人，由教育部就學術界聘任

十二人，另以教育部次長及高教司長爲當然委員組成的。委員絕大多數屬於學術界。部聘的委員亦屬通儒碩學，如吳稚暉、柳詒徵諸先生都是部聘委員。這些部聘委員不單屬於一個學派，在學術審議上具有平衡作用，所以凡是審議會的決定，都能獲得學術界的贊同，因此許多難免爭議的大專學校教員資格審查工作，以及學術獎勵的決定得獎人選，均由於負學術界重望的學術審議會的主持，得以順利進行，而獲得預期的結果。

戰前，各大學本有研究所的設置，係由各大學有適當導師及優良設備之院系研究室發展而成。二十五年度共有二十二研究所，分三十五學部，研究生共七十五人。戰事發生後，各大學因遷校關係，研究工作多未能繼續進行。教育部於二十七年撥給經費，就設備與人才較優的國立大學，酌量增設研究所，同時並令舊有研究所恢復招生。至三十三年，大學研究所增至四十九所。各所共設八十七研究學部。研究生共有四百二十二人。比較戰前，數量增加幾倍。依規定，研究生修習專課科目兩年以上，經考試及格，並提出碩士論文，經教育部送請專家覆核及格，始可授予碩士學位。學術審議會成立以後，碩士論文之覆核亦歸其主持。研究生之訓練以及學位之授予，都很愼重。

我主張恢復並擴充大學的研究所，其主要目標，固爲訓練研究生，其另一附帶目標，也是鼓勵教授從事研究。因爲教授要當研究生的導師，自身也就不能不從事研究了。教學相長，在研究院所，尤屬必然。但是指導研究生的教授，究屬少數。我還自三十年起訂立辦

法，每年獎勵著作發明及美術作品。在我任內，一共舉行獎勵四次。應徵作品逐次增加，每次均在一百件以上。第一次受到申請獎勵作品經審議會審選予以獎勵者二十九件，第二次申請作品經審選給予獎勵者四十八件。第三次申請作品經審選給予獎勵者五十四件，第四次申請作品經審選給予獎勵者六十六件。得獎者計共近二百人。歷次得獎者如已故陳寅恪教授等，多係學術界知名人士。獎金金額亦逐次提高，自數千元至二萬元不等。對於清苦的教授生活亦不無小補。從應徵者之踴躍，可見此種獎金，對於學術研究有激發作用。宜乎此種獎勵直至今日，教育部猶舉行未替。

戰時科學儀器補充困難。有若干大學教授，往往自行設計製造簡單儀器從事科學研究，也獲得相當結果。此種於無法中設法、不廢研究之艱苦卓絕精神，曾經引起當時英國主持重慶英國大使館的中英科學聯絡處的李約瑟教授（Professor Joseph Needham）的注意和讚佩。他曾在英國的科學雜誌《自然》（*Nature*）撰文加以報導，文中備述中國大學的學者艱苦研究的情形，尤其對於當時的浙江大學，極爲稱道。雖然如此，因陋就簡的儀器，以及過時的圖書雜誌究竟在研究的功用上有限制，必須有適當的補充。我便在三十年委託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代製顯微鏡二百架供各校應用，同年成立生物標本製造所，三十二年又成立科學儀器製造所。這些儀器標本勉強可用，仍不能適應精細的研究要求。我進一步籌款向國外購買圖書儀器。當時政府對美桐油借款成立，我向孔兼財政部長特別請求，承蒙慨撥美金壹百萬

元之鉅，供各大學向美購置圖書儀器。均於三十一年底購運到達各校。在國家作戰激烈亟需外匯補充軍用之時，政府能撥如此鉅款，我教育界同仁，同深感奮，益勵教學研究，以報國家。因此在科學人才的訓練方面，成就甚大。回憶及此，我不能不對已經謝世的孔庸之先生再致感佩之忱。關於圖書方面，除了以外匯自購而外，我還向英美友邦募集。英國牛津大學首先贊助，其後各國人士，均有捐贈。在二十九年至三十年之間，英國募得圖書雜誌六十二箱，內圖書計共三千七百六十九冊，雜誌計共十五種一百四十六冊。在美國亦募得圖書雜誌三百餘箱，均經分配各大學存用。

因爲圖書儀器的不斷補充，大學各科教學，能以維持適當水準，研究工作，亦能繼續進行，所以戰時所造就的人才，尤其是科學人才，後來很多人有卓越的表現。

關於國際文化合作，我在戰時，也有不少措施，並沒有因爲國際交通的困難而中止推進。我特別在部內高等教育司增加第四科，專門主管學生留學及文化交流事務。

在戰爭初起時，因爲節省外匯，對於國外留學係取限制政策。二十八年由部規定，無論公自費生均以學習軍工理醫切合國防需要者爲限。且規定必須大學畢業，且在國內已有兩年研究經驗者方可留學。所以此時除特准派遣之公費生及得有國外獎金或補助金者而外，出國留學人數很少。唯中英庚款留英考試及清華基金留學考試在戰時仍照常舉行，另有林主席七秩壽辰獎學金留學考試，也曾舉行。三十一年英國文化協會贈留英獎學金名額十個，英國工

業協會贈免費實習名額十個；又與印度交換留學學生名額十名，均經過考試，或甄選優秀學生出國。

戰時限制留學政策行至三十一年，出國人數較戰前銳減。唯三十一年一月，我政府與英美締訂平等新約，國際情勢大為改善，加以抗戰勝利在望，先總統蔣公在其《中國之命運》一書中提示戰後需才孔亟，須預為培植。教部為配合國策，適應時代需要起見，乃放寬留學政策，廢除前述之限制辦法，准許大專畢業生出國，並准結官價外匯，作留學費用。唯其時官價外匯，與實際美匯市價相差懸殊，以官價結匯留學經費留學，事實上幾無異於公費留學。我既與財政部洽商，而有此可以官價結匯自費生留學費用之寬大措施，為防止國帑之浪費，對於自費留學生之程度，勢必加以衡定，以免不堪造就者出國。因此而有第一屆留美自費生之留學考試。三十二年舉辦此項考試，與試者七百五十一人，錄取者三百二十七人。三十三年十二月又舉行英美獎學金留學考試，錄取一百九十五人。錄取學生均因優給外匯，先後出國。現在台灣服務政府、學校及社會，各部份之領導人才及中堅幹部，一部份即是戰時派赴英美留學學成返國之學生。現在美國以及其他國家的教育、學術，以及工商實業卓著成績的中國學人，有一部分也是此時遣派出國留學而獲得成就的。其中著名人物，不勝枚舉。舉其著者如楊振寧、李政道兩位得諾貝爾獎金，如新任的香港大學校長黃麗松博士，都是戰時由國內出國深造的。數年前我在美國寄居時，我不知遇見好多的中國學人，向我表示他們

戰時出國研究的經過；並向我致謝政府的寬大留學政策的。這也是一種極大的安慰。

戰時我國對外海陸通路，曾一度爲敵人封鎖，國際交通僅有空運一途。除了派遣留學生而外，國際文化合作仍在此交通極度困難情形下，繼續進行。我國與英、美、印度交換講學研究人員，往來不絕，皆由教育部主持。英、美、印度學者包括李約瑟（Joseph Needham）及賴達克里希那（Sarvetalli Radhakrisknan，後來任印度總統）在內，在三十年至三十二年之間來華的，有十四人。同期我國學者赴英、美、印度講學或研究的，包括張其昀、周鴻經、薩本棟等教授在內，亦有二十五人之多。我國教授個人在戰時受外國之聘，經教育部協助出國者尚有多人，不在上述人數之內。舉例而言，現在在國際知名爲全世界極少數數學家之一的陳省身教授，即是在戰時受美國之聘前往研究，無法出國而由教育部特向軍部設法，用軍用機運送美國繼續研究，而成爲卓越的數學家的。他後來還敘述此段經過，向當時教育部主辦的人員道謝。

戰時曾由行政院派遣了一個以教育部顧次長爲團長、高等教育司吳司長爲團員之一的赴印文教訪問團。教育部根據訪問團的建議，而特別資助印度的設有中國文化講座的「國際大學」，並請賴達克里希那來華短期講學。又與印度交換留學生十名。我國赴印的交換留學生中有特出的人才，如駐澳洲的沈錡大使和曾任中央文化工作會主任的吳俊才同志，即是依當時交換計劃被遣派赴印留學而有成就的。

在戰時，英美各派有人員在我國從事文化合作。英國所派的是前述的李約瑟教授；美國所派的是費正清（John K. Fairband）夫婦。這兩國人員所負的使命相同，但是所做的工作，對於中國的影響，恰是利害相反。李約瑟教授同情於中國文化。他駐在重慶時曾來見我，談及他之計劃，擬對於他所最感興趣之中國古代之科學成就、科學思想，及其在人類文化史上的價值，作深刻之研究及比較，並編著成書以問世。我以其所志正獲我心，當即予以鼓勵，並爲其介紹有關人士及機構，給予必要之援助。後來李氏在重慶英國大使館的中英科學聯絡處聚集中英科學家，研究考察中國古代科學及戰時中國科學研究的情形，曾遍訪後方各主要學術文化中心。戰爭勝利後，李氏復訪北平各大學與中國知識經驗豐富之工匠，討論中國古代器物之製造方法。根據多年研究結果，他寫《中國之科學與文明》（*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已成鉅著六冊。書中對於中國科學發明之早，對於世界文明貢獻之多，發揮盡致。在發揚中國文化、增加中國人之自信心方面，有很大的貢獻。我因爲和李氏的研究及著述，過去在重慶有此一段淵源，又因爲他的這部大著對於中國貢獻很大，所以便發起用中文翻譯他的《中國之科學與文明》，而爲其主譯人。此書的著譯，起端於戰時的中英文化合作。而李氏的成就是對於世界與中國文化有極大的貢獻的。

美國當時駐在重慶、從事新聞及文化工作的費正清夫婦，非但對世界與中國文化無益，而且有很大的害處。他們夫婦所做的乃是破壞中國的工作。他們造作蜚語，中傷中國政府人

員，供給虛僞情報，引導美國作錯誤政策的決定，以致助長了共匪的勢力，也促成了我政府在大陸的崩潰。他們是共匪的功臣，所以曾被邀往中國大陸訪問以示酬德報功。他們在教育文化方面的破壞，莫過於煽動中國所謂前進分子反對政府，以及造謠中傷我國政府官員。即如我在上文所述的，因爲我要他代向美國政府捐助電化教育器械，又因爲我規定對於留美學生的管理，便誣我要統制思想，並在哈佛大學發動倒陳運動，即是一例。費正清所做的不是文化合作，乃是文化破壞，和李約瑟教授的貢獻恰成一對比。（李氏思想誠然也傾向社會主義，但他並沒有作破壞中國文化的工作，這與費正清是不可相提並論的。）

因爲在戰時向政府請得相當數量的外匯，我做了一件在戰時似乎不急之務。這便是爲了獎勵外國青年研究中國語文歷史與文化，增進對於中國的了解起見，於三十三年在英國牛津、倫敦，美國哈佛、耶魯、密西根、芝加哥、哥倫比亞、加利福尼亞，及印度加爾各答、國際大學等十個大學，共設獎學金五十名，每名每年金額爲美金一千五百元，凡在以上大學肄業的非中國籍學生選習中國的語文、歷史、文學、藝術、政治、經濟、地理等學科一年以上，具有相當成績，俱可申請，由各該大學核選。後來又擴充名額至美國南加、華盛頓、史丹福，及英國劍橋等四大學各設五名。此項獎學金直設至三十七年度，成就了英美兩國的中國學者專家不少。其中最著名的，有兩位。一位是吳克教授（Prof. Richard L. Walker）他學成後曾爲耶魯大學教授，爲一有名的反共學者，曾來台灣演講，並爲客座教授一年。他的反

共，極爲積極，甚至爲耶魯前進分子所不容，而改在其他大學任教。另一位是曾任哥倫比亞大學中國與日本學系主任、大學評議會主席，現任哥大副校長的狄別瑞（Prof. W. T. De Bary）。狄別瑞教授爲在美國漢學研究方面，在費正清所把持的系派而外，別樹一幟的領導人物。哥倫比亞與哈佛大學在漢學研究上成爲兩個對壘。狄別瑞教授在哥倫比亞領導群倫，影響最大。他的漢學研究，注重在宋明理學方面，眞能把握中國思想的中心，與費正清的只研究中國現代史，暗中爲匪張目者不同。狄別瑞教授雖不如吳克教授的公開反共，但是其影響是一樣的，否則，費正清在美獨霸漢學研究，其後果將不堪設想了。

吳克與狄別瑞兩位教授的立場，決非出於偶然。我三十多年前，設置外國學生研究中國學問獎學金，沒有預料能在美國學術思想方面，發生這樣有助於中國的結果。可見但問耕耘，不問收穫，古人之言，不我欺也。關於吳克教授對我國的貢獻，還有一點可以附帶敘述的，即是當大陸失陷，內地許多教授與學生，流亡到香港，設立學校，情形艱苦，最初向美國雅禮協會（Yale-in-China Association）建議補助這些流亡學校。後來由該協會決定補助新亞書院而有今日的規模的，便是吳克教授。

青年的貸金制救濟、招致、訓練，與徵調

我在以上各段憶述的戰前教育設施，似乎主要是把戰時教育當平時辦，側重於爲建國儲

備人才，對於抗戰缺少立時的直接貢獻。這種看法，只是皮相，實際上教育應該「平時應有戰時的準備，戰時應如平時的鎮定」，所以戰時正規教育是抗戰與建國雙管齊下的，對於抗戰的需要，從未忽視。除了正規教育中已寓有輔助抗戰的目標而外，在戰時，我們還對於抗戰，有當下直接的貢獻。在這一方面，我們是以戰區、敵後，以及後方的全體青年爲對象。在戰時沒有設置青年部，青年部乃是戰後才設置的，我們教育部在當時兼做了青年部的事。所有招致、救濟、訓練和徵調工作，都是教育部負責辦理的。

戰時的青年工作，第一件最緊急的事，便是爭取青年。此一措施具有兩大意義：(1)大凡子女之能入中學或大學者，其家庭多半爲中上之家，吾人若在後方照料其子之學業，其父兄絕不爲日僞所利用，甘爲漢奸。(2)奔赴自由區之學生青年，深信政府必能爲之設法，若來而無人照顧，勢必爲共黨所設之延安抗日大學等勾引，欲求補救，將不及矣。故雖化費大量國帑，亦屬值得。以上是我自行政院力爭採取貸金制度之最大理由。當時我們非但要在敵後和戰區向敵僞爭取，還要同時向共黨爭取。當時共黨利用抗日機會來吸收青年，安置於所謂抗日大學，以共產主義毒化青年，希達政治企圖。在敵僞地區，暗中打著一致抗日旗號招致青年，青年不知實情受誘者不少。我方爲拯救青年免被共黨利用，一面爲充實兵源及保存國家元氣，乃用種種方法向敵後戰區，大量爭取青年；一面在敵僞控制之區域，依「淪陷區教育設施方案」，就地在地下設校，吸收青年，予以抗日教育，並分區派戰區教育督導專員主持

其事。由二十七年之五十個督導區增至三十二年之一百零二個督導區。此等督導專員及地下教育工作人員冒險犯難，精神可佩。據戰後不完全的調查，殉難人員有二百四十二人之多。

淪陷區青年如無法就地教育，則在各地設站招致，運送後方安置，最初係零星招致。三十年教育部成立戰地失學失業青年招致訓練委員會，作大規模有計劃的招致與訓練。自二十九年起至三十二年止招致青年計達十五萬四千八百九十六人之多。

對於招致至後方青年之救濟與訓練有種種適應需要之措施。此等青年，離鄉背井，無人接濟生活，其衣食住所均由教育部撥款供給。除少數就業者外，此等青年均先後安置於學校繼續受教。其中中等教育程度之學生則設立各種國立中等學校，及臨時中學予以收容。其中原在大專學校肄業之學生則分發大專學校借讀。此種借讀辦法，乃是戰時所首創。凡戰區甚至港澳大專學校學生一律分發學校，插入相銜接之科系班級，極大多數均在借讀學校完成學業。原在戰區大專學校學生，聞有借讀辦法，雖不經招致，亦源源而來。戰時大專學校學生人數之增加，借讀生爲其來源之一。分發借讀學生，不僅以我國之公私立大專爲限，即香港大學之中國學生，也一律分發借讀，甚至港大教授也隨同借讀學生在借讀學校任教。據前在港大醫學院任教授、戰時率港大學生在我後方借讀，其本人並同時在重慶之上海醫學院任教之王國棟博士（Dr. Galden King），親告現在港之前高教司吳司長，港大戰時在我後方借讀學生有數百人之多。王博士對於我方之一視同仁樂育爲懷，至今猶表示感謝，並稱正對此事

寫紀錄以作久遠紀念云。香港現在政治與社會中不乏知名人士，係戰時由教育部分發後方借讀者，例如現任香港政府醫務衛生處長之蔡永業醫生、現任香港市議會及立法局議員之胡文瀚議員、現任香港大學醫學院外科主任之王美源教授，均是戰時在後方借讀完成學業者。所可憾者，我方對香港大學一視同仁，而香港政府並不念戰時友誼，也不考慮我國大學之水準，對於我國大學畢業生在港服務者，並未承認其同等資格。尤可憾者，昔日曾在我國大學醫學院借讀之港大醫科學生，對於我國醫科畢業生在港希望開業者，非但不予以同情援助，反加以阻撓，以怨報德，殊示人以不廣也。

戰時對於救濟青年一事，由於政府負擔太重，教部所面臨之困難最大，戰區學生大量湧至後方，衣食住學樣樣刻不及待，當時救濟費用用貸金名義，蓋欲使財政當局易於同意，將來有收回之望耳。蓋來自戰區中中等以上學校學生，離鄉背井，多係經濟來源斷絕，如不予接濟，非但不能繼續學業，且不能維持生存。我當時即感覺對於這班學生不但要教，還要養。因而負起責任，設置貸金制，使這些經濟來源斷絕的學生，可以貸金維持生活。貸金包括膳食及衣服各項費用。最初名曰貸金，原期受貸學生將來就業後償還。後來因責償不易辦到，並且法幣貶值，即令能償還，亦幾乎等於不還，所以將貸金改爲公費。後來非戰區學生，因家庭不勝負擔，也幾乎都得了貸金或公費。此項支出費用浩大，幾乎超過全體教育文化經費二分之一。對於此等學生眞是教養兼施，而國庫負擔之重，也於此可見。費用雖大，

但是成就甚著，據統計，戰時由中學以至大專學校畢業，全賴國家貸金或公費以完成學業者，共達十二萬八千餘人之多。此等皆是國家不可少之人才。凡是現在國內外五十歲以上之社會中堅分子，幾無人未受貸金或公費之惠。如無貸金及公費制度，不知道有多少人失學，將爲國家一大損失。這種制度所以值得大書特書者在此。現在美國亦仿效我們對於大專清寒學生建立貸金制度矣。（另有關〈數十年後貸金制對國家的貢獻〉於後感想述及）

以上敘述了戰區青年的招致和救濟與安置，最後要說對於青年的軍事徵調。原來在戰事將初起時，不但有人主張將一切教育改爲戰時教育，還有人主張將及齡的大專學校青年一律照壯丁抽籤辦法徵召入伍。我當時認爲青年志願從軍，應加鼓勵，但大專學生一律抽籤入伍一節，須愼重考慮，我國與歐美日本國家不同。一則它們的兵源少，不得不管青年知識程度，而對一切壯丁作無分別的抽籤入伍。二則它們的教育發達，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數比較多。至於我國則兵源衆多，而受大專教育的人數太少，當時全國只有四萬人，即人口一萬人中受大專教育者不及一人，爲了國家建設前途，也爲了儲備作對軍事更有價值的貢獻，不應無分別的與一般壯丁一同抽調入伍，應該仍令受完大專教育而加以軍事訓練，遇將來必要時，再行徵調。我這種意見，幸獲軍事最高當局的贊同。雖然當時有人反對，可是這種緩召的正確，即以美國而論，在第二次大戰時，不是對醫學生緩徵麼?後來對越南戰爭，不是先對所有大學生，後來對大學研究生緩徵麼?保全人才，作戰時和平時最適當的使用，乃是正

確的徵調政策。

政策既定，我便於二十七年發出告全國青年書，指出日寇之所以侵略我國者，由於我國科學與工業落後，我們自不能因抗戰而將學校停頓，致使差距更大，並聲明四點：第一，青年願意從事軍事工作者，教部負責送往軍事工作地點；第二，其自己認爲不適合軍事工作者，教部當送往學校讀書；第三，無論在何級學校肄業之青年，遇國家有需要時，應隨時放棄書本，以應國家徵調；第四，政府決不容許任何青年，既不從軍，又不入學，假抗戰之名，行逃學之實，以爲害國家社會。

我後來對於青年的處理，就是依著上述四個要點進行的。二十七年政府在武漢時，志願參加抗戰工作的青年，由教育部保送入政治部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受訓，期滿分發前後方擔任各項戰時工作者，共四百八十人。戰時各種軍事學校學生名額大量擴充，經保送及自動報名應考者，均爲中等以上學校在校生或畢業生。後來由前方招考來後方的失學或失業青年，除分發入學或介紹就業者而外，也是軍校入伍生的來源。

抗戰數年後，軍事日漸緊急，前方需要知識青年從軍，協助軍事工作，我因協同有關部門徵調專科以上學校學生從事軍中工作。首先徵調的是醫科學生。在抗戰初期，已有一部分醫科學生在軍事醫院及紅十字會救護機關服務。自二十八年七月起正式開始徵調醫藥科學生服務。所有醫藥科應屆畢業生，全數受徵調在軍事醫院及國家醫務衛生機構服務。自三十年

起准以應屆畢業生全數百分之十五至二十留校服務，其餘則分別由軍醫署及衛生署分配工作。其次徵調的是工科學生。三十年一月，四川、江西兩省建築軍用機場，教育部徵調大學工科四年級學生前往工作。三十年由部訂徵用工程學科畢業生辦法。徵用名額，以各級工程學科畢業生總名額百分之十為度，自三十二年開始徵調。戰時徵調服務人數最多的是翻譯人員。三十年秋，先徵調各大學外國語文學系三、四年級學生，經在戰地服務團受訓後，派任美國來華志願空軍的譯員。三十三年教育部復令將重慶、成都、昆明、貴陽等區各專科以上學校高年級男女全體徵調為軍事譯員。總計抗戰時期徵調任譯員之學生共三千二百六十七人；經徵調任醫藥工程等項工作之學生共三千一百零四人，總計為六千三百七十一人。其在校學生自動參加軍佐工作或譯員工作者尚不在內。受徵學員，都是踴躍應徵，不避艱險，完成任務，沒有一個臨徵而規避的。

最壯闊的青年參加軍事工作運動，要算是自三十一年起由教育部發動的青年從軍運動。當時戰事格外劇烈，單是徵用各校學生任軍事技術工作已不能完全適應需要。為鼓勵士氣，及充裕兵源，當時更需要知識青年受訓入伍，正式加入作戰行列。在學學生原在免徵之列，此時情勢緊急，不得不發動在學學生志願從軍。經過發動以後，各地志願從軍學生風起雲湧，蔚成風氣。截至三十二年止，各地從軍青年已達一萬五千餘人。三十三年冬，教育部更發動波瀾壯闊之十萬青年從軍運動，為教育史及抗戰史上留下光輝燦爛的一頁。教育部為鼓

勵在學青年從軍，曾訂下種種優待辦法。各大學學生投筆從戎，爭先恐後，社會動容，軍隊振奮，使全國抗戰精神更加發揚踔厲。雖然由從軍之青年經過編組訓練而成之青年軍，開赴前方作戰，歷時未久，即告抗戰勝利，但青年愛國犧牲以及鼓舞士氣之精神是極可稱道的。

開辦商船學校

民國二十七年抗戰期間，招商局江輪「江順」號，由宜昌上駛重慶，疏散物資，創巨輪航行危險的三峽之紀錄，這件事令舉世震驚，爲航運技術史上一大盛事。平時可駛至重慶的都是較小的船隻，噸位大約一千四百噸以下，船身長度不逾一百五十英尺左右；而「江順」號總噸有四千三百二十七噸，載重爲四千八百噸，可搭客七百六十一人，馬力一千八百匹，航速十二浬半，吃水十二英尺六英寸。如此一巨輪，能經過古稱神河的川江，水流湍急，航道險要，而抵達重慶，外國人都不相信，視爲奇蹟，紛紛派記者前來採訪。面對這艘巨輪，我有了一個新構想，教育部應開辦一所商船學校，以前有一所吳淞商船學校，但抗戰期間停辦了，實在是很可惜的事。我考慮很久，由於找不到適當的地方，於是就決定在這艘船上辦一所商船學校。並且決定學生們不僅在船上求學，而且還住宿在船上。這項構想終於實現了，當時重慶中央日報特別報導開學典禮盛況如下：

「從東南海濱，遷到西南山地，從昔日的吳淞，改為重慶商船學校，於昨天補行了盛大的開學典禮。迎客船從朝天門碼頭出發，遙遠地望著被鎖在揚子江上游的英、法軍艦，旗幟飄蕩。」

「在後方的另一個商船學校在抗戰中長成，各方面都熱情地哺育這個麟兒，一群海軍軍官，以極高的修養，幫助他們；三北輪船公司，贈給學生們以珍貴的畫圖儀器；民生輪船公司，把造船廠借給他們實習；招商局把自己的商船『江順』，供給他們作為校舍。當補行開學典禮的佳日，水兵們特地來給船頭裝掛起萬國旗，一切都點綴得花團錦簇。」

「莊嚴的升旗禮，下面站立著無數的嘉賓。著禮服的陳教育部長立夫、八十一歲的薩鎮冰上將、西裝的彭學沛次長、布衣的盧作孚次長、中山裝的顧毓琇次長……，全國的造船、駕駛、輪機的專家，和草綠色制服的學生，及校長宋建勛，宣誓就職，監誓員講『貨暢其流』。」

「陳立夫部長說：『這是一個新的開始，中山先生的建國方略上，講水道整理，長江與珠江，怎樣聯合？黃河、長江怎樣聯絡？三個大港、九個二等港、十八個漁港，我們需要多少艘船啊！那一個國家有這麼偉大的河流啊！水道交通的前途遠大，幾百年內，什麼能和船隻來比？』他勉勵學生造江船，再造外洋船，立大志完成中國科學化的

使命。」

重慶商船學校，設有造船、駕駛、輪機三班，學生中有一部份是從吳淞商船學校轉來的。他們的生活是受軍事管理的，是我國重建海軍好預兆。後來這些學生們畢了業，大部分都當了船長。這件事現在回想起來，也深具時代意義和創造精神。

兼顧淪陷區的學校教育

淪陷區方面，在北方尚有許多學校，如燕京大學、輔仁大學在北平沒有撤出來，我們就請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就近照顧，因爲他是美國人，可以從北平經香港飛到後方來，所以我們就託他，負責北方學校的聯繫（其中尚包括許多天主教辦的學校），政府並供應這些學校的經費，司徒雷登等於我們教育部和淪陷區間的「特使」。于斌當時任南京區主教，他到美國去爲我們政府宣傳抗戰，他和我也很友好，他並到了美國福特漢大學，這是一所在紐約的天主教大學，規模也很大。故這所大學給了我一個名譽法學博士學位，因爲抗戰期間在淪陷區的天主教學校，我們教育部仍在照顧他們，這個名譽法學博士的贈予，就是因爲感謝我幫助淪陷區的天主教學校，同時在大後方的教育也辦得很有成效，而頒贈給我的。我當時不能離開重慶，不能親自到美國去接受這項榮譽的頒獎，所以請顧維鈞大使代表我接受這個學

位。由以上事實可證明我們抗戰期間，不僅大後方教育辦得很上軌道，甚至連淪陷區裡的教育也顧到了，這也是抗戰期間比較值得一提的事情。

爲國家培育理工專業人才

在抗戰時，我被選爲中國工程師學會會長，同時也是中國礦冶工程學會會長，那時，委員長寫一本《中國之命運》的書，其中涉及我們要實現國父實業計劃，需要多少工程師問題，委員長要我估算一下，闢建東方大港、北方大港、南方大港等，共需要多少此類人才？於是我把國父實業計劃仔細研究後，就請土木工程、機械工程等專門學會各作一估計，合製成一覽表呈給委員長，他就把此表插入那本書中，這是我動員全國工程師完成的。中國工程師學會今天還存在，每年開會並刊行一本論文集。

國父寫《實業計劃》一書，已有半世紀以上，我們要實現此計劃並建設如此龐大的一個中國，所需的工程人才，如理工人才和文法人才，照一般比例，乃一與四之比，也就是說有一個技術人才，就必須有四個文法管理人才。當時在國民參政會時期我擔任教育部長，一反學生唸文法科多的傳統，在教育方針上使理工科學生多起來，由於國民參政會會員文法科出身者佔了十之九，便質詢我說：「是否你學工，便偏重理工人才的培育？」我在答覆他們時表示：「事實絕非如此，文法科人才與理工科人才，因爲四與一之比，唯工業如不先發展，

文法科人才需要不多，國家要工業化才能強盛起來，故暫時應多培育理工人才，以應工業化實際建立之需要，到那時候，文法科人才始有出路，現在是四與一之比。」我們是以農立國，缺乏工業基礎，今天在台灣之所以能順利工業化發展，和當時多培育理工人才有重大關連。

建教合作制度之創立

我擔任教育部長時，要培育人才，是從用人方面配合起，那時基於此種需要，我遂創立了「建教合作制度」，即國家需要些什麼人才，應事先有個估計，而此後所培育人才方能適合需要。故我當時建教合作的辦法是：一經培養的人才就必須分發；其次是所需人才，事先應通知我教育部預估準備，因爲培育一批事業人才，決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事。

五年制專科制之建立

此外在教育部還創辦了五年制專科學校。那時高中三年、專科三年，我看高中三年和專科三年在課業上有很多重複之處，合起來五年即可，如此專科可提前一年畢業，爲國家培養初級專業人才。而高級專業人才的培育則有專科及大學的理工人才，堪稱是一貫的專業人才教育制度。反觀當前大陸上人才缺乏，青黄不接，派到美國深造的都是三十五至四十歲左右

的人，學習能力衰退，英文今天學了明天就忘，此與我們相比，實有天壤之別。

中央圖書館設立及善本書籍搜購與保存經過

我於民國二十七年初接任教育部部長，至三十三年十二月初離職，離日本於翌年八月十日無條件投降、抗戰結束差八個多月，故抗戰期間之教育設施，皆由我辦理。中央圖書館屬於教育部，其在此期間之工作，茲就記憶所及，其要務約有兩端：

1.在渝建設分館並正式成立：該館於二十五年，獲得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補助一百五十萬元作爲在京建築館廈之用。唯中英庚款補助費係由庚款利息購料還款中撥款，須陸續發給，且須需用時請撥，事前更須經教育部核准。在京時爲購成賢街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作籌備處房屋，曾支領八萬餘元，徵購國府路小筆土地及組織建築委員會，請由戴季陶先生任建築委員會委員長，徵求圖樣等曾支領二十餘萬元，其後在京人員避難入川，運輸圖書，皆由此款支付，抵渝爲長期抗戰，頗需時日，又呈准教育部，在重慶兩浮支路興建重慶分館，動用建築經費十七萬餘元。籌備處於二十八年三月因日機空襲，遷至江津縣白沙鎮，出版品國際交換處仍留重慶，昆明設有交換分處，辦理由安南海防轉運交換圖書之用。二十九年，重慶分館建築完成，七月結束籌備處，八月一日國立中央圖書館正式成立，開放閱覽。任命籌備處主任蔣復璁爲首任館長，並公布立中央圖書館組織條例。抗戰期間所有文化活動均在中

央圖書館舉行，貢獻甚大。

2.搶購淪陷區善本圖書：該館籌備處以經費不裕，在京時僅有每月四千元，抗戰之初曾減爲一千元，余任教育部長後，逐漸恢復原數。二十九年正式成立，始定爲每月一萬元，然僅供辦公之用，實無餘款採購善本圖書，而西南亦並無著稱之藏書家可以採購。該館曾在宜賓購到中文普通書一批，約萬餘冊，僅可供日常之用。其時淪陷區藏書家以生活艱困，所珍藏之善本圖書，多不能保存，紛紛流入市肆，滬上文教界函電教育部及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請迅予採購，以免流入域外。中英庚款董事會董事長朱家驊先生主張以庚款會補助中央圖書館未用之建築餘款，作採購淪陷區善本圖書之用，徵得我之同意，共同辦理。英庚款董事會約付一百二十餘萬元，教育部撥給專款二百數十萬元，均逕匯淪陷區支用，先派籌備處蔣復璁主任至香港與英庚款董事會董事葉譽虎先生接洽，由其負責採購廣東流出之書，至上海與暨南大學校長何炳松先生負責採購京滬平津方面流出之書。兩方面辦事處成立後，蔣主任即返渝復命。在上海購得之書，先由郵包分寄香港在港大成立之辦事處，曾用空運寄至重慶一次，以運費昂貴作罷。積存在港之圖書有一百餘箱，擬運美國，託胡大使適之先生寄存美國國會圖書館，蔣主任恐圖書運美，或有疏失，爲便於識別，主張蓋「中央圖書館藏」之章，經我同意辦理。然每本圖書係前後蓋章，在滬託王福庵刊刻藏章，在港複刻六個；歷時三月，方克竣事。而日軍佔領香港，書被運走，戰後在東南亞各處尋覓，卒以蓋有藏章，乃

經駐日軍事代表團顧問顧一樵先生在日本東京帝國圖書館發現，全數運返南京，並無一冊遺失。後由京運台圖書，其中一百餘箱即爲此批圖書，尚爲香港原製之箱，亦云幸矣。

三十五年，該館以抗戰結束還都，重慶分館廈暨中西文圖書與設備等均移交國立羅斯福圖書館籌備處。三十七年以中共叛國，奉教育部令疏運善本圖書至台，共計十二萬餘冊，其中有宋本二〇一部、金本五部、元本二三〇部、明本六二一九部、嘉興藏經一部、清代刊本二四四部、稿本四八三部、批校本四四六部、鈔本二五八六部、高麗本二七三部、日本刊本二三〇部、安南刊本二部及敦煌音經一五三卷。自來珍藏書目，其繁富宏博，似未有逾於此者，這些都是抗戰期間採購之善本，亦有一部分係抗戰後所接收者。從前閱一善本，良非易事，今日中央圖書館、故宮博物院及中央研究院皆富於此類藏書，隨時可以取閱，較之前人爲幸多矣。而中央圖書館更建築一宏偉之圖書館，在東南亞亦爲可數之圖書館中巨構，國家復興文化，不遺餘力，於此可見也。

抗戰時教育政策和爲國家培育人才的成功，應全歸功於蔣委員長的大力支持。他很重視人格的培養，如在政校時，就特別重視此項教育。由於委員長對此教育之重視，所以抗戰時我才能做教育部長，他叫我接替王世杰的教育部長後，對我所提出的教育方針全力支持。再加上當時孔先生一生主張八個字「提倡教育，振興實業」，重視教育的配合，乃使我在抗戰時期的教育大計能按部就班的傾力推展，而促使我國今天在工業發展與成長方面具有直接與

間接的影響和貢獻。我自己亦覺得我一生中最有貢獻的事功，是在教育部長任內對教育事業爲國家奠定了久遠的基礎。

辦教育幾件特殊和欣快的事

我任教育部長幾乎到了七年之久，做的事確實很多，而其中有關日常工作效率、財務處理手續，以及人事任用等，皆具獨特的方法，和他人不一樣；另有幾件事我認爲處理也很成功，內心上有感欣快，值得敘述，特列述如下：

教育行政效率的講求

我在教育部長期間，工作效率很快，我辦公的方法和人家不一樣，每天早上八點上班，我八點以前就到了。八點開會，司長們要參加部務會報，所有司與司間的問題當場討論解決，所以每天早上在上班以前，就把重要問題先解決了。各機關的上班簽到往往是虛僞的，有些人會找人幫他簽到，照我的辦法，我部長一到部，司長一定到；司長一到，科長也一定到；科長一到，科員也一定到；這樣一來，不用簽到，大家一定按時上班。另外，在處理公事上我也有一套辦法，每件公文一到，由收發室摘由，再依據複寫三份，上面一張送部長，

下面的三張分送主管司司長一份，貼在公文上面，檔案室一份，留在收發室一份。故凡送部之公文，其摘由單四個部門可同時收到。公文在主管司處理時，部長室及檔案室已經知道，如一件公文超過時間不到部長室，部長室主管秘書可隨時到司裏去查問，如果一件公事逾時不到檔案室，檔案室亦會查問，如此則各部門便無法積壓公事。所以抗戰時期，教育部的公文最爲迅速。在台北我曾爲交通問題寫信給市長，結果一個半月回信才來，信上僅說：「你的信我已經交工務局處理了」，也沒有說明處理情形。本來一天半可做好的事，卻要一個半月。我也是學工程的，對效率是非常講究的，市長後來爲此事向我道歉，這於事何補？

財務處理主公開，教科書編著請專家

還有一件事我們教育部也和別的機關不一樣，那就是每個月把帳目處理一次，每半年舉辦「假交代」一次，這樣一來，管帳的單位隨時會把帳目處理清楚，政府主計處並派人監視「假交代」。我是三十三年十一月底離開教育部的，差一個月又要辦「假交代」，接我部長職的是朱家驊，因爲以前的帳目每半年有一次交代，這五個月的帳目，我幾天就辦好了，朱家驊當時很驚訝，認爲我七年部長的工作帳目怎麼會在幾天之內就辦好了呢？前任部長爲王世杰，我是接他的事，他的總務司長雷震辦了一年半，帳目才辦清楚。我是平時把帳目都辦好了，剩下的五個月很快就交代完畢，否則積壓下來，越積越多，麻煩可就大了。我離職

時，不僅帳目很快交代清楚，還把朱家驊新上任的領款公事都替他辦妥，他當時深感意外。我做事不僅快，而且錢也弄得清楚，尤其是公家的錢，一分也不能弄錯。教育部經費很不少，在開會時看學校的需要而分配經費，我對財務之處理是公開的、公平的，我都在開會時處理，並請專家公開參與，因此我做教育部長，大家都說我是最民主的部長。

抗戰時，中小學教科書很缺乏，由於後方紙張買不到，而且很多書局像商務、中華都沒遷到後方，編書時，我們先把必需要的書編好，國文、歷史、地理、公民，各請專家選編，大家不願編的我們請人來編，編好了再請專家審查，印書時照規定印，印好之後由教育部運送到各省書局去賣，凡是困難的事教育部來做，容易的事大家做。後來蔣夢麟校長對我稱讚說：「我想不到你做教育部長做得那麼好。」我回答說：「我所以有小小的成就，就是我相信專家。」我所請的學術審議委員會像胡適之、吳稚暉、蔣夢麟、梅貽琦諸先生都是學者專家。而次長司長亦都是專長，集衆人之長以成事功，所以有所成就。

用人唯才，以不分彼此爲先

至於用人我也跟別人不一樣，我每到一個機關，不大願意自己帶人去，像我當中央黨部秘書長，我只帶一個人去，他幫我處理私人信件，其餘都是老人。我認爲一個人能指揮別人，也是他的本領，爲什麼只有自己帶去的人才能用呢？假如到了一個新機關，所有的人都

能聽我的話，我爲什麼不高高興興的做呢？所以我覺得一個人能獨來獨往倒是很好，那些人本來就屬於那個機關的，不屬於我的，何必來來去去拖了一大堆人呢？到現在爲止，以前（民國十五年）的機要科人員還來看我，做過我部下的人都和我感情很好，我也不擺架子，我做部長，比人家先上班，比人家後下班，我一生中以身教爲重。其次我不要人家的錢，我連開會的車馬費都捐給公家了。一個人不要把錢看得太重，否則人家會看你不起的，要人家來請我，不要去求人家，有時自己的本事也要表現給人家看一下，用不著太客氣，要走在人家前面，盡了自己的能力和責任，當然也需要人提拔你，可是你自己條件不夠，人家提拔你也不行，人要能自立自強。

改建防空洞的救人設施

我到了重慶後，在民國二十八年五月，日本人轟炸很厲害，我們教育部在川東師範辦公，川東師範操場上被投了一顆炸彈，留下一個直徑約十多公尺的炸彈坑，遠望過去像個池塘，校舍沒炸到，否則損失不少。川東師範操場是有一低窪處，該處建了一個巨大的防空洞，可容教育部全體職員，但那個防空洞的形狀很怪，入口處在必須先向低窪處下去再往洞裏去，有一天月光很亮，我乘坐滑桿（即四川一種轎子）經過那裏，看見那個防空洞，心想這個洞的入口在低窪處，萬一投入一顆炸彈剛好塞住洞口，那麼大的壓力，裏面一定承受不

了，裏面的人可能全部會死光，想到這裏，心裏萬分耽憂。第二天立刻下令，在防空洞上端用很粗的毛竹搭建一個高高架子，加蓋七八層厚，萬一炸彈落在上面立刻會爆炸，不會到低窪處，等到炸彈威力消失，不會影響到洞內的人，我命令總務處馬上動手趕工，兩天以內一定要完成，總務處的人立刻去覓包工，限期完成，搭了七八層厚的一個大架子，架子搭好不久，日本飛機又來襲擊，剛好投了一顆炸彈在架子上，架子最上面兩層炸亂了，幸好下面五六層的毛竹仍完好，大家都覺得我有先見之明，非常感激我救了許多人的生命。所以許多事情，必須看得仔細，想得週到，要做就做，才能避免發生意外，這是我憑工程知識，以先見救了不少同仁，亦是一件快事。

處理交通大學風潮

抗戰期間，交通大學也遷至重慶附近，校長是吳保豐。有一天，交大發生一件意外事件，交大的學生們利用假日到重慶來玩，返校途中要乘船行駛一段路程。學生們正忙著趕搭乘船時，船卻已開動了，學生們搶著跳上去，船伕堅持不准他們跳上船，於是雙方起了爭執，在憤怒與混亂中，學生們把一名維持秩序的警察綁架到船上，然後載往交通大學，接著把警察藏在防空洞裏。警方知道後，非常惱怒，認爲學生們怎可把警察綁票呢？於是警方便包圍了交通大學，憲兵也參加了包圍的行列，還開了槍，於是事情便鬧開了。交通大學的學

生爲了和軍警人員對抗，便到各大學去請求支援，當時重慶大學、中央大學的學生都準備互相響應。我看出情形不對，第二天就到了交大，那些鬧事的學生也很狡猾，他們的簽名是簽成個圓圈形狀，使你從簽名上查不出誰是主使人。那天剛好是肇和軍艦起義的紀念日，我到了交大，學生們很奇怪，教育部部長爲什麼來了？我召集學生們來講話，我先講述肇和軍艦起義的經過及其紀念價值，然後我說：「你們也和肇和軍艦一樣，在一條船上發生事故。當時船要開了，你們還硬要跳上去，你們就已經不對了；你們又不聽警察的話，而把他綁架到學校防空洞裏。警察來包圍學校，你們又要和他們起衝突，結果將不堪設想！你們的簽名簽成一個圓圈，沒有一個人有膽量挺身而出解決這個問題，這充份表現你們沒有膽子。萬一打死了人，你們也要負責任的，你們怎麼可以這樣搞呢？」我訓了他們一番話之後，作了個結論說：「你們做這件事已經做錯了，做錯了之後又不敢承認，簽名簽成一個圓圈兒，這就是更錯了！你們如果有種的話，那幾個人開頭肇事的就勇敢的站出來吧！那幾個人若能勇敢的站出來，就是：『君子之改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你們把手舉起來！』結果有五個人先後舉起手來。我說：「照理你們五個人應受處分，今天你們能有勇氣自己承認錯了，我以教育部部長的名義免予處分！你們上課去吧！」重慶大學、中央大學的支援學生得知這個消息，也就自動解散了。這件事我處理的經過，自己也深感滿意，否則軍警和學生會產生一場大規模的衝突，很可能會發生打死人的事。事後，學生們間接告

訴我，那一天我的演講使他們萬分感動，他們才自動舉手認錯的。此之謂「至誠動人」。

平復中央大學潛伏的學潮

還有一次，中央大學在醞釀伙食問題。那時是羅家倫當校長。他知道了學生們對伙食辦得不好，醞釀著要改革伙食的風潮，羅家倫那時很害怕，就向教育部報告，我知道這些情形後，我說：「我去吧！」我到了中央大學，對學生們講話，我開始就說：「伙食辦得不好，學校應該設法改善，但是不能涉及其他問題。」接下去我又說：「我小的時候，家境很窮，勉強有唸書的機會，中學畢業後，我的三叔介紹我到滬杭甬鐵路去做剪票的工作，我自己不願意，於是偷偷地去考了北洋大學，大學畢業後又想盡方法得到機會到美國去留學，我眞正嚐到求學的艱苦滋味，所以我當了教育部長後，以全部力量支持你們求學，你們不能在抗戰期間有過份的要求，今天我擔任教育部長，我要使你們每一個青年不因爲戰爭的關係、經濟的關係而失學；而你們也要知道前線的士兵正在滌血抗戰，他們吃的是什麼東西？你們吃的又是什麼東西？你們今天吃的比他們好一點點，我不能給你們吃的太好，因爲他們在替我們打仗，你們不能比他們好太多，你們青年人應該懂得前線和後方必須同甘苦、共患難這些道理，才能打勝這一場戰爭。」我講完以上的話後，學生們口服心服，於是將要產生的風潮就被消滅了下去。因爲這些青年人看見我這教育部長如此勇敢和坦白，我的講辭也很令他們感

動，所以他們原來的怒氣也消散了，我面對青年人的憤怒絲毫不害怕，我對他們講道理。我擔任教育部長對所有的青年人（包括淪陷區的青年），他們有什麼困難我都去幫他們解決，他們都很感激我，而我也不怕他們，所以有麻煩及危險的時候與地方我就親自去了。問題也就解決了。

抗戰時期大家吃也吃不好，穿也穿不好，唯一的力量是靠精神支持，因此，蔣委員長發起精神總動員運動，精神總動員當然應由教育部主持，精神總動員的歌也是我作的歌詞：「精神動員，民族復興；抗戰必勝，建國完成。國家至上，民族至上；軍事第一，勝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抗戰必勝，建國必成。」還有一些口號，也是我寫的，因爲打仗打了好多年，大家都疲倦了，這些歌詞和口號可以替大家打打氣，全國一致，對抗強敵。大家看見日本人一天天往西進，我們的領土一天比一天更少，心中萬分焦慮，日本人要向南打貴州省。在攻打長沙時，湖南省主席薛岳領導反攻，一連打了兩個大勝仗，民心士氣大振，精神總動員之功不可磨滅。

蔣委員長兼中央大學校長

在民國三十二年二月，有一天晚上，蔣委員長把我找了去，那時經國弟也在陪他父親吃飯。飯後，他向我提出了一個主意，他說：「所有軍事學校都是我兼校長，現在所有的大學

我來兼校長好不好？」我說：「軍事學校和文學校不同，軍事學校是重絕對服從的，所以比較容易管，而文學校則不是那麼簡單，委員長如果兼各校校長恐怕有困難，我看與其兼大學校長，還不如來兼教育部部長，委員長如果擔任部長，我來做次長好了。」因爲我不贊成增加他的麻煩，所以這樣說，他後來就想了一想，說道：「那麼我先試一個學校好不好？」我不好意思不同意他試，於是就答允了他，以中央大學給他試，他就做了中央大學的校長。本來教育部部長可以下命令給校長的，但是他兼任了校長，我就不好下命令給他了。當初我建議請他做教育部長，我做次長的原因，就是我是他的部下，怎能下命令給他呢？後來，我想了一個辦法，在中央大學增設了個教育長的職位，把所有的命令都發給教育長，朱經農是我們教育部次長，我派他去做中大教育長，才算解決了這個問題。蔣委員長時常奔波於前線戰場上，不常去中央大學，軍事學校學生不見校長還可以，而文學校則需要常見到校長，所以他雖在百忙中去中央大學看看，有些學生也不認識他，常常會失禮貌，不向校長敬禮，過了幾個月，他知道困難，就不再兼了，後來改由顧毓琇繼任之。

辦理教育的感想

從以上的敘述，我主持幾近七年全國戰時教育的經過，不但爲未來建國儲備人才，同時

對於支援抗戰也已盡了最大的努力，也可說爲我一生參加革命工作中最有意義的一階段，回憶所及，感想甚多，茲續述如下：

解說舉辦各級各類教育事業成就之由來，及與當時共同工作人員離散的感傷

當國家從事戰爭，危急存亡未卜之時，戰區員生十數萬人，流亡在途，亟需安置，各級各類教育事業，俱待舉辦，爲建國與抗戰作積極準備；又當戰時物力財力萬分困難，而能做出這些事，現在想來，眞不知當時何以可能。回憶經過，以爲有幾點可以解說的。第一，由於最高當局對於戰時國策的英明決定，使抗戰與建國雙管齊下，而教育決策也得有依據。第二，由於當時賢明的行政院長兼財政部部長孔祥熙深知教育的重要，力排衆議，寬籌教育經費，使我在行政方面有所施展。第三，由於我選擇了努力奉公的工作幹部，在行政方面能貫徹教育政策。第四，由於戰時各級教育人員以及青年學生，都能深體時艱，各盡本職。雖然在萬分清苦的生活中，仍各無怨言，並且格外踔厲奮發，使教育得以順利進行。我個人雖主持全局，仍賴上下左右的領導者相與合作，始能有所成就。我個人若有一點貢獻，即是我的革命精神。我負了黨國付託之重，本著革命精神，認爲應該做的工作，即集中精神，不畏艱難，不避險阻，奮鬥犧牲，說到做到。有錢也做，無錢也做。該做的即做，做了再說。先求其有，再求其好。我憑此精神，根據我對於教育的整套主張，按部就班的做去，孜孜矻矻，

鍥而不捨，才有上述的小小成就。

我現在回憶以往的工作，千頭萬緒，正如一套活動電影，一幕一幕的映現在我眼前，撫今追昔，不禁感慨萬千。有許多當時合作的人，或已於戰時奮鬥力竭而去世，或已於戰後完成其工作而脫離塵世，有許多人陷在大陸，或已受迫害而失去生命，或正在苦難中。戰時所保全和造就的人才，或正在陷區被迫奴役，或流離他國，楚才晉用。有許多戰時維持或開設的教育事業，或已停歇，或仍然存在而精神與面目全非。這些都是使我因回憶以往而不勝感傷的。

戰時培育人才惜大部未能爲我用，而少數在台者今日有成效，值得欣慰

可是我回憶以往而感覺欣慰，也有不少事端。首先是戰時教育確爲抗戰與建國克盡了雙重的責任。爲了抗戰，訓練了好多萬的青年支援軍事；爲了建國，保全了以及培養了許多專才。所可惜的是大部人才，因爲大局的變化，一部份爲敵所用，一部份用於別國。中共現正以原子彈威脅世界。他們製造原子彈的專門人才，那一個不是我們在戰時所保全、所幫助深造，或是在戰時大學所培育的？至於現在美國學術教育與工商各界的中國專家學者，人數在數千以上，大多數也是我國戰時大學或中學所保全、所培育的人才。所可惜者，此等專才一時尚未能爲我國所用，以促成建國大業。不過在今日台灣，所有各界的若干領導人才及多數

中堅份子，都是戰時所培育出的人才，憑他們的努力而有今日富庶康樂的復興基地。當年國家辛苦保全和栽培人才，已有今日之成效，是值得欣慰之事。

自由區全體師生無一人要求增加伙食費，上下一心對抗戰前途抱有信心，是一件驕傲事

我所感到又驕傲的一件事，是抗戰期間自由區全體師生，沒有一個人向我要求過對於他們的伙食費予以增加，我幾乎走遍了前後方各省，巡視了極大部份本部主管的大中學校，親眼看到他們吃的僅是青菜豆腐，米飯更是質料很差，但是個個精神愉快，對抗戰前途，個個抱樂觀信心，使我十分感動。我有時和他們共餐，和他們閒談，他們對我的講演，並不認為向他們打氣，而是認為中央的看法和他們完全一致，吃苦是應該的，勝利必須從上下一德一心同甘共苦中得來，我從吾國青年的意志和理智中，確信吾國的前途是十分光明的。

認戰時創立的教育制度與措施均屬適應需要

其次，我在戰時為臨時及久遠著想而創立的若干教育制度，經過了三、四十年，現在還繼續在台灣施行。例如大學聯合考試制度、大學訓導制度、學術獎勵辦法、大學教員審定辦法、大學先修班制、五年一貫的專科學校制度、中小學國家教科書編印辦法、自費留學考試

辦法，以及中國醫藥研究所制度等等，都是經過時間的考驗，而證明其確屬適應需要而能繼續存在的。

說及在戰時的教育措施，由於各級教育校數及教員學生數的增加，社教及邊疆與華僑教育的展開，在當時曾有一種批評，認爲發展太快，因有太多和太濫的現象。這種批評，在當時我已加以辯答。此時從教育的結果來衡量，格外見到這種批評，不符事實。所謂太多或太少，應根據需要而言。如符合需要，即使有更多的擴充，不得謂太多；如其不合需要，即是只辦一所學校，也不得謂之太少。現在回顧在戰時所辦教育事業，沒有一件不是爲適應當時，或久遠的需要而興辦的。幾十萬的員生流離失所，不得不興辦學校加以安頓；戰時需要許多技術專才，不能不增校增班加以訓練，要喚起全民對日抗戰，社會教育不能不創造新局面；爲了安定邊疆，以及爲了照顧在海外失學返回祖國的僑生，不能不擴充邊疆及僑民教育；爲了對於本國固有知能從根救起，對西方科學技藝迎頭趕上，不能不加強學術研究；爲了預儲建國專才，不能不開放國外留學，這許多事業，對於教育各種方面，幾乎全面顧到。從表面看來不免有好大喜功，多多益善之嫌，但是細加考核，無一件不是爲了適應需要而興辦的。非但不能說太多，現在看來，還有許多應做未做之事，回憶之餘，不免憮然若失！

證以留學生有卓越的表現，我國戰時中等教育高等教育水準並未降低

每種事業的質與量，有時是相對待而成反比的，戰時教育的數量發展得很快，尤其在物力萬分艱難的戰時，牽蘿補屋，因陋就簡，由多而「濫」，在初辦時確屬難免。但是我做事所採的方法，乃是先求其有，再求其好。古人也說凡事作始也簡，將畢也鉅。如其初時不肯因陋就簡，勢將一事無成。可是各事雖從簡陋開始，除了求有而外，我還在求好方面，多加努力。如對於課程教材的改進；如對於師資的培養和審定；如對於學術研究的獎勵；如對於科學儀器的製造；如請得鉅額外匯對於國外圖書儀器的購備；如對於各級學校教科書、用書，或參考書的編印；如對於大學教授與學者出國進修盡量予以協助；在提高教育的素質上也盡了應盡的努力。其結果是各級教育的水準，並未降低。所造就的人才，還有些在國內外有卓越的表現。單就大學教育而論，以戰時物力人力的艱難，既維持又有擴充，最易於降低水準，可是事實不然，有一具體事例可以證明。在戰時培育成就的大學畢業生（大部分是由戰時中學畢業升入大學而畢業），先後數百人應英美留學考試出國，在外均能直接入研究院研究，而研究成績均不在英美學生之下。其回國任教職者固多成就，其留在美國工作的，成爲有名的教授、研究員、工程師、醫生、工商企業家者爲數很多。由此實例，可證明我國戰時的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水準並未降低，其畢業生且有卓越的表現。戰時教育太濫之說，可不攻而自破。

數十年後貸金制對國家的貢獻

抗戰八年，我做過幾乎七年部長，最困難的時代我辦教育，許多大中學學生對我都很好，我和內子吃小館子時，時常遇到有人替我們付帳，一問之下，原來都是第幾國立中學的學生，他們說自己所以有今天，都是由於那時受了國立中學教育，今天才做了某公司的經理，化幾百塊錢請老師也是盡一點自己的心意。最近台灣電力公司總公司請我吃飯，原來是有三十幾個人，在抗戰時拿貸金讀書的學生，一位總經理，他的太太就是拿貸金的，總工程師四人中有三位拿貸金，還有處長、科長、專員，一共三十四個人都是拿貸金的學生，他們一同請我吃飯，表示感謝的意思。他們請我演講，我說：第一次我最高興的是楊振寧、李政道拿諾貝爾獎金，他們就是抗戰時拿貸金的學生。當時在美國紐約華美協進社開慶祝會，請我去演講，我說貸金制度在今天開花了。因爲當初用「貸金」這個名詞，是表示將來要還這筆錢的，其實並不要他還，用「貸」字表示要還款的，財政當局知道將來是要還的，才能支出這筆錢，其實誰也沒辦法去追查償還的，以「貸金」爲國家培植人才，總是一件有意義的事。其次，每兩年有一個美國「工程技術回國訪問團」，帶回新技術，有一次那個訪問團有三十六人，團長就是過去拿貸金的學生，他講話時指出：「今年我們回國的有三十六個工程師，其中就有二十八個是拿貸金的學生。」我說：「很高興你們今天返國，爲國家帶來新技

術，也等於爲過去貸金付出一些利息金，將來光復大陸後，你們應該放棄美國的高薪工作，去從事建設祖國的工作，由於我國薪資沒有美國高，那時就是等於你們還本的時候了！」大家聽了都笑了起來。教育工作就是把目光看遠一點，培養人才更是要很長的時間，抗戰時培養的人才，大約二三十年後才看出成果，那些人到今天都五十多歲了，才看出教育對國家的重要性來。如電力在國家是最重要的工程，魏道明任台灣省主席時，我推薦楊家瑜當建設廳長，後來他兼電力公司董事長，在他不做建設廳長時 就做電力公司董事長。他在電力公司十四年，功勞也很大，而此功勞，是不少拿貸金的學生幫助他成功的。

還有據民國七十七年去美國參加第五屆中國科學史國際會議的一位劉廣定教授回來說：「我這次赴會，遇數位六、七十歲之大陸學者咸言：『抗戰期中，得以公費就讀國立大學，實爲先生之恩澤。』特予稟告。」我認爲我人在台灣，而在大陸上的學者，還懷念著我，這「貸金」制所發生的久遠影響，尤使我格外欣慰。

好制度不能維持之可惜

辦教育是件快樂的事，以前認爲隨便抓什麼人來教書也可以了，我以爲這不是個好辦法，教育應由專門人才來辦，因此全國各級師範教育整個制度就是我創辦的。我主張管教養衛都要有專門人員來擔任，另外，聯合招生也是我創辦的，到現在仍繼續著，以前我們只能

塡三個志願，現在聯招塡數十個志願，實在是不合理的，因此目前聯招辦法又準備修改，改成先考試後憑成績塡志願，我在那時本來有個好辦法，就是「保送」辦法，眞正程度好的高中學生採用保送，事實上這種學生一定會考取的。自己子女被保送是一件很光榮的事，但是後來這個辦法出了毛病，高中把次一等的學生保送上大學，最好的學生去考試，其實這是可以查出來的，每個學校那些是最好的學生，老師們都知道，但是自從出了問題以後，他們都把保送制度取消了，我覺得這種因噎廢食的辦法是不對的，現在他們又在主張恢復保送制度了。如此，好學生不用考試，暑期中可先去找工作，磨練一下自己。我在教育部時，將國家考試制度和學校考試制度配合起來，就是考試院普通考試和學校配合，好學生成績到某一標準以上，就不必考普通考試，考試院可發給證書，何必老是考試，考得學生頭昏腦脹，我覺得許多事可以省的就省掉，但是這一制度又被取消了，非常可惜。五年制專科學校也是我創立的，本來高中三年，專科三年，其中許多科目重複，我把它重新安排後定爲五年修完全部課程，可省掉一年，這是我想出辦法來改進的，後來教育部把五年制專科開放得太多了，好教員找不到，程度搞低了。

辦黨務與辦教育的比較

我辦黨務很久，人爲的糾紛多，很麻煩，中國人聰明的太聰明了，不大肯合作。一個省

黨部中往往九個委員就分兩派，常常不合作，上面不要分派別，下面怎麼分都沒關係。譬如山東有個軍閥，送一張名單給蔣委員長，想支配省黨部全部委員，蔣委員長把名單交給我，我當然不能全部取用，我圈了其中一部分精華，另一部分我們自己派去，這樣他們當然不滿意，就會產生兩個派別，一派聽軍閥的話，一派聽中央的話，這樣就不容易團結。萬一用選舉的辦法也還是不妥，人與人關係非常複雜，我在黨內協調，精力花費很大，時間糟塌很多，但看不出什麼成績來。我在教育部倒做了不少事，現在慢慢都發生作用了。

黨務搞了若干年後，還是一無所得。在我們黨內，在民國十幾年時，蔣委員長那時資歷尚淺，上面像汪精衛、胡漢民、丁惟汾這些人資格都比他老，我擔任秘書長各方面要應付得很好，工作不易做，這些工作對國家對黨是有好處的，對我個人是沒有多大好處，是浪費時間，但黨內許多老先生都對我很好，我也學到一些東西，增加了不少經驗。

我在教育部幾乎七年，回想起來倒是很值得安慰，尤其像上面講到的學生貸金制度，則特別有意義，如果和現在大陸相比，那更值得安慰。由於大陸的大學教育停辦了十二年，找人都找不到了，現在派到美國的留學生多半是三十五到四十多歲，這種年齡學英文都學不下去了。教育工作是不能停頓的，由此可以證明，我們抗戰時的教育工作，無論怎麼困難都沒停頓，在政策上是絕對正確的。所以辦了這許多年教育，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事。在黨中也工作許多年了，最初我是組織部調查科主任，調查科是我創辦起來的，為專門對付共產黨的

部門。我從主任調升秘書長，一跳好多級，那時我才二十九歲，任中央黨部秘書長年紀算很輕了。後來從秘書長下來接蔣委員長的組織部長，此職位本來是他自己兼的，後來他到前方去打仗，我就接下他的組織部，並且工作很多年，當時我也沒帶什麼人去，因爲部內他的人，我怎麼好意思去換？後來抗戰開始，我調到軍事委員會第六部，第六部是管教育和黨務，嗣又派我去做教育部長。順便一提的是：我除了擔任軍事委員會的工作外，還擔任調查統計局工作，等到蔣委員長要我擔任教育部長後，我覺得必須辭去調查統計局的工作，因爲這兩項工作，性質不同，如此我便能注全力於教育。

在擔任第六部工作以後，我又做過社會部部長，主管勞工，過了一段時間之後，我才擔任教育部部長，我自己也沒想到會當教育部長。但我到各學校講演，很受學生歡迎，他們都知道我，所以擔任教育部長後，他們不覺得意外。我從二十七年三月就職到三十三年十一月底，差三個月滿七年的教育部長任期，可算是過去中國教育史上，部長任期最長的一個人，也是最年輕、處境最艱困的一位部長。那時英國大使和我很要好，他對我說：「幸虧你頭髮白了，否則你跑到學校裏，別人還以爲你是學生呢！」我二十七歲頭髮就開始白了，二十八歲就擔任中央黨部秘書長。像文書工作、黨部工作、教育工作都非我所學，但我這個人不接受這份工作則已，一接下來就拚了命也要把它做好。

推行社會教育誣爲思想統制

我在教育部有一項計劃，是關於社會教育的，我當時有個構想：外國人六天在學校裏，一天在禮拜堂，我們沒有禮拜堂，爲什麼不把禮拜天學校不上課的時間，加以利用？爲什麼不把那一天學校教室空著的空間，來推行社會教育？既省經費，地方又是現成的。當時，每個保有個國民學校，每個鄉鎮有個中心學校，這個中心學校就是管國民學校。我想，如果所有的國民學校和中心學校以及城裏的中學，星期天都關閉起來，那是很可惜的，應該利用學校大禮堂來實施民衆教育，這就是我的構想。

我們教育部有巡迴教育車，車上有電影、幻燈片、唱片、展覽資料等，巡迴教育車祇有兩部，我們在四川各地巡迴，每到一地，就放電影、幻燈片給民衆看，那時很少有電影院，所以一般民衆非常歡迎。我們排好了日程，每個地方停留三天或五天，放映國內外影片或衛生教育影片，對國民的教育收效很大。假定我們在某地的日程是五天的話，到了最後一天，民衆都不放我們走，因爲看電影、講演、各種展覽都是不花錢的。此外，由於學校禮堂大半不夠大，譬如一個僅容兩百人的禮堂，五天的演出，也只能供一千人觀賞，因此每到一縣，居民往往聯名請求多演幾天。這個情形很好，表示民衆願意接受教育。某次，四川有個城市，城門修築得很矮，我們的車子開不進去，他們就把城門拆掉，讓我們的車子開進去，那時我感動得無法以筆墨形容，民衆對社會教育的熱忱由此可見一斑。

因此，我想把巡迴教育車擴大範圍，使巡迴教育車能多載一點東西，輪流在各國民學校、中心學校放映，不是更好嗎？外國人在星期天以禮拜堂來教育人民做人的道理，我們以歷史文化、衛生，及一般知識來教育老百姓，也利用星期天。若星期天不夠用，晚上的時間也可以，這樣效果一定很大。外國人以教堂爲學校，我們則以學校爲教堂，剛好倒過來，我當時擬定了長期計劃。有一天美國新聞處處長費正清即將返美，他到教育部來看我，那時我的計劃剛剛印好，就拿了一份給他，此時戰爭已近尾聲，我對他說：「美國有許多剩餘物資，你回去可否幫個忙，送給我們一些？」這位思想左傾的，後來處心積慮幫助共黨要打擊我們政府的哈佛大學教授，看完我的計劃書後說：「你這樣子做是不是要把三民主義傳播到最低層的民衆去了？」我說：「是呀！我們就是要使一般民衆了解我們立國的主義啊！」他曉得我若能實行這個計劃，效果一定很大。我要求他說：「你回美國，想辦法幫我們弄到兩百架小型電影機、兩百架幻燈機，以及錄音唱片，凡是有教育性質的都可以，請你給我幾十套，我可以到各地巡迴使用。」他怕我這項計劃實行之後，宣傳的力量太大，而威脅到共產黨的發展，因此他一回到哈佛大學後就開始造謠打擊我，他說：「陳立夫是搞思想統制。」他在哈佛聯合一些思想左傾的中國人，發起一個運動打擊我，說我是「思想統制」。哈佛大學在美國輿論界深具影響力，我做教育部長，共產黨不易活動，因此他們想把我打倒，這件事越來越擴大渲染，幾乎美國所有報紙都刊登著：「陳立夫思想統制」。我也發表一段談

話，我說：「思想怎麼能夠統制？上帝也不能統制人類的思想！我陳立夫又怎能統制別人的思想？我主要的是辦教育，是根據我們國家的國策和教育方針來辦的，他們完全是胡鬧，有作用而毫無根據！」他們渲染好幾天，這次風潮才過去。不久國民大會要召開籌備會，蔣委員長對我說：「不是爲這次風潮的事，而是因爲國民大會要辦選舉，你要回組織部去幫他們辦理。」我想我做教育部長已近七年了，於是就向蔣委員長提出辭呈，他要我和朱家驊職位對調，我是教育部部長，朱家驊是組織部部長；對調之後，朱家驊任教育部部長，而我又回到組織部了。

最後還有一點感想：我獻身黨國數十年，於黨政工作，多所參與，成敗得失，有待公評，唯有在戰時這一段教育行政工作，雖然未必能達到理想，總算對於國家，竭盡棉薄。我總覺得百年樹人的教育文化工作，乃是最有意義積極的工作，而教育文化事業的興辦，乃是最有收穫的長途的「投資」。現在我雖已滿頭白髮，脫離崗位，但仍將以有生之年，爲文化事業，賈其餘勇，再盡一部分的責任。

教育視察工作插曲

我任教育部長時，在民國二十九年七月和三十二年九月爲奉命教育視察兩次，未出席中

央五屆七中和十一中全會，當時視察到過的地方很多，西北地區如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等，其他地方如四川、雲南、貴州、廣西、廣東、江西、福建、浙江、安徽，這些沒有淪陷的地方，差不多都去過了。凡是有大學的地方都去講演，中學則是好幾個合併起來請我去講演，小學生則站在我所經過的公路邊等候，我經過的時候就向他們背誦青年守則，如果跟他們一句話都不講，他們一定會失望的，所以我給他們唸唸青年守則，給他們一點印象，因爲青年守則也等於國民守則。

向胡宗南提歷史性建議

我們視察團到了西安的時候，胡宗南招待我去看他的部隊。在一個大操場上，我和他兩人各騎一匹馬，檢閱他的部隊，檢閱完畢，回到他家，他要我批評他的部隊好不好，我說：「你的部隊是很好，但是你的部隊是不是只擺在那裏看看而已？」我跟他開玩笑地說。他問我爲什麼如此說。我回答：「我如果是你的話，我把所有的軍隊集中起來，也把飛機集中起來，一個晚上，佔領延安。」他說：「老先生沒有命令啊！」我說：「唉！這種事情那要命令呢？你做了之後，老先生心裏高興，你再請求處分，他會處分你嗎？他是再高興沒有了！如果能做這件事情，你知道你的部隊就是蔣先生的直屬基本部隊，是他北伐時的第一勁旅，現在交給你，你如果做了這麼一件偉大的事，將來你可能會繼承蔣先生的事業了。這件

事你如果缺乏魄力的話，那實在太可惜了。」但他始終不敢做。如果當時他聽了我的話，那我們今天就不會來台灣了。後來胡宗南死在台灣，他們請我替他寫篇紀念文章，我說我不願寫，我如果寫，一定會把這段往事寫進去，那對他很不利啊！這是一件講反共戰爭中很重要的一段歷史，如果他接受我的意見，歷史將要改寫了。我曾對他說：「你在西北，不要去干涉別人，像干涉西安、陝西、甘肅等省政府的事是不必要的，你何必注意那些小事，爲什麼不做一番偉大的事業？」可惜他不接受我的建議，其實那個時候，蔣委員長非常喜歡他，曾經一度給他做媒，介紹孔二小姐，但他不要，可見蔣委員長很器重他，只是他自己沒有氣魄。我說：「你如果幹了之後，我和你一起負責，如果領袖要追究，那我也坐牢好了！」現在想來，這件事多麼可惜。

馬鴻逵與「青的寧夏」

到了寧夏，主席是馬鴻逵，他也很歡迎我，招待很週到。他集合各界人士歡迎我，請我講演，於是我想應該講一點可蘭經，但我對可蘭經沒有研究，當晚就「惡補」一下可蘭經，把經中的要點和三民主義配合起來講，他們聽了很喜歡，認爲我對可蘭經很有研究，其實是那晚沒好好睡覺，「惡補」到兩點鐘的結果。在寧夏我得到一種感想，寧夏，所以和西北各省不同，是因爲寧夏開了很多灌溉用的渠，幾條渠都是人工開灌的。寧夏、甘肅一帶土地都

是一種細沙構成，細的像粉一般的沙，有些岩崖由細沙組成，有五百尺至一千尺各種不同的高度，但它們卻不會倒下來。那兒有幾條渠，如著名的秦渠，渠水可灌溉，兩旁種了樹，所以有「青的寧夏」之稱，青綠得看不出沙土，所以寧夏是很富足的，河套一帶是很好的農作區。馬鴻逵鼓勵人民種樹，樹長起來，空氣就好，他有很多事是強迫大家做的，只要對人民有利，他就要做，這一點我很贊成他。我勸他買一具大型挖土機，挖土的效率更高，那就容易多開若干渠道，對寧夏的開發更爲有利，全省會變得更富庶。他那時都很獨裁，他說一句話大家都會努力奉行的。

農耕奇蹟與青海患痢

後來我到了青海，發現他們的田地，在細沙上面舖有一層卵石，這是我學到的一點新知識。他們的田地裏，細沙上舖上一層卵石，到了晚上，太陽下山了，卵石上結了一些露水，露水往卵石下滲，下面的土地就很潮濕，他們就把麥的種子種在石縫下，鳥也吃不到它，同時下面的泥土很潮濕，所以麥子就生起來了。這種乾旱不下雨的地方，他們也能利用露水和石子的關係來生產糧食，眞是智慧很高。他們又會就地取材，在幾百尺崖壁細沙中有一層卵石，他們就把卵石取出，加以利用，這一點連外國人都會欽佩我們的智慧。青海地方都是吃牛、羊肉的，那裏地勢又很高，高地入夜很冷，人必須吃脂肪高的食物，以保體温，所以那

兒的人喜歡吃涮羊肉，也是很自然的道理。青海的人民信奉喇嘛教，喇嘛教的寺廟我也參觀過，他們的廟頂用眞金造成，他們宗教信仰的力量很大。那裏一個男人可以娶四個妻子，爲什麼會形成一夫多妻制呢？譬如一個家庭中有四個兒子，三個去做喇嘛，喇嘛是不能結婚的，家中剩下的這一個兒子，便可以娶四個妻小，這也是一種平衡人口數量的自然方式，否則人口便會減少。他們吃了牛羊肉後，一定要喝茶，否則很難消化，所以茶對當地人是很重要的生活必需品，以前清朝設「茶馬司」，把長江一帶的茶運到那邊去換馬，這個政策非常好，因爲中原打仗需要馬匹，那邊的人民生活需要茶，因而互通有無，各取所需，互蒙其利。

我在青海忽然染上了痢疾，找不到醫生，那兒所有的醫生集中於都市，鄉村裏找不到醫生，我病得很厲害時，最後找來一位獸醫，他替我打針，他用的針藥分量和牛的分量差不多，僅稍爲減少一點，所以病況未見好轉，只好飛回到重慶，那時我已渾身無力了。我後來查一本醫書，根據書上記載，我知道我打過的針已超過書上所載分量的兩倍，而書上說，如果超過藥量，病人會渾身關節痛，四肢無力，結果會死亡。我請重慶的中醫張簡齋先生看了病，又讀過那本醫書後，才知道自己差一點就死了，眞是危險。

堅持鹽業保護政策

到了四川，參觀自流井，鹽民們歡迎我，場面盛大，我不知道他們怎麼得到我要去的消息，以及爲什麼要歡迎我？後來我才知道原因，因爲中國以前實行計劃經濟，鹽是劃分好區域的，這幾省只能吃這種鹽，另外幾省又只能吃另一種鹽，四川、貴州等省只能吃自流井產的鹽。這種分區吃鹽制，稱之曰「引岸」，在抗戰爆發之前的不到半年，立法院中的幾個委員想要把「引岸」的制度取消，引岸是用來維持鹽區的生產的，引岸的劃分線如果超過規定區域，就會被認定爲「私鹽」，是要受罰的。爲什麼這樣劃分呢？如果甲區產鹽每斤八分錢，乙區產鹽每斤兩角錢，丙區產鹽每斤兩角五分錢，成本價格各不相同，爲保護每個區域的鹽業產量與銷售量平衡，於是互訂契約，每個區域都要吃自己產的鹽。如果不劃分區域，那麼甲區的鹽一定轉賣到乙區，乙區的鹽也會賣到丙區，這樣一來，價錢貴的區域鹽民的製鹽業一定會被打垮，所以引岸制度是爲了保護各地區鹽民的生存與發展的，可稱之曰計劃經濟之創始。鹽這種東西是人類一天都不能缺少的，但是每個人一天吃的鹽是很少的，所以一區的多數人用貴一點的價錢去購買鹽，而能維持鹽場的生存以及鹽的正常產量，是很值得做的事，因爲鹽關係著每一個人的生命啊！立法院有幾個委員認爲這個制度不好，應該採用西方自由買賣制度，他們擬定「新鹽法」，要把「引岸制度」取消，要實行自由買賣。凡是一個新的立法，它一定要先送到中央政治委員會，先把立法的原則通過，然後送到立法院去，

根據這個原則立法。我此時任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兼秘書長，他們送來這個案子時，我反對，我反對的理由是這樣的，我反問他們兩個問題，我問：「你們看起來，日本人會不會打中國？」（此時約在抗戰前半年）他們說：「這個……當然很難講哩！」我說：「如果日本人打中國，你想他們會從什麼地方開始？」他們說：「極可能從北方開始……」我說：「天津產的長蘆鹽最便宜，每斤只要八分錢，江蘇的鹽每斤兩角五分，浙江的鹽每斤兩角八分，福建的兩角七分，四川的鹽大約要三角到四角，如果自由買賣的話，除天津的鹽廠外，其他都要垮了，因爲不能跟它競爭。長蘆鹽產量多，所以太便宜了，每斤只要八分錢，如果運過來的話，所有鹽廠都要倒閉，四川的鹽廠更不能生存。在這個時候，日本人要來侵略我們，他們一定先從北方打過來，如果天津大量生產鹽，把江蘇、浙江、福建、四川的鹽業都打倒了，日本人一佔領天津，禁止鹽的運出，我們就完了，還談什麼打仗？」我就把這些理由講了，他們幾位立法委員仍然堅持要通過這個案子，我當時說我堅決反對，這件事太嚴重了，對國家是生死存亡的事情，我不能贊成。但若此事洩漏了出去，外面一定有人會造謠說鹽商拿錢出來活動，希望這般人不要搞新鹽法，那麼我豈不蒙受冤枉嗎？我想不管別人是不是冤枉我，我拿著皮包就走了。那時汪精衛做經濟小組主席，他就勸我說今天我們散會，明天再來討論。第二天，我提出一個折衷辦法，使每個鹽場都能保留，政府收買鹽，決定「民產、官收、官運、民銷」。假設我照各區成本，定個全平均價格爲幾角幾分，如甲區便宜只要八

分，乙區貴一點要兩角多，政府照生產成本加利潤，收購各區的鹽（官收）。再運往生產缺少的各區（官運），由各該區商人賣給老百姓，政府賣給商人幾角幾分，商人去賣給老百姓爲幾角幾分，錢仍由老百姓賺去，這樣可以保存鹽場繼續生產。我這個辦法也很好，既不是舊的「引岸」制度，也不是新的「自由買賣」，是折衷的辦法，鹽由公家管制，生產還是由國民去生產，便宜的地區由政府收購，貴的地方亦由政府收購運輸，則由政府負責，最後由人民銷售。後來他們原來提的案子沒通過，我的折衷方案通過了，隨即準備立法，法還沒立，就打仗了，所以新鹽法仍未實行。那天我視察教育到了自流井，鹽民們盛大的歡迎我，他們說：「如果當時不是你反對，而通過自由買賣新鹽法的話，那我們今天可沒飯吃了！」他們很感激我，我也非常高興。我不知道他們怎麼會知道這件事，因爲我們中央政治委員會研商這件事時，外面並不曉得，他們的消息怎麼會如此靈通呢？後來我們後方自由區吃的鹽還是從福建、浙江等省運來的，一方面自流井也增加生產，供應後方所需。西北還有一種石鹽也一併增加生產，抗戰時食鹽沒有受到影響，這件事我認爲自己對國家有大貢獻。自流井的製鹽法很特別，他們鑿井，一直觸到含鹽的岩石層，就把熱水溶下去，把鹽石溶化，再取來製成鹽滷，這種製鹽法成本很高。貴州地區鹽最寶貴，他們把一塊鹽用繩子掛在鍋上，做菜時把鹽拉下來在鍋裏擦擦，或用力的刮一點鹽來用，所以鹽在貴州是非常寶貴的，人一天沒有鹽都是不行的。所以施政若不思考，徒學他人，是會亡國的。

四川灌縣古老竹吊橋

到了灌縣，那裏有一座吊橋。灌縣的河水流的急得不得了，以前做水利工程的人，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而這座吊橋在秦代就修建了，所以中國人對吊橋的原理領悟得很早。關於這座吊橋有個故事：有一個人，他的母親病得很重，他必須過這條河去買藥，河水湍急，他涉水而過，差一點淹死了，後來總算把藥買回家，把母親救活了。他開始想法子造這座橋，他的名字叫李冰。這座橋全用毛竹做成，竹纜有好幾百公尺長，全用竹編的，非常粗而結實，竹纜有很多條。橋面平坦，鋪的也是毛竹編的板。在橋上走起路來，搖幌得很厲害，下面水流湍急，眞是驚險萬分。附近有座竹山，竹山裏盛產毛竹，新生的毛竹就拿來編竹纜，把新竹纜拿去換舊竹纜，一年到頭，一條一條的換，材料不需費錢，工錢也非常節省，因爲只要找幾個工人編編竹纜就可以了。中國人很早就發明吊橋，懂得其中原理，這是很值得我們重視的科技傳統。此同一原理及方法，較美國紐約的華盛頓吊橋早了兩千多年之久。

龍雲盛情與雲南白藥

我的視察工作到處講演，到了昆明，那時龍雲擔任雲南省主席，他曉得我和蔣委員長的關係，派了一名上官和一輛車子給我用。我那時年富力強，到處視察，一天跑十幾個鐘頭都

不在乎，那個士官卻吃不消，他寫了一份報告說他不能再做下去，因爲他跟著龍雲每天也只有幾小時的工作，所以龍雲對我的工作態度非常敬佩。有一天他請我去參加宴會，政府重要官員都參加了盛宴，龍雲此時和我們國防部裏某人意見不合，我也想乘此機會做一點調解工作。雲南當時受法國影響很大，但龍雲對政府始終忠誠，所以我站起來講演，我說：「唐生智叛變，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叛變，石友三叛變，每一次叛變事件發生，龍主席都是第一個打電報給蔣委員長，表示擁護中央政府的人，別人可能不清楚這些事，但是我在秘書處機要科做事，我很清楚，龍主席眞正是三民主義的信徒，也是幫助蔣委員長北伐，完成統一的重要助手。」龍雲聽了這番話自然很得意。吃完飯後，餘興節目是看京戲，演的是三國演義中的「失街亭斬馬謖」和「空城計」故事，我當時想這次應該利用機會稱讚稱讚他，不過這次是稱讚得對了，我對龍雲說：「諸葛亮最重要的一個幫手是趙雲，每次最困難的時候都是趙雲來救駕，你看從前有個趙雲，現在有個龍雲，諸葛亮有危險時趙雲就來了，蔣委員長有危險時龍雲就來了。」龍雲聽到非常得意。中央來到他那裏的人，他從來沒有迎接和歡送過，他的架子是很大的，儼然是雲南王的樣子，但是他卻「郊送」我五里路之遠，還送我雲南白藥一盒，雲南白藥中自然以龍主席的白藥爲最好的。他送我的雲南白藥一盒中有十瓶。後來我們的車子由雲南開往貴州，貴州地方有座盤山，上山大約有二、三十個彎道，途中遇到一輛大車子翻了，年輕的小司機當場死亡，頭已經壓扁了；另外一個年長的司

機在旁邊奄奄一息。我忽然想到龍雲送我的雲南白藥，我們把他的嘴撬開，把藥倒進去，又灌進一些溫水，再將他抬到我們車上，他吃了白藥後逐漸恢復知覺，我們把他送進盤縣的醫院，我留下個條子給他，告訴他我是什麼人及地址，如果他的傷好了，就請寫封信告訴我，我又繼續到東南部去視察，回到重慶後，那個司機果然寫了封信來，謝謝我把他救活了。可見龍雲送我的白藥確是最好的一種，剩下的白藥，此後我又救過好幾個人。

貴州華家的真正茅台酒

車抵貴州，第一個遇到的是教育部同仁華仲麐，就是後來在台灣任孔孟學會的理事兼總幹事。他們家釀製茅台酒，因爲他是教育部裏的秘書，所以我到貴州，他也順便回去，第一天他就招待我住在他家。他的母親很能幹，她拿出眞正最好的茅台酒給我們喝。在北伐時候，我是機要科科長，上面有個秘書長名字叫李仲公，是貴州人，他回到貴州去，每次都帶茅台酒回來，我們就在機要科裏休息時喝，郭沫若也經常來喝酒，所以我對茅台酒是很熟悉的。那時貴州的省主席是吳鼎昌，我在貴州還是視察各學校並且講演。華仲麐在貴州的家鄉是很富有的，是一向贊助革命事業的，他的母親就曾幫助張道藩從事革命工作，他家中又開了一個印刷公司，最有趣的是別人出了冒牌茅台酒，那冒牌的招牌是他們公司替人家印的，眞是有意思。後來人家問他們爲什麼替冒牌茅台酒印招牌，他們說：「他們生產的茅台酒，

沒有人比得上，一飲就知道是眞是假，所以人家冒牌的茅台酒，是冒充不了，人家一嘗就會分辨出來的。」

冒險坐黔桂鐵路首班車，及深入福建鼠疫區

從貴州到廣西乘黔桂鐵路火車，黔桂鐵路剛剛修好，那一天首次通車。那些修黔桂鐵路的工程師都是我的朋友，他們來邀我們一同乘坐新通車的火車，一般人一定認爲剛建好的鐵路危險性較大，但我想他們工程師都能坐，我爲什麼不能坐呢？所以我就坐了黔桂鐵路完成後的第一班次火車。他們覺得我去坐了非常高興，而我也覺是件值得紀念的事！

廣西那時還沒淪陷，因此我順便遊覽桂林的明山秀水。桂林照地質學研究，以前可能是海底，所以桂林的山水和別省不同，山峯奇險秀麗，皆露出地面或水面，而小腰小谷卻藏在土中或水中，這和它的特殊地形有關。我到各學校講演，那時李宗仁的太太也辦了一所學校，她也請我去講演。當時我年紀輕輕，精力充沛，倒也不覺得疲勞，從廣西到廣東，廣東已有一部分領土被日軍佔領，接著翻越大庾嶺到達江西，又從江西至浙江，浙江省政府在麗水，胡健中（曾任立法委員）爲我籌備一次講演，因爲聽衆太多，場地又小，所以用售票的方式解決。在中國的講演賣票，此還是第一次。

後來到了福建莆田，那個地區正流行著可怕的鼠疫，缺乏醫藥，所以是個眞正的危險區。我一天去講演，忽然覺得腳很癢，原來被跳蚤咬到了，襪子破了個小洞，心裏不禁擔憂是否會被傳染到鼠疫？應虧後來吃了一點預防的藥物，才保全了健康。

6 戡亂逆挫大陸淪陷時期

民國三十四年秋至三十八年冬

抗戰勝利後，
政府先以處理軍事財政無方，
繼以美特使馬歇爾將軍來華調停國共和談失敗，
暨對遴選國民大會代表失誤與
選舉總統、副總統之不當機立斷，
導致人心渙散，共黨壯大危機，
終致戡亂逆挫，大陸淪陷，
隨政府撤至台灣。



重慶時毛澤東來訪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毛澤東抵重慶，由吳文官長鼎昌爲蔣委員長去電邀其來的，此事關係甚大，未付中央常會討論，遽爾去電，似乎疏忽。毛來後，除謁見蔣公外，並拜訪黨政重要有關人員，我亦被拜訪之一人，毛來敝寓高廬相晤，我之會客室一牆角，曾被日機投彈炸壞，尚未修竣，且會客室坐椅均陳舊破爛，有所不恭，寒暄後，我坦直告以我何以反共，毛頗爲驚奇，蓋他人對其來渝，均十分客氣，唯我則例外也。我曰：「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乃集世界各種主義之所長，而又合乎我國文化道統之精神，經其融會創造而成者，故對外可以多方面因應，對內足以增長自信而自立自強，不依賴任何帝國主義，而自成一獨立思想體系，以增強次殖民地之中國之自信與共信最爲適當；而共產主義來自侵略吾國之蘇聯帝國主義者，須知文化思想之侵略，較之任何其他種種侵略爲最危險，不可不愼也。其實此種思想，在我國二千四百餘年前之戰國時代，已早有之，許行、陳相之徒，信仰之，而孟子則以勞心與勞力同爲重要，分工而已，告之，而視之爲異端而攻其妄。毛先生如讀過四書，當能記憶及之，中國人民，已受三民主義之賜，獲得了自由平等之幸福，國家已列爲五強之一，不平等條約除蘇聯外，均已取消，絕不會再願意去做蘇俄的順民，所以我敢斷言，共產

主義，絕不容於中國人民，而終被埋葬，而且中國歷史之外患，大都來自北方，北極白熊兇狠殘暴，不容輕視，不好玩的，爲避免中國成爲國際列強之戰場，祇有大家信仰三民主義才對，所以我根本反對共產主義。」毛曰：「共產主義之實行，爲時尚遠，故我現在談，新民主主義。」我曰：「先生之新民主主義我已拜讀，並不勝於中山先生之民權主義。」雙方話不投機，至此而別。不料不久我政府退出大陸，毛竟得意忘形，一意孤行，立即實行共產主義，蘇俄懼其長大，誘其侵韓，使之戰美，以削弱其國力，當時雙方約定，中國出人力，蘇俄出經費，及韓戰結束，蘇俄竟食言不肯出錢，毛始知上當而覺醒，於是轉而反蘇，雙方陳大軍於數千里之邊境，如臨大敵。聯蘇之結果，蘇俄所佔我國之廣大土地，寸土未歸還，不平等條約，亦未取消，較之民國十二年，中山先生與蘇俄之越飛將軍之共同宣言，究竟出諸於大政治家之手筆，聯俄而絲毫不失立場，相去何啻天壤，蓋趙孟所貴，趙孟能賤之也。

軍事財政外交之失誤

日本人投降時，總裁派何應欽將軍去受降，我特地去看何將軍，我建議他要求日本人的軍隊，幫我們防守兩條路，由南京、浦口到天津，與由漢口至北平之津浦與平漢兩條鐵路，使日本軍隊幫我們防守這兩條鐵路沿線地區，我們的軍隊就可開往北方去，因爲我們的軍隊

都在西南、西北一帶。但何將軍忽略了我的建議，致使我們的軍隊須經上海，由海道運往天津、北平，白白浪費許多時間和人力、物力，予中共以調度機會，這是很可惜的事。

後來我們犯了一項很大的錯誤，就是日本投降後，所有在日本軍隊後面打游擊的部隊，我們沒有收容過來。當時這些在北方、在東北打游擊的部隊，都是本黨同志，後來軍政當局或許受了國防部次長共奸劉斐之影響，不要這些游擊隊的兵，引起了他們的怨恨，這些人心裏想：中央軍隊和日本人作戰時，我們在日本人後面打游擊牽制他們，不無有功，到現在天亮了，我們也應該有個歸宿呀！現在中央却不要我們，那我們跑到共產黨那裏去算了！這項政策的錯誤導致北方、東北那些打游擊的人大失所望，投向共產黨那邊。我們應該臨時接收他們，再慢慢地補充到各正式部隊裏去，才是正當辦法，如同淪陷區退出來的青年，如果我們當時不收容他們，他們自然被延安共黨收容去了，這種損失，是無法補償的了，爲淵驅魚，是等於壯大了共產黨，使他們平白增加好多萬人。

以上是軍事方面的錯誤，導致我們失去大陸。第二項失敗的原因是我們的財政金融沒有搞好。當日本人佔領了一地區，他們用日本軍用券一塊錢換取我們中央政府所行的法幣一塊錢，他們用這種方法逐漸收去了我們的錢幣，而使整個淪陷區都用日本軍用券，而我們中央銀行的錢幣便不通行了。這時候如果我們這邊有一個人，他有一萬塊法幣，那這個人必定很富有，因爲那時吃一桌含有魚翅、燕窩的酒席，才不過三、四塊錢。在淪陷區，可以用一萬

塊法幣去換一萬塊日本軍用券，人民感到並無吃虧，後來當汪精衛組織僞政權以後，他發行一種僞幣，此時一萬塊軍用券可換五千元僞幣，乃等於貶值了一半，日本投降以後，收復地區人民自然歡迎使用法幣，但財政當局宋部長竟規定兩百元僞幣換取一元法幣，這一錯覺，以爲這樣一來，就可用少數法幣把僞幣都收了回來，其實害了老百姓。有五千元僞幣的人祇能換到二十五元法幣了，而這時候的法幣早已貶值了，所以原有一萬元法幣的人民，祇剩貶值的二十五元法幣了。再舉例來說，抗戰初期，我曾用一萬塊錢協助兩所大學遷校，這兩所大學一所是復旦大學，一所是大夏大學，他們都在上海，沒有錢遷校到後方，我就撥給他們一萬塊錢辦好了這項艱巨的遷移工作。這樣看來，一個富有的人經過這場戰爭，他的財產由一萬塊錢變成二十五塊貶了值的錢了，這不是替共黨舖路嗎？還算什麼財政專家呢？由此可見，我們的財政政策把有錢的人民也變成沒有錢了，沒有錢的人，更是一無所有了，以前有句話我不太懂，這句話就是「民窮財盡」，到這時候我才懂得。政策一錯，可使民也窮了，財也盡了，所有的有錢人，都變成了窮人，無錢的人都變成了赤貧了。換句話說，我們已先替共產黨把人民都變成了無產階級，這是我們財政上犯的大錯誤，當時政府不應該去佔這種便宜。人民有五千塊僞幣，政府仍要用五千塊法幣去換才對；不應該佔人民的便宜，用兩百塊僞幣換一塊法幣。他只看到自己這一面，而沒有看到人民全被整慘了。勝利後我們剛回到上海，發現一切東西都便宜極了，因爲我們一塊錢法幣等於兩百塊使用，所以大家都搶購東

西，弄得老百姓痛恨我們。軍事上失敗，把游擊部隊放棄，使他們成爲共產黨的部隊；財政上的失敗，是幫助共產黨把有錢的老百姓變成「無產階級」，這兩大失敗，是我們爲什麼要到台灣來的最大原因。

所以任用人才要特別謹慎，治大國必須有大量，見識小、度量小的人，絕不能治大國的。又如果他中國書很少讀過，他寫的說的都是英語，他自然不能治理中國了。要是我寫歷史的話，上面這兩位先生的錯誤政策，雖然後者是經過中央會議決定的，竟把我們趕出大陸了。因爲那時老百姓對我們失望極了，心想換一個政府看看，或許還有希望，這種心理就幫助了共產黨成功。所以政治上政策一錯，影響大得不得了，每一個老百姓都蒙受其害呀！

冀朝鼎禍國陰謀之得逞

抗戰期間，我們知道冀朝鼎這個人和共產黨有關係，不過孔祥熙和他是同鄉，因此便用他。後來宋子文接孔祥熙財政部長，也用他，我們調查工作人員也曾告知孔、宋當心這個人，但孔先生因同鄉關係，很信任他，便不聽黨裏的勸告。宋子文從國外回來，中文程度差，平日均用英文，冀朝鼎這個人英文不錯，可能投其所好。孔、宋兩人都因冀很能幹，結果冀爲共產黨在我方財政金融方針任設計工作，他專門替孔、宋出壞主意，都是有損害國家

和損害政府信用的壞主意。

其中，如黃金儲蓄券六折還本問題，我曾在國防最高委員會會議中兩次發言反對，我說：「黃金儲蓄券發行是經行政院提經由立法院通過條例的。現在要還本兌現，既經過立法院通過的，怎能按六成發給人家呢？」主席蔣公說：「這是宋兼部長經考慮了很久才提出的，他說祇有這個辦法。你不要懷疑他。」我又說：「有些老媽子、司機借了錢買黃金儲蓄券以示愛國；現在要還本兌現一、二兩黃金，也要給他打六折，太說不過去了。」總裁聽了後說：「那就這樣好了，二兩金子以下全數還本，不打折扣！」蔣公太相信宋了，他總認爲宋是財經專家，其實，有些事是屬於常識，和專家沒什麼關係的。那時黃金儲蓄券行情看漲，黑市比官價還要高，可見需要量更多。第一期是發行二百萬元，那麼第二期可發行五百萬元，以適應市面需要，並以盈收對第一期到期者照數換第二期，不打折扣，以維政府金融信用。奈何宋氏不作此圖，從此乃使政府金融信用掃地！

另外，政府還發行過一種美金儲蓄券，購買者多爲華僑愛國人士。此券到期應以美金兌現，孰料到期後，宋先生却不給購買者兌現了，這是一種賴帳的行徑，使政府又大失一次信用，實在太沒道理了。從此以後，華僑對政府亦失了信用，眞可惜，大陸淪陷後，冀朝鼎被毛任爲財政部重要職位，可以爲證。

以上兩項金融缺失，再加上法幣與僞幣不合理的懸殊兌換比率，無異使富者變窮，貧者

愈加窮困了。這都是冀朝鼎替宋出的壞主義，復因蔣公太相信宋子文，故我屢次針對以上缺失提出建議，也未予採納。從這些事實看來，可以說在抗戰勝利後，我們每一步棋都走錯了。檢討起來能怪誰呢？每樁大事都是總裁或最高國防委員會最後決定的。現在回憶這些痛苦的經過，太難說了，誰該負責呢？當然我們不能把責任推給總裁一個人。王世杰先生掌理外交，其最大的失敗，爲答允馬歇爾將軍來華調解之一事，使我軍事受外交之牽制而誤時機，其害太大，其詳見下「我與馬歇爾將軍」一節，不贅述。

平息上海金融風潮及成立經濟改革委員會

宋子文先生這個人對國情不瞭解，書信都用英文寫，如他所決定的拋售黃金措施，便大遭人非議。孔祥熙先生卸任時，移交給他很多黃金，白銀也不少，所以導致其拋售黃金，此一決定是很糟的事。這時舉國金融經濟很亂，人心惶惶，上海反對宋子文的聲浪很大，工會罷工，商會罷市。總裁乃派我到上海，設法平息風潮。

我到上海後，邀工商社會人士進行調解。他們說：宋子文先生的做法很乖張，不合乎我們的國情，如此下去不得了！我當即表示：大家要冷靜，我們慢慢想辦法。我並向上海各界人士發表演講，講的是：「三民主義的經濟政策應該怎麼樣」。大意是說，外國人在上海經

營銀行，其制度是特別重視商業，他們把我國農產品以廉價收購運回本國，加工後再以高價工業品賣給我們。這可用三句話說明外國銀行在我國的經營政策，那就是：「不管農業，敷衍工業，特重商業。」但我們應採取的金融政策則不然，應該是扶植農業，提倡工業，顧及商業而不能以商業爲中心，三民主義的經濟政策應該是這樣。因此，我批評現行經濟金融政策，是不合乎三民主義要求的。

演講後的第二天，中央日報等各大報把我的講詞刊出來。那時宋子文先生爲行政院長兼財政部長，聽到有這樣一篇文章後，令當時任行政院的秘書長蔣夢麟先生，帶了報紙到廬山向總裁告了我一狀，說我指摘他的金融政策不當。總裁當即打一電報給我，他很客氣的說：「立夫兄！你對金融有什麼意見可向我說，不要對外發表。」於是我拿著那篇文章去找宋先生。我說：「子文兄！你看我的文章是罵了你呢？還是幫了你的忙？請你花十分鐘仔細看一遍（他看中文是很吃力的）。」他看了後說：「你沒罵我呀！寫得很好嘛。」我說：「在我的演講中，我僅說明過去幾十年，金融政策是抄襲外國而僅注重商業，於我國的需要不相合，而建議以後金融政策予以徹底檢討，加以改革，這是替你解脫的，不料却引起你對我的誤會，我要離開上海回南京了。」他說：「你別走，明天我請上海金融及工商各界負責人在中央銀行開會，特別請你發表演說。」以宋氏驕傲的個性來說，這簡直是破天荒的大事。我說：「回南京我的票都買了，已不能再躭擱。」但經其再三懇切的挽留，我也祇好把回程

票退了。

宋氏連夜邀請上海金融、工商等各界領袖共二十餘人，翌日在中央銀行開會，我演講時仍強調日前我所講過的三民主義經濟政策，並指出目前我們所推行的金融制度，是帝國主義者侵略中國多少年來帶來吸我們的血的制度，極不適合時宜於我國的需要；這當然非宋院長的政策，但今後望其能針對積弊改革，代之以三民主義的經濟政策。

我的演講歷時四十五分鐘，宋氏始終很虛心的坐在主席位子裏聽講，據人告我，宋子文先生如此耐心的聽人講話，是罕見的事。我講完了，他並詢問大家有無意見。他即席指出：「立夫先生講的很有道理，希望大家要共同研究。」我在演講中還強調：「我非學政治經濟與銀行學，祇是站在一個三民主義信徒立場，希望改革現行金融制度，以適合國家社會之需要而已，相信宋先生必有此魄力去大力改革。」

我平息上海罷工罷市反對宋氏風潮後返回南京。待總裁自廬山歸來，我即寫一報告歷述上海見聞以及平息風潮經過給總裁，並指出此事件暫時雖已無問題，但目前我國金融政策已屆危險邊緣，亟應研究改革。總裁看了我的報告後，當即命令成立一「經濟改革委員會」，且令我擔任主任委員，劉健羣副之，而宋子文先生也是該會委員之一，另有學者專家多人參與。宋氏按時出席開會，在他這位一向驕傲的財經專家來說，是頗不容易的事。嗣經擬訂一經濟改革方案並依法定程序通過，在我赴美考察民主制度之前呈給總裁交由財政部門執行。

我想開國需要軍事，治國需要經濟，總理是經濟長才，而非軍事專才，故不能統一中國，而蔣公是軍事天才，而非經濟長才，所以打下了天下而不能守之；假定孔祥熙在抗戰勝利後，繼續掌握財經，而不由宋子文接充，我們還不至來到台灣。回想起來，無限感慨！

我與馬歇爾將軍

我自民國二十七年一月接任教育部長至三十三年十一月，已將達七年之久，蔣委員長是時已決定召集制憲國民大會，有意調我回任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兼負籌備選舉國大代表事宜，我遂辭教育部長職。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日本無條件投降。十一月下旬某日，委員長約我至重慶汪山官邸午餐，同席有經國同志。餐畢，外交部王世杰部長有要事晉謁，報告美政府派馬歇爾將軍來華調解國共間問題。我聽完報告，即對委員長率直而肯定的說：「此事不妥，任何人來，比馬歇爾將軍爲佳！」委員長問：「何以見得？」我說：「國共間問題，宜直接商諸蘇聯，反易解決，若由美國出任居間，使蘇面子過不去，徒增阻礙，此其一。照我觀察，共方利於拖延，俾有時間整軍以對我。美方對於共黨問題，見解不深，易受其欺，此其二。國共問題，據我推測，調解之機會極少，馬歇爾將軍英雄人物，爲世所稱，此番出任調人，祇能成功不能失敗，一旦失敗，如何下場？其咎若諉之於我方，我又將何以

自處？此其三。有此三者，我所以認爲馬將軍不相宜。」委員長聽了，似有所動，即向王部長問道：「同意的電報，已經發出否？」王答：「已經發出。」（其實那天是星期六，要追回電報，還來得及。）並謂：「美方對中共問題不太了解，參加和解，當可增加認識。」委員長默然不語，我續道：「將來得不償失，悔之晚矣。」

馬將軍於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以杜魯門總統特使名義飛來重慶調解，二十四日爲其生日，委員長安排一個盛大宴會爲其洗塵並祝壽，不料彼竟以殖民地總督式的口吻，大大的責備我們一頓，參加的文武百官，聽了甚爲不悅。飯後，委員長約馬將軍、王寵惠（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長）、吳鐵城（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及我（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四人，集在一隅談談，並一一介紹後告馬氏道：「馬將軍如需要知道有關吾方的黨政資料，可和這三位先生接洽。」馬將軍遂與吾等略談數語辭出。

次日，王、吳及我三人連袂去見馬將軍，作禮貌的拜訪，並再三聲明，如有需要吾三人協助之處，請不吝通知，當盡力爲其服務。唯自此以後，從未接到馬將軍一電話或通知接見，數星期後，我與吳鐵城先生商量，吾三人是否再去見他一次，吳以此事徵詢王部長意見，以王不同意而作罷。

數月以後，我奉命去上海，處理學校風潮，適値司徒雷登先生經滬去南京，謂係奉馬將軍之電召，司徒先生之親信助手傅涇波先生知我在滬，經潘公展先生之安排，與司徒先生作

七小時之長談。在抗戰期間，司徒先生時由北平來重慶，常與我往返；北平方面學校之事，常託其轉達。此番在上海相晤，知馬將軍之電召，必將畀以任務，燕大學生中之左傾者，混入美國大使館者已不乏其人，司徒先生如任大使，彼等正可利用之以遂私圖。我遂乘機將中共與國民黨之分合歷史詳加奉告，俾知中共之陰謀篡奪，必須隨時警覺。司徒先生以往從事教育，心地純潔，對共黨之奸謀聞之指髮。此七小時之講述，或對司徒先生未來應付環境，不無幫助。最後我請司徒先生於有機會時，暗示馬將軍預先有所準備，因彼之使命，在我方定必想盡方法，助其成功。唯中共方面僅以談判爭取時間，不求任何結果，如此推論，馬將軍所希望使命之成功成份不多，爲彼計自應作最壞之準備。

三十五年七月九日，司徒先生被任命爲美國駐華大使，彼果將我告彼之言轉告馬將軍。馬將軍疑我之所言爲委員長所授意，其實，委員長從未向我談馬將軍之事，我之見解早在馬將軍未來華之前，即已提出，今將證明我之預測爲不謬而已。

一日馬將軍見委員長問道：「司徒雷登先生在滬遇見陳立夫先生，彼告以余之使命恐怕不會成功，應早有準備，然耶？否耶？」委員長笑道：「陳立夫有事去上海，我已數星期未見彼，彼富於哲學思想，先生何不約其一談？」馬乃到處找我，期能一談，我得家中長途電話，由上海趕回南京，與馬約會於其寓所。

馬將軍初見我時，氣氛似不甚友好，首先問我對國共和談之態度。我說：「我爲國民黨

黨員，且任組織部部長，在黨部開會討論和談問題之時，各人可自由發表正反不同意見，和談一經黨的決定，全黨黨員務必一致服從，我任黨的組織部長，尤應以身作則。」馬謂：「周恩來說你破壞和談，反對我，並在重慶教場口親自指揮打他們新華日報舘，有無此事？」我問：「有無確實證據？」並告以我素習礦冶工程，尊重科學，無稽之談，羞於爲信，周之所言，純屬誣衊，請詳言之：「猶憶先生初抵中國，在首次宴會之後，委員長曾特別介紹王寵惠、吳鐵城及我與先生，以備諮詢，次日並曾趨前拜謁，重申此意。數月以來，未蒙召見，初以爲先生對於本黨方面情形已知之甚詳，今聞先生之言，始知先生所知曉者，純爲一面之詞，且與事實相反，無怪乎和解工作發生困難。先生如有時間，願將經過奉告。」馬將軍說：「請說下去。」我乃將八年大戰之後，如能和談成功，政府得有喘息機會，整軍建設與國家有利，誰不贊成，何況此舉經本黨決議之後，更無個人反對破壞之可能，我爲黨的重要幹部，尤不容不服從，否則黨的領袖，能不以黨紀處分我？馬聽後表示驚奇，但並不置疑。我繼續告以對他之來華，事前確曾向委員長表示異議，乃將以前告委員長之三點理由相告，謂所信如此，主要原因爲，我以往與中共接觸時機特多，其交涉對象爲周恩來，故對於國共和談之談判，認爲共黨係利用國人「久戰而厭戰」之心理，策動和談以爭取時間，並無誠意，當然不會有結果。並謂：「我因爲愛惜先生，不願先生以世界之英雄，擔任此一失敗之使命，故自始即向委員長陳述，謂任何人擔任都可以，唯獨馬歇爾將軍則不可。惜乎吾政

府負折衝搏俎之責者，平時絶少與共黨接觸，見不及此，徒使先生來此嘗試。我終日所憂懼者，爲的是，如一旦和解不成，先生將如何下台？故於上海晤見司徒雷登先生時，請其暗示先生早作準備。我今日能將心中所欲言者，當面奉陳，非常愉快，先生當知我之反對先生擔任此事，乃在事先，爲的是先生，事後希望能幫助先生而乏機會，今日得見，敢不盡情以告。」馬將軍聽後非常感動，自知已上了當，欲我繼續陳述，我復告以：「周恩來之言全屬虛構，新華日報館造謠生事，謾罵政府，人民厭惡已達極點，是日遊行隊伍經過新華日報時，該館樓上擲下一杯，打傷遊行者，民衆激怒，遂將其搗毀。當時我在社會部主持一會議，參加者爲何人，會議時間地點，均有紀錄，我何能分身去教場口指揮羣衆？先生如不信，可召當時參加會議者而查問之，當知我言之不誣。」聽至此，馬將軍願知以往國共分合歷史，我遂以所能記憶者相告，並將我與鮑可莫洛夫商討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及與周恩來、潘漢年商定共同抗日聲明之經過詳述一遍。馬將軍極感興趣，聽之不倦，其時接近傍晚八時，委員長約其晚餐之時已到，我欲停止，而馬仍願我續講，謂稍遲至委員長處沒有關係。我不便却之，遂將我於一九二七年清黨後，如何建立中國之調查統計工作組織（如同美國之ＦＢＩ）之經過相告，當時助我之高級人員均留美習工程或科學者，從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之十年中，此一工作，全受我直接或間接之指揮（受任教育部長以後我不再負責），爲美國技術對付蘇聯技術而戰勝之階段，共黨之地下組織，被我方破獲者百數十處，共黨份子之來投誠

或被捕者約一萬五千人，其中不少以後被我任用在各級黨部工作而頗有成績者，周恩來本人在上海租界僅差五分鐘，否則爲我方拘獲（此爲周本人親口告我者），共黨之特工頭子顧順章向我方投誠，使共黨聞之畏懼；而抗戰期間我在教育部長任內，一切措施，均阻礙共黨對青年開展工作。周之視我爲最大敵人，用盡方法毀謗之，誣衊之，自在意料中。我深信共產主義不適合於中國與美國同，而中國文化則遠勝於蘇聯，而爲愛好和平之文化，對未來世界，當有所貢獻。談至此，我遂儘快結束，並謂馬將軍：「如有垂詢，請隨時賜一電話可也。」乃辭別而出，此番一晤，爲時幾達四小時，予馬之印象極深，以後諸事，可以爲證。

我將晤馬氏之經過，約略面陳委員長，委員長問：「馬將軍有未約你們三位談過？」我答：「從未約過，此是首次，且僅約我一人。」委員長始告以馬氏誤會我對司徒之言，故建議馬約見我者，而對馬將軍不約我等三人詢問本黨方面諸問題，認爲馬將軍來華之前，已有成見之故。我回憶馬將軍在重慶之第一篇講詞，可以證之。而我等三人被阻止接近馬將軍，更爲極大之隔離而鑄成大錯。加以馬將軍之旁，有共黨潛伏，更以隔離馬將軍與我等接觸爲任務之一，故馬將軍之偏聽誤斷，自必難免。

七月，中國青年團在廬山召開大會，委員長於閉會前向全體團員訓話，並分析國際局勢甚詳，會後囑我同返官邸，告我以馬將軍強其所難，面現憤怒之色。我遂乘機提起當初我所以不贊成馬將軍來者，其原因在此。彼急欲其使命成功，非接受共黨之無理要求而強我方接

受不可。爲今之計，我們祇有忍耐，不可與馬氏鬧翻，致使和解失敗之責任，諉之於我。若彼拂袖而去，則損害中美情感，於我極爲不利。委員長聞而不語。

馬將軍之使命，固不出我之所料，終於失敗。而共黨藉談判以爭取時間之目的，則已達成。美政府於是不得不爲馬將軍另想出召其返國之正大理由，以保全其顏面，乃發表其爲國務卿。

民國三十六年一月八日，馬將軍離開中國，發表一篇談話，曾由中央社自華盛頓拍發全文，主要有：促進中國「和平之最大障礙，乃中國共產黨及國民黨彼此所懷之完全而幾乎具有壓倒力量之懷疑心理。一方面，政府領袖極力反對共產形式之政府，另一方面，共產黨坦白表示，彼等乃馬克思主義者，並有意在中國建立一共產形式之政府，唯先以美國或英國式之民主政府爲過渡階段。政府領袖深信共產黨人所表示願以參加政府協商會議去年一月所主張設立之政府，其目的唯求破壞。余信共黨人士認爲政府之顯然接受政治協商會議關於建立新政府之決議，並無誠意，並蓄意藉軍事力量之壓制及秘密警察行動，以消滅共產黨。雙方除相互極不信任外，尚有另一顯著錯誤，即忽視其於估計雙方面於解決協商中各種問題所作建議或反對之理由，而必於疑懼時將產生之影響。……」

馬將軍此一談話雖責備雙方，唯對共黨之無誠意和談，及其種種惡意刁難，以及其最後目的，則已洞燭其奸。

一月十五日，紐約時報記者來訪，詢以我對馬將軍之聲明意見如何。我遂發表下列之談話，爲求字句正確，特先請李惟果同志譯成英文，原文如下（經中央社紐約十五日專電拍發）：

第一、認爲馬氏來中國所負之使命，頗多成就，促成中國各黨派團結（惜最後共產黨未能參加國大），開成國民大會，乃至通過「與去年一月各黨派（共產黨在內）政協會議所定原則相符」之民主憲法，馬氏均有所貢獻。

第二、認爲馬氏看中國問題相當深刻，對於中國共產黨之看法自甚正確，但如能以較多時間與國民黨各負責幹部及社會人士更多接觸，則其對於中國整個問題之認識，或更正確。

第三、認爲馬氏指出中國共黨問題不同於美國共黨問題，並提醒美國人，切勿用看美國共產黨之看法，看中國共產黨亦甚確實。

第四、認爲馬氏指出中共：「不顧事實」與「不顧人民痛苦」，而專從事於「非常有害而具有煽動性」之宣傳，以及推翻政府、崩潰經濟之企圖，亦甚深刻。

第五、認爲馬氏指出中共爲純粹的馬克思主義者，「蓄意在建立一共產形式之政府」，而有異於若干美國人士誤認中共爲土地改良者，尤具卓識。

第六、認爲馬氏主張中國今後應切實依照憲法，完成民主政治工作，並歡迎各黨派參加政府，尤爲完全確當之見解。

吾人所引爲遺憾與慚愧者，即爲馬氏以一盟國之友，高齡老人，不辭勞苦，爲中國作十三個月之努力奮鬥，而猶不見諒於少數中國人——即中國共產黨，而「故意對美國政府行動政策及目的，加以曲解與謾罵，並不顧事實，尤不顧及眞理，顯係用心誤導中國人民及世界各國引起激烈之反美情緒。」讀馬氏「在此種公然謾罵及完全不顧事實之情形下，保持緘默，既感困難，如加否認，則每日必須否認，是誠美國官員所不能忍受之事」數語，其衷心之懊喪痛苦可知。然而熟知中共之慣技者，並不以此爲異。二十年來，中共又何嘗不以同一方法，甚且十百倍過之，對其本國政府與本國同胞，而故意對國民政府及國民黨之行爲政策及目的，加意曲解、誤述、謾罵，誤導中國人民及世界人士，引起激烈之反中國政府及國民黨之情緒。即以我個人而論，我實爲抗戰之初最先努力國共合作工作之人，而中共迄今所最曲解、誣衊與辱罵者，亦爲我一人。故熟知中共之慣技者，自應不以此爲怪。

我猶需坦白指出者，即國大國民黨代表中大多數份子，俱受有英美自由思想或多或少之教育影響者，亦即中共惡意宣傳已久之所謂「反動份子」或「頑固份子」，實則即爲此次國大通過「與去年一月各黨派政協會議所定原則完全相符」的民主憲法之「進步

份子」或「自由份子」。中共善於製造名詞，加之於人，其宣傳方法，又甚技巧，故其影響，每易使人炫惑不明，甚或誤假為眞而不自知。究其實，二十年來在中國，凡揭發或阻止中共顚覆政府，或「蓄意建立一共產形式之政府」之陰謀者，莫不被目為「反動份子」或「頑固份子」耳。

科學家解決問題之方法，祇有多多與現象接觸，多多分析並研究其內容，然後方有發現顚撲不破的事實之可能。政治家研究或解決政治問題之方法，亦應如是。馬氏以十三個月之長期留駐中國，憑其智慧熱誠及其所採用之科學態度與方法，故能發現中共之行動中「有一非常有害，而具煽動性之事實」，故能發現固執之共黨人士，絕不猶疑使用激烈之手段，以求達其目的，故能發現中共為「絕對馬克思主義者」，所有目前一切言行，均係手段與政策，而其目的，則「在中國建立一共產形式之政府，或於過渡時期內組織英美式之民主政府」。至於英美式之民主政府，正與本黨數十年所奮鬥、所追求之民權主義之理想脗合，而即依此次國民大會所通過的憲法而產生之政府也。

據聞美國大使館以我之上述談話全文電致馬將軍，其時馬將軍對我之認識已與前大不相同，對我所發表的感想六點，當不致再以頑固份子視我矣。

時代雜誌以吾像爲封面

共黨之慣技，爲分化敵人，在粵時以胡漢民爲右派，以汪精衛爲左派，捧左抑右，爲其策略。及北伐軍佔領長江以南諸省，又以CC（中央俱樂部 Central Club 之簡稱）以分化中央黨部，嗣後又控造四大家族以攻擊在朝者，積非成是，以盡攻擊之能事。及中日戰爭爆發之後，又以自由份子與頑固份子分化本黨，凡堅決反共者均誣稱爲頑固份子，蓋此類份子，不受威脅利誘反共到底者也。共黨之攻擊最烈者，即爲彼輩之所最畏懼者，我既任調查統計方面之指揮者，又曾使共黨分子自新來歸一萬五千餘人之多，在任教育部長時所行政策，均阻礙共黨工作之推展，自成爲攻擊之第一目標，但我自律甚嚴，無懈可擊，種種誣衊，不啻爲我增強知名度而已。

因此美國著名之《時代雜誌》駐華記者 Friderick Grain 君前來訪問。余以中國文化以孔子思想爲主流之原因告之，並將國共分合之歷史詳述之，初不料於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出版之《時代雜誌》封面有余之畫像，而內中有長文一篇，敘述余之思想、信仰、人格、操守，及事功，其態度頗爲公允，該記者事前並未以此相告，及出版後，我始知之，蓋封面之畫像原幅，照例應贈送給本人也。此一出版，使我之國際知名度增加，故次年訪美英時，接見者輒以見我像之在《時代雜誌》封面爲談話開始之資料也，唯在國內，似亦引起人之忌妒

也。

外蒙古獨立一案之經過

蔣公不知道是否受雅爾達會議之壓力，提出同意外蒙古獨立自治案於中央政治會議，並邀全體立委至中央開會，使之通過此一法案，其時戴季陶先生與余意見相同，「我們不必正式承認外蒙獨立，以留他日收回之餘地」，面陳蔣公，未蒙採納，亦未示原因，似有苦衷，卒致通過。將來恐成問題。

政治學校風潮

中央政治學校在民國十六、七年間就創辦起來。創校之初爲中央黨務學校，後來才改爲中央政治學校，是黨辦的，此和一般學校不同，不隸屬教育部管轄，直屬於中央委員會管理，除由蔣公兼任校長外，另有一校務委員會，由黨內元老如胡漢民、丁惟汾、陳果夫、戴季陶諸先生組成，嗣後我也被邀加入其中。

該委員會權責頗重，學校一切重大教育方針，決由該委員會決定，至於校長的提示，也

須由委員會研議後，再依照其意思執行。況且校長經常親赴前方督導作戰，也沒多大時間投入學校，因此校方常務工作，大都由各元老照料。

當時，先兄果夫在諸多元老輩中尚屬年輕，故耗在學校中的時間也最多，他先是做總務部主任，後來便代理教務主任，而政校學生都對先兄觀感極佳。因此他常接近學生，如經常作個別談話等活動，能深入瞭解學生疾苦，排解難題，所以有很多事情都先由先兄策劃，簽呈校長批准後交校務委員會研討通過執行。另校長基於實際需要，也親自寫一些提示，然後交給先兄飭由有關部門推動。

政校很特殊，採軍事管理，而入學考試又很嚴，不講任何人情關係，比如黨內老同志的家人要入政校就讀，如入學考試成績不好，來信關說也絕對不行。一般情形是入學考試平均二十人中錄取一名，比統一招生五人中取一人要難得多，當然錄取率不高，也和學生完全公費有相當關係，有不少清寒子弟都願來政校就讀。學生在校時接受嚴格的管理，培養堅定的信仰，而他們畢業後在社會上經若干時期習練後都獲得重要職位。該校除有政治、經濟科系外，還有合作學院、地政學院、蒙藏學院、新聞學院等，當時多為各校所無。如今合作金庫、地政界服務者多為該校出身，至於新聞科系畢業者，則多分佈於各大報社，堪稱造就人才極廣。

出身政校的學生，多有良好的學問基礎；我主持教育部時，曾對他們作過考核與比較，

覺得政校畢業學生，由於選擇較嚴，其程度自然大都在中上級。此後政府遷台，該校即改爲國立政治大學，而本黨從訓政結束已漸進至憲政時期，教育邁入正規，而原有校務委員會亦不復存在。另有值得一提的是：那時高等考試及格，均須到政校受一次訓練，足證該校在培育國家建設人才方面的重要性。

在抗戰時，除政校外，總裁又辦了一所中央幹部學校，請經國先生任教育長，該校也造就了很多人才。當時在大家的感覺中，爲何要辦性質相近的兩所學校呢？且二校同由總裁擔任校長，而政校這邊是由先兄果夫爲教育長，而先兄也深感二校共存實無必要，恐要製造派別，而先兄自覺年歲大了，正可順理成章的交給年輕人，因此乃據理簽請蔣校長希望合成一校，而由經國先生來擔任教育長。簽呈上去以後，過了好幾個月都沒有批下來。

此時，朱家驊與我對調爲教育部長，我則回任組織部長，政校有個黨部，我也是委員之一，但他並未告訴我要發表經國先生爲教育長事，嗣此令忽然發佈而朱家驊又去杭州，先兄也毫無所聞，孰料校中竟因此發生了風潮！到處張貼標語，反對蔣經國爲教育長，此一消息傳至校長處，校長把我找去問我：「政校發生風潮你知道嗎？」我說：「不曉得。」他又問：「你怎不曉得？」我遂問：「究竟什麼事？」他說：「經國發表了政校教育長，學生們反對。」我說：「朱部長發表此令並沒有通知我一聲，所以我一點不知道。」他說：「你趕快去處理。」

在一般人看來，以爲政校是與我們兄弟二人有重要的關係。而我在政校教三民主義一課已有好幾年，學生對我很好，也可以說學生們對我兄弟二人都相當尊敬。因此，對於政校風潮的事，蔣公便很自然的最後對我說：「你趕快去處理，不要引起誤會！」於是我便即刻趕到學校，此時已勝利復員，學校已由重慶南温泉遷回南京的原址紅紙廊。趕到學校後，我即請學校召集全體學生講話。我向學生們說：「你們不應反對經國先生，你們應該歡迎他來。」我說了許多理由，大家終於接受我的勸告，立即把反對經國先生的標語撕毀並派代表去歡迎經國先生。

然而，我奉命處理這件事後，事實上却吃了個寃枉虧，因爲在人們的感覺上是：「你的力量眞大，竟能靠一篇講話就完全扭轉了大勢！」而經國先生也執意不肯去接政校教育長職務，後來乃是由教育部次長顧毓琇接任。嗣經證實，此事件係由朱家驊的疏忽及共黨挑撥幾個青年軍出身的學生考入政校者煽動學生，反對經國先生的行動，自始即是一項有計劃的陰謀活動。檢討起來，如當初朱部長能事先向政校黨部打個招呼，由我們先向學生們作些準備工作，便不會被共黨破壞利用了。此是黨內負責同志缺乏警覺及相互溝通的一則教訓。

後來校長蔣公仍然下令將幹部學校與政校合併，到了台灣，政大復校，改爲國立，另由教部聘任校長，至今猶然。

遴選國代政策之錯失，選舉總統副總統之不當機立斷

我被調回組織部，就是來幫助國民大會的選舉，這項選舉麻煩很多，主要的麻煩不是我們黨裏的麻煩，而是要各黨各派參加選舉的麻煩。困難的是多年來友黨他們沒有什麼活動，以前他們有少數黨員分佈在各縣，但這種黨員也沒有什麼活動的成績，所以要他們在多數國民黨黨員競選中產生出來是很不容易的。

中央爲了挽救這項缺點，就給青年黨、民社黨每個黨若干名額，而這些名額要我們黨員在各縣選出的代表讓出來使他們補上去，這是很困難的事。假定我們黨內同志努力奮鬥許多年，他被選出來了，又要他讓給青年黨或民社黨的黨員，而這種黨員在當地沒有什麼服務成績，又沒有什麼很大的貢獻，要叫黨內同志讓出名額給他們，這是一件非常艱苦的事情。

不過黨裏既然這樣決定，我們組織部就要去達成任務。按照道理，這種做法是不對的，應該誰的票數多誰當選才對，沒有理由讓給票數很少的人。譬如一個國民黨黨員，他有一萬三千多票，一個青年黨員，他只有三十多票，本黨硬要把有一萬三千多票的人讓給那三十多票的人，是違反民主精神的一件很艱困的事情，可是我們黨裡的同志都能顧全大局，經過勸導之後都能讓出來，但內心總有些不甘心的。這項工作在民主政治上是一件違法的事，民主政治完全靠人民擁護的，擁護的人多便選出做政治人才，擁護的人少而又要擁護的人多的讓

出位置來，是不合乎民主條件的。所以有人講青年黨、民社黨得到民主之虛惠，而國民黨却犯了違背民意獨裁之名，這種批評，對我們辦事之人而說，是一種違背良心的痛苦。

我曾和中央黨部秘書長吳鐵城先生商量，我說：「與其這樣讓出名額來，還不如修改選舉法，在名額中給青年黨、民社黨增加若干名額，反而簡單，也不會太違背民主的原則，譬如中央決定一些遴選的代表（遴選就是不一定要經過選舉），這樣的話，他們各黨各派不能選舉出來的可以遴選，這樣比較簡單得多。」吳鐵城先生不贊成這個辦法，所以我也無法向中央常會提出。這樣做下去，是給組織部一個很大的難題，我調回組織部做這件很艱苦的事，換來的結果是：一方面青年黨、民社黨他們還不滿意，我們答應他們一百二十個名額，他們還要求增至兩百個名額，那就更不容易了，最後東刪西減，又讓出一些名額給他們，總算勉強解決了這項困難。

那些讓出名額的人，他們在國民大會裏也有許多朋友，那些朋友替他們打抱不平，因此國民大會開會時並不順利，中央要一般同志怎麼樣去做，他們對中央處理不滿意時，他們就在應該服從的時候而持反對的立場。我非常後悔，我不堅持改爲遴選，是一生最大的錯誤，我違反了民主的原則，而要求同志們謙讓，是一件不合人情的作法，其影響之大，我應該負責的。這個時候李宗仁競選副總統，有很多代表對中央很不滿意，本來他們不會去幫助李宗仁的，那時對中央不滿的都去幫他了。中央不希望李宗仁被選出來，大家偏要把他選出來。

這一下意氣用事就出了毛病，我們大陸的丟失，這件事具有直接、間接的影響。

本來李宗仁的競選，我在事前曾向蔣公報告，我說：「李宗仁要競選副總統，這件事要早一點決定政策。就是要不要准他競選？如不准他競選，早點制止他，否則他到處活動，花了很多錢，那時再制止他就不容易了！」蔣公當時很猶豫，他也不好意思制止那一個人，照道理講誰都有權去競選的，去制止他也不大合乎民主，所以他也始終沒有去阻止他。事實上我覺得在黨內，總裁可以在事前告訴某同志：「你這一次不要參加競選，下一次再參加。」也是可以的。

國民大會先要把總統選出來，那時有一段插曲。蔣委員長推薦胡適之去競選，他派人去徵求他的同意，胡適之覺得能做總統是光榮的事，因此也同意競選，不過這件事倒是蔣委員長客氣，或許他想如果總統是一個文人，他來做副總統，那就能阻止任何人來爭此席位了，實際上我覺得，蔣委員長不應把總統擅自讓給人家，因爲連自己還沒有被推選出來，何能以之讓給他人，蔣委員長的謙讓對他自己是很好，但他沒有想到黨內的老前輩們却都不贊成，他們的想法是這樣的：你，蔣先生當總統沒有話說，你今天讓給一個非黨員，他也不是任何一黨的黨魁去做總統，我們這班跟著總理革命、出生入死的人，爲什麼沒有資格做總統？所以，蔣委員長的謙讓，他只想到了一面，而沒想到另一面。黨裡的人覺得不應該，所以他們表面上不便反對胡適之，但口中却說：總統只有蔣先生出來，除了蔣先生外，沒有第二個人

適合，所以到最後還是推定蔣委員長爲總統候選人。

蔣公當選之後，其他的人當然開始競選副總統了，像西北方面推舉于右任，他年紀也很大了；孫科是總理的兒子，他也很有功勞，也被廣東方面提名；程潛在北伐時任第六軍軍長，資格很老，是湖南人，湖南方面，軍事人才很多，力量很大，他們推舉他出來；再加上李宗仁，四個人出來競選副總統。在黨裏開選舉會議的時候，蔣先生是全體一致推舉了他爲總統候選人，當時我就寫了個條子給蔣先生，我寫著：「照美國的慣例，副總統由總統提名，是不是就乘這個機會把鈞座心中想要的人選提出來？也是很合適的。除了美國外，其他的國家也有很多是副總統由總統提名的，總統提出的人選，大家也沒有話說。」不過他沒有採納我的建議，他就站起來宣佈：副總統自由競選！這樣一來，我在組織部的地位就不能幫那一個了，因爲黨決定副總統自由競選，他們四位競選副總統者都來對我說：「你們組織部不能隨便幫那一個人的忙了，這才是自由競選。」無形中把我組織部長幫人競選的能力解除了。

實際上，總統並沒有想得很週到，他心中是很想孫科當副總統，但表面上仍要大家自由競選，他不知我們的困難，假定我們組織部今天去幫助孫科，其他三位都是黨裡的老資格，他們一定對我大不滿意，責怪我違背黨的決議，使我無話可辯了。這樣怎能眞正把事情做好呢？但是一經決定自由競選，我們就感到十分困難了。

這樣決定，蔣公可不得罪任何一位候選人，但是又希望組織部還是把孫科選出來，而孫科這位先生有大少爺派頭，他不從事選舉活動，選舉這件事不活動是不行的，李宗仁却有大批人幫他去活動，所有的國大代表，他都有人去和他們接觸。李宗仁的太太又能幹又漂亮，這期間也爲李宗仁四處活動。相形之下，孫科實力太弱，我們已暗中幫助孫科，但是投票的結果，孫科的票數比李宗仁少得多。李宗仁花很多錢，孫科又不肯花錢，也沒什麼錢，所以李宗仁當選了副總統。

在還沒有舉行選舉副總統之前，李宗仁一度曾感到有困難，想要退出競選，寫封信給蔣公表示自己要撤退，這個機會很好，蔣公應該批准他自動退出競選，可是他又不批准，而予以慰留。所以有三步都走錯了：第一步是開始不制止他；第二步，總統自己不肯提名副總統，致第二次機會又錯失；第三步是李宗仁自己請求撤退，應該核准他，而又不肯接受。結果李宗仁被選了出來，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爲什麼要到台灣來的主要原因。因爲一選出來之後，蔣公若能稍爲將計就計，忍耐一下就沒有事了，而蔣公這個人心中有什麼不滿意，臉上就會表現出來，李宗仁也知道蔣公不大滿意他，他們兩人的感情就不好了。

在這個時候，敵人已從濟南打下來，那時候李宗仁桂系的軍隊在河南，假定他的軍隊能往東方（山東）推進，就正好撲向敵軍之背，他們就不敢南下，這在中國歷史上時常可見的局勢。敵軍自山東濟南往南進攻，而李宗仁桂系的軍隊却按兵不動，除了按兵不動外，還對

蔣公不客氣，白崇禧打電報來違抗命令，他們的目的是希望蔣公直屬部隊被打垮，剩下的就是他們的部隊了，所以他們的居心實在可恨。

因此在最重要的決定勝負的一戰——徐蚌會戰，我們失敗了，長江以北的領土全部落入敵手。桂系的軍隊沿平漢鐵路往南撤退，就變成長江以北是共產黨的力量，長江以南是我們的力量，此時，雙方談和，他們又逼蔣公下野，共產黨說只要蔣先生下野，什麼問題都可以討論。蔣公想：我變成和平的障礙了，那我就下來吧！這樣一來，李宗仁便代理總統，整個的大局就垮了。李宗仁又不能指揮軍隊，軍隊也不會聽李宗仁的指揮，蔣公在野，已不是海陸空軍大元帥了，李宗仁才是海陸空軍大元帥，軍隊是聽李宗仁的話，還是聽蔣公的話？長江以南的部隊逐漸又被打垮了。

所以大陸失敗的主要原因是中央辦選舉辦錯了；國民大會開得不好，就是我們政策方面錯了；各黨各派的代表名額不應分去我們當選同志的名額，我們的黨原本很團結的，像這樣弄得自己黨內就不團結了。在選舉方面，事前沒有週詳計劃，總統之位又要讓給胡適之；副總統的選舉又不事先阻止內心不喜歡的李宗仁競選，就這樣一錯再錯的錯下來，弄到由政治影響到軍事失敗的局面。

參加世界道德重整會大會

世界道德重整會是卜克門博士（Buchman）倡始的，他鑒於赤禍流行，世界各國社會道德普遍墮落，本救世之心，以重整道德爲己任。他曾在中國江西傳教，對中國文化崇仰甚深，因此以彼之社會地位，發起世界道德重整會。該會以絕對誠實、絕對貞潔、絕對仁愛、絕對無私，爲參加該會者之四大信守，每日早晨，要自行靜默反省，以化敵爲友爲目標之一。一九四八年，彼以四十五位美國參衆議員之名義，邀請各國政府及社會知名之士參加大會，聲勢浩大，開會時，邀請與會者講演或報告其化敵爲友之事實，以證明敵可化爲友，而反對鬥爭。其第二絕對貞潔，含有對現代女子之行爲而言，故有錢之年老婦女，均願支助卜博士之工作。重整會在瑞士柯峯（Caux）有一座鉅大之會所，可容千人之居住，倫敦、美國洛杉磯等處，均有規模較大之會所，全賴卜克門博士一人之號召而成者也。

卜博士知我在中國提倡儒學，弘揚道德，遂請艾倫（Leauaid B Allen）來華，邀請參加大會，我當時正準備出國考察民主政治之施行，遂順便答應參加，並組織一代表團，包含有羅時實、胡健中、陳石孚、艾倫，並有內人同行。

飛抵洛衫磯時，卜博士親來機場迎接，且有警車開道，至爲熱烈。一到會所，即有七八十人，靑年居多，在會所唱歌歡迎，立即請我講話，我表示感謝卜克門博士之邀請，並稱頌其工作之重要，於社會道德之重整必大有影響。次日大會排定我作專題講演，我以「中國文化與世界道德重整」爲題，聽者至爲讚譽，其實該會所主張之四個絕對與我國之道統內容大都符合也。

後來又被邀至好萊塢大講演場作三分鐘之演說，又在當地市政府歡迎會上作講演，講稿均由我授以大意，由陳石孚、艾倫兩先生起稿，故英文均無困難，並有胡健中、羅時實兩位先充實其內容，每篇都極精美，受人讚賞。

會畢，代表們被邀去華府接受馬歇爾國務卿與霍夫門之聯名邀請午餐，馬歇爾致歡迎詞強調道德重整之需要，我被推致答詞，我與馬歇爾將軍又會了面，相見甚歡。

旋即搭輪去英繼續開會，我即由該會安排謁見英國國會議長、財政部長等，藉以對民主政治作扼要之詢問，其情形見「奉命去英美考察民主政治之施行」一節中，不贅述。

回美國後，我往訪美政府及國會兩黨領袖人物，均承重整會代爲安排，至爲熱心與順利，此均爲卜博士所關照於我以協助，感激殊深，見面時，均遞蔣總統之介紹信。

我並與《時代雜誌》創辦人亨利露斯，霍斯德報業鉅子晤談，並應華美協進社之邀請作講演，每次講述，均攻擊共產主義之不適宜於中國，及中華文化之內容，俾美國人知我之反

共而有理由，並非如共黨之對我攻擊，而誣我爲頑固分子也。

我在美時間雖短，然得重整會之幫助，每分鐘均爲國家之需要而求助，並以反擊共黨之誣衊，其結果頗有所獲也，蓋國民外交必須以有思想者任之，否則適得其反也。

我閱美國國務院於二十年後發表對華有關文獻一九四七與一九四八兩冊，其中吾國政府中重要官員對美大使之談話，無不紀錄詳實，其中有攻擊本國政府之談話紀錄不少，讀之汗顏，幸我無一語詆毀政府，故國人對外人談話以後應加小心，毋任被人紀錄而不自知耳。

奉命赴美、英考察民主政治之施行經過

當總統、副總統選出來以後，立法委員就選舉立法院院長。因爲孫科沒有當選副總統，爲了安慰他，蔣公就提名孫科爲立法院院長，我爲副院長。我在競選時，是由黨支持的，另一個候選人是傅斯年，他是青年團支持的，開票的結果當然是我當選，我的票多很多，但也很危險，因爲黨員不遵照黨的提名，而另推選一非黨員，是違黨紀的，團不受黨的指揮，由此可見；但總裁對之亦未有所譴責，黨員不遵從黨的決定，由此開端，因此孫科當院長，我當副院長。

在我當選立法院副院長以後，尚未就職之前，蔣公派我到英美兩國去考察民主政治如何

實行。他因我當選了副院長，有栽培我的意思，我也很感激。我以前沒有做過立法委員，或其他民意代表，所以派我到美國和民主黨、共和黨兩黨領袖們談談，並去訪問政府重要首長，以便請教。那時我們局勢很危險，馬歇爾協調失敗，已經調回國去擔任國務卿。我出國一方面是去考察政治，一方面是去參加世界道德重整會，在洛衫磯開會。我出去的名義是參加世界道德重整會，實際上是派我去考察民主政治的施行。

這段期間，我見過美國總統杜魯門及該國政府中許多重要人物，及兩黨領袖。出國前，總統給我許多美國政治界重要人物的介紹信，但卻單單缺少介紹拜會國務卿馬歇爾的信。我出國前曾對總統說：「國務卿馬歇爾，我似乎不能不去看他！」他說：「你看著辦吧！」我也很難再請他寫封介紹信，我到了美國後，所有的人都去看了，就是不看馬歇爾有點不禮貌，何況我們已經暢談過四小時。不料我們早先在洛衫磯開世界道德重整會，會開完之後，馬歇爾在華府與霍夫門共同宴請各國代表，馬歇爾致歡迎詞，我被代表團推任致答詞，馬歇爾對我說：「嗨！你也來啦！歡迎你！」這次是馬歇爾以國務卿身份請客。後來馬歇爾去檢查身體，我請中國大使館向國務院登記，我想去拜見馬歇爾，我們的大使館裏的人說：「你不要去看他，他對你很有誤會，他不會見你的！」我說：「不會的，他一定會見我的！」因爲他們不知道在國內馬歇爾曾經和我長談過一次，他很高興。我說：「你們替我安排請見就是了，我是作禮貌的訪問！」結果馬歇爾檢查身體出來，他第一個就接見我。國務院的通知

上寫的是顧大使十五分鐘，陳立夫先生十五分鐘，兩人共三十分鐘，顧維鈞大使陪我去的。但馬歇爾見到我非常高興，二人共談了一小時零十五分鐘，當時等候接見的客人很多，大家覺得奇怪，怎麼馬歇爾和我談這麼久？顧大使陪我出來時，新聞記者擁上來問我：「你今天見馬歇爾談些什麼事呀？」我說：「我是禮貌的拜訪。」記者們又問：「禮貌拜訪怎麼會用了一小時零十五分鐘呢？」我回答說：「那你們去問我國大使顧維鈞先生吧！」顧維鈞也很久沒有見到馬歇爾了，他陪同我去拜訪，沒想到馬歇爾第一個就接見我，而且見到我時很高興，開始就問蔣總統及夫人好，對國共和談之調解不成，表示歉意，對民主政治施行之慢性與軍事工作時之迅速相比，有天壤之別，他說民主政治運作起來很慢，不像軍隊裏一張條子命令下去，事情很快就辦好了，民主政治乃是要經過許多的程序才能慢慢辦完一件事的，他講解了許多有關民主政治的重要觀念給我聽，故美國政府對中國之援助，亦難希望速成等語。他知道我爲考察民主政治而來美國後，對我非常的客氣，立刻叫秘書過來，對他們說：「這位陳先生要考察我們民主政治的實施，他要什麼資料你們盡量的供給他！」顧大使並不知道馬歇爾曾在中國與我長談過，所以他很奇怪何以馬將軍對我這樣好，後來我告訴了顧大使，他才明白。馬將軍以往對我們不大瞭解，因此導致調節失敗。只有一次我和他大談特談，雙方都非常高興，此事對他記憶猶新，因此，我拜訪他時，他非常客氣，願爲我幫忙，臨別時還要我問蔣總統及夫人好。這次見面，談得如此之久，中國大使館方面深感驚

異，其實我早就知道馬歇爾對我印象很好。外交工作，要主動地用功夫才有效果呢！

後來馬將軍參加五百萬人簽名反共，可見好欺騙人的中共，一被人們發覺，一定立被厭棄的，「誠實還是最好的信守」。

拜訪美國總統杜魯門等及英國政要

後來又拜訪杜魯門總統以及國會中許多重要人物。拜會杜魯門總統時，我告訴他我國局勢很危險，希望美國早一點幫我們的話，譬如向美國貸款、請求支援軍火的事都一一談及。杜魯門總統又詢問我有關共產黨的事，我說：你問得很好，我是眞正一向和共產黨辨交涉的人，有什麼問題儘管問。我又說共產黨最大的缺點是不守信用，說了話不算數，所以對他們要存戒心。不能以你我的道德標準去衡量他們，否則一定會上當，所以希望貴國早一點來幫助我們，才能趕上時間。杜總統作同情的承諾。

我到美國拜會了國防部部長、財政部部長以及其他重要首長，收到很大的效果。馬歇爾以國務卿身份與他們通過電話，所以貸款的事以後在國會方面也很快的通過了。我去見國防部部長時，他立刻找太平洋管軍火的官員，問他們還有多少剩餘軍火存在太平洋方面，當即口頭命令他們儘早想辦法運交給中國。國防部部長佛瑞斯特還邀請我吃午飯，吃飯時頻頻叮

囑部下們趕快把軍火送往中國，那種熱忱令我至今難志。蔣公要我到美國考察民主政治，並無其他囑咐，但是我到了那裏，乘機把所有我可能幫助政府做的事情做了，如見國防部部長、財政部部長，要軍火、要借錢的重要事項，都一一解決了，我雖沒有肩負這些任務，但却盡了我一切力量幫助政府。

後來我又到英國，因爲，蔣公要我考察英、美的民主政治，英國是民主政治的先進國家，所以我也去看他們的國會議長、財政部長及以一些重要的部會首長。英國人要比美國人深沉得多，由他們的談吐中可以感覺出來。我在英國也獲得許多民主政治的知識，譬如英國國會議長請我吃飯，他告訴我：「你們不要看民主政治就是人民作主的政治，民主政治是要代表們盡量讓老百姓曉得政事兩面的情況。主要兩個政黨——一個在朝黨，一個在野黨（這個時候保守黨執政，工黨在野），在國會裏成立了一個小組，其組成份子是保守黨幾個人，工黨幾個人。國會裏若有個重要議案，先交給這個小組交換竟見，希望它溝通，於是雙方先商量好了，所以表面上主政之黨拚命爲這個案子辯護，反對黨也拚命找理由反對，這兩種看法都是對人民的一種教育，要人民曉得這個案子的兩面是怎樣的理由？正面怎樣說，反面怎樣講？到最後表決，表決還是照我們小組大家商量好的結果辦理，看起來好像是在朝黨和在野黨吵得一塌糊塗，但實際上國家的大事我們還是先商量好的，這些都是民主政治的內幕。這些重要案子表面上有正面的理由，亦有反面的理由，實際上都以國家及人民利益爲先，自

無分別在朝或在野了。後來辯論終結，案子修正通過了，正面獲勝，其實我們早已安排好了。所以我們表面是兩個黨，彼此對立，唯對國家眞正重要的問題，我們還是要事先商討，結果還是一致的！」以上這番話是對我非常有啟發性，在對國家有利的大前提下，各黨各持己見，大吵大鬧是絕對不對的，我回國後，將考察所得，詳細陳報蔣公了。

總統隱退、副總統李宗仁代理，政局不穩，先後南遷廣東，西遷重慶、成都經過

張岳軍先生擔任行政院長爲時不久，在改組時，他向蔣公推荐我接任，蔣公乃徵詢我的意見。我說：「比我資歷老的前輩很多，應該先考慮他們。如眞正找不到人的時候再考慮我。比如王寵惠、孫科諸先生就是比較適當人選。」

當時，孫科爲立法院長，我爲副院長。後來孫科答應蔣公接任行政院長，時局已日趨緊急，徐蚌會戰於我已很不利，政府已醞釀遷至廣東，如孫科接任行政院長，他是廣東人，必收地利人和之效。但孫科答應接任行政院長，却提出了附帶條件，即把吳鐵城、陳誠，和我等幾人加入行政院爲閣員，他始就任。孫科先生如接任行政院長，我是立法院副院長，依法就要代理院長，跡象顯示，吳鐵城先生很想接任立法院長。但此時孫科先生却非要吳和我一

併加入行政院爲閣員不可，於是我報告總統說：「如我離開立法院去行政院，此後立法院可能會發生些困難問題。我個人無所謂，我不計較名位，祇要總統要我去，我就奉命去。」

行政院組閣的事躭擱了十多天，毫無頭緒，大家都跟著急，如一直拖下去怎麼辦？此時前方戰爭節節失利，總統令組閣的事應迅速解決，後來孫科先生又提議把邵力子等人也拉入行政院，使總統左右爲難。我當即表示：「爲求迅速組成行政院計，我去行政院好了！」於是以孫科爲首的行政院改組乃予完成，我擔任政務委員，吳鐵城爲副院長兼外交部長，如以世俗的眼光來看，顯然我受損失最大。

孫科任行政院長後，過了不久，大局逆轉，蔣公隱退，由副總統李宗仁代理總統。在蔣公隱退前，陰謀竊國者放出空氣說：「假如蔣總統下野，由李宗仁代理總統，美國方面即將幫中國政府的忙。」蔣總統在此情勢下，認爲既然他已成爲政府的障礙，那麼就索興下野好了。蔣公就是在這種狀況下斷然隱退的。

接著，共產黨南下渡江了。政府派張治中和邵力子去談判，也都投共不再回來。此時共黨的陰謀已揭開，即先是僞稱和政府媾和，實在是緩兵之計——趁此一舉而渡江！至此，政府被迫而遷往廣東。李宗仁居心可誅，他把蔣總統逼迫下野，以爲可挽回大局，其實共黨對他是騙局，根本不理會他，一味兒進軍江南。而屬於他的由白崇禧指揮的桂系部隊，一直退到廣西，他們有個一廂情願的想法，即退到廣西後，再動用美國的援助力量反攻，事實上已

無能爲力了。

國勢日趨逆轉，至此，孫科也不幹行政院長了，乃由何應欽先生繼任。此時，爲了削弱李宗仁日益膨脹的權勢，中央更設法加大行政院長何應欽的權力。李宗仁代理總統後，野心更熾，他進一步想控制行政院，促使何應欽辭職，乃與居正勾結，提他做行政院長，以便恣所欲爲。此時立法院已撤至廣東，如經該院通過此一任命案，由李、居二人互爲表裏，政府麻煩就大了，那時立法院新當選不久的院長是童冠賢先生，副院長是劉健羣先生，我們盡力拉立委至廣州開會，結果對此案贊成與反對各佔一半，因童院長傾向李宗仁，我乃正告劉副院長必須投反對票，乃在表決中以一票之差否決了任命居正爲行政院長的人事案。立法院既否決了任命居正爲行政院長的提案，蔣公聞訊後亦甚欣慰，並建議李宗仁請閻錫山先生做行政院長，嗣經立法院通過任命。

此時，政府因軍事節節失利，乃由廣東遷往重慶，許多立法委員見重慶情形不好，紛紛要我轉請蔣公出來，繼續領導政府，大家表示如蔣公再不出來，國家就沒希望了。當時乃由律師出身的立委江一平起草，以我的名義，致電蔣公，請其復出。而李代總統此時竟拋下政府飛往昆明，值此危急存亡之秋，他竟置國家大事於不顧，却一個人先走了。我乃打電報給在台灣的蔣公呈報重慶之危險情形，並轉達李代總統的留話：「如果蔣公不來重慶，他也不再回來了。」蔣公即予覆電與我，表示馬上來重慶。

當時，蔣公飛來重慶，是非常冒險的事。自台灣飛經大陸，如共黨有軍用飛機，將有被擊落的危險，幸而那時他們尚沒有軍用飛機。蔣公一到重慶，軍心暫時穩定下來，但李代總統却未實現諾言——未再返回重慶，却由昆明去香港，然後飛往美國。繼而重慶吃緊，共黨已侵入外圍，錢幣一天天貶值，那時共黨特務工作比我們做得好，政府的一切行止，他們都清清楚楚。「兵敗如山倒」，蔣公到重慶沒有多久，政府再從重慶遷到成都去，我也去了，那時亂得可怕，我的汽車也被搶去了。蔣公離開重慶時，座車幾乎開不出去，好不容易才開到機場。

那時四川軍人大多數都靠不住，如鄧錫侯、王纘緒以及西康的劉文輝，至於楊森在四川軍人中則比較好些。當此人心惶惶之際，閻錫山院長竟在行政院會中提了一案，完全像共產黨的口氣，要通過提案清算地主。我當時一氣，就在會中說：「共產黨還未來，我們就先清算地主嗎？」經我一罵之後，閻院長才把提案撤回去。此時我們的兩個航空公司叛變投共了，共黨在重慶的地下工作，亦很積極，人心惶惶，不可終日，機場僅留下軍用飛機，所以我們自重慶撤至成都時，都是乘軍機去的。在成都雖然有蔣公坐鎮，已大為安定，但情勢仍不穩，胡宗南的西北軍隊也不行了，他是嫡系，是蔣公的基本部隊，又是配備最好的美式裝備，結果竟沒打什麼仗，就敗退下來，眞不爲人諒解。

胡宗南的西北軍隊，有一部份奉命調到西康，故政府曾一度有遷往西康之議，那眞是很

亂的時候了。此時雲南的龍雲已叛變，盧漢雖屬主席，但把被捕的共黨釋放了，顯然也靠不住了，因此政府乃考慮再撤退的事。一天，晚飯後我到軍校校長官邸去見蔣公，他情緒很壞，他見了我就說：「今天眞奇怪，我召集軍事將領開會，大家都不來了！」面色凝重，猶有慍色。我說：「情況很危急，這些將領可能都靠不住了。總統你看該怎麼辦？」蔣公答道：「你和閻院長等先飛台灣好了。」我接著問：「總統去那裏？」他說：「我飛西康。」我說：「總統不能去那裏。」他說：「爲什麼？」我說：「總統若到西康，胡宗南軍隊到達者僅兩團人，人地生疏，而劉文輝已在那裏搞了十幾年，他如在機場請總統訓話，再來一次西安事變翻版怎麼辦？」蔣公聽了改變主意說：「那我去雲南好了。」我說：「盧漢也靠不住了，雲南絕對去不得。」蔣公接受了我的意見，不去了，派經國同志前去，經國同志認爲與盧漢不太熟，不肯去，後來改派張岳軍先生前去，結果被盧漢扣留了，過幾天，才被放出來，他們見大勢已去，各自投機投共，眞是人心可怕，永矢忠貞的人，才能臨大難而不奪，眞是一大考驗呀！

陪同閻院長飛台遇險

我奉命陪閻院長飛台，同行有者有朱家驊等數人，晚間出發飛經大陸去台，不料飛抵四

川與湖北交界處，遇到寒流，飛機兩翼結成厚冰，往下墜落七百尺，不能前飛，仍回成都，是時飛機師始將情形宣布，余見城市電燈明亮，疑爲漢口，在手提箱中取出手槍準備自戕，聽報告後，始知返回成都，一場虛驚始得過去，後來方知飛機上滿載金條數十箱，爲閻院長所帶行李之一部份，昨夜墜落之原因，爲所載超重，與此有關，次日再飛，飛行師告我，最好飛機不超重，以免發生危險。我乃商諸閻院長，閻寧可減少衛士數人，而金條非帶不可，幸一路平安飛抵台灣。後來知道隨閻從山西出來之人不少，均靠閻接濟，故金條對閻確是十分重要，唯我等之生命，幾因此而遇險，不亦寃乎！

胡漢民國葬，楊永泰被刺，余倖免

胡漢民逝世於廣州，政府決議予以國葬，蔣公派我作代表，前去參加國葬典禮，是日爲民國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九日，余既代表總統，自當領導前行，余見右轉前往靈堂處，與祭人員及民衆人數極多，而秩序甚亂，遂未到應右轉處先向右轉行數十步，再向左向右而入靈堂，禮畢退回時，亦不遵照規定之路徑而返，未出事端。及返寓所即接獲報告，謂楊永泰在武昌渡江赴漢口參加外人約會時，被人行刺，當場斃命，兇手逃逸云云。後經政府查緝，知爲胡黨劉蘆隱買通職業兇手王亞樵部下所爲，以報胡漢民被禁之仇。據軍法處審訊口供內

稱，其計劃在胡漢民國葬之日，廣州、漢口同時下手，廣州刺余，漢口刺楊，如此作法，使外間不明用意所在。不料余有預感，改道赴國葬靈堂，開槍距離太遠，無法下手，余遂免於被殺，余爲胡先生被禁閉時，唯一求情者，與楊永泰恰恰相反，絲毫無理由陪楊犧牲，臨時改道入靈堂者，蒙天之佑也。劉蘆隱在獄中，劉峙具呈保釋，欲余亦簽名，余允之，總裁未批准，劉蘆隱聞之，深感慚愧不已云云。

7

民國三十九年秋至五十八年冬

建議改造本黨時期

政府遷台後，在生聚教訓中，建議改造本黨，並對黨國負責，俟後又引咎離國，赴美自食其力生涯。



黨的改造與引咎離國赴美

政府遷台後，在生聚教訓中，有一次在日月潭我向總裁建議說：「從本黨歷史看來，每次挫敗後，急應把黨改造一下，以期重振革命精神。」在建議時，我並陳言：「黨未辦好及一切缺失，最好把責任推給我兩兄弟，將來改造後，我兄弟二人亦不必參加，庶幾總裁可以重振旗鼓。」（對此意見總裁未予置詞）。至於改造之事，總裁乃下手令命我召集小組起草方案，並指定十一人小組共同研究改造，經集會討論多次後，復予以文字整理，然後呈交總裁。定期召開本黨改造會議，在此期間，有二次中央委員談話會議中，有幾位委員老同志如陳肇英、李宗黃等表示：「我們的意思是認爲本黨之改造，至爲必須的，最好由幹部作建議，請由總裁決定執行，免得總裁爲難，而且亦合乎民主。」此話一出，竟使總裁勃然大怒，深恐改造之事，一經討論，將會節外生枝。當即憤然斥道：「你們如果不要我來改造黨，即祇有下面幾種辦法：第一，就讓本黨無聲無臭的如此下去；第二你們要給我權，大家要相信我，用民主方式改造是不對的，如你們不相信我來改造，我就不管了，由你們去辦好了！」此番震怒，大家都很詫異，直令在座者目瞪口呆，復聽總裁繼續說：「如果你們不相信我來改造，你們跟陳立夫去好了！」

那次會我有病未出席，後來有人告訴我這番話，我心中十分納悶。總裁雖是在盛怒之下，但怎能講出此話呢？這不是認爲我是在主張民主和他對立嗎？當時我建議改造本黨並奉命爲總裁擬訂改造方案，原意是將來我兄弟二人不參加改造工作，以俟改造後，黨有了一番新作法、新精神，這樣才是對改造有利的，先兄（果夫）身體孱弱多病，我也應該引咎辭職，且有意從政壇上退隱。因此，當聽了總裁這番話後，知道另有原因，蓋總裁深知我不能得罪，一經得罪就會離去。這一暗示，遂堅定了我退隱的意志，從速離開那時的黨政工作，出國赴美。但我已向總裁明白表示黨沒辦好，我兄弟二人應負其責，絕無戀棧之意，已十分明白，總裁不應再有任何誤會，但剛才那番話，好像把我看成反對黨了！不禁鬱結塡胸，久久不能釋然。

事後我仔細反省，總裁那番話的政治背景，可能導源於陳誠同志在一公開場合失言所致。陳氏在被總裁提名行政院長人選時，依法須經由立法院同意通過才任命，我由袁守謙同志前來傳達陳氏之託，從中向立委斡旋，乃獲得百分之八十二高票通過，張道藩同志去向總裁報告投票結果，總裁說：「怎麼會有這許多票？」似乎在怪我們幫過頭了。嗣後陳誠同志宴請立委餐敘，以示感謝，經國同志和我都在座，陳氏愉快的戲言：「從前CC是指陳果夫先生與陳立夫先生，今後則是陳立夫與陳誠了！」這話講壞了，因爲陳誠先生是屬青年團的力量，而我本人大家則看作是黨的關係。黨與青年團相結合，站在一位領袖的立場，認爲失

去制衡的作用，是不願意的。此事件眞相，本因我幫了陳氏忙，他以感激之情說出了上述不當的戲言，但乍聽起來，却像二陳要聯合起來有什麼企圖似的，則對培養經國是有害的。既有此「莫須有」的誤會，我更決心退隱去國了。

此時，行政院陳誠院長又想把立法院的權抓來，本來政府撤退廣東時，何應欽先生擔任行政院長，中央爲不讓代總統李宗仁的權太大，在立法院不易召開會議之情形下，乃刻意把行政院長權力加大，但此時在台灣不同了。因此，在由蔣公主持的一項會議中，我說明了上述此點，我說：「在廣東時，立法院不易召開會議，爲應變計，中央增加了行政院長職權，目的是使李代總統不要日益膨脹他的權。現在不同了，總統已復職並負實際責任，故行政院長有其職權範圍，不必將立法院的權抓過來。」陳氏聽了，當然不高興。

日後陳氏仍不甘心，還是一味兒想抓權。他授意在立法院裏的青年團同志提了一案，把立法院立法權削減得很小，結果被立院會議否決了，陳誠同志正在行政院開會，得此消息，便發起脾氣來。事實上反對該案的幾位立委都是年紀很大的超然同志，和我沒多大關係，陳先生也不問反對者什麼人，就一律稱之謂CC派。他憤怒的說：「他們一定是CC派！現在這個行政院長，除了陳立夫之外，沒人能幹得了。我不幹了！」他指令副院長張厲生：「給我寫個辭呈給總統，行政院長我不幹了。」

此事傳出，有好幾位中立派的立委告訴陳誠同志說：「你錯怪了陳立夫先生了，對於該

提案，他未向立委們表示任何意見。你是錯怪了他！」至此，陳氏才知道錯怪了我。我當時也頗感不平，前去台中前，曾如此表示：「立法院有任何事，請陳誠同志今後不要再找我了！」我去了台中，他知道錯了，乃請立委許紹棣同志前來台中代表其向我道歉，表示他錯怪了我。我說：「前此在一項會議中，我不過說明當年政府在廣東時，中央爲不使李宗仁代總統的濫權，才加重行政院何院長的權力，現在，總統已復出視事，行政院長的權力已無必要擴大。僅是就事論事，恪盡言責，不料竟導致陳先生的誤會！」

此事件的發生，再加上總統對改造問題誤解我，我乃決心退隱出國。此時世界道德重整會東邀赴瑞士開會，我遂趁機向總統說：「我受總統薰陶二十五年，但我很慚愧沒什麼表現，很感罪戾！我出國了，今後一切政治問題，請勿再找我，我一向對此不感興趣，……」事實上在我出國之後，在養雞期間，總統曾有六次職務託經國同志來信找過我，㈠聯合國代表；㈡日本大使；㈢考試院院長；㈣西班牙大使；㈤希臘大使；㈥巡迴大使，祇是我全沒有接受罷了。在出國之前，我並寫了兩封信：一致與我相熟的同志，勸其繼續效忠蔣總統；一致比我年長的老同志，表明過去未能做好，引咎辭職出國。

在此期間，本黨進行改造，黨員重行登記，我則未辦歸隊登記，總裁亦未將我列入改造委員名單之內，但他還是把先兄（果夫）發表爲評議委員。孰料我由瑞士轉往美國，却接獲俞國華同志奉總裁命，特地送來的原浙字第一號黨證，要我仍做一個中國國民黨黨員，暗示

其仍不願我離開本黨的意思，我想拒絕不大好，接受了，從此我脫離了多事之秋之政治圈，無拘無束的在美國度自食其力不必事人的養鷄生涯。

籌款洽購華美日報

蔣總統既核准我出國，但須有個名義，此時恰好世界道德重整會邀請我第二次出席會議，乃趁機而去。我第一次出席該會是民國三十七年，那次是由美國參衆兩院四十五位議員函邀，可以說非常光榮。

此次開會，亦即我以此名義出國的藉口，開會地點是在瑞士柯峯，由於該國已承認中共，故入境時發生問題，此時中共正在瑞士大事政治活動，對我進入該國設法阻撓，嗣經世界道德重整會負責，經卜克門先生出面說明道德重整會不涉及政治活動並由其擔保，經瑞士國務會議通過後才准予入境。

會議畢，乘英國最大郵輪 Elizabeth 號赴美，便決計長住美國。

剛到美國，所發生的第一樁事，便是籌款洽購華美日報。這份報紙在華人地區極富政治影響力，該報要轉讓，風聞中共急欲買到手，紐約諸同志乃要我設法把它搶購過來，以免落入他們之手做爲宣傳共產工具。

報紙開價二萬美金，我乃匆匆找到在美國的徐堪先生，他以前做過糧食部長及財政部長。我問他：「你到美國來，總統曉不曉得？」他說：「不曉得。」我說：「既不曉得，你要當心了！總統未要你來，你怎能來呢？」隨後我告訴他可以替政府做一件有意義的事，必可獲得總統的原諒，那就是買下華美日報的事。他當時答應祇能拿出一萬美金，多了拿不出來。最後由我去七拼八湊，由潘公展、項定榮、賴璉、薛光前、董霖、陳慶雲及本人等同志七人湊足另一萬元，終於買下了華美日報。徐先生爲董事長，我任副董事長，潘公展任社長，賴璉任主筆，立即接辦報紙，在華人地區鼓吹復國反攻，成爲僑民心目中的反共精神堡壘。

當時我羅致了在美的一流好手，撰寫報紙文章。他們分別是：潘公展、賴璉、薛光前、董霖、程其保、陳慶雲、項定榮等先生，其中潘公展先生是過去申報總編輯，而賴璉先生則是前中央日報總編輯，可以說集一時在美之文采菁英。故足以影響美國的輿論，一般華僑均訂閱此報，厚植海外復國建國力量。直到一九六九年，我才和此報脫離經濟關係，出讓與朱伯舜同志，維持原名及反共立場，但仍掛了名譽董事長之頭銜以迄於今。

自食其力的養鷄生涯

赴美定居後，有許多朋友都從事教職。當然我是學礦冶的，可教礦冶學，也能教哲學或中國文化。就在此時，我的女兒中學畢業，要到紐澤西湖林城上大學，此地是一養鷄中心，也是避寒的所在地，故有許多一流規模的大旅社，它們夏天歇業，冬季生意興隆，百分之九十是猶太人在做生意。

我有一位朋友胡定安先生，是過去江蘇醫學院院長，提議到紐澤西養鷄，並邀我同去，恰值我女兒也去此地唸書，我便答應了一起去養鷄。在開業之前，我們去看了六十個養鷄場，最後選一較便宜者買下來，成交要四萬七千元美金，可先付二萬元，其餘分期十年給付。這是一筆大數字，而我祇有四千元，不得已祇好向朋友告貸。孔祥熙先生很慷慨，答應借我八千元，與我合夥的胡先生亦祇能拿出四千元，剩下的四千元還是其他朋友幫忙的。

我爲什麼要選擇養鷄行業呢？因爲我想想替政府已工作這麼多年，伺候了蔣公和黨內黨外不少人，而竟不受諒解，此後將不再伺候任何人！那麼去照料鷄沒有這種感覺了。

此時，美國的蛋價很好，故從事養鷄業也頗能賺錢，而半年下來，我們竟賺了五千元。

在美國養鷄，飼料都是用機器定時傳送和控制，但我們的農場却用人工，很不現代化及科學化，且飲用水也不夠，乃逕以所賺之錢購買三部輸送鷄糧機器，和開掘一口深水井，五千元就這樣花掉了。我們共養了五千隻鷄，飼養很忙碌，所幸三個兒子都抽暇幫忙，那時我最小兒子才八歲。不過養鷄也有方便的一面，就以飼料來說，祇要一通電話就會送來。那時我健康良好，一百磅的飼料，我一彎腰就能扛起來。甚至過去有的脊背疼宿疾，經養鷄勞動後，也不再有復發的感覺了。

我經營養鷄業是一面工作，一面學習，總算運氣好，沒碰上如鷄瘟等的麻煩事。養了三年後，有一次鷄生了喉嚨痛病，那時共有十大間鷄舍，每間飼養五百隻，計有五千隻鷄，如都生起病來，那眞會一發而不可收拾，幸虧醫治得早，傳染不普遍，所以並無大礙。這五千隻鷄，若以七折計，每天就可生蛋三千五百個，可說利潤甚豐。

幹那一行，必須瞭解一行。就那養鷄業來說，買小鷄也是一項大學問，最重要的是對小鷄能辨別雌雄問題，因爲買了雌鷄才會下蛋，如買來些公鷄就虧蝕老本了。通常我們難以辨雌雄，必須專家們以顯微鏡辨識，出蛋殼的小鷄，在二十四小時以內他們才能分辨出雌雄來，當然這也難保是百分之百的準確，偶爾也有一、二隻看走了眼的，在這方面，日本人很是權威。天生萬物似有一定規律，以鷄的雌雄來說，如有五千隻新生小鷄，雌雄大概各佔一半，差不多百分之五十一與四十九之比例。小鷄難養，冬天又怕冷，要有保暖設備，待慢慢

大起來後，並須請專家打針，然後放到室外，且應嚴防黃鼠狼侵害，因此門窗要緊密，日夜加以照料。

銷售鷄蛋，也有一定程序。通常是以機器挑選、分類，使蛋能維持一定重量，不使過小者摻雜其中，並加以洗濯，以維護生產品質與信譽。爲保持新鮮度，須當天裝箱，以供收買者取貨，就近由紐澤西去供應紐約市場所需。奈何好景不常，待東西高速公路完成通車後，蛋價暴跌，原因爲西部地區養鷄，是放飼於田野間，鷄蛋成本低廉，業者用貨櫃車用冷藏方式，把蛋連夜運往紐約廉價銷售，與紐澤西養鷄中心競爭蛋市，原有市場大部份被其搶走，幾年以後，使紐澤西養鷄生意蕭條，紛紛倒閉，我隔壁是一家猶太人，他很有眼光，告訴我說：「高速公路一通，西部蛋源源運來，競爭困難，我們不能養鷄了！」於是他把鷄場斷然賣掉。

但我却不敢作此打算，賣掉養鷄場幹什麼呢？此時每個月比過去最少減收二千多元，生活越來越困難，全用機器不用人工的養鷄業者，還可勉強維持，而以人工飼養者便無法維持下去。開始與我合夥的胡先生在經營三年後已先離去，我的大兒子也去唸書進修，最後祇剩下我和內子及小兒子合力經營，儘管一再節省開支，但還是週轉不靈，乃向朋友借貸維持，而我所借的錢，大都言明三兩個月一定還，從未失信過一天。幸在此期間，蔣公瞭解我的困窘，雖然我從未張口，他却每年總有一兩次寄來二、三千元，幾乎成了我償還借債的固定來

源。這不啻是雪中送炭，我很感激蔣公的關懷。

我的養鷄生涯自一九五三年開始迄至一九六一年，實無法再繼續下去，乃不得不關閉養鷄場，結束了爲期八年慘淡經營的養鷄業。

「福無雙至，禍不單行」，眞應驗了這句話。就在我關閉養鷄場後，碰上了一樁倒霉的事。我養鷄開始時，連房舍一併投保一萬六千元，現在鷄不養了，保險公司的人因和我已有八年的交往關係，便好心的對我說：「鷄不養了，何必再保這麼多的險呢？可以少保一點呀！」於是我決定祇投保四千元。熟料退掉不久，却發生一場森林大火，恰巧那天我們全家又應邀到紐約朋友家做客，火順風向蔓延到我的養鷄場。

我的那片農場共有三十英畝大，房舍佔了三畝地，那時地上落葉遍地，久不下雨，大火就燃燒著落葉一路燒過來。說來也是不幸中之大幸，就在做客前夕，我把房舍四周落葉掃淨，不料竟因此使火未能燃燒枯葉延伸過來，房子乃未被大火波及，而三排鷄舍被焚，祇剩下半排鷄房，我一部新座車，放在飼料室旁邊，也燒成灰燼，那是因去紐約朋友家做客，往返是搭當地朋友的便車去的，故把車停放家中車間裏，不料竟遭此意外。逢此火災，適值減少投保之後，祇保了原來的四分之一，因此賠償也減少了！此非始料所能及。

兄喪未能返國，父病危非返國不可

民國三十九年在我出國時與先兄果夫辭別，當時家兄之病，比較加深，相互間已有一種預感，這是最後一次見面了，果然在次年（民國四十年）家兄就逝世了，當時接總裁來電，報告噩耗，言詞間暗示不必回國，一切已妥爲安排，我亦明白，這時候，黨甫改造，回國不相宜。父親已九十歲了，蔣公因我不在國內，特在其生日那天，請了年長的前輩先生若干人，爲父親祝壽，殊爲感謝。嗣後，事隔十年（民國五十年），父親病重，接總裁電囑，立即返國。星夜偕內子起程，抵台時，機場自動來相迎者逾千人，久別重逢，來迎者之厚意使人難忘，當由陳誠同志迎接至家父家，見家父腦中風，已失知覺，唯緊握吾手，知已返國。總裁接見時，亦特別關心此事，不久家父即去世。喪後，我等經日本返美，因有人怕我將被總統留台任職，頗有疑忌，故以早離爲宜，且鷄場託沈士華兄代爲照料，亦不便爲時太久也。

父親喪事，全賴在台友人料理，殊爲感謝。而回國機場之一幕，全出於國人之自動，不遺在遠，足徵我以往之工作，尚值得人們之懷念也。

結束養鷄，另謀出路，功敗垂成之中醫藥書籍整理

現在鷄不養了，無事可做了。就在此時，有一位中國人所辦基金會，欲將普林斯頓大學蓋斯特圖書館數千本中國醫藥書籍加以整理，請我主持其事，我想假如能把這些中醫典籍整理出來，是一樁富有意義的事，我便答應下來。

這些中醫典籍，是由一位猶太籍蓋斯特先生所收集。他爲何收集如此多的中醫書呢？因爲他是腰纏萬貫的人，早年曾患有嚴重眼疾，遍訪世界名醫，均束手無策，後來到了中國河北定州，我國定州的眼藥是名聞遐邇的，未料到他使用這種眼藥不久，眼疾就痊癒了，他認中醫藥很神奇。因此，以後每年就撥出一筆美金，交付其大使館裏友人代爲收購中國醫藥書籍。若干年下來，爲數已相當可觀。他把這批書携往加拿大，暫置一政府機構地下室，後來遇到愛因斯坦，他問愛氏要不要這批書？愛因斯坦說：「我的研究中心不大，沒地方存放。但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新建成，頗寬大，可以存放那裏。」這便是該大學蓋斯特圖書館中國醫藥典籍之由來。中經胡適之先生花費兩年時間，爲這批書做了一份目錄，足見這批書籍之多。我依基金會的意思，訂定一整理計劃；大要是中醫對各種病如傷寒、中風、糖尿病等，是怎樣醫治的，整理一套書，作一中西對照，假如還有各種藥方子，也同時加以整理。此項構想計劃送到基金會後，該會主席佛格森先生表示：「你最好同時找一位普林斯頓大學教

授，也能參加這一整理計劃，那就更好了。」於是我找到一位名叫Mott的教授，其夫人是中國人，他本人也會說中國話，我問他是否有興趣參與此項整理計劃，並借重他的大名共襄義舉，他聽了頗爲高興，欣然接受此一協助整理工作。

此後該基金會看了我訂定的計劃，也非常贊成，然後就請一位中國人陳克恢先生審閱我的計劃。因爲陳先生研究中藥「麻黃」頗負盛名，並提煉出麻黃精製成針藥，醫治氣喘病很有效。他看了我的整理計劃，在審查意見中表示：「請陳立夫先生主持此計劃很好，因他對中醫藥也深有研究。」基金會擬第一年給予二萬美金開辦，此後每年也將陸續撥助經費，但天下事眞有些出人意料之外，那位Mott先生竟起了黑心，想把我排開，由他自己來做這件事，於是他向基金會提出一廂情願的意見。唯基金會主席佛格森先生斷然拒絕了他說：「此事不可以這樣做。因爲該計劃最初是由陳先生倡議並訂定整理計劃。你是幫他加個名字而已，你祇可幫他做，怎可喧賓奪主呢？」爭論的結果，他見狡計未逞，竟以不接受此項整理計劃作爲報復，嗣經我去找他商量，他竟不接見我。後來我又請普林斯頓大學蓋斯特圖書館中國圖書管理人童世綱先生代向Mott先生轉告：「閣下要辦也可以——我幫你也行。但應規規矩矩的做好，不能藉此名義拿了錢不辦事！」他沒有回音，整理中國醫藥書的事便如此功敗垂成了。此一計劃被擱置，非常可惜，後來一位法律專家陳霆銳先生告我：在美國必須事前一切用書面寫好，清清楚楚雙方簽好字，否則很容易中途被奪，因爲社會上祇認錢而乏道

德的人太多了。我聽了，眞爲美國躭憂！

中國近代名人史料紀錄之創始

此時我經濟困窘，好友何廉先生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教，他好心的去和校長商量，聘我做高級研究員。該校現代歷史研究所韋勒伯博士主持一項中國近代歷史筆錄計劃：即協助整理中國名人回憶錄，何廉先生乃要我先去訪問記錄我的回憶錄。此計劃中尚包括孔祥熙、李宗仁、顧維鈞、陳光甫、曾琦、張發奎、胡適之等先生，以及許多現代社會知名之士，並以我的回憶錄第一章作範本，向福特基金會申請批准撥助經費，該校派一位華人夏蓮英小姐，每週到我家作錄音訪問一天，我家並以午餐招待她，如此繼續了一年多，有一天，這位夏小姐對我說：「你年紀還輕，回憶錄可否讓我先去訪問紀錄年紀較大的先生，最好你的先等一等。」於是我便答應下來。

夏小姐就這樣去了香港，整理了以下諸先生的回憶錄，他們分別是：陳光甫先生（前上海銀行董事長，當年對革命極有貢獻）、曾琦先生（青年黨領袖）、張發奎將軍等。她留在香港兩年多，我的回憶錄就因此擱下來。當時我心裡很不高興，此事開始時，以我的回憶錄作範本，現在卻一拖兩年之久，把我的躭擱下來。此後雖然又整理一部份，但畢竟未能做

完。這位夏小姐英文很好，中文不太行（回憶錄是我說中文，她譯成英文）。初時簽有合約，即未經我本人同意，回憶錄中任何事都不能對外透露。我的回憶錄共整理了兩章約一百頁，豈料未整理完她就出嫁了。她嫁的是一位泰國華僑，婚後就不再做此項工作。我乃向現代歷史研究所韋爾伯教授詢問：此事該怎麼辦呢？後來我把錄音帶要回來（僅寫了英文稿約十分之一）。以後每年夏小姐都和我互寄賀年卡，但在民國七十一年她未回卡，才知道她過世了！她的祖父是夏瑞芳（前商務印書館老闆），曾一直幫袁世凱做事。肇和起義之失敗，是他連夜拿鉅款去運動另一軍艦應瑞號，使他們不參加肇和起義之役而失敗的，後來被人暗殺的，但夏小姐本人大概不大知道這件歷史故事。而我的回憶錄就這樣擱置了。

食品工業之創辦

此時，湖林有幾位養鷄朋友都不養鷄了，提議大家合夥做皮蛋生意，我國的松花皮蛋很好，做好了到華人區去賣，說做就做，我們有一張做皮蛋的方子，便眞的做起來，我們的松花皮蛋，的確很漂亮，人們稱之謂「陳立夫皮蛋」。做了一些時候，中國人要過中秋節，我們便想到做月餅需要鴨蛋黃，於是用兩萬個鴨蛋製成鴨蛋黃供應。這段日子也賺了點小錢，工作極爲辛苦。我們的鷄房很大，空在那裏，做皮蛋（鴨蛋黃每年僅一次）也用不了那麼

大，乃物盡其用，夥同鮑、沈二家組織一食品公司，嗣又擴大業務，加做湖州粽子、年糕以供應，年糕是用鋁盒包裝，食用時既衛生又方便。那時我們還推出一種辣椒醬，其味鮮美，所以辣椒醬是很出名的，後來亦有人稱它爲「陳立夫辣椒醬」，遠銷西部舊金山一帶。這時我們夫婦二人和鮑、沈兩對夫婦均尚未屆七十之年，在體力方面，還可以賺此種辛苦力氣錢以度生活。

返國祝蔣公八十壽與出版四書道貫

我旅居美國期間，是一九五〇年至一九六九年，在養雞工作之餘（利用晚間空閒）寫作《四書道貫》，書完成一半時，因家父病重回國探視，雞場託沈士華兄代爲照料。我回抵台灣時家父已神志不清了，不久即謝世，我便再返回美國繼續寫作。

蔣總統令經國弟寫信給我，先後要畀予我以下工作機會。這些工作是：聯合國代表、駐日本大使、考試院長、西班牙大使、希臘大使，最後要我做巡迴大使，但我都一概謝絕了。

民國五十五年，蔣公八十歲大壽，經國弟寫信給我盼我能回國定居，我乃返國爲蔣公祝壽，並以印好的第一本《四書道貫》獻給，蔣公作爲壽禮。蔣公復要求我做國家安全會議委員，也經我婉謝。我表示對政治無任何興趣。

我寫的《四書道貫》，有好幾位先生如劉百閔兄、潘公展兄、陶百川兄都爲我看過初稿，錢穆先生等並代爲寫序，世界書局總經理吳開先先生（前上海市黨部主任委員）要承印這部書，因爲我自己沒有錢，是開先兄幫忙代爲借款新台幣十二萬元以印此書，問我印多少本？我問了幾位朋友，他們都說，這一類書最多印一千本，但是我想冒險印三千本，我就決定請開先兄爲我印三千本。正中書局是我創辦的，該局胡軌先生祇答應銷二百本，豈料此書一出來，不到一個月，三千本即銷售一空，但正中書局再想增銷時已無書了。

在回國之前，我曾寫信給經國弟，我說《四書道貫》一書出版後，我一返國，學校方面可能請我講演。我說我準備講十次，講完十次，我擬停止，唯蔣公看了我送他作爲壽禮的《四書道貫》後，大爲激賞，特邀我到慈湖去住一晚，他並且要我去各軍校講一講，我以爲軍校不過三、四個學校，不料合起來軍事方面共有十幾個學校。先例一開，計有一百多所學校請我去講演，待講到第七十五所學校時，就漸感體力不支，再加上過多的邀宴應酬，終在一場台北國際獅子會講演中病倒了。經送榮民總醫院診治，確定爲急性肝炎。

蔣公到醫院看我，問醫師病況怎樣？醫師們向蔣公報告「很嚴重」。過去尹仲容先生就是送入榮總，病情惡化過世的，因此蔣公特爲我請來了香港名醫腸胃科專家張光璧先生醫療。張先生察看過病歷後表示榮總的治法沒錯，病情雖很嚴重，但無危險，要多休息，我除了照醫院辦法服藥之外，並以小蚌殼燒湯服之，醫生亦同意，病情乃由穩定而漸痊癒。

蔣總統促我迅速返國定居，我乃回美作農場結束工作後於五十九年回國。

我回台後，蔣公要我做文復會副會長，他說：「這個職位，不是官啊，你不能再推辭了！」於是我接下此項文化復興的工作，此後復主持孔孟學會，弘揚儒家人文思想。

我所寫的《四書道貫》，編著的比較有條理，不但年輕人讀了對中國傳統文化有更深一層的瞭解，而年紀大的人看了也頗有興趣。民國五十五年我回國以此書作祝蔣公八十壽禮時，蔣公邀我去慈湖住一晚，次晨早餐時，他除已如前述要我去各軍校講一講外，又對我說：「我先看過你這本書的前言及結論，覺得你寫得很好，祇是書名太深了一點。」我說：「假如總統有更好的書名，待下次再版的時候可以更改。」蔣公說：「讓我再想一想看。」過了兩天，仍未想出較好的書名。蔣公就提了「陳立夫著『四書一貫之道』蔣中正署」數字，叫經國弟將字條送來說：「不必改名了，只要把我所題的字插入該書第一頁就好了」，使「道貫」二字更易使人明瞭，我對蔣公厚意，殊深感激，乃即照蔣公的意思做了。由於《四書道貫》寫作及銷售成功，此後復允國立編譯館之邀請，主編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六冊，及教師手冊六冊，以期將《四書道貫》精髓融入高中高職國語文教材之中，而發揚儒家博大精深之人格思想教育。

8

民國五十九年春至七十年

全力貫注復興中華文化時期

弘揚儒家思想，並從事寫作，
注意健身運動，
希望家庭五世其昌，
並接受韓國建國勳章。



允蔣公出任文復會副會長，並協助工作之發展

經國弟傳達其父親之命，欲我回國定居，並擔任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副會長。我因過去曾六次婉謝蔣公之邀請任公職，故經國弟特別代表蔣公向我聲明：「這不是官，是社會團體之職務」，我想若再拒絕，將會傷感情，遂允之，文復會既以倫理、民主、科學為三大實施綱領，前兩項已有多人致力，唯科學一項獨付厥如，我遂以翻譯李約瑟氏所著《中國之科學與文明》約八百五十萬字之計劃，陳報蔣公會長，蒙其嘉許，並謂如經費不夠，可由文復會支助，我遂化私為公，將該翻譯委員會改隸於文復會，該會之總編輯由我自任，並請劉拓先生（前國立編譯館館長）副之，現已出版十五冊，未出版者，尚剩五分之一。並利用空餘時間，另編一套《中華科學技藝史叢書》，以補李約瑟氏之不足，共三十冊，現已出版二十四冊。另外約林副會長哲生共同發起「獎助科技發明委員會」，收效甚宏，而科學之基礎在數學，故由該會舉辦高中高職數學成績優良學生之獎助，並保送入大學，如此，可使文復會在科學方面有所致力焉。

被選任孔孟學會理事長

由於孔孟學會之任務，與文復會大致相同，均以弘揚中華文化爲主旨，我遂被選任理事長（蔣公爲名譽理事長），我對於孔孟學會之工作方針，訂爲㈠向下扎根；㈡向外發展。前者除繼續每月發行《孔孟月刊》，及每年出版兩次《孔孟學報》，每月舉行一次講演會外，並辦理各級學校論文競賽及小學生書寫四書文句比賽，均有得獎，在暑期中並舉辦國學研究會，教師及學生各一班，各約百餘人，在國內並促成各縣市建立孔廟及成立分會，前年並召開國際孔學會議等，後者協助美國加州聖荷西市建立中國文化公園，內有二十二英尺高之孔子銅像、中山紀念堂、中正紀念亭、中國式牌樓、梅花亭等，及園中採用中國式花木之佈置，並促成德國及日本、琉球建立孔廟，後與外交部及台北市政府合力贈送孔子像於美國，凡與台北市締結姊妹市之城市，大半建立於大學校園中，並鼓勵在美加各大城市舉辦祭孔大典，藉以宏揚孔學於世界，因此我已被連選連任孔孟學會理事長二十餘年之久。

奉命擔任中國醫藥學院董事長

中國醫藥學院爲覃勤、陳因、陳恭炎三人所發起辦理，以宏揚中醫爲目的。創辦之初，阻礙重重，因淺學者多數認中醫爲不科學，爲其最大原因，唯蔣公並不同意此種看法，認爲中醫有中醫的長處，應予以扶助改良，但學院主持乏人，內部常生糾紛，教部乘機派董事十五人以改組之，其中九人爲西醫，是無異以西醫攫取中醫學院，反對之聲浪高起，蔣公聞知，召我前去，謂我曰：「中國醫藥學院依照教部之處理辦法，必將垮台，祇有你去，才能挽救，中醫歡迎你，西醫不便反對你，因爲你一向爲中醫說話。卻是學科學的。」我先謙辭，不獲，乃允之，我選了五個中醫、五個西醫、五個對學院關心而不是醫生者共十五人，組成董事會，自任董事長，報部備案，但無法找到一位兼中西醫二者之長者以任院長，不得已，選一著名教育專家鄭通和先生爲院長，果然一切順利進行，唯此一中醫學院，在台灣竟不易找到教授，須向香港請人，更找不到教材，須從頭自編，畢業學生各公私醫院不受歡迎，經千辛萬苦之不斷奮鬥，居然一一爲之克服，後來蒙經國總統之助，撥款以建醫院，幸賴同仁之努力，一切進行順利，今者學院擴展，各系均備，每年畢業者有七百餘人，具有博

上、碩士班學員，故最困難時期已過，而醫院已有病床八百餘之多（連北港醫院在內）。聲譽甚佳，爲中國唯一的中西醫合作之醫院，今者中醫之理論基礎建立，中醫之法律地位已定，公私立醫院陸續增設中醫部，公勞保中醫亦能享用，衛生署對於中醫之態度亦漸改變，十餘年之苦幹，已足以答謝蔣公之知遇矣！

蔣公逝世經過紀略

民國六十四年四月五日蔣公逝世，全民哀悼，治喪委員會成立，我被列名參加，仙逝在後半夜，故至次日拂曉始知噩耗，趕至榮總弔唁，經國弟向我下跪哭泣而言曰：「我已失去父親矣，你是我唯一的哥哥，以後務請多多扶助！」我扶其起來而慰之曰：「這是我應該的，請節哀保重，以當大事。」以後在治喪會議中，有人主張停止國內娛樂一個月，我起來反對，謂「此非君主時代，千萬不可，至多停止一星期」，衆以爲然，入殮時有人僅主張以基督教聖經與荒漠甘泉等書籍置入靈柩中，我起而主張以代表中國文化之四書五經及國父遺教同時置入，以示蔣公爲文復會之發起人並任會長，並爲繼承及實踐國父遺志之信徒也，衆皆贊同，靈柩陳列在國父紀念館，供民衆瞻仰，數日之間，日夜往弔者數百萬人，哭泣之哀者不少，移靈至慈湖安厝，沿途設奠祭弔者，萬人空巷，蔣公之德澤廣被，以此可見！

文復會長繼任人選之經過

蔣公去世後，文復會失去領導者，經國弟前來徵請我繼任，我謂不可，依照文復會組織章程，會長由總統兼任（唯未註明限於現任），似可請卸任之嚴家淦總統繼任之，經國弟乃往徵求其意，嚴先生謂陳立夫兄仍能屈就副會長，彼始允就。經國弟復來徵詢於我，我謂我一向爲事業著想，從來不計較名位，遂允之，嚴乃任會長，我力助之，於會中增設標準行書推行委員會、中國圍棋研究推行委員會、中華戲劇研究推行委員會、中西醫合作研究委員會等，以配合文化之復興，後來嚴會長患中風症，開會時均由我代之，直至民國八十年，乃共同辭職，改由李總統登輝繼任，改名爲「中華文化運動總會」，繼續工作。

樂觀十大建設之成功使經濟起飛

經國弟在我定居台灣之後，時時來我家訪問，確盡敬兄之誼，有人餽贈食品者，必分敬於我，凡政府重要人選之決定，以及重要政策之推行，必先徵詢我的意見，我亦掬誠奉告，親信勝於骨肉，例如十大建設之計畫，亦乃先舉要以告，及建設有成，敦請上將級戰略顧問五、六人及我組成考察團，實地前往考察，以示重要，其敬老尊賢之誠，一如其父親，故能

得全黨同志之愛戴，而樂助其成，十大建設之成功，對於台灣經濟創奇蹟，關係甚大，其眼光之遠，魄力之大，至可佩也。

本黨主席產生經過

蔣公逝世，本黨失去重心，亟待重建，繼任人選，自以經國弟為首選，如何產生？應用何種名稱？有待研討，名義以「主席」名稱，由中央全會推選為宜，時中央祕書長為張寶樹同志，就商於我，謂將以全體常務委員簽名向全會推薦，我知另有人將提其他人選，故告張同志必須以全體中委聯名提出，並由中央評議委員中若干元老上台發言推崇，張同志乃照此計劃而行，會中由張羣、何應欽及立夫三人發言，全場一致通過。本黨重心，於焉建立。

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之號召，向大陸作政治反攻

民國六十二年，我向經國弟建議，我們不能常被大陸中共統戰，我亦應作反統戰之圖，彼亦以為然，我遂於國父誕辰紀念大會中應邀擔任報告時，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之必然性」為題，聽者動容，不久中央全會召開，即採用「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為中心議題，中共

對此至爲恐懼，連續撰文二十三篇，以攻擊之。其實此舉徒使三民主義在大陸爲人民複習一次，無絲毫損及三民主義，徒自認以往兩次國共合作之無誠意而已，嗣後即有「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之組織產生，由何應欽同志主其事，開始時工作至爲積極，唯此一號召，爲符合蔣公之「七分政治，三分軍事」之反攻策略，應使全球僑胞向大陸作心戰之用，乃能得其績效，若其工作置於台灣，則無濟於事。後來，蔣公去世，經國總統欲我繼任此職，我因年逾九十，年邁力衰，懇辭，乃由馬樹禮同志繼任，以迄於今。

任大學教授十二年授「人理學」一門課

我回國定居後，各方請求講演者，仍不在少數，有一次我提出中國文化以「盡人之性」爲重點，異於西方文化之重點在「盡物之性」，遂有自然科學之進展，但中庸稱「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則中國文化爲人文科學之先進者，稱之曰「人理學」亦甚恰當，若迎頭以之趕上「物理學」（化學其實亦研究物理之一部門）自不困難，中國過去之缺點，在停止於「盡人之性」一階級，而不再進至「盡物之性」，遂致自然科學落人之後，可見國父所昭示之文化方針（從根救起與迎頭趕上）至爲正確，因此師大博士班邀請我去教「人理學」一門課，我允之，遂一面準備講義，一面授課，共成三十二講，逐步增訂，始成一著，由吳

寄[illegible]兄任助教，計共教了十二年，後來政大、文大之博士班學員，亦來師大加入，受教者先後約一百五十人，後來因年老力衰，而停授此課。

創作數事

標準行書

我認爲大陸之採用簡體字，其目的在使人民容易書寫及認識，原意並不壞，唯若行之時久，將使青年不易讀古書，於文化有損，我遂請專家研究我國行書，其目的亦以簡易迅速爲目的，若能使之標準化，則可具有簡體字之長，而無簡體字之短，經數年之研究，並廣徵各方面之意見，始作定案，經文復會通過，並得教育部之核定，頒佈施行，由標準行書推行委員會張希文女士及鮑雨林先生，到各校講演示範，幸得社會之肯定，將來兩岸和平統一後，可以和簡體字共同研究改進矣。

家庭教育

我認爲中國之異於其他國家者，採取家族制度，特別重視倫理道德，故首先崇尚孝弟。

由家而國，由近及遠，故曰「孝者，所以事君（長官）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雖然今之教育制度，已從幼稚園開始，而兒童從小在家的時間仍多，其所耳濡目染者，仍爲父母之言行，故家庭教育仍爲教育之始基，故家庭教育，仍應有一教本，此一構想與謝東閔先生所見相同，遂共同邀請專家，寫成家庭教育課本四冊，名之曰《快樂家庭》，由正中書局出版、銷售，其效果如何，若干年後始可知曉。

中文易學

由於中國文字不用音符，遂被人們認爲難學，其實不然。中國文字百分之八十以上爲形聲字，有形有聲，見其形而知其屬類，助之以聲，若知其方法，實不難學，我遂邀集若干專家，依天、地、人、物四大類，分別編排，有圖有字，共分八冊，名曰《中文易學》，現已出版四冊，由三民書局發行，現正在試行中。

在中央全會中提案，以中國文化統一中國，並資助國父實業計劃之建設

在十三屆中央評議委員第一次全體會議中，我與趙耀東同志，連同中央評議委員三十二

人 提案以中國文化建立兩岸之共信，並以美金一百億元與中共共同開始建設國父實業計劃之一部分，藉以建立互信，進而達致兩岸之和平統一，此案通過中央評議會議，此一構想有勝於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之號召，中共方面有趙紫陽之反應贊成，但吾政府方面，似怕中共之乏誠意，未有進行，而趙紫陽被鬥下台，海內外各方對之反應雖佳，此案仍不免胎死腹中，殊爲可惜。

八十歲生辰舉行書畫展及奉頒中山文化獎章

爲慶祝內子與余共度八十歲雙壽舉行書畫展於國立歷史博物館，並印行書畫紀念冊以贈親友，蔣經國總統特於生辰之日，頒贈中山文化獎以彰弘揚文化之功，在頒獎典禮中，余公佈民國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事變之史實，俾本黨同志咸知此舉爲蔣公事業成敗之關鍵，余幸而參與共事而稍有貢獻焉！

蔣經國總統去世

經國弟任總統時，我與內子以書畫合裱一立軸祝之，畫中有一舟乘風前進，題曰：「鵬

程萬里」，上面有一方塊紙，題曰：「教忠教孝，愛國愛民，天助自助，必信必成。」似頗切合事實，經國弟亦懸之於書房之中，似亦好之，在任數年，日夜辛勤，時常出巡民間，深知民間疾苦，人民亦愛戴之。彼有糖尿病，出外多動，對病有益，後來國際方面暗殺案時起，立委國代若干同志聯名請其少出入民間，以防不測。用意無他，而對其生活方式之改變，於糖尿病則有害也。此後我每晨在浴盆中淋浴同時全身自力按摩之運動不輟，故能保持血糖於一四〇度以下，而彼之血糖則上升，足部有傷，不易收口，更難於行，病日見重，加以民進黨之無法無天，民主開放，不便繩之於法，但心中不免煩悶日增，一旦內部出血，難以制止，遂與世長辭，不亦痛乎！出殯至桃園時，沿途民衆莫不涕泣，其愛民之深所得之反應耳，回憶彼之由俄返國，出諸我個人之意，未經請示蔣公，由贛南行政專員起，即有蔣青天之威名，一切作爲，無不爲民。苦幹力行，不尚虛名，由省委以至於總統，所作所爲，莫不符合我十六字之贈言：「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孟子），則我居之而無愧矣。

李登輝總統選舉時之風波及協助平息

經國弟初次任總統，提謝東閔同志爲副，事前承其見告，第二任總統提李登輝同志爲副，亦然，我看經國弟用人考慮之周詳，至爲心折，當其逝世之後，本黨推李以代，依照憲

法，於若干時間之中，必須舉行總統選舉，本黨復推李爲候選人，未見有任何阻礙；及國大召開，一部份代表有不同意見，擬另推他人，此乃違反黨的決定之行爲，乃有八大元老出面斡旋之舉，幸對方之林洋港與蔣緯國均自動撤消，乃告無事。李提李元簇同志爲副總統，均獲得國大之高票當選，一場風波，於焉平息。不料事後老國代被迫退休，二屆國代，另行產生，並主修憲，台獨囂張，授中共以侵台之柄，幸郝柏村院長主張堅定，前途如何，當視最高當局之決心而定焉。

我的寫作生活，開採文化鑛之所得

早於民國十六年本黨清黨成功以後，許多年輕的共產黨員都樂於投效中國國民黨。那時候我做中央黨部祕書長，這些來自全國各地迷途知返的年輕人都來找我，自願參加建國行列以施展抱負，爲數總計逾一萬五千餘人。

那時中央的政策是：凡是放棄共黨前來投效本黨的便起用他，給他們一條出路。而每天約其談話的學生，總有二十到三十多個。經過此番約談後我發現：他們爲什麼參加共產黨？其主要原因有三：㈠對本國文化太不明瞭，一知半解者佔了多數；㈡對立國之三民主義，學校缺乏好的教師，所以對於它優於其他主義之處不懂；㈢具有自卑感，而無信仰他國主義爲

可恥的觀念，所以易於被共黨所誘惑。這些人到後來我擔任組織部長時（此職原由蔣公兼任），舉凡優秀者，經訓練後就擢拔其爲本黨中下級幹部，他們都很努力，頗有衝勁，這件事對我有一種啟發，那就是要使青年人愛國、愛黨和愛歷史文化，就必須先使其對於歷史文化有所瞭解，因此一有時間，我就對他們作講演。

那時候，我的身體並不太好，肺功能不佳，但我竭力而行，我預定每年對十萬青年講演，在我每次講演以後，我都把所有聽講人數記下來，綜計那一年聽講者共達十萬零六千人，屆時我再檢查肺疾，竟出乎意料的痊癒了，所以我得到了「養生在動」之教訓。

青年們聽我講演都很有興趣，我所講的都是中國文化和道德問題。大凡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它之所以能夠存在於天地之間，必有其不可磨滅的歷史文化，因此，要研究中國歷史文化，必須從根本上去研究，我就從如何發揚我國文化入手。我國文化歷史悠久，自從做了一世紀之次殖民地後，對其優點已忘懷了，所以，國父要我們將它從根救起，正如礦物之埋藏地下時間久了，需要探測、開採、冶煉，才能有用。我想我既無機會「學以致用」以開採煤鑛，何不轉而開文化鑛呢？

什麼是中國文化的根呢？那就是《易經》，孔子、老子等的思想，都是導源於易經這部書，還有其他諸子百家，其思想淵源，亦都離不開易經。那時我就發表一篇〈易理中正論〉的文章，中央政治學校便請我去講演，我即以此爲重心作了一系列講演，說明中國文化的根

源。

在我研究中發現，《易經》這部書是宇宙萬物的生存進化原理，亦即所謂「生生之謂易」。於是我又找到一個「根」：看到國父所說的「民生是人類歷史進化的重心」，他所講進化論中有一個「生元」，形成生物最初的一個單位叫「生元」。他說生元不單是有物質也有精神，等於是我們中國的陰與陽，一定要有陰同時有陽才能有生命。而我據此推演闡釋的一系列講演，嗣經整理印成，書定名爲《唯生論》上冊，以此來對抗共產黨的唯物論。唯物論認定宇宙中的一切，都是受物質支配，我認爲這是不對的，既不單是精神，也不單是物質，乃是精神與物質合起來的生命。從易經的生生之原理到國父的民生史觀，足以證諸民生史觀可以糾正「唯心論」與「唯物論」的錯誤。

據此，我進一步聯想到，一個人祇有在以下兩種情況下應該要死的，第一是我的生存足以妨礙多數人的生存時，比如一個人持槍去搶劫及殺人，所有人都會受到其威脅，此時他應該接受法律的制裁而處死，亦即被動的死；第二是當國家多數人不能生存時，如有必要，應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爲多數人的生存主動去救國而犧牲生命（死）；除此二者之外，即使一個小蟲或一隻螞蟻，牠總是會保衛自己去求生的，如有人去捉牠，總會用種種方法以逃避死亡。根據此一道理，我便寫了《唯生論》這本書。因爲以往共黨的「唯物論」，我們一直缺乏有力的抗衡與駁斥其荒謬的文獻。此書一出來，由於其是以歷史爲背景和中國文化作基

礎，是打擊唯物論反歷史進化強有力的理論，共黨竟下一命令，要其所有黨員，在一年之中，去買我的書，大事批判我的立論。

但事實怎樣呢？他們所寫的文章，沒有一篇足以推翻我的理論根據。因爲我的《唯生論》是有歷史根據的，結果是共黨越反對，我這本書的銷路越好。此是我所寫的第一本打擊共黨的書。（正中）

此時，我忙於工作，無暇著書立說，《唯生論》下冊就無法出版了，後來我做了教育部長，有一位唐君毅先生，他是被聘任爲部裡的編纂，頗富哲學思想，我便請他到我家來，每天花費半小時，我講，他筆錄，於是完成一部哲學的書，而命名爲《生之原理》。（因《唯生論》下冊，是無時間續編，而且上冊是講義性質，所以重寫一冊名爲《生之原理》。）此書於重慶出版，在全國各省竟銷到十二萬餘冊，對於抵抗共黨之邪說影響力極大。（正中）

在此順便一提的，即我寫《四書道貫》的動機，早於教育部長任內時，便有此構想。記得小時候，每個人都要唸四書，人人都要背熟，故時至今日，大部份我仍能背出來。最初我有個理想，即如何把四書作有系統的整理，此後我又看到國父所講的一句話，他說：「大學這本書，它先從一個人內心講起，一直到齊家、治國、平天下。此書的內容，堪稱是世界上任何大思想家、大學問家、大哲學家都未能講得這樣好，是中國獨有的一件寶貝。」

當時我想：假如我能把四書整理成一部有系統的書，應該以上述國父所說的話作爲分類

從，於是我就試著寫一大綱，依《大學》的八綱目從——格物起到平天下爲止，將四書之所有資料插入八綱目中。從前編著一本書，總以爲不應把原書拆開編寫，認爲那是不道德的，但我的想法不同。因爲今天的問題是青年們對中國文化歷史不瞭解，如針對所編寫這部書，不合乎科學原理，大家一看就興趣索然，覺得毫無意義。現在編排都很進步，大小標題分明醒目，我編寫《四書道貫》便應具此特色。四書在我國已有很長久的歷史，歷代帝王都不敢刪減一章一字，也無人敢加添一節一章，當然我亦無權予以增刪。而我的編寫主旨，是使其系統化，卻不能缺少一字，儘管其中有一小部份已不適合現在要求，但誰能料知再過五百年，此部份卻又適用呢！「不多又不少」的原則確定後，困難又產生了，即百分之九十五可照大學綱目編入，另所剩百分之五將如何插入呢？經過反覆推敲，卒能勉強予以全部編入，確是煞費周章的事。其編寫的困難，可從下例看出一斑：例如「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然而接下去有「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此兩段文字可說毫無關係，但四書原本卻相連一起。又如「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諸如此類尚有甚多，必須一一加以整理，使其具有因果關係者編排一起。故耗時耗力，化費功夫極大，但終於成功了。（世界書局出版）

此外我又編寫了下列諸書：

《孔子思想對世界的影響》：編成兩本，已由復興書局出版。其中第一本是列舉西方各國大教育家、大宗教家，和大哲學家對孔子所作之批評；第二本是亞洲各國如日本、韓國等對孔子的尊崇與信仰及其學術的發揚，使吾國青年咸知孔子在世界學術界中所佔之重要地位，而生崇敬之心。（復興）

《從根救起》、《迎頭趕上》這兩本小冊子是根據國父文化政策的指示，即「將中國固有的德、性、智、能從根救起，對西方的物質科學，迎頭趕上」。這兩小冊子是以事實來證明從根救起的效果，與迎頭趕上之可能。（三民）

《中國之科學與文明》：此書是由英國科學家李約瑟博士所著，我在美國僑居時，時值先總統蔣公提倡中國文化復興運動，其中三綱領是：倫理、民主、科學。在倫理方面，我們說與做的都很多，但在科學方面卻很少。爲配合蔣公的意旨，於是我決定翻譯這部具有八百五十萬字的鉅著，此是一項很艱鉅的工作。李約瑟先生在我於抗戰期間任教育部長時，他那時是英國新聞處一名職員，當初他想寫這部書時曾找過我，我竭力鼓勵他寫，並且贈送他一部漢書及介紹他到各地蒐集資料，儘量給予方便，幫了他不少忙，所以他一直對我很感激，當我決定翻譯他的書後，便寫了封信給他，他收到信後立即回我一信，表示很贊成我翻譯他的書。於是，蔣公邀我回國時，在紐約幾位親友爲我餞行的餐敘中，我順便提出翻譯《中國之科學與文明》計劃，在座的董浩雲先生首先站起來表示：「陳先生如果翻譯此書，需要錢

時我來支援！」如此一來，給予我很大鼓勵與勇氣，回國後經初步估算，約需五、六萬美元，如讓董先生一人擔負實在太重，乃由董先生負擔四萬美元，嘉新水泥公司張敏鈺先生一萬美元，王雲五先概允由商務印書館承印，於是我的負擔減輕了，然後我就報告先總統蔣公。他聽了我的報告後說：「這計劃很好，如經費不足，我會支助你。」開始翻譯很困難，第一冊書光是參考書就一千多種。做此工作，必須中外學識俱佳，迄至七十五年時，已出版十四冊。李約瑟先生來信說：「翻譯他這本書時，可以不必依其原本厚度，可拆開依照其份量分成幾本。」我便按照他的意思去做。此書每一冊都另有一摘要簡介，由林品石先生任之，我擔任主編，劉拓先生協編，由於這本書規模太大，李博士將稿子交付英國書局承印，一拖三年都印不出來，但我們編譯人員不能浪擲時間，一直等下去，便利用此空檔，另編成一套《中國科學技藝叢書》，已出版了二十四冊，把我國所有科技如農業、水利、鹽業、蠶桑等資料蒐羅甚豐，一一納入其中。（商務）

《孟子之政治思想》：孟子生於戰國時代，與今日之世界情勢，極爲相似，楊朱思想，爲絕對個人主義，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有似今日之資本主義，而共產主義高叫爲人民謀福利，則有似墨子思想之倡「磨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其時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孟子兩面作戰，弘揚孔子之正道，以抗邪說，有似我們以三民主義思想去救世界之浩氣，此時出版，正合需要。此書編著方法一如《四書道貫》，不漏一字，而成系統，出版之後，中山文化基

金會特予主動給獎，此是前所未有之舉，因爲該獎的頒發，都是先由當事人提出申請經審定後才予頒給的，我得此光榮，益增我編著之勇氣。（中華）蔣經國總統在中央全會中，對此書特予以讚揚，更增光榮。

《易學應用之研究》：研究中國文化必須先了解易經，易經研究頗不容易，他有自然科學中之最高數學。研究易經的人雖不少，但多數爲研究其一部份，如天文、數學、醫學、音樂等，我想易經是太深邃了，其用途也太廣了，比如說用電，大家很少懂得高深電學，但電燈會點，電話會打，電視會看，電報會發。因此，我們爲什麼不從應用方向去研究易經呢？大家都知道易經應用範圍很廣，如能充分研究其應用學科，再進而研究其原理，則比較容易而且必得其眞價值，所以我便邀集一批研究易經的學者去編寫一部《易學應用之研究》，自任主編，已出版了三輯。例如天文，則運用易經的道理去觀察，醫學則以易經的道理去驗證，這樣，大家漸漸能了解易經之偉大了。（中華）

《人理學研究》：中國文化特點究竟在那裡？我的研究結論是：其一切學問都是在講做人的道理，因爲我們祖先，重本末之道，他們認清人是一切的中心，樹人是本，以德樹人，則一切隨之而入正軌，故我認爲吾國文化可以「重人兼重德」五字代表之，而西方文化這一兩百年來之進展，都偏重在「物」的研究，其成就可觀，兩者各有所長，因此我便寫了《人理學研究》這本書。探討怎樣做人、怎樣做事，以及人生的意義與責任是什麼。此書一出，

師大就請我去教博士班，後來政大、文大兩校的博士班學生都轉來參加，足足教了十二年，才告退休，這亦是我首創一門學問。（中華）

《國父的道德言論彙編》：此書是把國父關於道德方面的言論作一歸納整理，國父的《進化論》把宇宙進化分爲三個時期，就是㈠物質進化的時期；㈡物種進化的時期；㈢人類的進化時期。他說：「物種進化，以競爭爲原則，人類進化，則以互助爲原則，社會國家者，互助之體也，道德仁義者，互助之用也，人類順此原則則昌，逆此原則則亡。」又曰：「有道德始有國家，有道德始成世界。」國父在奔走革命時，尚且如此重視道德，足見其一生對中國文化之以道德爲主要的了解至爲深刻。蓋道德爲人類共生、共存、共進化之保障，不可須臾離也。

《四書章句速檢》：此書是方便研讀四書者查對章句來源出典的一本工具書。我們常常記得一句古書，而不知其出在四書中那一部書，有此速檢，則立即得答案，不致說錯。（世界）

《中國文化基本教材》：這是我答應國立編譯館主持編篡的。我年紀已這樣大，爲何還接下該館此項繁鉅的工作？乃因我思及影響國家社會效率最大的莫過於教育，亦即如教科書編得好，則所有青年都會在接受教育時受其薰陶。因此我決定將《四書道貫》以簡便文字編入《中國文化基本教材》（高中高職用），如此即可把我國歷史文化的精要部份介紹給青年

們，以作向下紮根的工夫，經二十三人組成之編審委員會詳細研審通過才刊行的，也就是我主編《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的理由。此著共六冊，供六個學期教學之用，現已在所有高中高職課程之中用兩年了，希望對於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有所貢獻。

編完之後，還必須另編六本教師手冊，每一本教材要配合一本手冊，如此一來，本是祇編六冊，但實際上是十二本，故工作相當繁重。此書編好後，中國文化重要部份即以修身爲本的如「四維八德」、「青年守則」等都編入其中，可以說中國文化一系列最基本的道理，也全部納入教科書。（國立編譯館）

關於文化方面我寫的文章不少，有四十多篇講詞與文章在《孔孟月刊》發表，還有許多篇稿子已收入《陳立夫儒學研究言論集》（黎明），另有若干篇好的正編印中。至於我前在大陸所講的尤其很多，但稿子未帶出來，最近我請一位已退休先生，找中央日報自民國十六年起到三十九年的報紙，蒐集我寫的文章，預備加以整理後出版一本書，叫《弘毅齋藝文集》，紀念九十雙壽，業已出版。

最近文復會出版一套《中西文化經濟比較》叢書，計一百五十冊，但僅有一百四十九冊，尚缺一冊，乃囑由我寫一本補足，於是我答應寫《中國文化的科學解析》一書，以玉成其事，現已完成六十餘篇。我在不久前，接獲美國友人的一信，指稱大陸上開始研究孔子思想，並託朋友購置我的書，我遂寄出轉予交付。所寄之書包括《四書道貫》、《人理學研

究》、《孔子思想對世界的影響》等。另外我的《四書道貫》一書，已分別譯成英、日、韓三國文字。即《生之原理》已英譯，在美國出版；《人理學研究》有人給我譯成法文，尚未付印。

我一生自認對文化方面小有貢獻，我把中華文化的精義，歸納成爲無私無我之「公」，成己成物之「誠」，立人達人之「仁」，不偏不倚之「中」，日新又新之「行」。斯五者，學自天道而成人道，包含了對道、對己、對人、對事、對物，應採取的正確信念，人人如此，自能成爲民族的道統，有此道統，民族賴以團結，國家賴以生存，此爲前人所未言者。由此而知中華文化，乃以人爲中心，以德爲基礎，故應爲人類所共同喜愛之文化，不若資本主義之「重財而輕德」，與共產主義之「重物而輕人」，兩者，均使人類走入歧途而降低人類之尊嚴也，我感到最有趣的工作，是在教育部對青年學生們的教育，做了不少的事情，而今天教育上的有些措施，都是延續我那時的教育政策。因此，我也獲得兩個獎章：一是六十八年九月十七日本黨中央頒發的中山獎章，此獎章獲得者共有四人，即蔣夫人、張岳軍、嚴前總統，再一個就是我了。七十一年三月三十一日行政院開始頒發國家文化獎，我和陳百年先生同獲得之。

附著述表。

一、著述二十八種　共計三十冊

書名	出版年月	書局名稱
1 維生論　上篇	民國16年初版 民國61年7月臺初版 民國64年4月臺三版	正中書局
2 生之原理	民國33年9月渝初版 民國35年10月滬六版	正中書局
3 生之原理　英譯本 (*Philosophy of Life*)　任泰譯	民國36年初版	美國 Philosophie Library
4 四書道貫	民國50年10月初版 民國74年7月十七版	世界書局
5 四書道貫　英譯本 (*The Confucian Way*)　劉師舜譯	民國60初版 民國75初版	商務印書館及聖約瑟大學出版部 英國 Routledge & Kegan Paul Pld
6 四書道貫　日譯本	民國63年初版	おりじん書房
7 人理學	民國60年9月初版	中華書局
8 孟子之政治思想	民國62年6月初版	中華書局
9 孟子之道德倫理思想	民國75年7月初版	正中書局

10國父道德言論類輯	民國70年5月初版	三民書局
11從根救起	民國59年6月初版	三民書局
12迎頭趕上	民國59年6月初版	三民書局
13四書中的常理及故事	民國72年2月	史藝社
14中國文化概論	民國76年10月	正中書局
15中國文化概論　英譯本(*A General Discusision Chinese Culture*)	民國78年1月	正中書局
16中西文化之異同及其他國家文字　英譯本(*Eastern & western Cultures: Confrontation or Conceliation*)薛光前譯	民國61年	美國聖若望大學出版部 三院新聞局
17陳立夫儒家研究言論集	民國72年7月初版	黎明文化事業公司
18中國文化之科學解析	民國73年12月	中央文物供應社
19孔子何以被尊稱爲萬世師表(*Why Confucins Has Been Reverenced as The Model Teather of All Ages?*)薛光前譯	民國65年	美國聖若望大學出版部

20 五筆檢字法之原理及應用	民國23年10月初版 民國60年2月在臺初版	中華書局 中國語文研究中心
21 五筆檢字學生字典	民國23年10月	中華書局
22 四書章句速檢	民國65年3月初版	世界書局
23 治癌中藥方彙編	民國66年3月	中國醫藥抗癌研中心
24 中醫之科學理論基礎及新的醫學如何產生	民國73年	中國藥醫學院
25 陳立夫孫祿卿夫婦八十雙壽書畫紀念冊	民國68年	自印
26 我的創造倡建與服務（九十憶往）	民國78年	三民書局
27 弘毅齋藝文集三冊	民國78年	黎明書局
28 眞理不滅孔孟之道永存		

二、主編三十二種（劉拓兄爲助） 共計五十冊

書名	出版年月	書局名稱
1 孔子思想對世界之影響 上下兩輯	民國64年10月初版	復興書局
2 易學應用之研究 一、二、三輯	民國63年7月初版	中華書局
3 中國文化基本教材 六冊	民國73年1月至民國74年1月	國立編譯館
4 中國文化基本教材教師手冊 六冊	民國73年1月至民國75年1月	國立編譯館
5 中華科學技藝史叢書已出版廿四種，共計二十冊，未出版者五種		

書名	編者	校訂者	出版年月	出版書局
(1) 中華水利史	沈百先 章光彩 等		民國68年3月初版	商務印書館
(2) 中華農業史——論集	沈宗瀚 趙雅書 等		民國68年3月初版	商務印書館
(3) 中華鐵路史	凌鴻勛		民國70年7月初版	商務印書館
(4) 中華水運史	王 洸		民國71年4月初版	商務印書館
(5) 中華鹽業史	田秋野 周維亮 等	朱玖瑩	民國68年3月初版	商務印書館

書名	作者		出版日期	出版者
(6)中華氣象學史	劉昭民	鄭子政	民國69年9月初版	商務印書館
(7)中華書法史	張光賓		民國70年12月初版	商務印書館
(8)中華地政史	蕭　錚	黃　通	民國73年1月初版	商務印書館
(9)中華醫藥學史	鄭曼青　林品石	李煥燊　陳夸羲	民國71年11月初版	商務印書館
(10)中華合作事業發展史　上下	陳岩松		民國72年3月初版	商務印書館
(11)中華公路史　上下	周一上　胡美璜　等		民國72年3月初版	商務印書館
(12)中華天文學發展史	劉昭民	丁有存	民國74年1月初版	商務印書館
(13)中華園藝史	程兆熊		民國74年4月初版	商務印書館
(14)中華地質學史	劉昭民	阮維周	民國74年9月初版	商務印書館
(15)中華國劇史	史煥章	張光濤	民國74年11月初版	商務印書館
(16)中華天文學史	曹謨		民國75年9月初版	商務印書館
(17)中華物理學史	劉昭民		民國76年7月初版	商務印書館
(18)中華雕刻史　上	鄭家睴　鄧淑蘋　袁德星		民國76年7月初版	商務印書館
中華雕刻史　下			民國80年4月初版	

(19)中外數學史的比較	趙良五		民國80年3月初版	
(20)中華生物學史	劉昭民		民國80年5月初版	
(21)中華樂律史及唐樂府研究	陸運逵		在編寫中	
(22)中華印刷史	江應龍		在編寫中	
(23)中華社會福利法制史	周建卿		民國81年12月初版	黎明書店
(24)中華繪畫史	江兆申		在編寫中	在編寫中
(25)中華陶瓷史	章依華 蔡本雄 陳擎先		在編寫中	在編寫中
(26)中華刺繡緙絲史	胡賽蘭		在編寫中	在編寫中
6 快樂的家庭共四冊	與謝東閔先生同主編		民國77年1月初版	正中書局
7 中文易學 共八冊			已出四冊	

三、上譯（原本已出版十四冊，又濃縮本十二冊，共計二十六冊，未出版者尚有八冊。劉拓、林品石兩兄爲助）

李約瑟《中國之科學與文明》，已出版十四冊如下：

冊別	譯者	校訂者	出版年月	出版書局
第一冊　導論	黃文山	陳石孚 任泰	民國60年12月初版 民國66年6月修二版	商務印書館
第二冊　中國科學思想史　上	陳維綸 程滄波 陳舜政 劉崇鋐 端木愷		民國62年3月初版 民國64年3月修一版	商務印書館
第三冊　中國科學思想史　上	杜維運 程滄波 顧翊羣 陳捷先 李杏邨 張靜二		民國62年7月初版 民國63年12月修一版	商務印書館
第四冊　數學	傅溥	劉拓	民國63年6月初版 民國64年9月修一版	商務印書館
第五冊　天文學	曹謨	劉拓	民國64年1月初版 民國66年8月修二版	商務印書館
第六冊　氣象學　地圖學　地質學　礦物學	鄭子政 王源 藍晶瑩 姚國水 黃春江		民國64年8月初版	商務印書館

冊別	書名	作者	譯者	出版日期	出版者
第七冊	物理學	吳大猷 張俊彥 李熙謀	吳大猷 劉拓	民國65年1月初版 民國66年8月二版	商務印書館
第八冊	機械工程學 上	錢昌祚 華文廣 石家龍	程嘉垕 劉拓	民國65年1月初版	商務印書館
第九冊	機械工程學 下	錢昌祚 華文廣 石家龍	程嘉垕 劉拓	民國65年8月初版	商務印書館
第十冊	土木及水利工程學	張一麐 沈百先	段品莊 劉拓	民國66年4月初版	商務印書館
第十一冊	航海工藝 上	金龍靈 楊傳琪	林繩民 劉拓	民國69年10月初版	商務印書館
第十二冊	航海工藝 下	金龍靈 楊傳琪	林繩民 劉拓	民國69年10月初版	商務印書館
第十三冊	造紙與印刷（原文書在翻譯中）				
第十四冊	煉丹術和化學	張儀尊 劉廣定	劉拓	民國75年5月初版	商務印書館
第十五冊	煉丹術和化學	胡懋麟 余傳韜	劉拓	民國74年9月初版	商務印書館

以上十五種，共二十六冊。

【註】一、除上述中譯本外，另出濃縮後的節本，計有一〜十二冊及十四、十五冊。

二、正在翻譯中者，除第十三冊《造紙與印刷》外，尚有第十六、十七冊《煉丹術和化學》第二十冊《植物學》，第二十一冊《農業》及第二十二冊《軍事工藝》。

三、原文書第五卷第六冊，第六卷第三、四、五冊，及第七冊，均尚未出書，俟出書後購譯。

四、勸編　三種　共五冊。

書名	出版年月	書局名稱
1中華醫藥專輯　一、二、三輯	民國71年10月至民國76年10月初版	中華日報
2中華文化復興論文選集	民國61年	文復會
3標準行重論文選集	民國75年6月	文復會

我家接受了韓國的三個建國勳章

此外，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六日美國福特漢大學，贈我一個榮譽法學博士學位，以酬答我在抗戰時在淪陷區幫助天主教會學校的輔仁大學之義行。而中國文化大學也贈我一哲學博士學位榮銜。還有韓國的建國大學頒我一個榮譽哲學博士學位，此在該國及該大學是第一個得此項榮譽者。在頒此學位之前，韓國還特別召開一次內閣會議討論通過，那是對我的一種酬勞感謝之意。因爲當初韓國的獨立運動，是由我的叔父陳英士先生協助開始的，他的眼光遠大，他認爲中國革命應不偏限於中國，乃是整個亞洲的革命，於是他一方面幫總理革命，另一方面幫韓國及安南革命。至他被袁上凱刺殺成仁後，其革命工作即由家兄果夫接辦，承蔣公之命幫韓國革命。嗣家兄調任江蘇省主席，職責繁重，有許多工作便由我處理，如韓國革命之聯絡、經濟支援、學生來中國就學等。那時韓國革命領袖金九先生（相當於我們的國父）是獨立後第一位總統，後又由李承晚取代。韓國革命成功以後，他頒發建國勳章給當初幫他革命者，不到十個，我家就榮獲了三個，即追贈已成仁的先叔陳英士先生和頒予先兄果夫以及我本人，此項光榮說明了一點，即我一家均幫過韓國革命建國，因此，建國大學頒我

一榮譽哲學博士學位，也與此有關係。當我接受此學位時，韓國有十幾位新聞記者包圍著問我曰：「當初先生是如何幫助韓國革命的？」我表示：「此事不能講，因爲我如據實講了，會導致日本的不滿，目前你們正和日本改善關係，不能再算舊賬了；其次是韓國革命，差不多是從我國民國元年開始，一直到民國三十幾年，歷史既如此之久，當非三言兩語所能交代；三，用我們中國的習慣來講，凡是幫了人家的忙，自己不應稱功，而應由被幫助的一方來講，所以我今天更不能對你們講了。」記者聽了，悻悻而去。

我們兄弟二人爲何成爲中共之最大敵人？

中國共產黨不是一個普通政黨，而是一個非武裝的軍隊，它有堅強的組織和紀律，有巧妙的宣傳技術和策略，攻擊計劃一定全體動員攻擊，作宣傳戰，故可積非成是，指白爲黑，一般人民不明事實底細，易受其騙，它認爲欺騙得了人是有本領，若以一般道德標準去衡量它，那你已經失敗了，它所動員攻擊的對象，一定是它的勁敵，可無疑義。

家兄果夫協助蔣公從共黨手中奪回本黨黨權

十三年本黨改組，採聯俄、容共、農工三政策，若總理健在，共黨絕不敢如此囂張，不

料十四年總理北上而逝世於北京，鮑羅廷遂勾結汪精衛，採取擁汪倒蔣政策，當我於十四年底奉蔣校長迭次電召赴粵，遂被強留任校長辦公廳機要秘書，是時蔣校長處境十分艱難，胡漢民先生被趕走，廖仲愷先生（蔣校長最好朋友）被刺死，老同志被稱爲西山會議派者，都不敢來粵，蔣校長雖軍權在握，統一了廣東，但在「以黨治政，以政治軍」的口號下，蔣校長隨時可以被汪免職，因黨主席、國民政府主席、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及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均由汪兼任，而實權則屬於俄顧問鮑羅廷與季山嘉。蔣校長曾一度被迫赴俄，隨行者唯我一人，幸我竭力勸阻，未成事實，唯以放逐未成，遂有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之事變，此一事變，幸蔣校長先下手爲強，共黨之陰謀失敗，本黨始收回黨權及政權，蔣校長乃得兼任本黨中常會主席、組織部長、軍人部長，此時張靜江先生及家兄果夫均被邀赴粵，旋即由張靜江先代中常會主席，家兄代組織部長，本黨黨權遂由共黨手中奪回，而組訓工作亦由此開始，當時協助家兄工作者有蕭錚、鄭異、段錫朋、余俊賢、駱美奐、王樂平、曾養甫等，均本黨之門上也。亦即共黨所指稱爲CC派之中堅也。

鮑羅廷遇到了勁敵

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事變之成敗，爲本黨戰勝共黨，亦即北伐之能否開始之重要關鍵，蔣校長不願使此事擴大，而使共黨仍與我合作共同北伐，使蘇俄之軍事援助以供北伐者仍能來

到，乃爲極高明之一著，於是奪取中山艦三人中之一的歐陽格被捕了，國共合作北伐之合約訂立了，唯獨熱心做領袖而願將黨權奉送共黨之汪精衛，則知罪出走香港，使黨政各主管能順利地全部改組，爲與蔣公合作之人繼任，例如譚延闓之國府主席、李濟琛之軍事主任、黨中央各部主管重入本黨同志之手。蘇俄中央亦不願放棄唯一的東方盟友，鮑羅廷仍繼續任中國共黨的督導者，以謀再度奪取政權，不料遇到了反共最厲害之張靜江與陳果夫二人，前者對鮑毫不客氣予以責備，後者埋頭苦幹以奠立本黨下層基礎，因此鮑發動反張運動，其口號爲打倒「昏庸老朽的張靜江」，後來靜江先生在上海見到了我，笑語我說：「如果我眞的昏庸與老朽，還值得打倒嗎，我老朽則有之，昏庸則未必！」共黨遇到了勁敵，才會動員黨員誣衊他，打倒他，可見張先生與家兄二人是對付得了鮑羅廷啊！

十六年清黨何以順利成功

清黨之役之所以一舉而成功，全靠四種力量之結合：㈠本黨元老之打頭陣，此則全賴中央監察委員張靜江先生與家兄二人深悉共黨之陰謀，促使吳稚暉、蔡元培、李石曾等均公開出面反共；㈡西山會議派一向在廣東以外地區，反對廣州之容共政策，而懷疑蔣公爲親共者，及三月二十日之事變發生及戡平，始了解蔣公爲反共者，唯尚在懷疑何以北伐進行中蔣公仍與共黨合作，到了清共，都全部歸隊，成蔣公之助力矣；㈢在三月二十日事變之前，組

織部爲共黨楊匏安任部長，各省黨部委員（地下工作者）過半數爲共黨份子，及家兄接任代理部長後，經訓練而派往各省黨部爲委員，清黨時本黨同志已佔了過半數，而已有力量剋制共黨。㈣軍隊方面政訓工作，共黨份子雖爲數不少，但軍隊長官都討厭政訓人員之替共黨宣揚，故一經中央決策反共，政訓人員全部失勢而反正。至於國共之開始決鬥，早在十五年底，當蔣總司令乘兵艦過安慶時，當地黨部開群衆大會歡迎蔣總司令，在會畢後，本黨同志與共黨決鬥，事前我與楊虎均隨侍蔣公在艦上，安徽同志們上船向楊虎（安徽老同志）請示，謂彼等受共黨之壓迫已久，是否可以乘此機會反擊，楊不敢回答，就商於我，我說：「可以，唯必須在蔣公離開會場之後。」其結果，本黨同志打勝了，此爲國共鬥爭之開始，亦即對共黨方法之示範也。

CC名稱從何而來？

北伐完成之後，中央召開全會，家兄認爲以往本黨同志在軍閥勢力範圍之下，從事黨的工作，而不能用本黨名義，否則難以存在，故各地用各種不同名稱，以資掩護，而經組織部備案者，例如華北有興中會、實踐社、大同盟等，長江一帶AB團、學術研究會等，今則國家統一，一切都可以公開，此類小組織，自無存在之必要。家兄乃聯合若干中央委員，提案主張取消一切小組織，經會議通過，通令施行。唯華北興中會、實踐社，不肯遵令登報取

消，中央遂派我去北平查明此事，始知彼等受共黨之挑撥，謂中央自己有小組織，名曰「中央俱樂部」，英譯爲Central Club，簡稱CC，爲何一定要你們取消，你們不應該「上當」，遂登報取消。但此「CC名稱，中共後來改爲指陳果夫及陳立夫（陳氏之英文名Chen，稱兩陳用CC），用以挑撥本黨內部，因當時家兄仍在代蔣公爲組織部長，而我則由組織部調查科長調任中央秘書長，我兄弟二人，整天均在中央黨部辦公，爲老黨員辦登記，對新黨員之大量徵收，一切黨內法規之訂立，黨的調統工作日見其成效，黨的組訓及宣傳進入系統化，以上均使共黨畏懼者，故以CC名稱集中攻擊，並用以挑撥離間本黨內部，少數不滿本黨黨員分子不察，亦借用此一名稱，以洩私怨，CC名稱遂不脛而走矣。後來又用「四大家族」，以攻擊本黨及政府，其中亦包括陳氏在內，可見反共最力者，共黨知之最深，而以頭號敵人視之也（以今日國際情勢大變觀之，家兄與我乃爲先知先覺者），其實稍一靜思，即知CC爲共黨所僞造者，其理由如下：

(一)本黨總章，明文規定不許有小組織，焉有黨掌理組織者，自己反而違紀攬起小組織之理。

(二)黨的英明領袖，絕不容許部屬攬小組織，而不予懲處，否則他自己犯失察之罪。

(三)以戴笠調統工作之嚴密，其能放過CC而不深究嗎？難道找不到一點證據嗎？

四我兄弟二人，民族觀念很深，即使有之，亦絕不會用英文來命名自己的小組織的。

有此四點，可見CC，絕對爲中共所僞造，無而爲有，久假成眞，亦不得不佩服共黨宣傳之高明，際此我的回憶錄出版之機會，爲使國人咸知CC名稱從何而來，以眞相向大家報告，俾歷史學家不再爲其所欺，則幸甚矣！

何以「四大家族」亦有陳氏在內

本黨自興中會開始組織成立以來，所有參加份子均爲慷慨赴義之士，抱犧牲生命之精神，一向不重形式，若欲與嚴密組織之共黨鬥爭，絕無勝利之可能，所以家兄自代理組織部長期間，乘此北伐勝利時機，建議蔣公大量徵求青年黨員，以充實本黨在各省市之基礎，並一方面訂定一切有關組織訓練及選舉之法規，使本黨各級逐漸成爲現代化組織之黨部，另一方面組織部成立調查科，專事對付共黨之組織而予以破壞之，此一工作，則交由我負責推行，一正一反，使共黨知所畏懼，不敢放肆，各下級黨部均附有調統部份，故本黨亦漸漸成爲反共之戰鬥體。而吾兄弟二人亦成爲共黨攻擊之目標矣。

吾兄弟二人少承祖訓：

「壽本乎仁，樂生於智，

勤能補拙，儉可養廉。」

故一生忠勤職守，廉潔自持，爲衆所週知者，唯對於國家財政金融制度之不合乎國情者，不得不建言改革，期能合乎三民主義之原理，而不爲帝國主義者用以剝削殖民地人民，其性質爲純粹商業，對於工業農業，毫無好處。我曾著文批判之，及蔣公在江西剿共，親見農村無金融機構，始悟國家應有利農之金融機構，乃派家兄擔任農民銀行董事長，始將該行之百分之百的商業貸款改變過來，以利農民，中國之合作制度亦爲家兄所首倡，故又使兼合作金庫董事長，其後復使兼任交通銀行董事，共黨遂利用此一機會攻擊家兄在金融界之地位與力量；而在《蔣宋孔陳》一書中，陳家亦被列入攻擊爲四大家族之一，共黨之惡毒有如此者。

共黨青年紛紛來歸

我方之反共係站在中國文化觀點，故對於共黨青年予以自新之路，凡來歸者不咎既往，而予以中國文化及歷史課程之補習，並任用彼等於各級黨部，先後來歸者爲數約一萬五千餘人，此爲共黨所最痛心疾首者，後來共黨之特務工作首領顧順章，亦由武漢調統工作主管蔡孟堅同志所感化，暗中來歸，使共黨在各地特工組織，爲我方一網打盡，周恩來在上海如慢了

五分鐘，亦可能爲我方所捕獲（此乃周恩來在政治協商會議宴會席上親自告我者），此者，共黨之所以恨我兄弟二人最甚之極大原因也。

以理論打擊共黨由我開始

我人之反共既基於中國文化，我遂從中國文化之根源——易經——找到唯物史觀之錯誤，生存才是進化之中心。生命必須包括心與物二者，亦即國父所發明之生元（生命的元素），具有心物二者，而非唯物，依「孤陰不生，獨陽不長」之原理，祇有「唯生」，才能存在，遂著《唯生論》，由理論方面從根駁斥之，共產黨曾下令黨員著文攻擊，唯無一能駁倒我的創見也。共黨因此更增其對我之仇視，家兄除對本黨擴大及堅強組織外，對於本黨財務方面多多策劃，使華僑捐款善得其用，例如南京城內自南至北之中山馬路、陣亡將士公墓、中央廣播電台，及華僑招待所等建築，均由華僑捐款所造成，華僑之四海歸心，亦有助也。

頑固份子與自由份子

共黨後來又以CC爲頑固份子之代表，有別於其他之自由份子，其實堅信三民主義份子而永不動搖者，爲共黨所最怕，稱之爲頑固份子，擇善固執而已矣，國人不察，人云亦云，

以致CC、四大家族、頑固份子之稱謂，均加之於我兄弟二人之身上矣。

爲本黨培植基本政治幹部

家兄開始本黨的組訓工作，前已言之，在與共黨鬥爭中，深切瞭解本黨如無強有力之幹部，則難以生存發展，遂建議中央有黨務學校之創立，由蔣公任校長，其實際工作則由家兄任之，後來改稱中央政治學校，其業務仍由中央黨內元老所組成之校務委員會主持之，我亦爲委員之一，由於家兄及我對元老之尊敬，使彼等均願出盡心力，以助校長蔣公，故一切進行頗爲順利。

政治學校除一般有關政治學科之外，另設地政、合作、新聞及蒙藏等學院，均爲其他大學所無者，家兄一生所化精力最多者，亦即對於政校，其對於學生之愛護亦逾尋常，學生亦事之如父兄，故共黨亦誣稱政校師生爲CC，黨校、政校畢業生，對黨國之貢獻至爲偉大，茲不贅述。

總之，反共之實際工作，吾兄弟二人均力盡棉薄，並以至誠至仁之心懷，善待同志，使彼等能忠於黨，忠於領袖，共同爲實踐三民主義而努力，不明事實之人，以爲你兄弟二人，若非有小組織，何能指揮同志如此之順遂，殊不知「至誠動人」之明訓使之然也。「蔣家天下陳家黨」，遂遍傳於天下矣，建黨救國，爲吾兄弟二人之素志，毀譽非所計也。

養生心得，勤練內八段錦

我年事已高，但身體仍甚硬朗，所以對於養生也小有心得。我自小即有一偏好，總喜歡吃雞、鴨、豬等的腦子，但不多吃，差不多兩星期至一個月吃一次，也許有人不相信，比方到現在，我的視力仍甚佳，我覺得這和我喜吃小銀魚有關係，我用小銀魚炒蛋，每次總有一、二百條吧。在舊時傳說中，認爲吃什麼補什麼，如果屬實，那麼我吃下一、二百條小魚，即有三、四百隻眼睛的營養，長期下來，便足以使我的視力保持良好，不能說沒有道理。

我有一個理由很科學，即人的體內不是像農業社會的，而是像工業社會的，它自己能製造其所需要的原料，也就是說吃下什麼東西，將經過消化系統供應人體內所需該類東西的部份，使之化合製造，不一定要吃什麼補什麼，祇是到了老年時才需要，有如人在年富力強時，體內有似自己種棉，紡紗，織布，自製衣服穿戴，但年紀老了，已無此能力自力更生，即應化錢買件現成衣服以供所需，如吃雞、鴨、豬腦，藉以補腦者就是此道理。

但這類補品因含「膽固醇」太高，實不宜多吃，要能恰到好處，即能供其所需份量，便不致有害了。比如我有時買一個豬心吃，通常一月吃一次，再加以隔一、二個月吃個豬腦，自應無問題。因爲我檢查身體的報告中，我的「膽固醇」祇有一百八十，自然可以吃的。

最近從瑞士回來一位許先生，他說在那邊有一家醫院，發明了「吃什麼補什麼」的特殊醫療法，稱之曰「細胞治療法」，他就是該院的副院長，但仍有些人不相信這個醫療法，事實上卻醫好了很多人，如英國伊利莎白女王、南斯拉夫狄托總統、德國首相艾德諾等政要名人，都是此種醫療法的痊癒者，尤其艾德諾的臨終遺言更發人深省：「德國大學應研究以細胞補細胞的醫療法。如我不是經此醫療法醫好疾病，則我不會爲國家又服務二十年！」

根據那位許先生的說法，瑞士這家醫院的醫療法，是從羊肚中取出羊胎，經過消毒後烤乾、分類、解剖，將耳、目、口、鼻等各器官及內臟各部門一一磨成粉末，並製成針劑，予病人注射，其治療效果奇佳。此一醫療方法，將來必因療效之顯著，而擴大施行。

附「養生之道」：

養身在動　養心在靜　飲食有節　起居有時
物熟始食　水沸始飲　多食果菜　少食肉類
頭部宜冷　足部宜熱　知足常樂　無求常安

往昔，西人曾譏笑我們國勢衰敝，人民羸弱，乃謔稱之謂「東亞病夫」；故蔣委員長於抗戰期間提倡「新生活運動」，就是針對此譏刺籲請國人革除舊習，強身報國。

我一生從事公職、由美回台定居後，設法退出政壇，期能以有生之年，在復興文化工作中發揚先聖先賢之道統，克盡一份綿薄之力，但這是一項艱鉅繁重的工作，必有賴於健全的身心；因此，我很注意健康身心的運動。

在僑居美國時，曾於華美日報讀到一篇中國秦姓婦女寫的文章，淺釋「內八段錦」爲有強身的功能，應說是一種強化與鍛鍊身心的「中國功夫」。我讀了這篇文章後，覺得很有道理，特地到紐約去拜訪她。她是秦昭芬先生的夫人，東北人，她告訴我說，內八段錦功夫她已做了八、九個月，發現有三大益處：第一，胃口變得特別好；第二，原有耳疾常流黃水，現已痊癒；第三，往日腿上有紅筋暴出，已不復現。

根據她的口述，內八段錦是這樣習練：

首先從眼部運動；兩手搓熱；自眼瞼向左右撫摩；然後揉搓太陽穴；再前後撫摩兩耳；再以二指輕彈後腦骨；再摩擦耳後；再揉搓鼻子；再咬勁牙齒；再撫摩喉頭；再撫摩後頸，並使中樞神經也受到運動；然後以兩手揉擦胸口腹部；再撫摩腰部；再摩擦攝護腺兩邊；再坐下，一手揉膝蓋，一手搓腳心；上述運動，每式動作最少要做一百次。另我自己附加一項起立——蹲下運動，上下做二十次。

從獲知這項運動起，三十五年如一日，每早起床就做，一直持續不斷。運動畢即大小便，然後淋浴。此運動最初是在床上做，自十二年前開始，我就利用淋浴時一併做，那就是水沖到那一部位，就用手摩擦那一部位。淋浴與運動併做以來，我感到效果更佳；因爲在淋浴時做此動運，必更能促進血液循環，此應是我所創見。回溯自做這項運動起，我的宿疾腰疼，已完全痊癒，攝護腺不必開刀而愈。

我生活很有規律，早晨五時三十分起床，晚間通常九時三十分入睡，有八小時睡眠。起床後排便、淋浴、運動、洗臉等約佔一小時（運動三十五分鐘），至六時三十分就一切完畢。然後用早膳，早膳後開始散步五百步，庭院中花木很多，空氣清鮮，漫步其間，頗收怡情悅目之效。

每天晚飯後看電視，在家都是六時三十分進晚膳，然後邊吃邊看電視新聞和其他節目；但在插播廣告時，我便利用此間隙在屋中散步：自客廳、廚房、臥室，來往踱著步子，合共約五百步。

內子也有在床上作此運動的好習慣。她每日六時半起床，早餐後散步，通常在陽台上走二千步，我有時也跟她一同走。如非外出開會時，我即在家寫點東西，做些整理文稿等工作。中午小睡一小時左右，然後起床再繼續工作。

我的飲食很清淡，喜吃青菜豆腐，油膩肉類較少；我的膽囊切除後，更不能吃太油膩的

東西。我有一點糖尿病，吃東西稍不留意，血糖就升至一百七八十度；一百二十較理想，超過二百便須注射因素林。現在我已經控制到一百四十左右，差不多高了二十度。目前有一種理論，即超過六十歲的人，每增一歲，血糖即可加一度，而我已逾越九十歲，故理想之血糖高度，超過一百五十亦不為高。

我的血壓最好。低血壓六十至七十；高血壓一百至一百二十；可說極為正常。像我這樣一個年達九十餘高齡的人，是很少有如此正常血壓的，此應歸功於運動的效果。常記得一位老方丈告訴我的一句箴言：「養身在動；養心在靜。」這位高僧說此話時，已逾九十六歲，且常以上述八個字，示人以健康長壽之道。

我的健康良好，確是運動的功能。早年讀中學時我就喜歡運動：舉凡網球、籃球、游泳、足球、滑水、跳高、跳欄、賽跑等，我都參與活動，他如：形意拳、太極拳我也都打過。可以說各項運動，我都有濃厚興趣。同時，我讀的中學要求很嚴，學業成績平均必須八十五分以上，一小時假都不請者，學期終了可獲頒一獎狀，四年下來，我榮獲七張獎狀紙，一學期未拿獎狀，那是因家兄果夫結婚，請了一次假的關係。讀大學時我也喜歡運動，主要還是為了鍛鍊體魄，我確認身體健康原是人生最大的幸福。故有人邀我演講時，如一時未特定題目，便作臨時性的養生經驗講話，告訴大家如何運動。譬如七十三年我在政大校友會新年團拜時講話，就曾把上述那套運動方法一一講出來並表現示範。

我這個人卻還有一個優點，躺下不到五分鐘就睡著了；因此，我一向都睡得很好。我有一重要原則，即我答應要辦的事，便一定拚命去做；即使做得未盡理想，但我已盡了全力。由於已全力以赴，故我入睡時便不再想白天所做的一切，於是我就能安然進入夢鄉。

此外我有個特點，也是多數人難以做到的，那就是當有人在旁高談闊論時，我可以不受影響，照樣伏案沉思，冷靜的寫文章。此時我能把兩耳封閉起來，聽之而不聞。

因此，我由士林家中到北市南海路孔孟學會上班，歷時約三十五至五十分鐘，便充分利用這段時間在座車中批閱公文，毫不受沿途車輛的嘈雜干擾。

我常在忙碌中度日，通常每天寫五、六封親筆信，還要替不少人題字、作序等多方應酬，並編寫文化教材，逐日與文牘爲伍，好像有永遠做不完的事。但我並不疲憊，此應是我受自強不息常年運動之賜！

喜見五世其昌

我與內子孫祿卿女士結婚正值北伐開始期間，戎馬倥傯，無暇顧家。結婚不到一旬，即回去江西上戰場，兩年後大兒子出生了，取名澤安，二兒子名澤甯，第三是女兒名澤容，第四又是男孩名澤寵。那時我正研創五筆檢字法：「丶一丨ノフ」，亦就是點、畫、直、撇、

曲。我遂以此分別爲子女取了乳名，即老大叫點兒，老二叫劃兒，老三叫直兒，老四叫羽兒（本爲「撇」兒，亦因不順口才歸併撇與曲成爲羽兒）。而羽兒另一含義，是當其出生那天，正值日機轟炸重慶，也恰是關羽的誕生日。附帶一提的是，我本計劃有五個子女，但因我臨時奉派歐洲公幹，內子未經我同意，就擅自墮去（老三與老四之間）一胎的關係，祇好第四孩子叫「羽兒」。

我的長子澤安，娶張哲惠先生之女張智眞爲妻，她原是我們的乾女兒，育有三子一女。由於我家是虞舜後代而族譜輩份是：延、其、祖、澤、紹、乃、家、聲，故其四子女適值「紹」字輩，乃依序取名爲：紹虞、紹舜、紹玲（女）、紹瑾。

澤安爲金陵大學園藝系畢業，嗣入美國威斯康辛大學讀植物病理學，獲碩士學位，再於新罕姆西夏大學攻讀植物病理，獲博士學位，現執教於紐澤西州立大學。並於美科學雜誌發表治危害植物細菌二十五篇以上論文，七十二年曾以兩票之差，未能當選我國中央研究院士。

澤安之妻即張智眞，爲美國西屯豪大學教育碩士，現在家中教烹飪。

澤安的長子紹虞，威斯康辛大學碩士，加州大學博士，研究動物病理，對於癌症研究具有突破性的創見。次子紹舜爲新澤西州立羅傑大學經濟財政學士。其女紹玲學農業工程。三子紹瑾正唸大學學士。

我的次子澤甯，娶陳廣沅先生之次女陳掬英為妻，育有三子，依序是：紹文、紹彬、紹傑。

澤甯為台灣大學畢業，他是學工的，復於麻省理工學院研究機械工程，獲博士學位，現於美國英格沙蘭德總公司做研究工作。其妻陳掬英，係加拿大大學化學碩士，現任電腦工作，其長子紹文，在MIT習機械工程得學士學位。次子紹彬哈佛畢業，三子紹傑現讀史丹福大學。

我的女兒澤容，與其母一樣，是學美術的，在紐澤西湖林城一所私立學院名GEORGIAN COURT 獲美術學士，從事會計電腦工作。其夫婿為俞潤身，是俞鴻鈞先生姪兒，為賓州大學化學博士，後來基於需要，復讀工商管理碩士，現於波登公司任研究部主任。共育有子女三人，依序是：俞國平（波斯頓大學之博士）、俞小容（女，波斯頓CONSEERDRY MUSIC COLLEGE音樂學士）、俞季平現在已獲得法學博士，在新罕西州任律師助手。

我的三子澤寵，為美國普渡大學航空工程學士，復獲工業藝術和工商管理碩士，現於台灣經營進出口生意。其妻林穎曾為林尹教授之女，係西班牙馬德里大學文學碩士，現任外交部專員及科長。育有二男，依序是：紹誠、紹仁，尚分別在唸中小學。

我的家鄉是吳興縣，老家在府學前「五昌里」，從祖父、父親、我，及我的子、孫，算

起來已是五代，家中和睦昌盛，正是「五世其昌」的徵兆。我的祖父眷蒼公爲人忠厚，相傳在曾祖父逝世後弟兄們爭家產，祖父謙讓爲懷，不與爭任何家產，他說：「我衹希望子孫五世昌睦有成就夠了！」父親輩有兄弟三人未分家，和樂相處。我兄弟三人即果夫、我及祖烈（另有一弟名民夫，陷大陸已去世），正如上一代從未吵過架，亦不分家。我的子孫輩亦安居樂業，各個學有專長，必能發揚家規。如此看來，倒眞能達成我祖父的「五世其昌」的心願了。

我的長孫（澤安之子）紹虞，在加州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後，去洛杉磯加州大學研究動物病理，並在其曾榮獲諾貝爾獎的指導教授指導下，對人類癌症有創新的突破研究，在他三十歲時在英國《自然雜誌》及美國《科學雜誌》發表了論文，受到醫學界無比重視。哈佛大學擬以年薪四萬美金及獎助金十萬元挖他過去，但被他婉拒了。他仍願在目前UCLA做研究工作，繼續從事癌症研究，也許他會創造奇蹟，爲我們陳家獲得一個諾貝爾醫學獎！當他把他的決定告訴我時，我亦支持他的灼見，我的兒子澤安（紹虞之父）也鼓勵他說：「錢是身外之物」，要其子繼續留在現在的大學研究。且該校還揚言：「如有一學校給你高薪請你去，我們會給你更高的待遇留下你。」

記得此長孫即紹虞於加州大學博士班畢業時，我曾以祖父分家故事在信中告訴他，並殷盼其發揚家風，使陳氏家族對人類作更大的貢獻！以期勿負先祖「五世其昌」之厚望。

愛其所同，敬其所異——夫婦相處之道

我妻孫祿卿女士，與我同籍，她是孫蓉江先生之次女，繪畫天資甚高，曾拜名畫家王一亭先生爲師，尤其對山水畫造詣極深。其父孫老先生與家父同爲典當業經理，故成爲至交，二人在地方上均頗孚衆望，因此在鄉里間有喜事或喪事，都請他們爲執事先生。少時記得他們二位任調解地方糾紛時，人們常能祇聽他們「一句話」即予平息紛爭，可謂之爲地方造福。

正因爲他們兩位同屬地方有頭有臉的人物，且係莫逆至交，二老乃將其子女終身大事給定下來。我與妻祿卿同年（她長我兩月），在十三歲時就訂了婚，接著讀中學，進大學，最後去美國深造，她就進上海美專。待我出國前夕，在親友們爲我餞行時，才在親友陪同下，在一處名叫沈氏義莊的私家花園中正式與我未婚妻會面。在傳統禮教約束中，雖然相晤，但也僅止於說幾句客氣話而已。當然在此之前，亦曾於鄉里間親友所舉行婚宴中不期而遇，但那都是一些可望而不可及的場面。

在負笈海外期間，我與未婚妻曾不斷有著書信往還。後來我學成返國，在上海稍事停留即赴廣東晉見蔣公，不允許我講理由，硬把我留下擔任機要工作，致未能按預定計劃施展所學服務於煤礦業。

直到民國十五年年底，我方於上海租界中與未婚妻完婚，已距訂婚之期相隔十四年之久。此時正值北伐期間，我隨軍征伐，根本無暇顧家，就是後來相聚，育有子女，亦因我工作繁忙，早出晚歸，極少和孩子們見面。幸賴我妻執掌家務，管教子女，乃能使我把全部時間，致力於公務。

八十一年，我與妻結褵已六十五年了，如由訂婚算起，已屆滿八十年了。在這漫長的歲月中，深覺我妻聰穎嫻淑，並富有聯想的敏感，譬如往往說到此一事，她即能聯想到彼一事。她有很強的管理能力，對家中傭人恩威兼施，她們也心悅誠服的願接受其意見，故傭人一來我家，便不肯再離去。

我妻有良好的整潔習慣，櫥櫃中所放東西，一切井然有序，衣飾器物，都有定位，故常見家中一絲不亂。此點我的女兒澤容，已深受其母薰陶。我妻個性很強，但她做的事我不去干預，偶有意見相左，我不當場反對，常在就寢時作心平氣和的檢討。其間，就是管教子女們的方法兩人意見不同時，同樣不當場反對，雙方適當保留其顏面，如此一來，也能使子女們得到父母的修養榜樣，事實上我妻的性格，有多地方和我完全不一樣，而我卻常能以八個字處之：「愛其所同，敬其所異」，亦即相同的地方要能相處，不同的地方使能相互尊敬。比如她脾氣很急，我則頗溫和，有時我想，我的溫和也有缺點，若有些事需要急的時候，她的急也能彌補我的缺點。這樣一想，我就會覺得她的個性不一定要同我一樣了，再如我喜歡

用錢，祇要帶錢在身邊，便常會花光，但她則用錢謹慎，沒有隨便花錢的習慣，否則，她如果和我一樣，則家中便很難有儲蓄了。因此我認爲夫婦相處，要能相互認識對方的長處，彼此便不會合不來，亦就不會有口角了。

夫妻朝夕相處，有些小事還要能夠相互容忍，比如我妻不易流汗，而我則相反，由於她不出汗便不怕傷風，故喜歡大開窗戶，但我卻常因吹風著涼，所以不習慣大開其窗，然而我卻從未堅持己見，不反對她開窗戶。又比如參加親友邀宴，她化妝時我便做我的事，待好了又催我時，我就說剛才等你半小時我沒催你，現在不過才等我幾分鐘，你就連番來催我了。如此便可「輕描淡寫」的一筆帶過。

此外，我妻也有和我根本不同的地方，由於她是學美術的，家中一切都要合乎美的標準，如客廳沙發、臥室家具乃至窗帘色彩等，她要佈置得很協調。而我則是學工程的，一切要講求實用，亦即主張實用第一，我妻卻以美觀第一。此皆因所學不同，故觀點亦不一樣。所以家中一切陳列我不過問，任由其發揮愛好與所學。至於經濟，亦全由我妻執掌，我倆並共用一銀行戶頭，兩人都可隨意取款，絕不懷疑對方之用途，互相信賴，自然便融洽無間了。我與妻結褵已六十多年了，在生活中從未吵過架，都是相互容忍、互爲信賴的結果。有時親友邀宴請我講話，我就把上述道理提出來規勸大家，亦頗能引起在座人士的共鳴。

我的岳父孫蓉江先生早於抗戰前過世，岳母吳氏相夫教子極有能力，惜天不假年而早

逝，吾妻有一姐姐及哥哥也已亡故。繼母翁氏育有三女，抗戰時隨我全家偕往重慶，和我們住一起，除照料其生活外，並把三個妹妹讀到大學畢業，所幸那時我做教育部長，有此經濟能力。我繼岳母身體康健，七十三年六月即滿一百歲。岳父生前很喜歡我這個女婿，似乎已料到在他身後我必能全力照顧其一家人，我總算不負其所託。

在老家時，我們兄弟姐妹相處和睦，我對大嫂極爲尊敬。因先兄無子，故我將大兒子澤安在名義上過繼給他們夫婦，以承其綿延不絕的香火。

經驗所得，成敗之鑑

在大陸一直從事黨政工作，戰事失利，退守台灣，我始有機會離開政壇，唯蔣公仍以總統府資政見畀，在出國退思補過期間，過養雞生活，以求自給。此時在他國雖欲回返採礦本行工作，爲時已晚，蓋舊業已荒，新知落伍，一生志願，付之流水，補救殆已乏術。唯從長期經驗中，我獲得如下之結論：

於己而言

(一)個人應立志，國家亦應立志（建立一個富強康樂之三民主義民主共和國，進而實現世

界之大同）；個人之志與國家之志兩者無法兼顧時，必要時應捨去個人之小志，而先實現國家之大志。

(二)精神與物質二者不能偏廢，物質礦無機會開採時，亦不妨開採精神礦（文化礦），其裨益人類則同。

(三)所學之科學方法與採冶工程技術，亦可用之於其他方面，蓋盡物之性與盡人之性，可以相通（見中庸二十二章），運用全在乎人。

(四)成功不必自我，可以助人之處，應盡力助之，與所學有關或相近者，尤不可失去機會，從旁協助，「人之有技，若己有之」，此一偉大觀念，一經具備，則心境開朗，不復作怨天尤人之想矣。

(五)一生用非所學，成效不易顯著，雖以竭智盡忠自勉，終須邊做邊學，起初往往無充分之自信，即使延用內行者爲助，以外行管內行，非誠信待人，不足以服人也。

(六)寧有志而未得用，不可無志而求倖成也。

(七)任勞易，任怨難，爲領袖任怨就是忠，任怨而不求人知，是量大，而必須先有自信。

(八)爲領袖者必須愛護部下之安危，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切不可有私毫私心，否則必如孔子所云，「智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

(九)我一生所見的人不少，聰明的人很多，而氣量大的人極少，量小則不易容人，此其所

以易於失敗也。

(十)以我之至忠無我，最後尚難取信於上，我之過歟？人之過歟

(十一)我有二事，永難使人諒解者：(1)我對於做官無興趣，卻又做了二十餘年之官，有些人想做官而不得，而不知我一直求去而不得（辭職有五、六次之多）。(2)他人想你怎麼能使黨內同志聽你的話，而無小組織的存在，他們殊不知要人聽話，第一要無私，第二要無求於人，才能使同志服從領袖，實行主義及政策。

(十二)我祇能成敗聽之於天，毀譽聽之於人，爲共黨之勁敵，文化之衛士，足矣！

於國事而言

(一)打天下靠軍事，治天下靠經濟。國父是經濟長才，而乏軍事長才爲之助，故不能得天下；蔣公是軍事天才，而乏眞正經濟長才（尤其於抗戰勝利後）爲之助，故得天下而復失！

(二)蔣公從北伐開始，以至於佔領北京，莫不身先士卒，以寡敵衆，智勇兼備，應用有方，故能對軍閥各個擊破，整個作戰時間不到一年，開吾國歷史之先例，可稱軍事天才，爲衆所悅服，出民水火，功垂史冊。

(三)蔣公出身軍事，威勝於信，軍閥之來歸者，畏威而非心服，而眞正革命部隊原非準備成熟而出師北伐，故相形之下，基本部隊人數，不及來歸者之多，引起來歸者之野心，有機

紛紛叛變，幸革命部隊，能以一勝十，加以敵人陰謀，吾機要科均能以破譯密電早呈諸蔣公，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矣。

㈣本黨老同志之在黨內有力量者，不能秉公爲蔣公助，甚至勾結軍閥、共黨、日本如汪精衛者，以對付蔣公，故蔣公無時無刻不在三面作戰，眞所謂堅苦卓絶，幸蔣公爲實行國父遺囑之信心堅定，不屈不撓，卒能開成國民會議，公布訓政時期約法，及廢除不平等條約，進而制成憲法，進入憲政時期者，實非易易，其功不可沒。

㈤抗戰開始，共黨雖宣言共同抗日，其不守信，早在蔣公預料之中，唯吾方軍力尚能控制，故無大礙，苟勝利後，我軍事方面不自大輕敵，處理游擊隊有方；經濟財政方面，不採取措施，造成民怨；外交方面不使美國居間，予共黨以爭取時間良機；黨務方面，不讓友黨以國大席位，及早告知李宗仁此次不要參加競選，則大陸之失，必能避免。

㈥所有帝國主義者，在我國失去既得之權利，心孰能甘？故凡共黨造謠攻擊本黨及蔣公者，莫不爲之轉播，積非成是，解釋爲難，而共黨得其利矣。

㈦政權之維持，不能靠軍隊，如施政有違民心，終必失敗。蓋軍隊亦爲人民所組成，而違民意之措施，乃自殺也。「兵敗如山倒」者，無鬥志以擁護其不願擁護之政權也。故曰：「得民心斯得民矣。」

㈧爲領袖者，必須親賢人，遠小人，無絲毫自私之心，庶能領導他人，以成大業，蔣公

不嗜殺人，而好使部下力量對立（如黨與團、政校與幹校等等），雖雙方均對蔣公擁護，終致力量抵消，效率低落，非良策也。

以上數點爲余所能見到者，是否有當，仍請讀者指引。

